
金 日 成
回 忆 录
与世纪同行
（续编）8

金日成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

8

（续 编）

外 文 出 版 社

朝 鲜・平 壤

主体87年（1998年）

第一部

抗 日 革 命

（8）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从早年投身革命斗争以来，肩负起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一心为祖国和人民、为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他的一生。

金　正　日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将革命的旗帜坚守到底

时期：主体29年（1940年）4月～主体29年（1940年）12月）

一　在小哈尔巴岭

小哈尔巴岭会议是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的重要的历史性会议。会议制定的新的战略方针是，为早日争取抗日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好准备主动迎接光复祖国的大变革。

小哈尔巴岭会议的召开，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劳苦和热情的产物。正当抗日革命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候，金日成同志为了将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逆境变为顺境，化险为夷，倾注了全部心血。

对这次会议的筹备和进行情况，金日成同志曾多次回忆过。现将他的回忆记录于下：

在红旗河消灭了“前田讨伐队”以后，我们在花拉子密林里对朝鲜人民革命军走过来的路程作了总结。这个总结，也叫做二十万里长征的总结。其意思就是我们走过的路程有二十万里。

要巩固这个长征的成果，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就必须做更多的工作，走更遥远更艰险的征程。因此我强调说：

“我们在长征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政治思想的优越性和游击战术。这就是二十万里长征的主要总结。当前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峻。要根据目前的情势和地理特点，熟练地灵活运用多种多样的游击战术和战法；要深入人民群众加

强群众政治工作；要有决心，为了革命的胜利，再走几十万里的路程；要抱着革命必胜的坚定决心，毫不动摇地把革命的旗帜坚守到底；要继续紧紧地掌握主动权，狠狠地痛击敌人。

1940年春，是“野副讨伐司令部”对人民革命军的进攻空前猖狂的时候。为消灭我们人民革命军，他们调动了庞大的兵力，订出了周密详细“天衣无缝”的“讨伐”计划。

尽管形势如此严重，我们还是决心继续掌握主动权。我们一向因掌握着主动权而压倒了敌人，将来也一样，不管形势怎样变化，一定要继续掌握主动权。

靠什么掌握主动权呢？就是靠我们自己的精神力量和战术。论兵力和武器装备，我们远不如敌人，是劣势；但是在精神力量和战术方面，我们比敌人强得多，占优势。问题是谁拥有更优越的指挥艺术，无疑，这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我们走进花拉子密林的时候，“野副讨伐队”各部还守在山地的他们认为可能有革命军出没的各个要隘上，不想走开。

尽管我们开会强调了掌握主动权的问题，但实际上，敌人仍包围着我们，形势十分不利。野副嫌他东满的兵力不够，准备从通化方面再调一批兵力来向他增援。据吴白龙说，这支兵力已经到达了延吉、敦化县境的亮兵台。长白方面也有一个叫什么工作队的部队已经到达。

在敌人不断增强兵力扩大“讨伐”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他们呢？

在敌人打着“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的牌子进行第一

阶段大“讨伐”时，我们用大部队回旋战的方法打败了敌人，而这次，敌人的攻势比过去更加猖狂，应该怎样予以粉碎？这是个问题。是因为过去大部队回旋战奏了效，如今仍要用这种打法呢，还是用什么别的打法？看当时的东西方形势，德国和日本发动的战争迟早会席卷全球，所有的列强和大小国家都将被卷入这场浩劫，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估计未来，制定什么样的战略？这是我们不能不深思熟虑的。

换句话说，我们面临着两项需要同时解决的任务：其一是必须制定粉碎当前敌人“讨伐”的战术对策；其二是必须确定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战略路线。

我决定一面制定扭转红旗河战斗以后出现的困难局面的战术方案，一面酝酿新的战略构想。

当时，敌人的所有兵力都集结在山区，城镇和集团部落只有警察和自卫队把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掌握主动权，就必须转入分散活动，都转移到丘陵地带去，扰乱敌后，分散敌人的“讨伐”兵力，这才是稳操胜券的战术。

按照这个计划，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于1940年4月中旬，秘密地离开了花拉子密营，踏上了最终粉碎敌人“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的征程。我们首先同时袭击了小沙河流域的大集团部落东南岔和洋草沟，在树街峰峡谷消灭了尾追而来的敌人，然后甩开敌人，悄悄地隐蔽到车厂子方面去了。

在延吉和汪清一带活动的安吉和崔贤的部队也配合我主力的活动，在县的中心地区开始了扰乱敌后的作战。

尽管我们在好几个部落里发出了枪声，但敌人没有什么使我们满意的反应。可见，要想分散敌人，还需要向敌人投出更大的诱饵。于是，我们决定同时袭击安图县城东边的三个部落。就这样，在某一天夜里，闪电式地同时攻打了南二道沟、北二道沟和新成屯。

这一下，敌人上钩了。一直守在安图、和龙两县南部交界地区的关东军部队，以为安图县城马上就要陷落了，立即蜂拥而来，朝满边境的国境守备队也与之汇合。

我们这样不惜代价地把敌人诱到安图县中心地区来的目的，既是为了分散敌军予以打击，也是为了趁豆满江一带的日军出动之机，再次把武装斗争的烈火扩大到国内去。

当时，肩负进军国内任务的是金一的第八团。我叫他们一面向国境一带徐徐前进，一面进行分散活动。同时，派第七团和警卫连去安图县北部地区。从此，我们天天打击敌人。

不久，金一带一支小分队悄悄地打进了国内。5月中旬，他们打入茂山郡三长面一带奇袭了国境守备队，还进行了两天的群众工作。当朝鲜总督南次郎命令日军严密布防，不准一个游击队员进入国内的时候，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一支小分队居然出现在国内，不仅发出了枪声，而且还从容不迫地进行了群众政治工作。这在40年代前半期的抗日革命历史上是一项令人注目的辉煌战绩。

为了巩固进军国内的成果，我们在豆满江沿岸和安图县中部与北部开展了更猛烈的歼敌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野副讨伐司令部”的新“讨伐”作战刚刚迈出头一步，就遭到了这样沉重的打击。于是“讨伐司令部”和“地区讨伐队”、“小区讨伐队”之间为此天天吵架，上头追问下头，彼此间互相推卸责任。司令部又要下达什么新的“讨伐”方针，闹得天翻地覆，沸沸扬扬。

当我们忙着准备新的作战的时候，韩仁和从南满带领第一路军的残余部队五六十人来找我们，说是魏拯民派他们来的，要汇合到我的部队里共同行动。韩仁和是第一路军的参谋兼警卫旅的政治委员。

我们决定同南满部队进行联合作战，以提高他们的士气。一进入6月，我们就攻打了东京坪和上大洞。攻下之后才发现，东京坪是毫无防备的。原因是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再攻打这个十几天前已经攻打过的地方，马虎大意了。此后我们又同时攻打了几个部落。袭击古洞河木材所的第二天，我们用缴获的战利品，同南满来的战友们一起欢度端阳节。

韩仁和喝了几杯酒，握住我的手说：“我现在才明白魏拯民为什么派我到金司令这边来。看现在的形势嘛，间岛这一带比南满那一带险恶得多，可是‘讨伐队’好像不是按野副或梅津的命令行动，而是听金司令的调遣。”

他对我们的作战有很深的印象，说：“第二方面军最棒，金司令的部队才是百战百胜的劲旅。现在，我们也有了信心。我要到额穆、敦化方面去见见陈翰章，再到宁安方面去会一下周保中，然后痛痛快快地大干一番。”

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胆大无比的活动，把日本鬼子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他们为了扭转“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每况愈下的局面，在间岛全境布下了严密的警戒网。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队伍里发生了意外的事故。原在大马鹿沟附近的密营养病的方面军政治主任吕伯岐被敌人俘获，供出了我部的全部秘密。

我们决定以变幻莫测的多种战术连续攻打敌人，以扭转因吕伯岐的投降而出现的困难局面。我决定首先把队伍化整为零。也就是说，把方面军分成几个小分队，在各处果敢、灵活地开展消耗战。把队伍化整为零，既可以保证行动的机动灵活，又便于突破敌人戒备森严的警戒网，使敌人再度陷入混乱。化整为零，队伍的规模变小，即使一旦被敌人发现，也能迅速隐匿。

这个想法成熟了，我们立即把方面军编成许多小分队，全面开展了消耗战。

如上所述，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不仅没有犹豫，而且果断地进行了迎头痛击。如果当时我们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住，畏首畏尾，避敌而逃，后果会是如何呢？不用说，肯定我们会吃大亏。我们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不给敌人以喘息和清醒脑子的机会，连续不断地打击了敌人。

在1940年春夏两季的作战中，朝鲜人民革命军取得了胜利，这是连敌人都承认的。

“巧妙地躲避了秋季、春季讨伐矛头的匪团，乘草木繁茂之季，到处猛烈活

动，尤其最近积极袭击第二线、第三线的部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我和诸位一样，为之深感遗憾。日满军队、宪兵、警察、铁道警护队、协和会，等等，多达几万人。诚然，季节与地形均对我不利，但他们却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威力，其原因，其责任，当然首先在于讨伐司令官我本人以及诸位。但仔细地考察最近的情况，不禁深觉遗憾，痛切地感到，讨伐队和各机关的融合团结与动态所表现出的许多弱点和问题很严重。它阻碍了肃正诸工作的进行，进而招致了容许匪团活动的后果。”(引自《治安肃正关系书类》野副讨伐司令部，昭和15年)、(译注：昭和15年即公元1940年)

经过1940年春夏期间的作战，我们积累了小分队活动的许多经验。从前，根据情况，也曾进行过小分队活动，但主要的还是大部队活动。到1940年夏季，以小分队为单位，到处运用了连续打击、反复打击、同时打击等灵活的战法。在这过程中，我们取得了新的宝贵经验：敌人越是增强“讨伐”兵力，越是布上水泄不通的包围圈和警备网，我们就越缩小战斗单位，越以小分队活动的方式开展游击战，是更为有利的。这一经验，为我们制订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及其执行办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不是以这种经验为基础，在那年8月举行的小哈尔巴岭会议上，我是不可能主张以小分队活动取代大部队活动的。由于有了经验和信心，所以我们在40年代前半期以小分队活动为主要的斗争方式，继续掌握着主动权，坚持了斗争。

有些人以为，在小哈尔巴岭会议以前，我们只进行了大部队

活动，而小分队活动是小哈尔巴岭会议以后才开始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游击战的特点，是根据军事、政治形势和环境条件的变化，临机应变，机动灵活。所以，小分队活动，在以大部队活动为主的30年代后半期也是受到重视并根据需要采用的。

通过1940年上半年小分队分散活动的试行，小哈尔巴岭会议以后，所有游击队伍就都从大部队活动转入了小分队活动。

前面谈的是大部队回旋战后期的史实。因为历史学家们说，对这个时期的研究，觉得史料有不少空白点，所以我特意挤出时间讲了这些。

如果以小哈尔巴岭会议为基点进行考察，那么可以说，1940年春夏期间我们进行的活动是这个会议的筹备过程。

我们是否应该根据形势发展的趋势改变战略？这个问题，是从欧洲发生的战争急剧扩大的时候开始考虑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在尚未结束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战争之前，就疯狂地准备向东南亚地区扩大战火，于是拼命地妄图维护“后方的安全”。

如前所述，敌人对我们进行的大规模的持久的“讨伐”、对我国人民实行的空前残酷的法西斯镇压和掠夺，正是他们这一侵略政策的产物。

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越扩大侵略战争，他们在国际国内就越发孤立，就越发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深深地陷入不能自拔的窘境。

整个形势表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是肯定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国人民完成光复祖国历史大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因此，我总结了十年来抗日武装斗争的成就和经验，并且针对急剧变化的形势，酝酿了为主动迎接光复祖国大变革而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的新的路线。

为迎接光复祖国大变革做好准备，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

要转入新的战略阶段，就不能片面地考虑和被动地顺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必须站在主动的地位上引导斗争，并且必须对争取最后胜利的主体力量予以正确估计，对前期的斗争进行认真的分析。

我首先检查了一下前期规定的战略任务是否已经全部执行。我们认为，南湖头会议制定的战略任务，诸如奠定建党的组织、思想基础、结成并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挺进国境一带向国内扩大武装斗争，这一切问题都已全部执行。

在规定武装斗争战略阶段方面，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

从数量上看，敌我双方的力量是无法相比的。敌人说我们是“沧海一粟”，可见在敌我之间，力量对比这话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但是，我们的力量对比方式，不是那种数学方式，而是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方式。

南湖头会议以后，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政治思想上和军事技术

上都有了迅速的壮大。在数量上，我军虽寡不敌众，但在同比我多达几十倍、几百倍的敌人作战中，我军始终紧紧地掌握着主动权，每次都取得了胜利。在这过程中，人民革命军壮大成了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战术战法对付任何情况的劲旅。

朝鲜人民革命军是同时执行军事使命和政治使命的新型的特殊的革命军队。

回顾起来，不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中，而且在整个朝鲜革命中，朝鲜人民革命军始终坚守着领导地位，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清楚地证明，我们坚持抓好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保证这项工作先行于其他一切工作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就一般情况而言，共产主义者夺取政权的斗争，通常是先建立政治领导机构即政党，然后着手建立武装力量。这是一条普遍的原理。

然而，我考虑到在革命斗争特别是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暴力手段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当时我国的现实，选择了先建军后建党的方式。

1932年4月，我们创建了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即反日人民游击队，接着又把它壮大和发展成了朝鲜人民革命军。我们就是用这支朝鲜人民革命军不断扩大了抗日武装斗争的烈火，把整个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引向了高潮，而且依靠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领导和武装保护，成功地推进了建党的组织、思想准备，祖国光复会的建立，统一战线运动的扩大和发展，全民抗战的准备等诸项工作。

实际上，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抗日革命时期，我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政治向导者、民族利益的武裝保护者——朝鲜人民革命军，可以说既是我们的军队，也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权。

上述这一切证明，能够胜利完成新的战略阶段任务的主体的骨干力量已经准备就绪了。

唤醒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从政治思想上锻炼人民群众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当时，祖国光复会的会员已有二十多万人。国内还组建了许多工人突击队和生产游击队等半军事组织。并以这些组织为母体，到处组建了准备进行全民抗战的武裝队伍。一般群众的动向也很好。

就在这个时候，金一他们一行赴国内打击敌人之后，在朝豆满江行军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个跛脚的农民紧紧地跟着金一的队伍，对金一他们说："我看你们好像要从这儿过豆满江，可今晚得走别的道儿，这一带全是鬼子兵。"

对他的话，是应该相信还是不应该相信，金一他们拿不定主意，都愣着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对这个农民毫无了解。

那个农民看他们犹豫不决，就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一个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条子给他们看，并且说："我是这样的人，你们可以相信我。"他拿这么一个巴掌大的报纸片要我们的人相信他，我们的人都禁不住愣住了。

一看那报纸片，登载的是介绍1939年5月茂山地区战斗的消

息。金一他们凭长期进行游击斗争的经验，立即断定这是一个好人，便问他从哪儿走才能安全渡过豆满江。农民说跟他走就行，虽然那里也有警备，但都是帮助革命军的好人。

金一他们就靠这位农民的帮助，安全渡过了豆满江。

那天被迫来站岗的老乡，明明看着游击队过江，却都闭着眼睛装聋作哑，甚至有的人还悄悄地指点金一他们说："这儿水浅"，"那儿水深"。

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他们对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始终不渝的支援，始终是扩大和发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伟大推动力。

在规定武装斗争战略阶段方面，再一个必须考虑的是敌人战略战术意图的变化。

1940年夏，我们在黄沟岭修路工地上俘虏了一个日军工兵军官。从对他的审讯中，我们了解到敌人正在间岛和南满一带修筑许多军用公路。以安图县为中心，和龙、延吉、敦化、桦甸、抚松自不用说，甚至朝鲜境内以及人迹罕至的白头山东北部险山峻岭也都修军用公路。

这些军用公路的修筑情况，每天都由"野副讨伐司令部"汇报给关东军司令部。据那个日军俘虏说，野副司令官不久就要亲自视察修路工地。这些公路，是用来"讨伐"我人民革命军的机动公路。只要命令一下，朝鲜和中国东北各地的庞大兵力就将经过这些公路向我们活动的地区集结。

在我们的周围，敌人还修建了许多军用机场。根据野副的机密指令，在满洲东南部三个省内修建野战机场。那个日军工兵军

官还供出了野战机场的位置，说这些机场的飞机都直属“地区讨伐队”和“小区讨伐队”。

如果那个工兵军官的供词属实，就意味着我们是处在野战机场的包围之中。

这个时候，“野副讨伐司令部”准备从吉林市移到延吉来，原在延吉的“东地区讨伐队”司令部则移往图们。

我的司令部不断地收到敌人的兵力源源不绝地向我们的活动地区集中的情报和侦察报告。据这些征候可以断定，敌人正准备不久将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定要打一场最后的决战。

敌情的急剧变化，用从前的战略对策是对付不了的，我们必须立即改变战略方针。

因此我打定主意，把回避无谓的战斗防止损失，以主动的行动保存并积蓄革命力量，作为我国革命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

1940年8月举行的小哈尔巴岭会议，决定了这条主动迎接光复祖国大变革的战略方针。

我们开到安图与敦化交界地的时候，第十五团团长李龙云和连长任哲带着四五个警卫员找我们来了。

我向朱在日说明了在小哈尔巴岭召开军政干部会议的意图，并命令他通知各部连长、政治指导员以上的军政干部都来参加会议，限于8月9日(农历7月初7)以前报到，汪清、东宁的安吉部、崔贤部则日后通报会议决议；第十三、十四团则只通知就近的连队；第十五团已有团长和连长到会，无须再通知。

小哈尔巴岭会议，从8月10日到11日，开了两天。

会议上着重讨论的问题是，能否把下一个战略阶段规定为革命大变革时期，也就是说，在下一个阶段能否争取祖国的解放。

我用一个单词作了回答：“可能！”然后接着说：“当然，日军现在仍然很强大，但它是走向灭亡的军队。凭什么说日军是走向灭亡的军队？只看号称关东军精锐部队的空军中发生了暴动的事实就清楚了。逃跑的、起义的，不断出现，因此敌人在侵华战场上为防止逃跑和起义，急得团团转。还需要更多的说明吗？日本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前不久，日本政府发布特别志愿兵令之类的东西，强征朝鲜青年去给他们当炮灰。他们在台湾和满洲也推行了这种制度。

日本已经落到了连仇恨他们的殖民地国家的青壮年都抓去给他们当炮灰的地步，可见他们的兵力不足已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期间，日本仅在满洲就损失了近二十万的兵力。

在侵华战场上他们每年的损失比这还要大得多。日本储备的战略物资也已消耗殆尽。在小哈尔巴岭会议以前，日军使用的弹药是1939年以后制造的，而在间三峰战斗时他们使用的是20世纪20年代制造的。这说明他们的弹药储备也已经露出底子了。

日本的政界也极为混乱。他们的内阁隔三差五就改组一次，争吵激烈，无休无止。军部也是一团糟，将佐各派勾心斗角，互相攻击，军事上无法保证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加上劳资矛盾、军民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严重激化，呈一触即发之

势。特务遍布日本本土，国民的嘴都打上了封条。

正因为这样，我在会议上强调指出，日本的国策暴露了他们妄图乘欧洲进行战争之机侵占东南亚的野心。如果他们进攻东南亚，那就等于自掘坟墓。我们酝酿新的战略时特别考虑到了这一点。

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迎接大变革时应执行的战略任务。

当时我们决定的新战略任务是：在为主动迎接祖国解放大变革做准备的工作中，保存和积蓄朝鲜革命的骨干力量——朝鲜人民革命军，把他们造就成为出色的政治军事干部。

解放祖国的大变革，是以敌我双方全部动员政治军事潜力进行较量的最后决战为前提的，要想在这个决战中取得胜利，我们的每个队员就必须学会执行比现任职务高几级的职务。祖国解放后，仍需要他们作为骨干去建设新社会。

最后决战和建设新社会，是创造我国的新历史，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民命运的战略任务，是必须由朝鲜人民革命军和朝鲜人民自己完成的，不是别国人能替我们完成的。

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在长期的抗日革命斗争中铸成的主体力量。

我在会上对大家说，打最后决战时，如有人主动帮助我们，当然是好事，但我们必须自己做主，自己打。为此，必须把我们的水平再提高两三级，同志们有这个信心吗？大家都回答说有信心。我又问能不能把全体人民武装起来投入抗战？大家同声回答说：能。

为了胜利完成上述战略任务，我们提出了由大部队作战转入小分队作战的新的斗争方针。

对这项方针，会上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人表示忧虑说，敌人到处调动大兵力打我们，而我们不用大部队却以小分队对抗，会不会被各个击破。

我对他们说："大部队作战发挥威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不是以大部队驰骋疆场的时候。当敌人调动庞大兵力妄图把我们一网打尽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运用大部队作战，必然会落入敌人的圈套，像飞蛾扑火一样自取灭亡。如果编成小分队，既打仗又做群众政治工作，那么口粮也好办，活动也很自由。我们有多少战友为了办粮食献出了生命啊？用生命换来的粮食，给大部队吃，没几天就吃得精光。如果化做小分队进行活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还可以尽量分散敌人。这是我们今年春夏两季小分队的活动所证实了的。我们的意图是尽量使敌人找不到打击目标。"

我接着强调说，为了执行新的战略任务，要在朝鲜和满洲的广大地区机动灵活地开展小分队军事活动，同时大力开展群众政治工作，加紧进行提高全体指战员政治军事素质的工作，同全世界所有反帝力量加强联系。继之讨论了具体措施，就结束了会议。

小哈尔巴岭会议，同提出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战略路线的1931年12月明月沟会议、1936年2月南湖头会议一样，是在我国革命跨入新的转折期的时候，作出了改变战略路线决策的历史性会议。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及时洞察到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势，只顾眼前

的成果，继续进行大部队活动，那么，别说保存力量，就连我们自己也不会存在，只能作为殉国烈士在史册上留下一个名字罢了。

小哈尔巴岭是延伸在敦化、安图县界上的哈尔巴岭的尾部。会议就是在这个岭的北坡上举行的，会场前面是一片柴草地。

一提起小哈尔巴岭会议，就想起那一片柴草地。那是人迹罕至之地，无人来割柴草。当时我俯瞰着这片柴草地心中想，如果经常骑着战马驰骋的金策、许亨植、朴吉松等北满同志们看到这片柴草地，该多高兴啊。在小哈尔巴岭的柴草地上曾思念的那些北满同志，到了苏联的远东地方才见了面。

二　对未来要乐观

记得这是1940年春天的事。

当时，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在安图、和龙等白头山东北部开展积极的军事政治活动。

这年春天，我们经受了极其严酷的考验。我们要用少量的兵力去争取斗争的主动权，自然吃了不少苦。最难以忍受的是敌人对我们司令部的波浪式“讨伐”。当数达几百几千的敌人嗷嗷叫着扑上来时，让人实在有些慌张。

野副要豁出命与我们决一死战。这也难怪，他曾夸海口说，要跨上战马攻上白头山消灭匪祸，可是那年冬天他却被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大部队回旋战打得狼狈不堪，遭到了关东军司令官以至日本军部的严厉斥责，因而恼羞成怒，对我们更是切齿痛恨了。

他因丧失了主动权，气急败坏地把奉天、通化地区的增援队以至苏满边境的国境守备队都调出来投入了“讨伐”。

同时，林水山这类投敌分子也带着敌人到处寻找我们司令部；加上那些深山幽谷的猎棚，蘑菇棚、偷种鸦片烟的人住的窝棚，都有许多密探在刺探我们的行踪；还有叫什么“工作队”的走狗组织打进我们活动的地区，公然大肆叫嚷说，形势有利于日本帝国，游击队不要为毫无前途的革命白白流血，赶快投降吧。这一切都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不过最困难的还是口粮。

敌人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不让我们吃到一粒粮食。他们嗅觉灵敏，连我们埋在山里的粮食也都找出来挖走。还严格控制集团部落居民的粮食。农民下地，村口城门的岗哨严格搜查饭盒。不少集团部落的军警，连他们自己用的粮食、被服和弹药也都藏在城外的秘密仓库里。仓库位置只有管理人知道。管理人带着钥匙，只有必要时才把东西悄悄地运到集团部落里去。因为我们常常袭击集团部落缴获他们的后勤物资，敌人就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我们。

煤矿等各矿山和伐木场的情况也都一样，只存着一两天，顶多三四天的口粮。

我们在车厂子附近时，口粮和食盐都断了。第七团和第八团不断地到安图地方活动，想筹办一些粮食，但都没有什么收获。全队人马都饿着肚子。五一节是吃青蛙肉过的，可见粮食困难到了何等程度。在某些国家，青蛙肉是很受欢迎的高级饭店的美肴，可在我们国家里却不是这样。充其量也不过是孩子们偶尔在稻田或山河旁抓些青蛙，串在小棍子上烧烤后吃，这也是为好玩，不是为好吃。

游击队生活虽然无比艰苦，但我们从没有在五一节挨过饿。1939年在小德水过五一节时还给指战员喝过酒呢。然而1940年的五一节，别说是酒，就是吃的一点也没有。所以不得不下到河沟里抓来青蛙垫肚子。连节日都过得这个样子，平时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不仅在车厂子附近时如此，在洋草沟也受尽了饥饿之苦。因为没有粮食，天天用草根树皮充饥。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总是忘不了洋草沟这个地方。

有一天，我走到机枪排吃饭的地方，责备了他们。我对他们说，早就解冻了，何不挖些野菜熬汤喝，那样不是既好喝又能垫肚子吗？姜渭龙回答说，因为缺少站岗放哨的人，没有叫人去挖野菜。

我听了不免有些生气，就说："野菜嘛，去站岗放哨，来回的路上都可以挖。只要安排好，不用多大工夫，就能挖够一天吃的。"

我严肃地对姜渭龙排长说，一个指挥员，应当懂得负责照顾战士们的生活。如果人手不够，传令兵也可派去挖么！

第二天，姜渭龙带着传令兵全文燮、李乙雪和韩昌凤去挖野菜，傍晚才回来，可是四个人挖的野菜还不满一筐。一问，是他们整天在草地上玩摔跤赛，没顾得多挖野菜。我再问他们，叫你们去挖野菜，怎么却玩起了摔跤比赛？他们回答说，和煦的春风轻轻地吹拂着脸颊，阵阵的花香沁人心脾，再看毛茸茸松软可爱的草地，不禁想起了家乡，想起了小时候每到春天就在野地欢蹦乱跳尽情玩耍的往事，也就情不自禁地玩起摔跤比赛来，不觉浪费了大半天。

全文燮和韩昌凤，年龄体力都不相上下，两人交锋，难决胜负。个头大的姜渭龙裁判，每赛完一场，他就拍手喝彩，还给他们助威说："好，再来，再来！"排长这样拍手叫好，连连鼓

劲，他们两个自然更加起劲地扭在一起摔打起来。

听了他们的回答，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连传令兵都派去挖野菜，可他们四条大汉挖的野菜还不够一筐，而且不顾全队断了粮饿着肚子，却玩摔跤比赛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实在太荒唐了。

我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分别给他们记小过处分。从严重性来看，本应该给他们更大的处分。在我们的队伍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司令官交给的任务如此掉以轻心的现象。令人费解的是，这四个人本来都是责任心很强，执行命令特别认真，不管交给什么任务，从来不计较轻重，一贯完成得干净利索的人。坦率地说，他们都是堪称模范游击队员的典型。可他们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呢？

夜里，我一躺下，眼前就浮现出他们端来的空了半截的菜筐。为这个不满的菜筐，我给了他们记小过处分，可是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们玩摔跤玩迷了的样子，我脸上不禁浮起了笑容：尽管处境如此艰苦险恶，我们的游击队员却毫不悲观，满怀着信心，乐观地生活，甚至忘掉饥饿，尽情地玩摔跤，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如果精神上没有充满希望，对未来悲观，那么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是根本不会想到玩摔跤的。只有我们游击队这样具有坚定信念的强者、具有坚定意志的强者，才能在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仍对未来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美好的希望，才能纵情地唱歌跳舞，兴致勃勃地玩摔跤，乐观地生活。

朝鲜人民革命军，是古今内外绝无仅有的乐天派的集体。世上有很多威名远扬的强兵劲旅和游击队，但是像朝鲜人民革命军这样洋溢着革命的乐观精神，热情充沛，生气勃勃，前途远大的军队，恐怕是再没有了。含着微笑对付逆境，化险为夷，转祸为福，即使天塌地陷也相信有活路的乐天派的集体，就是我们的朝鲜人民革命军。

全文燮，看他的外表，是个很沉稳，不苟言笑的人，但实际上，他也是个乐天派。他参加革命军的时候，对他的父母说："爹，妈，您们等着我好啦，等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祖国光复了，我会坐着汽车回来的。"他要打败日寇后坐汽车回到父母身边来，这话是多么出入意料，又多么充满着乐观和自信啊！

安吉也是个乐天派。我所以特别喜欢他，固然因为他是忠贞不渝的人，更因为他是个具有乐天性格的人。他是个从不知什么叫悲观的乐观而浪漫的革命者。

我们抗日游击队里，不光是他们，其他很多人也都是乐天派。事实就是如此，手持武器投入了同日寇的决战的战士，都是从不悲观，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乐天派。

我明明知道姜渭龙、李乙雪、全文燮、韩昌凤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我只给了他们记小过的处分，这是因为我更重视他们的行动所内涵的气度恢宏的乐观精神和豪气。

经过这件小事，我更加确信，即使艰难的行军那样的困苦再有十遍百遍，他们也是会坚决跟着我们走到底的。

据我的经验，抱着坚定的信念干革命的乐天派，不管身边刮

什么妖风，都绝不会动摇，即使被推上断头台，也绝不会屈服。然而没有明确的信念，看人家闹革命就随大溜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混入革命队伍的人，最后必然是走苟且偷安之路的。

有一篇回忆录记述了在一次行军路上捉蝲蛄吃的故事，想必大家都读过。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说明乐观精神在革命者的日常生活和斗争中起着多么重要作用的一个生动例子。1939年秋的敦化远征是大部队回旋战第一阶段的作战，所谓行军路上捉蝲蛄吃的故事就是在这次远征过程中发生的。

那时候也出现了缺粮的严重困难。只有把敌人甩掉，才能去搞到一点粮食，可是因为“讨伐队”紧紧咬住我们不放，我们无法自由行动。不知是怎么回事，那时候连一只野兔子都见不到。我们一直行进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的无人之境，因此也无法托人去弄粮食。

队员们都筋疲力尽，连棵倒下来的朽木都无力跨过，只好绕着走过去。一有休息口令，大家都就地或躺或卧，呼呼打鼾。发出了出发口令，有的队员还睡的死死的，起不来。头道白河、二道白河、三道白河、四道白河，这些松花江的上游地区，本来就有很多沼泽地和原始林，连猎人都不敢进去，我们的行军速度自然很慢了。

“同志们，加油啊！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松劲啊。到了两江口，再饱饱地吃一顿，美美地睡一大觉。”

我一边把瘫坐不动的人扶起来，一边这样鼓励他们。我何尝不饿不累呀，但不管多么饿多么累，不能表露于外的就是司令官嘛。

有一天中午，走到一处坡度不大的山腰平地上，我下了休息口令，然后叫几个警卫队员到山下去察看一下有没有情况。他们去了一会儿，回来报告说，山沟里只有一条小溪水，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我带几个队员走到沟里的小溪边，把裤脚卷到大腿上，下到水里轻轻地掀开水下的石头往里摸，不一会儿，捉到了一只挺大的蝲蛄。我把它往地上一扔，队员们就欢声叫起来："是蝲蛄！"

队员们都争先恐后地跳进水里开始捉蝲蛄，那个眉开眼笑高兴的样子，简直不像是些饿了几天的人。有的觉得脚冷了，就上岸歇一会儿再跳下去。全队都捉蝲蛄，十分热闹。连那些一路上无力地拖着脚跟在队伍后头的人，也都赛跑似地扑通扑通跳进了溪水。

我们回到原来休息的地方，开始生火烤蝲蛄。烤熟的蝲蛄鲜红鲜红，喷着诱人的香味。休息地里发出了欢声笑语。短短一阵的蝲蛄仗，顿时改变了全队的气氛

当然，吃几只蝲蛄，是吃不饱的。但是下到水里蹦蹦跳跳地捉了一阵蝲蛄，大家都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重新开始行军的时候，速度成倍地加快了。

这天，我望着同志们开朗的笑脸，想了很多。刚才还那么筋疲力尽，连倒下来的朽木都跨不过去的人，一听休息口令就软绵绵地躺下去的人，怎么会突然变得这样精神，这样快活呢？

我想，是一场蝲蛄仗激起了大家的乐观精神，使队伍充满了

明朗愉快的气氛。大家吵吵嚷嚷地捉蝲蛄，瞬间，疲劳烟消云散，精神振奋，力量倍增，变得全然不像饿了多日的人。

过去讲过，1939年端阳节那天，我们在玉石沟举行过军民联欢会和运动会。那天我们军民联合举行足球赛，赛场一片欢腾。因为很久没踢过足球，有不少人常常把球踢空了，逗得人们前仰后合捧腹大笑。

运动员失误很多，但观众谁也不埋怨他们。他们的失误，反而给观众带来了更大的欢乐。

当时正是茂山地区战斗后，敌人扬言要消灭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从四面八方压向我们来的时候。就在这种情况下，在“讨伐队”频繁巡逻的和龙县中心，我们从从容容地举行端阳节联欢和足球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不简单的。这是只有掌握了临机应变的战法、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具有无与伦比的胆略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才能做到的。

革命者是对未来乐观的人。革命本来就是从对未来美好理想的追求、对新生活的憧憬开始的。对未来抱着崇高的理想，为实现这个理想而献出全部身心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的人，就是革命者。如果对未来不乐观，对革命的胜利没有信心，根本就不会参加革命斗争，即使参加了，也绝对战胜不了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严重困难和考验。

革命者的人生观、他们的人格、他们的生活信条和生活方式，所以与别人不同，不仅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坚定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比别人更崇高

的理想，有更远大的抱负，在任何情况下都乐观地坚信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必将结出灿烂辉煌的硕果。革命的信念和意志，革命的乐观精神，可以说是革命者应有的三大特殊气质，是铸成革命者思想精神风格的三大要素。

记得有位外国记者曾问我：主席年已八十了，却仍像五十几岁的人一样健康，其秘诀何在？

我回答他说，我能长寿的秘诀，在于我乐观地生活。我这么一说，他们都鼓了掌。一个人的生理年龄能有多长，是为是否乐观地生活所左右的，同样，一个国家的革命，其成败与是否有生命力，也是为有无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所左右的。这就是我的见解。

一个人，只有乐观地生活，即使活一天，也才能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士气低落，暮气沉沉的军队，既不能抱成一团，也不能打好仗。

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只有以对未来的乐观为基础，才能更加坚定，才能坚持到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做一个革命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抱定决心，不怕监狱，不怕绞首架，不怕牺牲，献身革命。换句话说，就是抱着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和乐观精神，抱着赤胆忠心为革命胜利奉献一切的决心，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的解放的事业。我们常说要以革命的精神去生活，其意思就是要像革命者那样生活。为了未来，去开拓前人未曾走过的创业道路的，就是革命者；在这条路上不管遇到何等的艰难困苦，都能以吃苦为乐的人，满怀着

在为党和领袖、为祖国和人民而斗争的道路上生也光荣、死也光荣的崇高精神，不惜赴汤蹈火坚决斗争的人，就是革命者。

革命者的一生，所以有价值有意义，道理就在这里。

脱离了我们队伍的逃跑分子，无一例外，都是对未来丧失了信心的悲观主义者。他们都是在革命胜利前进时乘机加入了革命队伍，当困难重重、形势不利的时候，置革命于不顾，只为保全自己的一条命而逃跑的意志薄弱分子。

对我们的队伍来说，40年代是革命的浪漫精神、乐观主义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时候。革命的浪漫精神、乐观主义精神，是检验每个战士的真实价值和革命忠诚心的试金石。坚信我们胜利的人，跟我一道坚持了革命斗争；认为我们不能胜利的人，在半路上抛弃了革命，脱离了我们的队伍。

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不是自发产生的，是经过不断的教育，不断的思想锻炼产生的。坦率地说，在敌强我弱，无法预料革命何时才能胜利的艰苦时期，对未来抱乐观的态度，的确不是容易的。正因为不容易，才需要不断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锻炼。朝鲜人民革命军之所以能够壮大成为不为任何风暴所屈服的强兵劲旅，就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地大力进行了思想教育。

我们始终一贯坚持不渝地用无限忠于革命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用我们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教育了游击队员。

只要有机会，我就用乐观精神教育游击队员。“国家独立了，咱们一块上平壤去吃大同江的鲻鱼，再吃一碗平壤冷面，还

爬上牡丹峰去欣赏大同江风景。”我这么一说，队员们就握紧拳头，高呼着“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勇气百倍地奔向战场。

1940年的五一节，也就是用青蛙肉代替了节日特餐的那一天，我也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进行了教育。

那天夜里，大家都围着篝火坐在一起，对革命，对祖国，对家乡的父母兄弟，对胜利的明天，娓娓而谈，度过了愉快的夜晚。

那天我对战友们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拿青蛙肉过了五一节，等到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到平壤去，摆上用大同江鲻鱼做的菜，好好庆祝祖国的光复。现在，敌人疯狂挣扎，想把我们吃掉。可是我们绝不会屈服，绝不会半途而废。咱们都要对未来抱定信心，满怀着朝鲜民族的自豪感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光荣感，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坚决顽强地战斗下去。”

队员们被篝火映红的脸，一个个都那么明朗，朝气蓬勃，表现出一定要用乐观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解放祖国的决心和信心。

那天，假如我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望着远山发呆，或者在队员们吃了青蛙之后下令各回帐篷休息，那么队伍的气氛肯定不会那样明朗欢快，队员们肯定不会入眠，很可能忧心忡忡地想，今天勉强用青蛙垫了垫肚子，可明天该用什么垫肚子呢？

当我叫队员们去抓青蛙做节日“特餐”的时候，战友们都欢呼着卷起衣袖去抓青蛙，当我坐在篝火旁谈讲革命前途的时候，

他们都听得入了迷，个个心花怒放，不肯走开。这都是因为他们从司令官的脸上看到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和对任何艰难困苦都毫不畏惧的刚强气概。

任凭敌人怎样猖狂肆虐，紧迫不舍，不让我们吃，不让我们睡，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也绝不会屈服，绝不打败仗，这就是我的坚如磐石的决心。

指挥员的精神状态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指挥员是硬骨头，战士们也必定是硬骨头；指挥员有坚定的信念，战士们的信念和意志也绝不会动摇。战士们的乐观精神，是以指挥员的信念为转移的，同样，人民群众的乐观主义精神，是为领导人的信念和骨气所左右的。

困难的时候，群众所以先看指挥员的脸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的游击队员，一听到我说能打胜仗，就坚信一定能打胜仗。一看到我脸上绽出了笑容，就坚信我们的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就是我到河边去钓鱼，或者小声哼唱什么歌曲，他们也断定下一场战斗是稳操胜券的。

不仅是我，我们游击队的所有指挥员，都用乐观主义精神教育了队员。崔景和和姜墩，在行军路上也经常同战士们交谈，为战士们鼓劲。

用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教育战士的重要手段，是文艺活动。

离开了革命的文娱活动，就谈不上抗日游击队的生活；离

开了革命的歌曲和舞蹈，就谈不上朝鲜人民革命军走过来的胜利行程。

金正日同志说，朝鲜革命是从歌声开始，在歌声中前进，随着歌声取得胜利的。这话很对。像朝鲜革命这样同歌声密切结合的革命，以歌声贯穿始终的革命，恐怕也是世上罕见的。

革命本身就是一曲庄严的交响乐，是催生音乐的田园。没有歌声的革命是没有的。难道离开了《国际歌》还能谈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史吗？

在远征北满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歌声争取了惧怕和疏远我们的群众，也用《苏武歌》争取了一见我们就远远跑掉的中国老百姓。

音乐对我的人生航路也起了很大作用。如果说我的一生是从《催眠曲》[1]的歌声中开始的，那么可以说，我的革命斗争是从《鸭绿江之歌》[2]的歌声中开始的。当我驶离葡坪渡口横渡鸭绿江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下定了光复祖国的决心。此后，每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就回想着在鸭绿江畔许下的誓言，加快了战斗的步伐。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自己作词作曲。《朝鲜之歌》[3]、《反日战歌》、《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之歌》就是这样问世的。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唱着歌鼓起勇气。没有粮食只喝冷水安慰肚肠的时候，也唱着歌度过了难关。就在歌声中，我也成长起来，革命也不断前进了。

饿得难受的时候听到歌声就会忘掉饥饿，累得全身无力的时

候有人给唱支歌听，就产生使不完的力气。

在“艰难的行军”时候，有些警卫队员陷在雪坑里，无论怎样挣扎，四肢都不听使唤，爬不起来，因为一连几天饿着肚子行军作战，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也同样累得全身瘫软无力，但我尽力靠近那些像木乃伊似地躺着不动的队员，对着他们轻轻地唱起了《赤旗歌》。大家听了我的歌声，都提起精神，抬起身子站起来，重新开始了行军。

一度，敌人派出几千名兵力严密地封锁了车厂子游击区。当时游击区里断了粮食，饿死的人很多。严重的饥饿和敌人反复不断的“讨伐”，把人们赶到了死亡的边缘。就在这时候，有力地召唤死亡线上的车厂子人民奋起投入决死战斗的，就是儿童团员们唱的革命歌曲。

和现在不同，当时我们没有专业的文艺团体，也没有专业的作家和演员。但我们的抗日游击队员，自己作歌词，自己配曲子，创作了《游击队进行曲》等许多优秀的革命歌曲以及革命的话剧、歌剧和舞蹈等文艺作品。

在游击区的时候，也像搞青年学生运动的时候一样，我们经常举办文艺演出。游击区解散后，到广阔的地区进行大部队流动作战时，也做到了文化生活的日常化，无论在山上还是在居民区，经常进行文艺演出。

举行文艺演出的时候，四周都架起机枪，加强了警戒，因此，就是敌人扑上来，也能放心地继续演出。

文艺演出，逢年过节时举行，打了大胜仗也搞，欢迎新战士

入伍时也搞。无论在什么地方举行什么样的演出，我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死千百遍也一定要打败敌人的刚毅的革命精神武装军民，把他们都造就成为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

为了这一目的，甚至介绍文艺演出的海报也做到了富有乐观主义精神。

第七团第二连有一次到桃泉里去举行军民联欢形式的文艺演出，贴出了叫做“嘎嘎笑大会”的海报。海报上写道：“即日举行嘎嘎笑大会，敬请乡亲们光临观看。”这个海报一贴出去，指定为演出场地的一家大院子，立即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

“嘎嘎笑大会”，这个标题多么有气魄，又多么风趣啊！

人们只看这个海报，就禁不住嘎嘎笑起来。

游击队的文艺演出和娱乐活动，不光在有喜庆的时候举行，就是有悲伤事的时候也举行，以改变人们的情绪。

吴仲洽和姜兴锡牺牲后，就一连两次举行了大型的文艺演出。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的全体指战员无不沉浸在最大的悲愤之中，举行吴仲洽葬礼的那天晚上，宿营地里给大家准备了大米饭和烤青花鱼，可是谁也没有动过筷子。直到解放后，金正淑只要看到青花鱼，就想起吴仲洽，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可见，当时我们的指战员，为吴仲洽的牺牲而悲痛的感情是多么沉重。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行军途中特意抽出时间组织了一场娱乐会，用歌舞和魔术表演多少改变了整个队伍的悲痛情绪。

攻打了夹信子之后，在松花江畔的树林里又举行了一次大型的文艺演出。现在，老革命战士和历史学家著书论述这次演出是为欢

迎新战士入伍而举行的，其实，这次演出并不仅仅是为了这一目的，主要是为消散因吴仲洽的牺牲弥漫全队的悲痛情绪和失落感，并让全队化悲痛为力量，恢复乐观精神，重新活跃起来而举行的。

这次演出，盛况空前。

先砍来好多泥杨，搭好了临时舞台，再把几个帐篷布连起来做成帷幕垂挂在舞台上。铺做舞台地板的木材都冻了，很滑，便铺上了毯子。帷幕的开闭，要听哨子的信号。演出前，贴出了演出节目表：有合唱、独唱、舞蹈，还有魔术杂技和口琴合奏。真是应有尽有。

晚饭后，新战士、老战士和帮助游击队运战利品的工人，都聚拢来观看演出。

至今我还记得那天金正淑唱了《妇女解放歌》，唱完又表演了舞蹈。舞曲是在幕后唱的。

幕间剧也大受欢迎。在地阳溪入伍的高个子队员和在延吉入伍的队员像旧式电影的辩士那样表演了某个电影的几个对话戏，学得惟妙惟肖，把观众都感动哭了。跳神[4]的节目也博得了大声喝彩，是谁演的已经记不得了。还有一个汉族队员踩着高跷跳了舞。踩高跷是像我们的民间杂技那样，把两根长长的棍子拴在两只脚上踩着它走动的，也是这天大放异彩的节目。这个汉族队员，平时行军的时候，常常是踩着高跷埋没脚印的。此外还演了曹道彦的魔术和新战士们带着四弦胡琴连弹带唱的节目。最后一个节目是一出描绘游击队生活的短小独幕剧，是我在行军作战的间隙构思编写的。

这天的演出，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可是观众都不嫌长，兴致勃勃地观看。演出一结束，又有很多青壮年志愿报名，加入了游击队。

抗日革命时期举行的文艺演出有力地证明，文学艺术对培养人们的乐观主义精神，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革命不是只凭思想意志、纪律和道德情义就能进行的，还需要有浪漫的思想感情。没有热爱家乡和父母妻子的细腻而深厚的思想感情，就不能萌发出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如果以为没有热爱自己的集体、愿意为之献身的思想感情，也能把共产主义思想这样哲理深邃的思想作为永恒的真理化为自己的思想，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抗日革命的整个历程证明，具有丰富的思想感情和乐观精神的抗日游击队员，才是无限忠于自己的领导者及其思想，满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忘我地为革命奋斗不息，建树了丰功伟绩的，为祖国和人民所永远纪念的忠烈之臣。

朴吉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祖国啊，我夸赞你！……共产主义，她就是世界的青春，是祖国的光明未来的摇篮。正因为我们最明白这条真理，才这样微笑着去迎接死亡！"

被敌人挖掉了两只眼睛的崔希淑，临牺牲的时候高呼："我看见了革命的胜利！""我看到了祖国人民欢呼万岁，庆祝解放的那一天！"

日本的刽子手对着被锁链捆绑的李桂笋说，只要你讲一句悔过的话，就给你留一条活命，保你一辈子享受富贵荣华。李桂笋声色俱厉地怒斥敌人说："你们这些败类，别脏了我的耳朵！你

们还不知道朝鲜共产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吗？”她接着自己走上断头台高喊：“祖国光复的一天就要到来了！”

所有在抗日革命的征途上牺牲的战士，都是革命必胜的信念坚定不移，思想感情丰富无比的乐观主义者。

革命者是对未来抱乐观态度的人，是珍视明天胜过珍视今天的人，是为了明天不惜献出青春以至生命的热血沸腾的战士。

今天我所以对同志们特别强调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因为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发扬这种精神。

在好些国家，社会主义受挫，帝国主义对我们大肆进行“制裁”，我国人民在各方面都经受着严重的困难。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挑战。虽然还没有爆发战争，但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比战争还要激烈尖锐的对抗状态之中。

但是，这种困难局面不会持续一百年二百年。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必将被克服。

同志们要对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早日克服今天的困难，让我们祖国继续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今天的乐观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主心骨：深信只要有金正日同志这样的革命新一代，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有金正日同志在领导着我们的革命，对未来，我们是完全可以乐观的。

我愿意向同志们再强调一遍：相信金正日同志吧，那样就一定会万事亨通的。金正日同志的胸怀里装着朝鲜的未来和21世纪的未来。历史一定会证实这一点。

三　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抗日革命时期，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独立自主地领导朝鲜革命的同时，还为加强同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呕心沥血。

本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随着同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系的加强，朝鲜革命的国际范围进一步扩大，朝中共同抗日发展到了包括朝鲜、中国和苏联的更高形式的斗争新阶段。金日成同志就这一历史性时期，做了如下回忆：

恢复同共产国际断绝多年的联系，是在1939年，也就是在大部队回旋战前全体指战员换了一身新棉衣的时候。那时，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正在安图县花拉子密营进行军政学习。

一天，进行小分队活动的金一把身着黑长袍的三个人押到了司令部。他是在完成任务返回途中，发现了这三个穿戴举动极为可疑的人，便逮捕了他们。他说，看样子，他们不像是山沟农民，可能是日寇特务。

在他们身上查出了手枪、小锅和炒豆。

我同这三个人进行了谈话。

当他们知道我们部队是第二方面军，我就是金日成时，才说明他们是共产国际联络员，还拿出一盒洋火来。火柴棍特别大，不是满洲和朝鲜的产品，显然是苏联的产品，但当时我们的人谁也不晓得。

我们为了进一步查明他们的身份，便要求他们拿出其他证据。

他们就拿出一把小刀让我们看。这把小刀是魏拯民去共产国际时，作为接头暗号带去的。

虽说经过了好几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把眼熟的小刀。当年，我把这把小刀交给魏拯民时说，到莫斯科去，就把它当作暗号交给共产国际，还要求他们今后派人来时务必用它作为接头暗号，以便弄清身份。

光看这把小刀，也能使我们足以相信金一他们小分队误认为日寇特务的这三个人是共产国际的联络员。共产国际没有忘记我们，还派来了带着使命的联络员，这真是一件让人欢欣的事情。

南湖头会议后曾断绝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就这样恢复了。当我们为同二十余万大敌进行决战做准备时，共产国际派来联络员，这对我们是一种鼓舞。

据联络员们说，共产国际派的联络员原是六人，其中三人为寻找我们而四处奔波，后来得病回去了，只剩下他们三人。在回去的三个人当中，有一名朝鲜人。

共产国际没能告诉他们正确地址，只是茫然地说到延吉一带去寻找金日成部队，所以，他们只好估摸着四处寻找，吃了不少苦。离开苏联时，他们携带着简略的地图，可是因为我们部队随时游动，所以没能很快找到。

不仅如此，连人民群众都不肯推襟送抱，所以他们只好打消接头的念头，准备返回苏联。幸亏到安图县三道沟时有个人悄悄

地告诉他们不妨到花拉子去找一找，于是就这么来了。

他们还说，他们三个人在窝棚过夜时失了火，衣服都烧破了，粮食也断了，只好用炒豆充饥。他们决计如果在花拉子也找不到我们，就放弃任务返回苏联。他们说，他们踏上满洲土地后，因为行程艰难，孤立无援，有一种在汪洋大海里遇难之感。

我立即指示发给三位联络员新军装和一套日用必需品。他们换了新军装吃过饭后，在司令部帐篷里休息。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安心休息了。

日寇官方就1939年底共产国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派遣联络员一事写道：

“……康德6年(1939年)10月11日，金日成……盘据和龙县三道沟西北枕峰密林时，身穿共匪服装并带手枪的八名俄罗斯人和两名朝鲜人翻译一道前来，同金日成举行重要会谈。这帮俄罗斯人逗留十来天，除重要干部外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们。他们离开时将金日成的十二名伤病员带走了。据悉，这帮俄罗斯人系来自苏联的联络员……具体情况不详，然可认为其使命十分重要。”[珲春领事木内的报告，昭和15年(1940年)7月26日]

“其次，是党的领导即领导路线问题。去年(1939年)12月苏联直接向第一路军派遣四名联络员，联络内容和目的尚且不详。然今年(1940年)1月22日在抚松截获的魏拯民写给杨靖宇的书信中谈明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其路径是自敦化经由大蒲柴河再经过两江口……”［《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动向》，《思想月报》第77期，司法省刑事局，昭和15年(1940年)11月］

当时，共产国际给予我们的联络内容很简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第一路军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东北游击队指挥员会议，另一个是建议东北各抗日游击队暂时停止大部队活动。

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从新的角度考察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发展方向。从30年代末期抗日联军运动本身情况来看，其内部有些不顺利。在北满和吉东地区活动的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对于领导与联合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着一定的意见分歧。

为了消除这些意见分歧，共产国际在苏联同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代表进行了必要的协商。看来，在反复进行协商的过程中，他们认为有必要邀请朝鲜人民革命军和南满第一路军代表参加北满和吉东地区抗日联军代表会议，进行更加广泛的协商，以便采取在全东北掀起抗日革命高潮的措施，同时使满洲游击队运动同苏联的远东政策协调。

当然，共产国际的联络员并没有向我们具体说明这些内情。但是，从远东的军事政治局势和当时苏联与共产国际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作出这样的判断，也是可能的。

然而，我和杨靖宇还有巍拯民都无法离开游击战区。正当敌人即将发动大“讨伐”的关头，如果我们离开部队去苏联，就会给新的作战带来严重后果，也会影响队员的士气。

共产国际要求我们停止大部队活动的建议，也不能盲目接受。我们不能不慎重地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大部队活动的停止，会不会导致消极的分散逃避。

我向三位共产国际联络员申明我们对共产国际提出的两个要求的立场，然后，让一位联络员去会见魏拯民。代号为“漫江”的司令部通信员陪同他去了。

当共产国际联络员们离开花拉子密营时，我们把一些记载朝鲜人民革命军斗争内容的文件和照片交给了他们。因为将这些文件和照片保管在苏联，既安全，又能减轻我们的负担。

那时我们交给的文件和照片足有一背囊，我戴眼镜在临江县五道沟照的相片也是那时送去的。

共产国际联络员们在返回苏联途中，在和龙县跨过铁路时被自卫团逮捕了。这样一来，那些文件和照片没能交到共产国际，全部落入敌人的手里。从日寇官方资料上能看到我们的照片，这说明那三名共产国际联络员在返回苏联的途中牺牲了。

在那三个共产国际联络员当中，有一个是中国人，名字叫宁。魏拯民致共产国际的一封信证实了宁在交战中负伤的情况。

对共产国际提出的两个要求，魏拯民所持的立场和我是一致的。

从30年代初我们开始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可以说，30年代前半期我们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比较紧密。

但是，从魏拯民为解决在腰营沟会议[5]上未做定论的有关反“民生团”斗争[6]的意见分歧，于1936年初访苏以来直到1939年秋，我们和共产国际之间没有多少交往。我们没有派人去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没有派人来。

坦率地说，当时我们没有必要去找共产国际。我们认为关系

到我国革命将来命运的重要路线问题已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根据南湖头会议通过的方针推进革命就可以了。

我们以正确的路线推进了革命，以白头山为据点，向国内扩大了武装斗争。独立自主地制定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并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加以贯彻，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和斗争作风。尽管困难很多，但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没有向别人伸手乞求，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一切问题。

由于有从抗日革命时期起始终一贯坚持革命自主路线的历史传统和经验，今天我们拥有了世界上自主性最强的党，自主性最强的民族，成为了自主性最强的国家。

世界上有很多为击溃外来侵略者进行过游击战争的国家，也有不少为之靠正规军进行过现代战争的国家，但像我国这样在艰苦的情况下开展武装斗争的国家还是没有的。我们常说在既没有国家后方又没有正规军支援的条件下进行了历时十五年的抗战，这并不是言过其实的，而是如实地反映了朝鲜革命的艰苦性。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南斯拉夫游击队仗打得很好。可是南斯拉夫是1941年4月被德军占领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战斗的历史只不过几年。铁托开始打游击时，南斯拉夫还有不少正规军残余部队，并且还得到了苏联的很大帮助。据朱柯夫的回忆录，苏联当时向南斯拉夫提供的武器仅步枪和机枪等轻武器就达数十万支。南斯拉夫游击队还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大炮和坦克等重武器。

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战争，也可以说是与此相类似的。

蒋介石有几百万大军，但不能说这个军队全是进行反共战争的；尽管消极、暧昧，它还是举起反日旗帜，同日军交战，这是事实。蒋介石军队对日军的牵制，即使是消极的，也应看作是正规军对中国人民游击战争的支援。国共合作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共同抗日。

我国正规军是1907年被解散的，我们是从那时过了二十多年以后才开始武装斗争的。那时，别说什么正规军，连其残余也都没有了。

国家灭亡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国家后方了。虽然有几支义兵和独立军用过的旧式步枪，也都是生了锈无法使用的。我们只好用生命去换来每一支枪。

我们进行武装斗争的艰难和游击队员在山上遭受的将近十年的苦难，是写不尽说不完的。但我们从来没有向别人伸过手。

我曾多次说过，共产国际对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革命予以深切关注，但对朝鲜革命却不大关心。共产国际的部分成员竟然把朝鲜革命看作是中国革命和日本革命的一部分。

同样的中国革命，对关内的革命就十分重视，而对东北革命则不闻不问。举世皆知，共产国际为国民党派遣鲍罗廷和布留赫尔做顾问；为共产党派遣保伊金斯基、马林、奥托·布劳恩等人做顾问。然而，为东北革命，他们未曾派遣过一个顾问。

如果说对东北革命有所支援，那也只是偏重于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对在远离苏满边境的地方活动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和南满的第一路军，则几乎不于过问。这样说也并不过分。

他们把招到苏联培训的东北出身的指挥员大都分配到关内而没分配到东北，这一事实也说明共产国际轻视东北革命。游击区时期，在间岛和我们联合作战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参谋长刘汉兴和第五军的李荆璞都到苏联学习。他们都没有回东北，而被分配到了延安，等到日本帝国主义败亡后才回到东北。

据日本人记载，东北革命好像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援下进行，这不过是不符合事实的臆断。日本人曾散布过这样的谣言：金日成在莫斯科共产大学受训后，于1938年夏从苏联率一支精锐部队进入满洲。日本官方资料中还说，我率领部队到苏联搞过长时间的训练后回到满洲；有的资料说，张鼓峰事件[7]以后，我回到满洲在东边道活动。

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不外乎是把我们描写成在某些外部势力的唆使和操纵下活动的人，以图削弱并抹杀我们对国内人民的影响。

说实话，当时我们没有得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多大帮助。在汪清活动时，我曾写信给苏联，要求为我们建造一所手榴弹厂，但却杳无音信。我们只好自行制造称之为“延吉炸弹”的炸弹来使用。

一直对东北革命和朝鲜革命采取冷淡态度的共产国际，到了1939年突然采取破例的措施，派联络员邀请我们访苏，这是为什么呢？

一句话，这是由于日本侵苏就要变成现实的军事政治形势，使他们改变了态度。苏联通过哈桑湖事件和哈勒欣河事件[8]，

再一次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和强盗本性，明白了它迟早要进行“北攻”，因此，同共产国际一起从各方面摸索对策。

共产国际特别重视的是：要找出能从侧翼和背后用武装支援苏联的同盟者，并实现同这些同盟者的军事政治联合。在东方能用武装支援苏联的力量，只有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共产国际将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看作苏联远东军的一翼和外线力量，并打算有事时把它当作苏联远东军的别动队；苏联的想法当然也与此相同。

30年代前半期，苏联人还是不大注意东北抗日运动，在哈桑湖事件和哈勒欣河事件时看到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从背后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维护了苏联，才知道满洲的游击队并不是可以小看的力量。从这时候起，他们就为加强同我们的联系，做出了种种努力。

共产国际也采取了与之相一致的步调，把一切工作从维护苏联的角度加以推进，这是共产国际的根本使命，也是始终一贯的政策。

然而，共产国际和苏联远东军事当局对东北抗日力量的看法，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一致的。共产国际对满洲游击队的立场是，将重点放在保存力量直至战时到来，远东军事当局的立场则是，在全中国已处于战时状态，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要发动强有力的军事攻势，以牵制日本兵力移向中国内地。

总之，共产国际比以前更关注东北抗日运动，邀请我们参加讨论重要战略策略的会议，是值得注意的政策变化。这是我们壮

大成为能够在敌人背后用武装支援苏联的强大力量的结果。

然而，我们对共产国际的要求采取了保留的态度，没有停止大部队活动，也没有去苏联。反而，仍旧以满洲为据点，按原定计划果断地进行大部队回旋战，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攻势。

由于胜利地结束了大部队回旋战，我们才得以不陷于被动，而掌握了主动权，树立了新的斗争方针。当时，如果我们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转移到哈巴罗夫斯克或者立即转入小分队活动，那么，就不可能进行像大部队回旋战这样规模巨大的作战。

主体29年(1940年)秋，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又接到邀请他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一个会议的通知。共产国际派遣的使者冲破敌人森严警戒来找金日成同志。对此，金日成同志回忆说：

1940年10月中旬，也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队根据小哈尔巴岭会议方针，在各地进行小分队活动的时候，我再次接到了共产国际的通知。

两个共产国际联络员来找我。他们说，是远东军司令部将领留森科派他们来的，他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通知我参加共产国际于1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的会议。他们还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指令：在满洲活动的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务必从大部队活动转入小分队活动，并尽早转移到远东，以企以远东为基地整顿重编。

留森科在远东军司令部负责处理共产国际主持的一些事宜。后来我在哈巴罗夫斯克见到了他。他见到我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握一次你的手可真不容易。他向我一五一十地说明了为同我

们取得联系，派小分队和小组的经过。他很热情、亲切，具有一见面就吸引人的亲和力。留森科往往用化名王新林，他的主要工作是保持共产国际与苏联同我们之间的联系。

据联络员说，共产国际计划于1940年初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的满洲游击队指挥员会议，因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第一路军代表没有参加，所以变成了只有北满和吉东地区游击队代表参加的会议。

共产国际不肯放弃原来计划，一定要召开全东北抗日武装部队指挥员都参加的会议，来讨论发展东北抗日运动的方向，以扭转苏联的困难局面。

联络员抵达我们驻地是1940年10月，而共产国际发出有关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同年9月，这个通知对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是用无线电传达的，而我们因为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只好通过联络员传达了。共产国际指定参加哈巴罗夫斯克会议的对象是各路军总指挥、政委和党委书记等主要军政干部。

我向魏拯民通报共产国际派来了联络员，并建议共同行动。

魏拯民说，这个会议是共产国际主持的会议，应该参加，可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去。他委托我代表朝鲜人民革命军同时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参加会议。

共产国际有关小分队活动的要求，是与我们在小哈尔巴岭会议通过的小分队活动方针相一致的。

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形势，比我们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进行大部队活动的时期更为严峻。也就是说，是难以大张旗鼓地开展大部队活动的时期。

一方面，由于敌人完成了集团部落化，致使我们难以保障大部队的口粮。往往为了弄一把米，一个窝头，而流血。每次为获得粮食，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当时，敌人特别致力于治本工作和思想工作。

这个时期的集团部落政策，比之于以前在西间岛实行的更为毒辣。

敌人用烧毁所有分散住房，建立“武装部落”的方法，强行“匪民分离”，同时，严格控制粮食、物资和弹药，并大肆搜捕“通匪”分子，加强河川渡口的警备。对私制鸦片的控制也是很严格的。

另一方面，敌人又大肆散布什么“难民救济”、“民生工作”等谎言，力图从思想上瓦解革命群众和人民。

我们的经验表明，只要转入小分队活动，粮食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制定战略战术，不能不考虑粮食问题。第一是粮食，第二才是战术。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我把衣食住这个用语改为食衣住，可以说是反映了我打游击时为粮食而吃了大苦的体验。

如果出入远东和满洲两地进行小分队活动，就便于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政治工作，也能搞好部队干部的培训工作，还能取得夏季搞军事活动、冬季到苏联提供的地方搞军政训练的时间。这对保存和壮大力量也很有利。

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我们因敌人的大“讨伐”失去了很多干部。

我对共产国际联络员通报说，我们鉴于抗日武装斗争发展本身

的要求，已在小哈尔巴岭召开过会议，通过了关于保存力量并转入小分队活动的方针，至于转移到苏联的问题，今后可以考虑。

在敌人疯狂企图消灭我们的形势下，确保能够整顿和重编队伍的时间和地带，这不仅对当时的武装斗争，而且对将来的斗争也是必要的。要保存和壮大力量，就要有这种安定的基地。

我们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对保存力量予以较大的注意，是因为确信朝鲜革命最后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

到1940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席卷了整个欧洲。苏德战争必定会爆发，这是有目共识的问题。日本在侵华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又在策划针对南方的另一场战争。如果日本对美国和英国发动新的战争，那么，这种冒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昭然若揭的。

在这种形势下，避免正面冲突，保存并壮大力量是上策。我们的这种看法，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苏联愿意提供给我们能够整顿和重编力量，并保存和壮大队伍的基地，还同意提供必要的军事和物质上的支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然而，我并不急于去苏联。因为这是重大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首先要考虑的是如果我们到苏联远东去，那么要逗留多长时间。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诸如，是逗留一段时间就回来呢，还是长期逗留？在以远东为基地长期驻扎的情况下，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武装斗争？能否在必要时随时挺进国内和满洲？将来，如何

进行对国内革命运动的领导？等等。对这些问题，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心对转移到远东的问题，分几种情况加以考虑并解决。

第一，将主力留在原地，只是指挥员去参加会议，回来后，在原地继续进行活动；第二，先由指挥员们去参加会议，然后，等到有利时机，根据那个地方的情况，再让部队开进苏联境内；第三，去参加会议的时间和去苏联的时间要一致，暂且在那里逗留，以确立此后对策。

我决意在将来驻扎远东的情况下，也本着以进一步加强建立在白头山地区的秘密根据地为前提，在苏联境内建立新的基地的原则处理事情。要这样做就需要时间更具体地了解情况。

本来，我们根据小哈尔巴岭会议方针，计划将我们掌握的地区作为舞台进行小分队活动，度过一个冬天，并为此做了必要的准备。这是我们不能中途放弃的。

我根据这种分析和判断，对共产国际的要求不马上予以答复，一面让那些先派到苏联去的人了解具体情况，一面继续推进过冬准备。

我们指示李龙云开辟进入苏联境内的新通道，同时再一次了解原来利用过的通道是否保险。

李龙云是第三方面军的团长，以骁勇善战出名。他是1939年8月在安图县大沙河——大酱缸战斗中阵亡的全东奎团长的继任。

他本来是要带着魏拯民致共产国际的信到苏联去的，但因有别的情况没有去成。

他身材魁伟，比年纪显得老成。他平时温和，寡言少语，但一旦上战场就势如猛虎。

那是他们的部队奇袭敦化县的一个集团部落时发生的事情。部队在行军途中断了口粮，他决计打一个集团部落来解决粮食问题，先派侦察组侦察敌情。侦察组回来报告说，村里只有三个敌人。他本来决定带机枪班去消灭敌人，后来突然改变主意，说，打三个敌人用不着机枪班，我带传令兵去干掉算了，等我打了信号你们就进村。当时他的传令兵是太炳烈。

天黑了，他带着太炳烈径直奔敌人兵营，谁知打开门一看，竟有三十多名敌军官正围坐着讨论作战计划。指着军用地图训话的军官头子猛然看到李龙云，吓得目瞪口呆。

跟随李龙云的太炳烈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时他暗自想这回可不能生还了。

可是，李龙云却迅速地掏出匣子枪，泰然自若地说，你们被包围啦，举起手来！

军官头子嗥叫了一声突然抓住了李龙云的匣子枪。李龙云扣了扳机，没想到瞎火了。他急中生智用力一拉，把枪夺了回来。他拉得很猛，军官头子的手掌都划破了。

他火速推上子弹，打死了那个军官头子，用脚踢倒了顽抗的敌人，转眼之间敌人被制服了。好几个敌人被打倒在地。

事至如此地步，太炳烈还没能开一枪，站在门边发愣。

“小太！注意墙壁！”李龙云高声提醒太炳烈。太炳烈这才看到他背后的墙上挂有数十支手枪。

李龙云命令太炳烈缴去敌人的枪，活捉了全部剩余的敌军官。这天夜里，李龙云和太炳烈还活捉了“讨伐”归来的大批敌人。

李龙云是一个英勇无双，大胆无畏的优秀指挥员，在额穆县城袭击战斗、大沙河战斗、大酱缸战斗和腰岔战斗等多次作战中充分显示了这种素质。

我向李龙云团长交待任务的地方大概是小哈尔巴岭入口。那次见面的还有任哲。我嘱咐李龙云要开辟通往苏联的保险通道。他说，没问题，请放心。

林春秋和韩益洙带领一批病号和体弱者前往苏联，也正是李龙云和任哲到苏满边境开辟通道的时候。

我十分担心的病号和体弱者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可是，肩负特使使命的李龙云却在同日军的交战中壮烈牺牲了。他很好地完成了开辟通道的任务，还利用这条通道，把伤员送到了苏联。

他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到苏联了解那里的情况，向我们报告。他为了执行这项任务前往苏联。他到苏满边境—带，看到队员们衣着褴褛不堪，心想，司令部的使者这样破衣烂衫的太不象话了，便打算找从前有过联系的烧炭人解决服装问题。

可是，这个烧炭的早已叛变，做了敌人的密探。这个叛徒骗李龙云说要下山买衣服，却带来了一百多名敌人。李龙云寡不敌众，一个人打倒几十个敌人后，壮烈牺牲了。

多年来断绝的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就是这样恢复的。

其后，我同共产国际保持了紧密联系，并为加强同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做出了努力。

四　1940年秋

最近，我读了些宣传介绍抗日革命历史的文章，发现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固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深化的领域。

特别是小哈尔巴岭会议前后这个阶段的材料很少。

1940年的秋天，不是平凡的秋天。我们在这年秋天所经历的风霜，恐怕写几部长篇小说也是写不完的。那是从大部队活动转入小分队活动的时期，所以我们没有打过像抚松县城战斗和间三峰战斗那样大规模的战斗。人们都说在抗日革命历史中，未曾有过像艰难的行军那样艰苦的行军，也未曾有过像艰难的行军时期那样艰苦的时期。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1940年秋天我们所经受的考验，可以说不亚于艰难行军时期的考验。如果说艰难的行军是肉体上的痛苦达到了极限的考验的话，那么1940年秋天我们所处的逆境，就可以说是精神上的痛苦达到了极限的一次考验。

肉体上的痛苦也好，精神上的痛苦也好，要克服它都要有刚强的意志，不断地进行自我斗争。这就是我们在1940年秋天的体验。

小哈尔巴岭会议之后，我们从大部队活动转入小分队活动，根据新的斗争策略重编部队，在方面军之下设了好几支小分队。

我给这些小分队指定活动地区并分配任务之后，率领一支小分队开往延吉一带。

那时，我给金一小分队分配了在汪清和东宁地区进行活动的任务，给吴白龙小分队分配了在延吉、安图一带解决过冬口粮的任务。

我们在延吉县发财屯山沟尽头等待吴白龙的小分队。可是等了好几天，他们却杳无音信。那时候要弄一把玉米棒也需要流血，所以这是情有可原的。要弄到一升米，就要打进集团部落，而这是不豁出性命就难以做到的。

当年，我们一整个夏天光用煮熟的风毛菊充饥。山上风毛菊有的是，但光吃它，吃得再多也不顶事，肚子照样饿得慌。

正在这个时候，去搞粮食的侦察组在峡谷里发现了一所草棚。他们说，草棚里住着三个朝鲜农民，棚子周边有一片犁好的耕地，只要做好这三个农民的工作，也许能搞到一些粮食。

于是，我把姜渭龙派到草棚去了。我对他说，做草棚农民的工作时，不要隐瞒，要照实说我们是游击队。

姜渭龙请求农民给予帮助，他们显出为难的样子，说要搞到粮食，就得到明月沟去，可是，警戒森严，难以办到。他们又说，游击队的要求嘛，危险再大也得去办。于是他们冒着危险去了。

听了姜渭龙的报告之后，我指示队员们提高警惕，加强警戒。

这天，炊事班熬了一锅党参粥。将党参打碎煮烂，就成糊

状，如果掺点米，就别有风味儿，党参粥，在野菜粥中是上等饭食。

党参粥正滚开的时候，站岗的孙长春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敌人大举来犯。同志们到岗哨去看，怎么也看不见敌人，问孙长春敌人在哪里。孙长春指着山脚说那里有敌人。他们循他指的方向望去，那里只有一些树桩子。

患过热病的人，身体衰弱，视力减退，容易发生这种幻觉。他患热病没多久呢。

我正向派孙长春去站岗的那个指挥员追究责任的时候，在伙房里干活儿的队员们，一听敌人来犯，就将精心熬成的党参粥全给倒掉了。

过了几天，到明月沟去搞粮食的两个农民回来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穿西服的绅士。他要求和我谈话。这个穿西服的人，是在汪清游击队当过连长的崔容斌。

崔容斌曾是一个能干的指挥员，也是个大力士。

有一天，他向我请求道：他身体不舒服，需要离开连队休息一些时候。我给了他一些时间，让他到小汪清深山沟，一边打猎，一边养养身体，并帮助那里党组织的工作。

然而，过了些时候他被打成了“民生团”，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后投到敌占区去了。他在信上说，望你和娃子无恙；我干革命多年却被诬为“民生团”，实为冤枉；我不愿白白送死，暂且脱险去敌占区，在那里继续干革命。当时，他的妻子分娩没几天就带着这封信流着眼泪来找我。她好像患了产后病，脸肿得泡泡

的，初生的婴儿，像是奄奄一息的样子。

他为保住自己一条命，竟遗弃濒于死亡的妻小，投到敌占区去了，这也算一个人吗？我禁不住愤怒。我心里骂崔容斌冷酷无情，但又希望他像在信上写的那样初衷不渝，坚持革命。

他离开部队以后，我们替他照顾了他的妻小。后来将她们母女和伤兵员一同送到苏联去了。

离开革命队伍的崔容斌，过了五年之后，在比刮起“民生团”妖风时更艰苦的时期又来找我们。

崔容斌背着吊有一口小锅的背囊，大步流星地走上山来。看样子，他没有受过多少苦，满面红光。他一跨进司令部帐篷，就踉踉跄跄地跑到我的跟前说，“久违，久违！”

我也热情地迎接了他。不管怎么说，他毕竟还是我在汪清时带过的指挥员啊。

崔容斌一见我就讲起了他为了归队到处寻找部队的事。我问他吃过饭没有，他回答说刚刚在山下煮饭吃了。说着，他从背囊里掏出米袋、干比目鱼和烧酒等。

我看吊在背囊上的小锅，一点也没有沾烟黑。一个寻找游击队在山中跋涉好久的人，说刚刚用小锅煮过饭，可是小锅上一点烟黑也没有沾上，完全是新的。这就可疑了。

我断定他已经堕落成像李钟洛那样的败类。在我们的部队一度传开风闻，说崔容斌投降了。

崔容斌不知道我已看透了他，往杯子里斟满了酒，说，为纪念重逢，干杯。

我拒绝了。他举起酒杯的手突然抖颤起来。我的声音带有怒气，他好像也意识到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

我查问他：崔容斌，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和草棚农民是怎样碰头的，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崔容斌明白再要骗术也毫无用处了。他坦白道，草棚的那三个人是密探，他接到密探的情报，带三支“讨伐”部队来包围了这条山沟。如果现在他一发出信号，“讨伐队”就会马上扑过来。

我马上意识到我们陷入了难以突破的包围之中。

这时使我痛心的，不是部队处于决一死战的危险境地，而是做了日寇狗腿子的崔容斌若无其事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为了使我“归顺”，油嘴滑舌地发出了种种谬论。他看着我的眼色说：我很清楚现在金将军的处境有多么严峻；整个满洲已变成了日军的天下；无论怎样努力也是没有办法的；金将军是为民族做到了所能做到的一切，你“归顺”，也不会有人骂你；那些已“归顺”的人都当官发财了，那边说，只要将军下山来，就让你做吉林省省长。

我斥责他说，崔容斌，你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你是曾在汪清当过连长的人，不感到可耻吗？你遗弃妻小逃走时，我们却为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指挥员而感到惋惜。你竟敢以这种丑恶的嘴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你扔掉妻小投敌，你有做人的良心吗？人岂能变得如此肮脏！

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最终就会落到这种下场。

我认为，崔容斌的叛变，是从他以身体不舒服为借口离开连队到小汪清山沟休息时开始的。当时，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革命还重。他说他被打成“民生团”，不愿白白送命，逃往敌占区，但这都是缺乏革命信念的表现。

正如崔容斌的实例所证明的，在革命道路上退一步，其终点就是叛变。因此，我常常对队员们说，革命者要走的道路，只有一条革命的道路。离开这条道路，就成为反动派、叛徒和社会渣滓。凡是害怕吃苦、怕打仗、怕挨饿、怕艰难行军、怕蹲监狱、怕绞刑架而中途放弃革命的人，如果把他带到刑具跟前灌两三次辣椒水，就会改换旗帜。

背叛，可以说是从背弃良心开始的。这是崔容斌事件告诉我们的教训。

在间岛无数人被打成“民生团”遭处决时，有不少人离开游击区投到敌占区去。但大部分革命者被扣上“民生团”的帽子遭到迫害，也没有离开游击区，仍始终站在革命队伍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宁死不昧良心。他们很清楚，背离革命，就只能走反革命的道路。革命者就是这样把昧着良心离开革命红旗的行为看作可耻的事，当作死亡。也就是说，当作非人的行为。

在神仙洞游击区的时候，朴成哲他们连队有个叫仁淑的女队员。

有一天，这个女队员悄悄地给站岗的朴成哲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别的连队做连长的爱人寄给她的。她爱人在信上写道：他“被红色缧绳捆绑起来了”。这是被打成“民生团”的隐语。

朴成哲当时是连队青年干事，一个女队员把这种信给他看，并就自己命运问题征求意见，这从组织观念角度上来说，是做得很对的。她向朴成哲说，爱人被打成“民生团”了，她也不会平安无事，与其做冤魂，倒不如到敌占区去。

朴成哲对她说，这是什么话，到敌占区去，意味着放弃革命斗争，等于投降，岂能这样做。

她说，不，我是要避开“民生团”，而不是要放弃革命斗争。

朴成哲循循善诱地说，离开革命队伍，不就只有一条反革命道路吗，你要再三考虑。

她听了朴成哲的这番话，认识到自己差一点儿走上革命者不应走的道路。如果当时朴成哲不诚恳地开导她，而是怂恿她逃命，那么，她会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女队员仁淑没有离开游击区，一直在革命队伍里英勇奋战，后来在一次战役中壮烈牺牲。

她之所以能够在要么革命，要么逃命这两条道路中，没有选择逃命之路而选择了革命之路，是因为她没有凭主观愿望处理自身问题，而是向青年干事暴露思想以得到组织的帮助，又是因为她接受了组织上的指教，克服了动摇。她无愧为一个理智的革命者。

可是，崔容斌不管怎么样还是男子大汉，却不去求得革命同志们的帮助，只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卑鄙地投到敌占区去了。如果他作为一个人珍视一点良心，就不会扔下分娩不久的妻子，卑鄙地投到敌占区去的。

他未能克制个人感情。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一个人，如果不克制个人感情，就会犯不可想象的大罪。那些只顾自己的人，把个人感情绝对化的人，是终有一天会背叛革命的。所谓背叛，都是从“自我”这一立场出发的。从“我们”这一立场出发的人是不会而且不可能背叛的。

因此，革命者要努力克制自己，努力使自己习惯于“我们”。这就是踏上革命征途的人应具有的纯洁的良心，是时时刻刻完善自己的修养过程。

只顾自己的人，绝不能成为革命者，也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南牌子的时候，李钟洛穿着日军雇佣人员的制服出现在那里劝诱“归顺”；进行艰难的行军时李虎林开小差，林水山也做了叛徒，今天崔容斌又找我来摇唇鼓舌。

我当时的心情怎样是可想而知的。

最使我痛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李钟洛和崔容斌他们都是我曾珍惜和信任过的人。如果他们是我不怎么珍惜、信任和爱护的人，我是不会那样痛心的。

在朝鲜革命军中当一名队长，是很不简单的，在抗日游击队里当一个连长，也是不简单的。叛变之后光待在家里，还情有可原。可是，他们不仅不知道背叛革命是多么没有良心、多么可耻，居然恬不知耻地来找老上级诱降，这使我更感到痛心。

那么，他们为什么竟然恬不知耻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呢？这是因为他们不识时务，自己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认为革命垮了台，可以找老司令官来诱降了。

崔容斌也没能避免和李钟洛一样的命运。

这天，敌人重重包围我们所在的山岳，到处升起了点点篝火。但是无论敌人怎样布网，也不可能将整个山都给网上。敌人只能在山脊和山谷里设岗布下包围网。

我们引诱敌人自相厮打，而后沿着山腰离开了驻地。

当我们走过从明月沟开往安图的公路，开进树林松一口气时，远远望去，敌“讨伐队”黑压压地登上我们待过的发财屯山沟尽头，自相厮杀起来。

我们悠然地进入深山老林隐蔽了起来。

由于出现了这种出乎预料的情况，所以我们和吴白龙小分队的接头，就面临了困难。

本来我们约定在发财屯山沟尽头和吴白龙小分队会合。要和他的通信员接头，就要把人派到那里去，可是这需要付出牺牲。

更大的问题是吴白龙部队的通信员全然不知道发财屯山沟尽头已掌握在敌人手中。

我们把池凤孙和金洪洙派到接头地点去了。

金洪洙在长白刚入伍时，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新郎”，是个责任心很强的队员。

第二天晚上，池凤孙和金洪洙在接头地点碰到通信员，接到吴白龙的信后就回来了。

他们为了和通信员接头，潜入联络点的经过，是极为惊险的。敌人警戒森严，寸步难移，他们只好把一棵棵大树作掩蔽潜行。

其间，吴白龙小分队袭击集团部落，弄到了一些粮食。后来，他们把这些粮食大部分都送到司令部来了。

离开发财屯之后，我们选定的驻地是黄沟岭基地。我们打算在这里度过1940年的冬天，并开展小分队活动。

要一面开展小分队活动，一面恢复革命组织，牢固地奠定群众基础，就要做好过冬准备。

除吴白龙小分队之外，我还向其他各小分队下达了任务，要购进粮食、食盐、布匹等过冬所需的各种生活必需品。

过冬准备最重要的是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必须特别做好队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以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革命信念。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格纪律，以免发生事故。

但后来在姜渭龙的小分队中发生了思想松懈的现象。他们选定可建密营的地点回来时，发现小溪里有成群的鱼漫游，就冲着鱼群胡乱开枪。

听了这话，我就大吃一惊。敌人正在附近山岗上修炮楼，闹得乱哄哄的，在这样的地方开枪，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准备在这一冬蹲在密营里做很多工作，但这个计划差一点儿被一声枪响付之东流了。

在当时发生的事件中，还有一个事件使我难忘，那就是一头牛的事件。

这个事件的主人公是张兴龙。他当时任机枪排的班长。他率一支小分队去夹皮沟一带搞粮食工作，牵来了一头牛。

他牵来的既不是木材所的牛，也不是犄角上打了“王’字样

烙印的民会的牛，而是农民的牛。

当然，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为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而去一个村庄的时候，在山沟里发现了这头牛。为了找主人走遍了山沟，但始终没有找到。于是，张兴龙让队员们把牛牵到密营去，他本人留在了拴牛的地方，等待主人回来，讲清原委，付给牛钱。

可是左等右等，主人始终没有回来。这样，他没付牛钱就回密营了。

后来才得悉，那头牛的主人来牵牛时，看到一个带枪的人在那里踱来踱去，大吃一惊，跑回家去了。

听到张兴龙小分队没有付钱白牵来农民的一头牛的报告，我很不高兴。

如果是不懂革命军纪律的新队员做出这种事还情有可原，而干了多年革命的张兴龙竟干出这种严重越轨的行动，这使我难以相信。

张兴龙是在1932年同自卫团打仗时被打掉一支手指后被捕，后来越狱归队的。开初，战友们怀疑他是从敌人那里接受了什么任务回来的。

张兴龙为获得同志们的信任做了积极的努力，在车厂子游击区的粮荒和艰难的行军中都表现得很好。这样的人犯了随便牵农民牛的错误，是不可思议的。

搞好军民关系，是我们从武装斗争初期起一直强调的问题，人民革命军的服役条例也有明文规定。1940年军民关系达到了很

高水平。军民关系的纯洁性达到了何种程度呢？达到了人民群众送来支援物资，人民革命军就把它送回去的水平。

1940年春，我们在洋草沟打了一仗。战斗结束后，这个村里的人们给我们送来了好几只鸡。我们就付给了他们几十倍的钱。他们看到这个钱就暴跳起来，生气地说，革命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让我们收钱，这不是叫我们把鸡卖给自己的儿女吗？你们真是太不领情了。他们这么一说，我们也无话可说了。游击队用钱回答群众的一片诚意，这使群众感到难过。我们说，“如果你们不收钱，那么我们也就不收鸡。”这样，钱和鸡递过来递过去好长时间，最后，我们只好把鸡收下了，他们也收下了钱，这场争吵才算结束。但是，部队撤离洋草沟时，把这些付了钱的鸡如数放在村里了。

这不是好久以前发生的往事，而是几个月前的事情，可是，张兴龙破坏了优良传统，我的心情该怎样呢？

队员们对张兴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说，张兴龙就是死了也洗刷不掉这个错误。

张兴龙自我批评也作得很好。

因为他自我批评作得好，所以我们只给了他一个处分，叫他把牛还给了主人。

1941年，当我率小分队重返满洲时，张兴龙在金一小分队进行活动，后来壮烈牺牲了。

我们在黄沟岭基地时，还出现了逃兵。

这个逃兵叫小蔡，是个中国人。

小蔡平时想家想得厉害。中秋节那天，他吃着月饼哭起来了。他意志很薄弱，所以党组织对他加强了个别教育。

小蔡患了传染病，我们把他送到后勤医院去了。后来有人向司令部报告说，他怂恿炊事队的一个女队员和他一起回家乡。他没有过好部队生活。他担任值班时，爱打瞌睡；让他站岗，就说肚子疼。革命是不能勉强的。

小蔡终于背弃我们的诚意逃跑了。他逃跑之后的行为更可恨。他离开队伍以后马上引来了“讨伐队”。

大部分成员都去搞小分队活动，密营里只剩下我和几个传令兵。

后来，我们司令部转移到孟山村山沟去了。

各小分队和小组完成了任务，陆续回到这里来。

吴白龙小分队筹备几百石粮食，贮藏在秘密场所。他们买了一大片未收获的玉米地，自己收获，把带苞的玉米装进麻袋，运到离富尔河约有五十里路的深山老林中的囤子里贮藏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通知我们参加在苏联举行的朝、中、苏军事指挥员会议。我曾说过，当时我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之后，派先遣队详细了解那里的情况，同时指示按照既定方针，做好在东北过冬的准备。

可是传来一则消息说，那些粮食全部落到了敌人手里。因为毕团长叛变了，所以储藏粮食的场所被泄露了。毕团长是金明花在敦化的树林中竭尽精诚救出的那个毕老疙瘩。做过团长的人，因经不住考验而叛变了。

敌人探悉到粮囤的位置，纵火烧山，带一帮人来破开粮囤，把粮食全部拉走了。几个月的辛苦，毁于一旦。

但是，这一切困难都没能使我动摇。当时的困难固然是严重的，但我们遇到这种困难何止一两次。

在罗子沟台地上遇到的困苦，先后两次进行的北满远征和抚松远征，以及艰难的行军，都是十分曲折艰苦的。

但是，我们战胜了这一切。战胜了伤寒，战胜了饥饿，也克服了认为前途像黑夜一样暗淡的绝望情绪，还克制住了因战友的牺牲而产生的悲痛，毅然地站起来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放弃革命必胜的信念，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祖国和民族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没有背弃革命者的良心。

当时我在孟山村这样想：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闯过这个难关，使革命掀起新的高潮。好，走着瞧吧，看最后的胜利属于谁！

这也许是出自我对革命的使命感和胆量，考验越严峻，勇气就越大，对革命的热情和责任感就越发强烈。

出路何在？

形势越严峻，越要加速强行军。要进行强行军，就必须搞思想动员，以使人们坚定信心，鼓起勇气。

为此而召开的会议，就是孟山村会议。

我向队员们坦率地说：

“形势越来越严峻而艰苦。我们的革命事业能结出硕果，国

家能获得独立。对这一点，大家都相信。但谁也不知道这一天究竟何时到来。

我们饱经风霜打了十年苦仗，但不能说清楚，这种风霜今后还需要经历五年，还是十年。

“但要明白，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当然，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碰到比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困难多几倍、几十倍的困难。没有决心跟着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就可以回家去。

“愿意回家的人，我们发给他路费和口粮。同时也不指责他半途而废，放弃斗争。因力所不及，缺乏信念而离开队伍，这有什么办法？要走的都走吧。但要打个招呼。”

队员们听了我这番话，就忽地一下拥上来拉住我的胳膊泪汪汪地说，金将军，我们看不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倒下去也可以。我们要活在将军的身边，死在将军的身边。一个人，能活多久呢？与其背离同志，下山屈从敌人苟活，宁愿在这里继续打仗，在这里阵亡。我们要和金将军同生死、共患难。

队员们这么一说，我的眼眶也发热了。当时，他们说的话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想，任何慷慨激昂的讲话，都不会像那天队员们所讲的话那样激动人心。

那天我们宣誓：决不让我们在抗日革命征途上献出的鲜血白流。

在孟山村山沟举行的会议，又一次证明了司令官和战士间的浑然一体、领导者和群众间的钢铁般的统一团结，是既不能也绝

不会被分离的。通过这次会议，抗日游击队员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能从危机中拯救抗日武装斗争的关键是珍视革命良心，司令官和战士永远共命运。

通过孟山村会议，我们更加确信只要朝鲜的革命者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信念与意志，不屈不挠地展开斗争，就一定取得胜利。

正当这时候，我们派到远东去的同志们通知我们如下内容：

共产国际一再要求我和魏拯民等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代表尽快到苏联参加将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朝、中、苏三国军事指挥员会议；他们表示，如果东北的游击队来苏联的话，一定做好接待的准备。

共产国际还建议，我们到远东过一个冬天之后，根据实际情况磋商今后的活动措施。

共产国际要召集的会议宗旨明确，而且东北抗日联军的其他指挥员也已经到达，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去苏联参加会议，并带领一部分主力部队成员去。

但是这样做谈何容易，一想到要去离祖国更远的地方，更离开自己多年战斗过的地方，队员们都普遍感到难过。

在指挥员会议上通过了我去苏联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公布，有些队员就建议说，共产国际召集重要会议邀请司令官参加，最好金将军等几个同志去，部队留下来继续战斗。

当然，这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率部去远东是正确的。于

是，我说服队员们说，我们到远东去，既不是放弃革命，半途而废，也不是到那里永驻。去年共产国际召集的会议我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要参加。在这个会议上，要和共产国际或苏联当局就朝鲜革命将来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这样做会有助于我们。因为说不上这个会议究竟要开多久，所以赴会时要带你们一起去。在过冬准备做得不够好的情况下，我不能把你们留在这里。让我们一同到苏联过冬，等到明年春天再回到这个疆场吧。

后来我回顾那严酷的1940年秋时认为，当时我作为指挥员做的决策是及时的、正确的。

那年10月底，我们做好了准备，离开车厂子，踏上了赴苏联的路。

出发前，我派通信员通知了魏拯民和吴白龙。但他们二位正卧病不起，没能去。

吴白龙没见到通信员，后来为了寻找我们，走遍了整个安图一带。

吴白龙抵达车厂子的时候，我们早已离开了那里。

吴白龙发现我们埋藏的粮食和冬装，激动得流下眼泪的故事就是这时候发生的。我们为吴白龙他们着想，在去远东以前埋藏了两袋米和几十套棉衣，正是这些物资帮助他们摆脱了困难。

后来，吴白龙小分队也转移到远东来了。

开往远东的路上，我们也吃了不少苦。白天大都隐蔽在树林里，夜间行军，又需要避开敌人，所以既艰难，又费时间。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比较顺利地走到了老头沟。后来，朝百草沟方向

行军的时候，碰上了“讨伐队”。我们排成一行正翻越山岭时，敌人从山谷冲我们爬上来。我们回转头迅速跑向山脊。当时，金正淑背着许多东西，赶不上队伍，险些出了问题。

越过山脊后一查，看不见金正淑。于是，我急忙折回山脊，朝敌人爬上来的山坡一看，只见她被大背囊压得迈步艰难。敌人边追赶她，边声嘶力竭地喊：要抓活的。

我用匣枪射击敌人。警卫队员们也跑来用机枪掩护金正淑。她就这样得救了。

我们甩开敌人，在蛤蟆塘附近宿营。因为那天敌人活动特别频繁，所以我们躺在村庄附近谷子地上，直到天黑。

恰巧，垄沟里种着白菜和萝卜，我们就用它充饥，可是冷得受不了。于是点上蜡烛，用烛火烤暖冻僵的手。

到了珲春，有两个朝鲜农民开始做我们的向导。他们把我们一直带到苏满边境附近，告诉我们说，翻过前头那座山，就是苏联。可是翻越那座山一看，是一片没有任何标志的广阔无际的平原，分不清哪儿是满洲，哪儿是苏联。

我叫李斗益攀上树观察一下河水流向和人烟。他从小喜欢爬树。他从树上下来说，既看不见河水，也不见人烟。

我们往东走了一段路程，在树林中发现了电话线。只见瓷瓶与中国和朝鲜的不一样。这使我们感觉到已经到了苏联了。但需要再确证一下，然后开始行动。

这天晚上，当我们一行派出侦察组之后休息的时候，从东方传来刺耳的机枪声。过了一会儿，侦察组回来说，他们摸进

一所小小的哨棚，正在端详杯子和水壶的时候，被哨兵发现了，差一点儿闯了祸。他们说，杯子和水壶都特别大，又粗笨，看来一定是苏联边防哨所。问他们那个哨棚离这儿多远，他们说有十里左右。

苏联的边防军用机枪通宵达旦地进行了压制射击，看样子，我们的侦察组惊动了他们。

第二天，我派李乙雪和姜渭龙到边防哨所去，把苏联哨兵领了来。

我们同苏联人面对面地坐下来，可是语言不通，吃了苦头，我向他们反复地讲，我们是朝鲜游击队，我是队长金日成，幸亏他们听懂了“游击队’和“金日成”这两个词。

开赴远东的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之后赴苏，但因具体通道和时间还没有通知到边防哨所，吃了不少苦头。

进入苏联境内之后搞了好几天防疫工作，拖了些时间。

整天蹲在屋里没事做，队员们都感到无聊。有的队员整天唱歌。他们把所有的革命歌曲都唱了一遍，连古时候吟风弄月的歌谣都唱了起来，搞得挺热闹。

我们的同志会唱很多歌曲。

我到队员们的住处对他们说，要耐心一点。

在苏联边境逗留好几天，你们会不高兴，但不要以为是苏联同志慢待我们。每个国家都有出入境规定。根据入境规定，人家要进行身分调查。卫生检查，是为了了解有没有传染病菌。最近

在满洲的关东军细菌战研究集团，把传染病菌散布在苏联远东地区，所以苏联政府颁布了加强入境检查的决定。我们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还要闯过许多难关。我们的革命将带来新的局面。离解放的那一天也不远了。因此，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高唱着革命歌曲，进行顽强的斗争，光复祖国吧。

后来，苏联人把我们带到了包吉耶特。

在边防哨所的时候，我在那里见到了洪范图部队翻译金承斌。他担任了我们和苏联人之间的翻译。他很熟悉车厂子。

我们的女队员们看着苏联妇女们身穿花花绿绿的衣服自由自在地逛马路，含着眼泪说，朝鲜妇女什么时候也能穿上那样漂亮的衣裙，扬眉吐气地逛马路呢？

1940年的秋天，就是这样日日夜夜都以重重难关和严峻考验编组的严酷的秋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样重重的难关和考验的重压下没有窒息而活了下来，是因为在任何逆境中都毫不动摇，克服了艰难困苦，坚持了革命信念。

我们并没有因为路途艰难而绕道前进。我们一向是朝着解放祖国的目标勇往直前的。只要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早日实现祖国解放的道路，那么，再困难，再艰险，我们也都毫不踌躇，奋勇向前。

革命者是命里注定要同困难和考验做伴的，因为破旧创新是革命者的日常生活，它必然永远陪伴着困难和考验。害怕和回避困难和考验的人，不能成为革命者。

至今我还没有忘记1940年的深秋。就是在这个深秋，我们垫

着落叶睡觉的间岛的山水，如今还历历在目。

到了听不见枪声、看不见尸体的远东，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天地。

但是，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许多多的高山峻岭。当时距离祖国解放的那天，还有五年的岁月。

五　回忆魏拯民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生前曾多次回忆过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军政干部魏拯民。

从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情况，诸如金日成同志和魏拯民同志之间格外亲密的情谊、魏拯民作为革命家的人格和他的壮烈牺牲，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怀在心中的苦恼和希望。

我第一次会见魏拯民，是他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前来间岛出席大荒崴会议[9]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我和魏拯民一直并肩走在抗日的道路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魏拯民是从小走上抗日爱国道路的职业革命家。他在安阳上过军校，在北京念书时参加过抗日的游行示威。

作为革命家，魏拯民的活动，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把斗争舞台转移到满洲以来进入了新的时期。他来到满洲头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哈尔滨道外，在那里做党委书记的工作。

他的外貌，很像个大学教授，不是军人型，是个文人型、思索型的人。若不是闹革命，他很可能是为科学研究、著书立说奉献一生的人。他的特点是，为人淳朴真诚，待人随和谦逊，做事认真圆熟。

共产国际档案库存有《满洲游击队指挥员鉴定书》，其中对魏拯民有如下的记述：

“魏拯民

“南部集团副指挥、中共党员、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是政治素质很好的指挥员。

“据游击队员的反映，他威望很高。履历表不具。侦察局和内务部并无此人的反面材料。”

魏拯民是中国的革命家，是支持朝鲜革命家，为朝鲜革命煞费苦心的人。大荒崴会议是一次气氛十分紧张尖锐的会议。要是以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的魏拯民处事不公，我们肯定落到了十分不利的地位。是他认真听取了我的主张，该肯定的作了肯定，该参酌的作了参酌。腰营沟会议后，为了得知共产国际总部对我们申诉的问题作出的结论，他亲自跑了一趟莫斯科。

他的莫斯科之行，对我们朝鲜革命是一个很有益的支持。我至今不能忘记，当魏拯民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南湖头的时候，跟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脸贴着脸高兴不已的情景。

他转达共产国际的看法说，我提出的朝鲜革命者应举起朝鲜革命的旗帜进行斗争的主张，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我指责反“民生团”斗争犯了极左错误的讲话，是正确的。他接着转达共产国际的结论说，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应当有自己民族的军队，应当在国内和鸭绿江沿岸进行斗争。当他说完这些话就跟我拥抱的时候，我心想，决不要忘记他为朝鲜革命做出的贡献。

自南湖头会议以后，我和魏拯民的友情愈加深厚。我们意气相投，一起度过了半个来月，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迷魂阵会议上，他对我们提出的改编队伍的意见表示了支持；后来在成立祖国光复会时，他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大概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努力学朝鲜话，说是要跟朝鲜同志一起搞联合斗争，就应当掌握交流感情的语言。他特别爱护和关怀朝鲜队员。这都是对朝鲜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支持和声援。

对魏拯民，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心意。以德报德嘛。

迷魂阵会议后，他和我们一起开往白头山方面，不幸在富尔河附近受了伤。那时候我们有几匹缴获敌人的战马，我从中挑出一匹最好的骏马给他骑。他骑着这匹马，跟我们一直走到了马鞍山。

我命朴永纯在大碱厂办一所医院，让魏拯民治伤养病。

此后，他去会见杨靖宇，传达共产国际关于热河远征的指示。当我们开到西间岛即将完成白头山密营建设的时候，他从南满回到了我部。

我看他的脸色，健康状况非常不好。他体质本来就很弱，加上有已成痼疾的心脏病和胃病，而且一开始工作，就一头钻进去不要命地干，根本顾不上爱惜自己的身子，健康状况当然越来越坏了。

有一次，他在队伍的前头爬山越岭，心脏病突然发作，昏了过去。

尽管这样，每当我们劝他去养病的时候，他总是一笑置之，

说肉体犯病不可怕，思想犯病才可怕。

我叫朴永纯和姜渭龙到横山去盖了一座类似疗养所的房子，好让魏拯民住在那里养病。我没有让他去黑瞎子沟密营，是因为那里距前沿近，不是适于魏拯民这样的病人养病的地方。魏拯民到横山密营过了一段疗养生活。

我又派姜渭龙和金云信去长白购买人造甲鱼血等对魏拯民的补养有效的药品和补品。他们带着募捐的二百多块钱去买来了人造甲鱼血以及大米、白面、罐头、牛奶和煎饼，都给魏拯民送去了，魏拯民特别喜欢面食。

那年的春节，是我到横山密营去跟他一起过的。当时，朴永纯在罐头盒的底面打上很多小孔，用它造了一个压面桶。春节那天，我和魏拯民一起吃了用这个压面桶压出来的淀粉冷面，也喝了几盅酒。第八团团长钱永林也和我们一起过春节。他的烹调手艺非常高明。他分别用切肉的刀和切蔬菜的刀，做了好几样菜，把切得细细的肉丝这里放一把，那里放一把，再把调料拌在各个盘子里，做得非常熟练，非常麻利，手艺的确不同凡响。

魏拯民还跟我要人，我总是有求必应，满足他的要求。他要的黄正海和白鹤林，是我特别爱惜和关心的人，但因为魏拯民指名要他们，我就给了他。

黄正海聪明干练，是个当连长、当团长都能称职的人才。无论从哪一点看，他都是无可挑剔的，而且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最适于做群众工作的人选。

白鹤林也是跟随我多年的传令兵。他诚实淳朴，从不顾惜

自己，所以，我不管到哪里去，每次都带着他。打普天堡的时候也带着他。我在佳林川边一棵泥杨树下指挥作战的时候，他一直跑东跑西传达我的命令。在间三峰，崔贤的第四师被敌人包围的时候，也是他向第七团和警卫连传达了我的突袭敌人支援四师的命令。

他一度要求我让他到作战部队去参加战斗，我同意了，让他下到团队去了。后来我问他在作战部队过得怎样，他说，很好，挺过瘾，不过，离开将军身边，实在不好过，要求我再把他调回来当传令兵。这样，我又调他回司令部来了。

他还跟我参加了艰难的行军。路上断了口粮，把仅有的一合炒面分成好几份给大家吃的时候，他也是在场的一个。

上下之间的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就必然比亲骨肉还亲，必然更加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一想到要把这样一个亲如手足的人送给别人，我心里实在有点麻酥酥地难受。但想到他是重病在身的魏拯民渴求的人，我就忍痛割爱，把白鹤林送走了。

听到杨靖宇牺牲的噩耗，最悲痛欲绝的是魏拯民。他悲伤，他难过，连饭都不吃了。

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负起了第一路军的指挥。他作战英勇，战果辉煌。不幸，那年秋天的一次战斗中，他第二次受伤，加上又犯了肺病，不可能继续指挥队伍了。

日本鬼子杀害了杨靖宇后，把他的头颅悬挂在街头上，扬言南满的抗日联军全被消灭了，东北全境的抗日武装斗争也快要告吹了。

的确，这个时期的东北抗日联军，里里外外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日本帝国主义的“讨伐”越来越猖狂，抗日联军内部不断出现动摇分子和叛徒，甚至当过旅长的方振声也在杨靖宇牺牲的那个时候被俘叛变。

加之，南满第一路军的群众基础也被严重地削弱了。

这一切，对第一路军政治委员、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有漏洞，存在着绝不可听其自然的严重缺陷。

他是严于律己，又善于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优点的虚怀若谷的军政干部。他对我说，朝鲜同志在解散了游击区以后仍继续在东满、西间岛和朝鲜国内大力进行了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建设，希望听听我们的经验。

在游击区存在的时候，间岛各县是革命组织的天下。连六七岁的小孩子也自豪地在腰上佩着棍棒，打着儿童团的大旗，神气十足地嗷嗷喊着在大街上拥来拥去；妇女也都砸碎了封建的枷锁，团结在妇女会组织里投入了战斗。革命组织发动群众，群众奋然崛起，同游击队打成一片，沸沸扬扬，热火朝天地共同作战，共同种地，也共同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

然而，南满的游击队伍，却一直只偏重于军事活动一面，而忽视了群众工作。尤其是游击区解散以后，把原在游击区积极抗日的人民群众都疏散到敌统区，再也没有关心他们，也没有想到打好新的群众基础。结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自然而然地被断绝了。

他们的军事第一主义倾向，在热河远征[10]时表现得最严重。所谓的军事第一主义，指的是只重视军事活动，只凭军事对抗解决一切问题的倾向。

搞武装斗争，不能只重视军事。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支援军队、给军队补充兵员的广大群众做后盾，就不可能进行游击斗争。

我们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初期，只有几条枪，没有多少力量。但我们毫不迟疑地宣布了抗日大战，抱着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壮志投入了抗日战争。当时，日本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军事力量，和我们游击队的军事力量，是根本不能相比的。

那么我们靠什么开始了抗日大战呢？我们依靠的是革命的群众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的威力、道德上的威力、战术上的威力，是决心依靠这种威力去打败敌人的。

热河远征的冒险性，在于没有考虑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没有树立战术对策，只凭主观愿望，就离开自己的战区，与日军进行了正面对抗。

我们在解散游击区以后举行南湖头会议和东岗会议，决定进行党的建设，建立统一战线组织，把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改组为反日青年同盟，要挺进到鸭绿江沿岸和国内扩大武装斗争。作出这些决定之后，我们占据白头山地区，建立了祖国光复会，并且把这个组织迅速地扩大到国内的广大地区。这都是因为我们重视为军事力量做后盾的群众工作。

朝鲜人民革命军受到了这些组织的大力支援。那时候，敌人

大搞什么集团部落，筑起厚厚的土城，把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隔开，严禁群众把粮食运出城外，连一把米、一缕棉线都不准外流。当敌人如此穷凶极恶，处心积虑地企图困死我们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群众组织的支援，我们即便有钻天入地的天大本领，也是不可能坚持斗争的。

军民犹如针和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紧密相联，团结一致。

在南满省委召开的会议上，魏拯民决定将经过锻炼的游击队干部分派到满洲各地去，就是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而采取的决策。

尽管迟了一些，他能够认识到过去的失策，决心克服偏重军事一面的过错，还是可喜可贺的。

他在密营里同病魔拼搏的时候，最费心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在人力物力上受到重创的第一路军重整旗鼓，怎样才能引导受到严重挫折的南满革命重新崛起。他展望着迟早要到来的大变革，认为必须树立有伸缩性的战略，并与之相应地改变策略，可是因为想不出符合形势需要的决策而苦恼。他想到的一个办法是，要同中国关内的八路军取得联系，实现军事上的联合，于是当年4月给共产国际发了一封信，之后一直焦急地等着回信。

从魏拯民致共产国际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苦恼。现将信中有关几段话转载如下：

“……1935年秋……以后……同中央的一切联系全被断绝，在得不到中央

具体指示，收不到中央文件与通讯的情况下，四面受敌……我们犹如汪洋大海上的一只没有艄公的扁舟、一个双目失明瞎碰乱闯的孩子。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时，我们却如寄人篱下，蒙在鼓中……自与上级断了联系之后，我们屡遭意外的严重损失。”

魏拯民写信，为的是让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知道第一路军的困难，为的是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积极支援。

然而，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期望是很不现实的。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保障自己的安全，对满洲实行不刺激日本的柔和政策；而中共中央则远在几千里之外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无暇顾及东北革命。

在这种时候他希望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支援，是同他相当一段时间脱离了军事政治活动，无法及时获得能够帮助他正确判断形势的客观资料，并且为重病所折磨，身心十分虚弱的情况有关系的。

他那么望眼欲穿地等待共产国际的回信，是因为他在信中殷切地提出要求，要给第一路军迅速补充必要的干部和军需物资。他认为，共产国际的支援，是第一路军重振旗鼓的唯一办法。

然而实际上，在派一个联络员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从哪里如何输送他所要的干部和军需物资呢？与其期待共产国际的无法实现的支援，不如先恢复被破坏的地下组织，加强群众基础，得到人民群众的人力与物力支援，这才是更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是我当时的看法。

开过小哈尔巴岭会议后，我去看望在寒葱沟密营养病的魏拯民。看到他面容清瘦苍白，我心中不禁阵阵剧痛。我的同志们告诉我说，魏拯民的枪伤总算勉强愈合了，但已成痼疾的老病又重新恶化，健康状况总不见好转。我觉得，在这个条件很差的密营里，就是维持现状都是很困难的。

魏拯民对我说，他胸腔里好像有个石块似的东西老往上拥，很难受。听了这话，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因为我母亲生前闹心口疼的时候也常常这么说过。

魏拯民尽管自己的病这么重，却把话题老引到游击斗争的当前课题和战略战术问题上去。我告诉他说，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我们已定出了保存并积蓄革命力量，从大部队活动转入小分队活动的方针，并且已经采取了实际措施。他对我们定的方针表示支持，说朝鲜同志对形势作了正确的判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

接着对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斗争问题，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此外还讨论了将伤病员送到苏联去和预先储备小分队活动所需冬季口粮等问题。

这天，我劝他到苏联去养病。可是，躺在病榻上一直为第一路军的实况而苦恼的魏拯民却回答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改正，需要去办，不能去养病。他反而托我说，你要是到苏联去，一定要把第一路军的实况汇报给共产国际，并了解一下共产国际是否确已收到他的信。

看着他全然不顾自己的重病，一心想着第一路军的命运，为

之而苦恼，我心里也很着急。杨靖宇牺牲后，第一路军确实经受着严重的考验。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需要也不想到苏联去。因此，我们就约好，今后要通过通信员继续保持联系。

“金司令，拜托了。”

这是我离开密营时魏拯民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魏拯民。因此，对我来说，这句话就是他的一句遗言了。

实际上，这句话，是多么简单多么平常啊！

不过，我是把魏拯民送我时说的“拜托了”这三个字，以沉重的心

情，当作寓意深长的话记在脑子里的。我认为，他这话的言外之意，是托我坚持到底，完成他献出一生精心培植和爱护的革命事业，也许还包括着把第一路军的工作托给我的意思。

他说这话时的目光，是那么黯然惆怅，我至今仍不能忘怀。

我们动身时，为他准备了粮食和衣物，但我心里仍然很沉重。这些粮食和棉衣之类，能给他增添多少活力呀！他所需要的是能够把革命坚持到底的健康体魄！

我拉着黄正海和郭池山的手，一再嘱咐他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魏拯民救活。

他俩都说，一定尽全力照顾，要我放心地早早上路。可是他们仍陪着我，不想回去。

想到要把他们留在这无名的深山密林里，我也难过得抬不起脚来。

我们都难舍难分，把嘱托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觉迟滞了好长时间。

后来，我到了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全部办好了魏拯民托我的事情。

共产国际的人告诉我说，魏拯民的信确实早已收到了。

魏拯民致共产国际的信第一次被公开，是在1940年12月日本官方资料集《思想汇报》第25期转载其全文之后。

这封信落入日本帝国主义手中的经过是这样的：抗联第三方面军的团长李龙云于当年秋天在汪清一次战斗中阵亡，敌人在检查其携带品时发现了这封信。

由此可以认为，魏拯民的信未送到共产国际，中途落入了敌人手中。

那么，共产国际承认确已收到的那封信，是谁送到的呢？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库里的下述文件，可以看作是对这个疑问的明确答复：

“绝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启

兹将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司令、中国共产党南满省委书记魏同志1940年4月10日报告和两封信的译文送去，请查收。

雪里加诺夫

1940年8月10日”

这份文件上标有1941年1月23日这样的日期和季米特洛夫的签字。

信的前一页有下列文字：

“我们的通报共有四个部分，其中既有没有说全的，也有疏忽的。希望同志们会见这次前去的王润成，通过他了解你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他会将不便于用文字表述的秘密都告诉你们。对派往你处的此人，我作特别保证。”

据此可以推断，魏拯民致共产国际的信，不仅交给了李龙云，还托给了王润成。两人带的信，个别地方有些细微的差别，但基本内容一致，只是从李龙云身上发现的信里没有提及王润成而已。

王润成，早年就在东满同金日成同志有密切联系，外号叫“王大脑袋”，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政委。

主体30年(1941年)春，金日成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警戒森严的国境回到满洲，来到了与魏拯民见过最后一面的寒葱沟。然而，魏拯民他们一行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几个月后，主体30年(1941年)年底，金日成同志才听到了魏拯民及其警卫员一行的详细情况。

我们带着小分队回到满洲和国内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到了苏联。我们刚到，苏联同志就急于见我。一个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苏军大校来到我面前说，看来像是抗日联军的一支小分队越过苏满国境来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们说，能证明他们身份的只有金日成同志，并且很执意地要求和我见面。

我和这个苏军大校乘车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路上我浮想联翩，魏拯民也许在那支小分队里吧，但愿说他已牺牲的话是谣传。我心急火燎，觉得我坐的小轿车跑得像老牛车一样慢。

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苏军大校给我带来了郭池山。我一见郭池山，不禁大吃一惊，他竟变得像个花甲老人。他那衰老憔悴的面容，仿佛在一五一十地述说着魏拯民他们一行人辛酸凄楚的遭遇。

郭池山原在延吉地方当过教员，加入游击队后，最初是连队的指挥员，后来成了政治干部。

他是饱经风霜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见识广，品性敦厚，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尊敬。很多人跟他学了文化。人们所以都真心尊敬他，愿意跟着他，是因为他待人真诚，为同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有些人说他是“十二幅裙子”，我想这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对谁都一视同仁、关怀备至的度量大的干部。还有些人说他很像把一个大家庭的各种大小事情都揽在身上操劳和奔波的母亲，所以叫他是“十二幅裙子”。

第一路军组建警卫团的时候，我推荐他当了魏拯民的后勤副官。从此，队员们都亲昵地叫他“郭副官”。

他为魏拯民真正做到了竭诚尽忠。他不知多少次冒着生命危险去敌统区弄来了粮食和医药。魏拯民常说自己的生命能够延续下来，完全是郭副官的功劳。他这样说，决不是偶然的。

话又说回来，郭池山镇静下来，就请那位苏军大校把自己托他保存的匣枪还给他。等大校拿来了匣枪，郭池山就声音嘶哑地对我说：“这是魏拯民同志的匣枪。”

我虽然接过了那支枪，却怎么也张不开口问“他怎么了？”不见魏拯民，只有他的枪来了，可见他的牺牲是确切的了。

这天，通过郭池山，对魏拯民的遭遇才有了详细的了解。

我在寒葱沟与魏拯民分手以后，他们一行就迁到了桦甸县夹皮沟密营。满洲有好多个夹皮沟，汪清县有夹皮沟，东宁县也有夹皮沟。我讲的是桦甸县的夹皮沟。魏拯民他们迁到这个夹皮沟

以后，把密营设为两处，一处定在夹皮沟以北几十里外的地方，另一处定在西南方更远一些的地方。魏拯民住在北边的密营里，跟他一起的有黄正海、金凤男和医生金熙善，还有机枪班的七八个人。郭池山、金哲镐、朱道逸、李学善、全文旭、金得洙，都住西南的密营。知道这两处位置的只有郭池山一个人。他不顾劳累，经常来往于两地之间，通风报信，供应粮食。他入了伪满军军官的家礼，经他们的帮助解决粮食等物品。只要他提出要求，伪军军官都给他办，连宪兵队的特务队长也在他的影响之下。

同属一个家礼的伪军军官和特务队长，都是吃里爬外的。他们带着粮食和食盐到山里来送给游击队，换一些游击队的破衣烂衫和破烂脸盆等，拿回去当物证，诈称打死了多少多少游击队，骗取赏金。

魏拯民一直手不停笔地写报告，写游击斗争的总结，起草有关第一路军工作的文件，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想这就是魏拯民作为革命家深怀胸间的一颗赤诚之心。

在弥留之际，他把自己的匣枪和一包文件交给战友们，说："你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定要战斗到底。革命全靠你们。革命是艰苦的，需要流血牺牲，但不要怕，我们的鲜血是绝不会白流的。你们一定要投奔金日成同志。"

1941年3月，魏拯民去世了，享年才三十二岁，太可惜了。他停止了呼吸，没有为他鸣枪致哀，没有举行追悼仪式，一片萧瑟凄凉。战友们沉痛地竭尽心意安葬了他。

可是不久，一个汉族队员跑下山去，引来了敌人。敌人发现了魏拯民的坟墓。那个队员，是魏拯民平时非常爱护的人，可是他为什么做出了这样卑鄙的事，真是令人费解。

敌人扬言他们在战斗中打死了魏拯民，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不是被杀，而是病故。搞欺骗宣传，是日本鬼子的惯技。为了骗取赏金，敌人扒开坟墓挖出了魏拯民的遗体。这是只有野蛮人才敢做的兽行。

魏拯民的匣枪辗转送到我手里来的经过，说明保护他的战友们在他死后又经历了许多波折。

魏拯民交托匣枪的第一个人是黄正海。因为黄正海是他最喜爱最相信的人。

黄正海最初是负责通信联络的，有时也给魏拯民做翻译。不久，当了警卫排长，专门负责保护魏拯民，辅佐魏拯民工作，为他翻译文件，他卧床不起的时候还替他执笔写作。

黄正海和郭池山一道，为保护魏拯民付出了全部心血。有一次，魏拯民的白马从密营里跑掉了。黄正海把魏拯民托给机枪手，自己就去找马。他循着马蹄印一步步地追赶，赶了一程，突然发现敌人在悄悄地向密营靠拢。显然，敌人也是循马蹄印来的。情况十分危急。警卫排的人都搞粮食去了，魏拯民的身边只有他自己和机枪手。他只好飞快地返回来，藏好机密文件，把魏拯民背起来就朝树林里跑。敌人发现了他们，子弹像冰雹般飞过来。他把魏拯民从背上扳过来抱在怀里往前跑，为的是宁可自己牺牲，也一定要救出魏拯民。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他不能再抱着魏拯民跑

了，只好把人托给机枪手，自己接过机枪开始射击，牵制敌人，掩护魏拯民他们。

黄正海就是这样的人，魏拯民能不爱他吗？他把匣枪交给黄正海，不是偶然的。

此后，黄正海带着小分队搬到了郭池山的密营。他们打野猪和狗熊等野兽来当粮食，也储存起来作为备用。

黄正海是打狗熊的时候丧生的。他追赶一只被他打中一枪的狗熊，没想到这只狗熊突然掉头猛扑过来。黄正海就这样出乎意外地离开了我们。为着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我们冤枉地失去了一位宝贵的战友。黄正海保管的匣枪转到了白鹤林的同乡李学善。他每天擦一次枪，边擦边怀念魏拯民。可是他也为一件突发的事件牺牲了。他牺牲后，匣抢就由郭池山保管。

郭池山一面进行小组活动，一面还种鸦片烟，准备去苏联。柳京守的小组到夹皮沟附近去找到同郭池山有联系的一位老人，请他引路去找郭池山，而这位老人守口如瓶，说什么也不答应，弄得柳京守他们白跑了一趟。这事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郭池山他们用鸦片烟换了军装、粮食和食盐，做好一切准备上了路。可是路上还是吃了很多苦，偷越苏满边境时，把裤子脱下来顶在头上涉过了界河。

一支匣枪，就这样经过好多人的手，转到了我的手上。

郭池山他们后来汇合到金一的小分队，回到了满洲。他利用家礼这个杠杆，把从前就有联系的伪满军的军官争取过来，建立了地下组织，到群众中去开展了政治工作。

郭池山等保卫魏拯民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们，为了克服魏拯民曾为之苦恼的偏重军事一面的倾向，为了加强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竭尽了一切努力。

1943年，郭池山阵亡。他是受命到满洲去执行侦察任务，回队时战死的。

魏拯民是在朝鲜革命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候真诚地支持了我们的好战友，所以我常常怀念他。

他生前每当遇到实际难题难以当机立断的时候，都主动征求我们的意见。杨靖宇牺牲以后，凡是有关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工作的问题，他都跟我们一起讨论，这说明了他对我们是多么的信任。第一路军的干部有什么问题来请示他的时候，他总是让他们到我这里来听我的意见。

魏拯民牺牲后，共产国际也同我们讨论所有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工作的问题。

魏拯民，作为一个人，是位出众的优秀人物，作为革命家，也是出类拔萃的优秀革命家。正因为他是优秀人物、优秀革命家，我们诚心诚意地帮助了他。

为了保护和照料魏拯民，许多人受了很多苦；保护了魏拯民生命安全的国际主义战士是很多的。

在关心我们朝鲜革命的友好人士中，可以说魏拯民是突出的一位。

据长期在魏拯民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们说，魏拯民一向把朝鲜革命的命运同我联系起来，一贯地要求大家衷心拥护金日成同志。

魏拯民的一生之所以是壮丽的一生，是因为它的起始与结束是一致的。为祖国和人民，为人类的幸福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的人，最后一步也应当是为祖国和人民，为人类的幸福做出奉献的一步。这样，他的一生才是永远为人们所纪念的崇高而壮丽的一生。

抗日革命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是非常纯洁的。

然而，自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以后，讲国际主义的人就寥寥无几了。曾经口口声声大喊国际主义的人们，如今也为填饱自己的私囊而碌碌终日，不顾其他了。

回想起来，当年虽然缺吃少穿，但是闹革命的人聚集一起，不问国籍，不分彼此，有吃同吃，有乐共享的那个时候，才是好时候啊。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共产主义者都不应当背弃国际主义的义务和情义。

第二十三章

与国际反帝力量联合起来

一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
二　革命家金策
三　外邦他乡迎新春
四　小分队活动的日日夜夜
五　信念与背叛
六　组建国际联军
七　和东北抗联战友们在一起
八　来自北满的战友
九　培育革命的根苗

时期：主体30年（1941年）1月～主体31年（1942年）7月

一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

主体73年(1984年)夏，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结束了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友好访问，回国途中在哈巴罗夫斯克逗留了一天。这天，金日成同志感慨万千地回顾了当年在远东训练基地的生活和哈巴罗夫斯克会议。

哈巴罗夫斯克是我早就想再去看看的地方。上回到苏联因为取道满洲里，所以未能如愿。这回取道哈桑，经由豆满江回国，决定在这里逗留一天。多年来，我一直想回到这里重游旧地，过了几十年，这个愿望才实现了。

在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同苏联远东军部队一道组建国际联军开展共同斗争的时候，哈巴罗夫斯克是重要的聚会场所。共产国际干部、朝苏中三国共产主义者和军队领导经常在这里聚会，沟通思想，探索共同斗争的方针和途径。

当时，远东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共产国际东方宣传部也设在这里。

为了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我于1940年11月越过苏满边境进入苏联境内。

办完手续后，我与同志们分手，在苏联军官的陪同下前往哈巴罗夫斯克。

我在火车上，透过窗口眺望白雪皑皑的远东大地，不由得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在这片土地上洒下热血的众多独立运动者和爱国志士的形象。

当年，有多少爱国志士来到这里，为亡国而感叹，高呼恢复国权的口号，卧薪尝胆以待光复祖国之日到来。

他们有的筹措枪支，有的组织团体，有的挥洒着血泪控诉弱小民族的悲哀……

没有一个是来游山玩水的。

然而，国家的独立仍然作为民族的课题没有得到解决。

我暗自向长眠于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宣誓：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实现朝鲜的独立，使他们的英灵在地下能够得到安息。

在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火车上，我禁不住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第一次去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怎么能让我心绪安宁啊。共产国际邀请我们参加会议，这是令人兴奋的事，它表明共产国际的领导重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存在了。

共产国际邀请朝鲜人参加他们主持的会议是罕见的。

20年代朝鲜共产党也曾有人自己拿着土豆图章去找共产国际，但他们不是为真正发展共产主义运动，而是为争夺领导权搞的派系活动。

这种活动带来了可悲的后果：朝鲜共产党被解散，并在一国一党制下被逼转向别国政党。

我认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把朝鲜革命问题列为专项议题进行讨论是难得的。

朝鲜共产党解散以后，朝鲜革命几乎被置于共产国际的视野之外。

共产国际关注的是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革命。共产国际的部分领导干部反对在东北进行斗争的朝鲜人直接提出朝鲜革命的口号，并连续下达不符合实际的指令，致使我国革命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共产国际首次正式承认朝鲜革命的独立性并给以支持，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以后。

尽管共产国际不大重视朝鲜革命，但我们始终支持共产国际，珍视它的业绩和它存在的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国际根据新的形势为团结好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维护其纯洁性，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对共产国际在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国际先锋队作用的业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朝鲜共产主义者怀着做朝鲜革命主人的自豪感和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堂堂一员的骄傲感，在为争取朝鲜革命胜利而斗争的同时，还为执行共产国际旨在发展世界革命的指示，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我对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寄于很大期望。我认为，三国武装力量的代表首次聚集一堂，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虽然其过程不一定会完全顺利，但我对会议前景还是乐观的。

当我们抵达哈巴罗夫斯克时，积雪没膝，天气十分寒冷。

对一直在密林里作战的我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使我们觉得

很神秘。这里没有枪声，没有掠夺，没有饥饿。平静的大马路上，幸福的人们在安祥地边走边谈着，这一切就是我们理想憧憬的生活。

部分地图集把哈巴罗夫斯克标成哈府或者伯力。过去，朝鲜人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叫做海参崴。在远东一带有不少叫做双城子、烟秋、水清、苏城的地方。

据说，哈巴罗夫斯克这个地名是以远东开拓者之一哈巴罗夫的名字命名的。在城市中心火车站广场上曾建有哈巴罗夫的铜像。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这座城市拥有二十多万人口。

抵达哈巴罗夫斯克的那天，我在住处同徐哲会面，第二天与安吉会面。徐哲以南满省委委员资格赴会，安吉则以第三方面军参谋长资格参加。在东满、南满和北满因转战南北而未能常见面的战友，现在都见到了，当时我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状。

在第一路军军长杨靖宇牺牲，魏拯民卧病不起，方面军军长曹亚范和陈翰章也都阵亡的情况下，我们三个人不仅代表朝鲜人民革命军，而且还代表中共南满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南满活动的党组织和所有游击部队的代表。

我通过徐哲和安吉获悉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已在11月初抵达哈巴罗夫斯克，接着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和政委冯仲云、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季清也相继到来。安吉和徐哲还告诉我，金策和崔庸健也已抵达哈巴罗夫斯克，正在等候我。这样，代表东北抗日联军三个路军和吉东、北满和南满省委的干部就都到齐了。

在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召开前夕，我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苏联远东军将领留森科。

留森科向我说明了共产国际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满洲游击队和苏军代表会议的宗旨和目的，然后，说要共同制订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对策。他还请求我提供有关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的构成及工作内容的资料。我同意了他的请求。然后，同安吉和徐哲一起草拟了关于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活动的详细资料，也就是在1941年1月1日我们给王新林送去的资料。

王新林是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部长留森科的化名。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在苏联境内活动的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远东军的代表都使用了王新林这个名字。

在哈巴罗夫斯克会议接近结束时，由苏联远东军将领索罗金接替了留森科的职务，他也使用王新林这个名字。

共产国际文献库收藏着金日成同志于主体30年(1941年)1月以南满省委(第一路军)代表们的名义草拟并提交的资料原文。原文前有一段话照录如下：

“王新林同志：

你提出的关于抗日联军第一路军1940年春夏两季工作的诸项问题，我们仅能提供现今所掌握的资料。因此，该报告不包括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全部情况。

……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问候

金日成
安　吉
徐　哲
1941年1月1日”

在会议召开之前，令我更加兴奋的是同金策和崔庸健相逢了，也和阔别多年的周保中见面了。

安吉和徐哲在离开哈巴罗夫斯克之前一直同我住在一个宿舍。我们在一起废寝忘食地倾心交谈多年来压在心头的话语，热烈地讨论关系到革命未来命运的问题，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1940年1月底，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了共产国际召集的满洲游击队指挥员会议。这次会议，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第一路军代表都没有参加，只有周保中、张寿篯、冯仲云等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代表参加。

会议总结了东北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对形势的分析确定了以后斗争的方针，就同苏联远东军取得联系并互相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协商。最后，对采取一致步调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在这一成果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1940年3月中旬，又召开了东北抗日联军方面和苏联军事当局参加的协议会。参加会议的有，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代表、远东军司令官代理、哈巴罗夫斯克和伏罗希洛夫驻军负责人和留森科等人。

会上，抗日联军方面要求共产国际和苏军加强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支援。苏联方面则要求对方转让对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的指挥权。哈巴罗夫斯克驻军司令官说，最好将东北抗日联军武装部队从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分离出来。这样，苏联对东北游击部队的支援就会容易得多。

由于苏联方面采取这种态度，使协议会陷于僵局。有关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事当局互相支持与合作的形式和内容问题，只达成初步协议，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在后来召开的哈巴罗夫斯克会议上再次进行了讨论。

我们出席的史称1941年哈巴罗夫斯克会议，是从1940年12月召集，到1941年3月中旬结束的。会议是在特种部队兵营举行的。兵营周围有篱笆，会场是某工作员的秘密联络站。

会议第一阶段，首次聚集一堂的东北抗日联军、朝鲜人民革命军和各省委负责干部，就各路军与省委之间的联系及同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采取一致步调的对策问题，进行了几天认真的讨论。从1941年1月初开始，又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当局一道，就在满洲进行的抗日游击运动的前途问题和同苏联远东军事当局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的内容与方式问题，进行了讨论。

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代表有留森科将领等多人。

由于苏军方面和抗日联军方面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权问题，意见截然相反，所以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显得有点紧张。

使会议气氛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抗日联军方面指挥员为中共代表未能出席，心里感到不满。

本来，苏联方面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召集哈巴罗夫斯克会议时，通告吉东和北满省委中共中央代表也参加。然而，直到会议开始，中共中央代表也没来。这使长期以来渴望恢复同中央联系的东北抗日联军指挥员们感到失望。事实上，他们之所以特别关注哈巴罗夫斯克会议，是因为迫切希望同中共中央代表会晤。

我们也不大了解中共中央代表为什么不参加哈巴罗夫斯克会议。

或许苏联当局未通知中共中央，或许发出的通知还没有收到。不管怎样，中共中央代表的缺席，引起了部分抗日联军代表的怀疑，还使他们对苏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召开的会议宗旨也产生了疑虑，这对会议初期工作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会议是以座谈的形式进行的，没有作报告。采取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代表通报自己工作的形式，达到互通情况，促进了解，提高认识的目的。我就第一路军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情况作了通报。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就东北抗日联军的军事政治活动，作综合性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还未能实行集中而统一的领导。

尽管赵尚志和周保中等人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设法同中央取得联系，还设想建立独立的东北党组织，但都未能实现，只是由北满省委、吉东省委和南满省委并立，各自独立进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也不得不按路军独立进行活动。

统一掌握并领导整个东北革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数十万日军占领东北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在关内领导东北地区的党和军事活动也是非常困难的。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有关东北抗日联军和朝鲜人民革命军未来斗争方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使在朝

鲜和东北进行的游击斗争同苏联军队建立相互关系的问题，并如何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使之得以加强和发展的问题。

就这一些问题，苏联方面的意见是：德、日、意三国法西斯势力已形成反共联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断升级，在这种形势下，要战胜法西斯联合势力，就要加强共同斗争。为此，就要采取实际措施，最好东北抗日联军放弃独立性，与苏军合并。

苏联方面还强调说，这一措施既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也有利于东北革命。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在一年前召开的会议上就遭到东北抗日联军指挥员们一致反对的问题。

一年来，国际政治形势和远东军事局势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苏联的建议是这种形势变化的反映。

当时，苏联认为同风驰电掣地逼向西部边境的德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德国从西边进攻，日本同时从东边打过来，那形势就非常危险了。

苏联人千方百计地企图避免遭到东西夹攻。通过苏联提出的协同方案，可以看出他们迫于紧张形势的焦灼心理。

苏联土地辽阔，一部分位于欧洲，另一大部分位于亚洲，仅仅建设只能防守一部分边境或者只能防御一方入侵敌人的国防力量，是不能确保国土安全的。

苏联从建国初期起就本着能击退从欧亚两洲同时来犯之敌的原则，致力于国防建设。苏联人考虑到这种国防战略和对日、对中关系，一开始就要在远东设置独立的军事单位。

然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上都注重

于加强苏联的欧洲地区，未能使远东的军事力量也得以加强。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苏联人迅速扩充远东军事力量。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对苏联人的震动很大，他们担心日本会出兵远东。

九一八事变以前，苏联在远东的武装力量只有五万步兵、一百架飞机和三十辆坦克。九—八事变后，苏联才把远东武装力量扩充到三至四倍。特别是在日本拒不接受苏联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建议之后，针对日本的侵略威胁，苏联把重型轰炸机、新式坦克和潜艇也都部署在了远东。1936年苏联同蒙古签定了苏蒙协定，目的也在于牵制日本。苏联在远东进一步加紧扩充军备，是在日本挑起侵华战争，接连发生哈桑湖事件和哈勒欣河事件，东部边境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以后。

苏联方面将东北抗日联军变成苏联远东军直属部队的方案被与会者视为一年前他们提出的建议的翻版，甚至还引起了这样的非难：苏联只顾自己的政治军事利益，企图使东北抗日运动附属于它。

考虑到当时远东的形势，苏联提出的方案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因为德国和日本的东西两侧夹攻的危险已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是已迫在眉睫的现实。

苏联不希望在自己国土的东方也响起炮声。

日本造谣生事，胡说什么在满洲的抗日武装部队在苏联的唆使和指令下进行活动，企图制造入侵苏联的借口。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一面加强远东的防御，一面最大限度地

利用外交手段，为在战争爆发之前就阻止日本的侵略做出了一切努力。

当时，苏联没有可以联合对付德国和日本侵略的同盟者。为了消除在欧洲增大的战争危险，苏联追求建立集体安保体系，但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未能得以实现。在东方，也没有能够用武装支援它的同盟国。

虽然中国同日本作战，但它只能受到苏联的支援，而不能成为支援苏联的同盟者。苏联希望东方的国土安全，因此，它不想让日本抓住发动武装进攻的口实。

我认为，苏联提出把远东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合并，建立统一的军事体系方案的目的是，一方面不让日本抓住侵苏的口实，另一方面一旦进行对日作战，就获得能与远东军协同作战的同盟者。

围绕着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合并的问题，在会场内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们压根未想进入苏联远东军的保护伞下。他们说：我们风餐露宿，腥风血雨地打了十多年，为什么要合并呢？东北革命绝不能抛弃！并抱怨说，苏联方面根本不把别人的事情放在眼里。他们只顾自己根本不尊重其他国家的革命独立性的原则，他们还说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那里去加以解决。后来获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也对东北抗日联军方面的这种立场表示支持。因为这个问题，留森科被索罗金替换了。

当时，苏联方面很想知道我们对合并问题的看法。

他们煞费苦心地向我解释苏联方面提出的方案并不是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的，企图使我表示同意。他们的话里含有这样的意思：只有苏联存在，只有搞好了苏联的革命，才能搞好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

我向他们说，你们提出的方案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理解你们提出这样方案的处境。不过，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单方面的，而且为时尚早。日军窥视侵苏机会固然是事实，但还未见战争马上爆发的迹象。捍卫已取得胜利的国家革命固然重要，但推进还没有取得胜利的国家革命也同样重要。我还说，你们好像轻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

我这么一说，苏联方面就问我，对任何形式的合并都反对吗？

我说，不，对双方都有利的合并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某一方无视另一方或不承认另一方独立性的那种无理的合并。朝鲜人民革命军虽然和中国同志联合起来组建抗日联军，开展共同斗争，但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进行共同斗争多年，也没有发生纠纷。我反对把朝鲜人民革命军变为抗日联军，也反对从属于苏联军队，因为它意味着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无视我们的独立性。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以及苏联远东军用什么形式和内容开展共同斗争的问题，今后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认为共同斗争的形式和内容不仅要有助于苏联，而且还必须符合于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利益。

苏联方面注意地听了我的话，然后说，你给我们提供了能够解决反复打空转的论争和结束会议的办法。今天，我们从你的话中受到了很好的启迪。至于独立自主性问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我对他们说，你们拿定了主意，那就好。应该撤回单方面的主张，尽快结束会议。我们要奔赴战场，开展小分队活动和组织建设工作，还要做群众工作，时间可是太宝贵了。作为共产主义者拿着一个议题拖泥带水地磨嘴皮子，这太不值得了。只要各自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行理智的思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周保中和张寿篯也问我对合并问题的看法。

我说，如果承认各自的独立性，那我就不反对各武装力量的国际联合。问题在于是采用什么形式联合，对此，还要用些时间作进一步的研究。苏联方面提出的方案虽然是单方面的，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不要盲目地拒绝。让我们都以同志式的无私态度，最大限度地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根据共同利益，尽快结束讨论。

会上，我们的主张得到了支持。

我们在会上坚持的原则立场，对实现朝苏中三国武装力量的团结和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确认了我们关于保存并壮大革命力量，从大规模游击斗争转入小分队活动的战略方针是符合新形势要求的正确方针，并就东北抗日联军和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队将重点放

在保存革命力量上开展小分队活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两天左右的讨论，比较顺利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可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不同意见的。有些人认为，从大规模游击斗争转入小分队活动，是革命的倒退。他们说，进行大部队活动还觉得不过瘾，进行小分队活动，什么时候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的抱怨说，关内的同志们正在用大部队大张旗鼓地进行斗争，而先举起抗日旗帜的我们东北人却分散成小分队活动，这有失体面。

开展大部队活动才光彩，进行小分队活动就丢脸，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就小分队活动方针，我在会上和会下多次同苏联和中国同志进行了讨论。我们为了保存并壮大朝鲜人民革命军力量，已在小哈尔巴岭会议上通过了转入小分队作战的方针，积累了胜利进行小分队分散活动的经验。所以，苏中两国人对我的主张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我对他们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损失也不小。为了革命的今天和未来，不能忽视保存力量这个问题。不要认为能够轻易地打败日寇。要打败日寇解放祖国，无论是朝鲜人民革命军还是东北抗日联军，都要首先保存并壮大自己的力量。只要转入小分队活动，就能积极进行旨在全民抗战的组织建设，这样既能解决粮食问题，也便于进行对敌斗争。我们已从去年夏天开始进行小分队活动，成绩相当好，必要时，也可以进行大部队活

动。这种战术方针大家可以考虑采用。

向那些把小分队活动看作是倒退的人，简单地解释转入小分队活动的正确性是不行的。于是，我们进行了多次结合实际的讨论。通过结合朝鲜、满洲和苏联的形势，我们用事实说明了转入小分队活动的正确性。在进行结合实际讨论的过程中，逐渐消除了分歧意见，达到了认识上的统一。

那时我们进行的结合实际的讨论，是很认真的。以往，我们举行过多次会议，但像哈巴罗夫斯克会议那样长时间认真进行结合实际的讨论是从未有过的。

我对那些固执坚持大部队活动的人说，共产国际也要求我们停止大部队活动。这一要求包含着各国共产主义者要拥护苏联，保卫苏联革命胜利果实的意向和决心。如果大规模游击战对苏联的安全不利，那么，就应当停止。

我还对苏联方面代表说，你们不应盲目地把我们拴在这里。因为要保存力量，无所事事，袖手旁观，就不可能推动革命前进。我们要以小分队在国内和东北一带继续积极开展政治军事活动。

各方代表对我的主张都表示同意。事实上，当时苏联人希望我们驻在远东只进行训练和军事侦察活动，安常处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让日本抓住侵苏口实。

然而，我们不能这样消极地进行革命。如果我们只进行这种消极的活动，白白地消磨时间，这不是虚度光阴又是什么呢？

会议决定，今后活动以小分队活动、群众工作、组织建设和

壮大实力为主。这是与我们在小哈尔巴岭会议上通过的方针相一致的。

会上，苏联方面说，他们准备在苏联境内安排东北抗日联军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基地。我们决定把他们提供的基地当作又一个临时基地，在朝鲜和满洲广大地区开展小分队活动。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以后，苏联给我们提供了在远东的两个基地：一个是在伏罗希洛夫附近的南野营，另一个是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北野营。

我们临时驻在南野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五军的部分力量也驻在南野营。北野营由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使用。

当时，我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官任南野营负责人。没多久，又把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第一路军部分力量联合起来组建成第一支队，我任支队长。此后，我们采取了积极开展小分队活动的具体措施。

在远东建立新的临时基地后，我们随时挺进国内和满洲一带积极开展了小分队活动，可以说，这在抗日武装斗争历史上是一个转折。虽然这是临时性措施，但它成为了把争取抗日革命最后胜利的斗争推向更高阶段的重要步骤。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根据形势和革命发展的需要，及时制订适时而积极的对策，那么，就不能从危机中拯救革命，也不能取得抗日革命的最后胜利。

进行革命，就要经受考验，也会碰到逆境。然而，我们的革命从来没有低潮和萧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动摇，从

来没有为悲痛而士气低落，也从来没有因敌人的凌厉攻势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在逆境面前畏缩不前，陷于被动，哪怕只是一次，敌人也会毫不留情地扼杀我们的革命。

我们一向以宁死不屈、宁倒不退的精神和意志，变祸为福，变逆境为顺境。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和小哈尔巴岭会议一样，成为我国革命迎来新的转折的契机。小哈尔巴岭会议和哈巴罗夫斯克会议是两次重要的会议，这两次会议确定了40年代前期抗日武装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使朝鲜革命者怀着光复祖国的坚定信念，加强了我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主动地迎接了革命大变革。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以后，我们在远东临时基地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还以建立在白头山等国内各地的秘密根据地为据点，大力推动了国内武装斗争和革命运动，从而加快了光复祖国的进程。

当金日成同志提出新的路线和战略策略，积极开展军事政治活动时，日满军警为此而惊恐万状，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

下面的资料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在苏联的领导下，在满洲进行活动的朝鲜共产党的主要力量是前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的残余，其活动的中心人物是金日成。……

“金日成居于苏联红军直属‘海洋’野营军事负责人地位”［《关于在满朝鲜人不法团体阴谋案件》朝鲜总督府警务局下发各道警察部长的文件，昭和19年(1944年)］

“金日成、崔贤、安尚吉、柴世荣等在本年初全部转移到苏联，在伏罗希洛夫进行各种训练后，从4月以来，在新的编制和方针下，依次进入满洲。”[牡丹江领事代理古屋的报告，昭和16年(1941年)6月17日]

二　革命家金策

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几个月后的一天，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向干部们说：

“在锦绣山议事堂，有一个领袖生前珍惜的保险柜。

“副官和其他干部谁都不知道领袖在这个保险柜里珍藏着什么东西。

“领袖逝世后，我想打开保险柜看看，可是找不到钥匙，前几天才找到，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领袖与金策同志的合影。

“领袖一向把所有照片都保存在党史研究所。可是这张照片却保存在这个保险柜里。

“这说明领袖是多么缅怀战友金策同志。

在领袖的记忆中永生，这是一个人在一生中能获得的光荣中最大的光荣，是一个革命者献出一生才能享有的幸福中最大的幸福。金策同志正是攀登到这种光荣和幸福的最高峰的忠臣中的忠臣。

他是怎样成为在领袖记忆中永生的人物的呢？

我首次会见金策，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在那里我还会见了崔庸健。因此，我总是难忘哈巴罗夫斯克。当时，金策作为北满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代表参加会议。

我们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和金策来往较多。当时我与安吉

和徐哲同住一个宿舍，金策常来交谈一两个小时才回去。

当时，我对金策印象很深，首次相逢的情景如今还记忆犹新。我看到他那还不到四十岁就开始脱发的沉着大方的面貌，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然而奇怪的是，对这个初次见面的金策，我总觉得他是老相识。看来，这是因为我听了许多有关他的风闻，又是因为我一直想见到他的缘故。

互通姓名之后，我就说，这是初次见面，可觉得是老相识。他说，他也对金日成这个名字没有一点陌生之感。

我和金策都有这种感觉，说明我们一直在互相思念、互相挂怀。

我是多么想见到金策和崔庸健啊！我为了和他们见面，率部队到北满去找过他们。金策又是多么急切地想见到我呀！他为了找我，早在1930年就专程到吉林来。崔庸健也是多么企盼和我一起搞联合作战啊！他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往间岛派了四次联络员。

无论斗争舞台在北满还是在东满，我们想的都是朝鲜革命，始终没忘记自己是朝鲜人和朝鲜的革命者，也不管属于哪个团体和地区，都是为争取朝鲜独立而献身奋斗的朝鲜的儿女。

可以说，这种共同性，使东满和北满的朝鲜革命者很早就互相思念，互相想望。

金策和崔庸健为什么老是探头张望东满呢？是因为他们想念朝鲜人。

东满的第二军是朝鲜人部队，而他们所属的第三军和第七军都是中国人占多数的部队。因为同语言风俗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很羡慕有数十万朝鲜人的东满，向往大部分是朝鲜人的我们的部队。

打过招呼之后，金策自言自语地说：

“与金司令会晤的路程怎么这样遥远啊。”

他这句话使我很心疼。

金策仍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他的眼睛含满了泪水。他是多么想念间岛的朝鲜人，多么想念朝鲜人部队啊！不然，这个寡言少语的人能流出眼泪来吗？

那天，我也禁不住流泪。

国家沦亡了，金策的父亲带着家眷投奔间岛。可能他也听说过间岛是土地多又美好的地方。就土地而言，鹤城的土地也可以说是沃土。可是，在家乡无论怎样勤劳，还是同样过苦日子。

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呢。他们是为了养家糊口才背井离乡，走这条路的。

金策的父母认为，只要到了间岛就有活路。他们有三个儿子，所以根本不为劳力发愁，然而他们所依靠的这三个儿子，却把家里的活儿撂在一边，投奔革命去了。

往这个家庭吹入革命之风的人，是金策的哥哥金洪善。三一人民起义时，他参加游行示威，喊过独立万岁的口号，也跟着独立军部队参加青山里战斗[11]，还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他所任教的龙井东兴中学，有不少从俄国来的学生，在和他们的接触过程

中，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金洪善在宁安县一带做共产党区委，后来被人谋害，壮烈牺牲。

金策的弟弟也是响噹噹的革命者。金策说，他在报纸上读过说他弟弟被关进西大门监狱的消息，其后的情况他就不知道了。

金策边种庄稼，边上夜校勤奋学习。

从那时起，他就参加了革命运动。

他参加的第一个革命组织是东满青总，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金策所在的支部，是受火曜派[12]影响的组织。

金策知道，1925年建立的朝鲜共产党，是因派系斗争而被解散的，但他没有隐瞒自己曾在这个党的支部过组织生活的事实。

当时，满洲地区有两个所谓满洲总局。一个是火曜派掌握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另一个是与火曜派对立的ML派[13]满洲总局。

金策了解到争夺领导权的派系斗争内幕后，对专事争权夺利的共产党上层人物大失所望。正当这个时候，他被捕入狱。他在为因派系斗争而逐渐削弱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苦恼的时候，共产国际解散朝鲜共产党的令人吃惊的消息又传到了监狱中来。尽管是因派系斗争而四分五裂的党，但听到它也被解散了，不免感到痛心。

那么，今后朝鲜共产主义者应走哪条路？我应该做什么工作？金策在坐牢时和出狱后，苦苦思索这个问题。靠老一代，会一事无成；因此而否定老一代，则觉得没有能接替他们的力量。左思右想，他总觉得前途渺茫。虽然出了监狱的门，但手中没有

一文钱，无处栖身。怎么办？他心里很是怅惘。不管怎样，向恩人道别后走才合乎情理。他想到这里，就去找许宪先生的家。

金策受审判时，许宪先生为他做了辩护。金策本来没邀请律师。因为他没钱请律师，而且也不想请律师进行辩护。可是，许宪先生自愿承担了他的辩护律师，而且不收费用。他在法庭上曾为许多革命者和独立运动者做过辩护，使他们得以从轻处罚或者无罪释放。

金策在许宪先生家里住了几天，补养了一下身体。他离开汉城时，许宪先生送他一件长袍，还给他盘费。当时他给了三四块钱，金策就用这笔钱买了车票，又买了些东西吃。

金策和许宪先生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许宪先生为金策做辩护，纯粹是爱国精神的表现。他目击着朝鲜的爱国者为朝鲜人做了应做的事情还要受罚，感到痛心和愤恨才做了免费辩护。这是他对革命者同情和团结的精神，以及爱国前辈所特有的情义的表现。这么看来，许宪先生确实是位高尚的人物。

解放后，金策任内阁副首相兼产业相时，许宪先生做了最高人民会议首任议长。过去曾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和为他做辩护的人都当了国家高级干部，这是多么不寻常的缘分啊！

金策在被任命为副首相的那一天对许宪先生说：

“先生，您过去为我做辩护，往后更对我多作批评。如果我作为副首相，作为人，有什么事做错了，您就毫不留情地狠狠训我。”

许宪先生是位好心人，又刚正不阿。如果金策工作做得不

好，他会真的批评他的。可是许宪先生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因为金策作为副首相，作为人，从没有做过应当受到批评的事。

可是，朴宪永做副首相时，却遭到许宪先生的白眼。不知许宪先生发现了什么苗头，多次提醒我注意朴宪永。

许宪先生听到金策逝世的噩耗而放声痛哭的情形，至今难忘。他不禁惋惜地说，金策是谁都替不了的金首相的右臂啊，可惜去得太早了。

金策说，他在许宪先生家住的那些日子，感到很惭愧，顿顿给做的热饭菜吃得不舒服。他并没有为民族做出什么大事，只是被宗派分子所愚弄，充其量坐过一段牢，而许宪先生却把他当作了不起的革命者看待，使他有一种如坐针毡之感。

“宁死千百次也要重新站起来，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这就是金策离开许宪先生的家前往间岛时立下的誓言。

金策一踏上间岛，就听到了父亲和妻子因病去世的噩耗。家里只剩下两个不懂事的儿子。

可是，金策无暇顾及私事，因为有消息说，日寇特务全部出动，要来抓他。日本帝国主义狡猾得很，押来革命者拷打一顿，再装着发善心，从前门释放，然后从后门押进来。这些日本鬼子实在狡诈得很。

金策把两个儿子托给内兄就离开了家。他头戴破草帽打扮成农民，牵着内兄的牛，走出了村口。登上山岗了，那头牛因见不到牛犊一个劲儿地叫。牛犊也因见不到母牛，不住地哞哞叫。

伪装固然要紧，但他再也不能牵着这头母牛走了。他听着母

牛和牛犊的叫声，就联想起留在内兄家的孩子们，不禁眼泪夺眶而出，觉得那牛犊和孩子都很可怜，于是就把母牛放回家去了。过了十六年了，他还未能见到孩子们。这是只有金策这样的革命家才能做到的事情。

我问金策知不知道后来孩子们的情况，他回答说不知道。他还说，如果内兄还活着，他们就能勉强糊口，如果内兄死了，他们可能成了乞丐。即使成为乞丐挨门讨饭，只要能活着，早晚还能看到解放那一天，见到我这个没出息的父亲。

他离别了两个儿子后，径直去了宁安县。在这里，听到了有关我们的传闻。他碰见东满青总时期的同事和满洲总局时期的好友，听他们说，吉林出现了和老一代截然不同的新一代组织，领导人叫金成柱，年纪不大却颇有声望，亲和力强，曾在军阀监狱里受过苦，获释后不知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东满青总也有吉林组织的内线，所以他们也能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况。宁安县一带也有不少到吉林去读书的学生。

金策听到这个传闻，就立即启程来找我。那时候我已离开了吉林。

幸亏他在旅社里碰上了我们的同志。他们可能是尾随金策的。

我们的同志查明了金策的身份，听了他到吉林的原委之后劝他说，金成柱不在吉林，看来你是初次来吉林的，不要在这里磨磨蹭蹭，快躲一躲，现在由于“红色5月”的影响，军阀正在大肆搜捕革命者。金成柱嘛，今后也能见到。最好在警察的魔爪伸到这里以前离开吉林城。他们还给了他路费，送走了他。

金策离开吉林径直到了北满，可是又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关进了监狱。他在监狱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被释放，走出牢门不久，再次被军阀警察逮捕，成了未决囚。不久，在简易法庭上他被判了死刑。他虽是共产主义者，可是没有参加过什么堪称运动的运动，也没有动过军阀一根毫毛，却被判了死刑，真是太荒唐了。当时的满洲就是这样无法无天的。

金策被押到了刑场，突然有个军官跑来大声叫喊不要开枪，他好像是个反日思想很强的进步军官。这样，金策才死里逃生。

金策离开刑场时心想，老天爷还有睁眼睛的时候。

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些波折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他说，他从年轻时候起就参加了革命，但多半在监狱和路上度过，没能搞出什么名堂来，老是被人追赶，后来拿起了武器，才掌握了主动权，打击敌人了。

金策笑着说："敌人是把赤手空拳光喊口号的人看做稻草人的。"他还说，一个人如果不武装起来，就会在武装的强盗面前像稻草人一样无所作为，连自己都保卫不住。这是生活的教训。

我听了他的话认为，他正确地汲取了教训。这既可以说是金策通过半辈子所获得的教训，也可以说是革命斗争的普遍规律。

革命必须用枪杆子来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其成败大都是为武装斗争所决定的。我们的抗日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其根本因素就是我们自己拥有独立的革命武装力量。

在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曾有过金九、李承晚和吕运亨等各种势力，但日本帝国主义最怕的是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这是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不是用请愿或罢工、笔杆或讲话的方式，而是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的方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抗日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革命必须用枪杆子进行的真理。这使我们解放后在建设新朝鲜、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斗争中，狠抓革命的建军路线，集中一切力量建设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

国力出自枪杆子，民族自豪也出自枪杆子。只有军队强大，民族才能兴盛，国家才能繁荣富强。离开了枪杆子，就不能有自主。枪杆子如果生了锈，人民就会沦为奴隶。

今天，金正日同志做革命武装力量的统帅，把人民军培养成为所向无敌的强军，取得了军队建设的惊人成就，这是为继承并完成在白头山开拓的主体革命事业所建树的最辉煌的历史功绩。

金策对宗派的危害性也讲得很多。他说，他没做出什么大事就被捕坐牢，这都是宗派分子造成的。

金策说，他尝过坐牢之苦以后才痛切地认识到，再不能用老一套方式搞共产主义运动了，不清除宗派分子，别说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什么都搞不成。他还说，他之所以要见我，是因为他听说在吉林出现的新兴力量既不属于朝鲜共产党，也与宗派分子毫无关系，完全是新一代的组织，于是决定与这个组织携起手来。

他说，如果说他的历史中有一段富有人生价值的时期，那就是在珠河组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之后的时期。在这以前的生活，都是彷徨和摸索的过程。这是事实。在北满组建游击队之后，他在北满党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中任重要职务，积极

为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开展活动。北满的朝中革命者和人民都尊敬和爱戴金策，说他是训练有素、久经考验的革命者。

金策说："我很早以前就注视金司令。您不知道，我们北满的朝鲜革命者是多么想见到金司令。金司令部队所在的白头山一直是我们希望之灯塔。如果当年我在吉林见到了金司令，这几年就不至于那样苦闷了……"

他还说，听到我们进军祖国攻打普天堡的消息，他很想和我握握手，代表北满朝鲜革命者表示感谢。

没想到一直被人们视为性情峭直的金策，却那样的重感情。

他说，他从我派到北满的一些人那里听了很多东满和西间岛的消息，他认为，在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活动中应当看做榜样的是，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作风。还认为，在思想灵魂中值得学习的是自主精神，虽然在异国土地上干革命，却仍然理直气壮地主张，朝鲜人要把光复祖国当作斗争纲领，为朝鲜的解放而奋斗。

金策对我们的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他甚至还了解我给一个队员修理枪把的事。他说，他无论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把我们当做榜样。金策就是这样谦逊的人。

金策说把我们当做榜样，但实际上他是革命者的典范。

人们都说他是像老虎一样严厉的人，实际上他是比谁都爱护队员的政治干部。他说听了枪把的故事深受感动，但是与之相似的有关上下关系的佳话，他也多得很。

革命军的战斗力是什么，是同志友爱。爱护革命同志，要像

爱护自己心脏一样。世界上再没有比革命同志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金策，经常向队员们强调的思想。

有一次，一个队员给他送来文件。金策让他先睡在兵营里，而后阅读了文件。天黑了，他就拿着针线到兵营里去替那个队员缝补穿破的衣裳。白天看文件的时候，他发现那个通信员的衣服破了，就想替他补一补。这个队员也不是他的队员，是另一支部队的，但他像亲哥哥、亲生父母一样照顾他。

每打一场仗，金策就向队员们祝贺战果。他不是把队员们召集在一起表示祝贺，而是向每个队员表示祝贺，具体地评价他们的战斗成果：你在冲进城门时哪一点做得好，攻打伪满军兵房时又哪一点做得好，做喊话时哪一点做得不错，哪一点做得不够好，等等。北满部队队员们说，受到这样的表扬，打仗就打得更好。

他做受批评或处分的人的工作也很得法。如果哪个队员受到指挥员的批评，他就一定找那个队员谈话，了解他是否悔悟。如果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清，他就孜孜不倦地进行说服，直到他认清为止。

这是金大洪做排长时发生的事。

有一次，他狠狠批评了一个入伍不几天的机枪副射手。这个还没经过战争锻炼的队员，一看敌弹像冰雹似的倾泻而下，就朝天放了空枪。金大洪看到这情景说："你这胆小鬼，如果舍不得命，就放下枪快滚回父母身边去！"。

仗打完之后，金策召来金大洪说，同志，可不能那样对待队

员，他是新队员嘛，是头一次参加战斗，可不能这样训斥他。你不应该先训斥那个队员，而应该率先做出榜样。

金大洪受到金策的批评之后，再也不斥责队员了。

金策不只是爱护部下，他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指挥员。他根据情祝该说服的说服，该追究的追究，该处分的就处分。如果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给予严厉的处罚。

金策逝世后，张相龙回忆他说，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是1942年冬，也就是金策参加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后回满洲开展小分队活动的时候。他们的小分队断了粮食，大家都饿着肚子。

一天，张相龙出去打猎。他跑了一整天，猎获了一只黑熊和一头野猪。要回宿营地时，天已经黑了。他把猎物都藏起来之后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走，可是太累了，路又不好走，实在走不动了，索性走到离宿营地不远的一个猎棚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回到了宿营地。他过了一夜的那个猎棚，是金策早下令禁止使用的，因为很可能是敌人所利用的。

金策了解到这事，就对全昌哲说，张相龙没有资格当我们的游击队员，要严加处分。

全昌哲恳求说，他是一直忠于革命的人，饶了他这一次吧。

金策说，不行，不能饶他，先罚他到外面站三个钟头。

全昌哲只好奉命把张相龙带到外面去了。被罚站还不到两小时，张相龙就已经冻得快支持不住了。

全昌哲看不下去，向金策建议说，我看他罚站这么长时间了，够他充分反省错误了，让他进来吧。他这么一提，金策就

说，想减免别人的错误，也是违反纪律。接着命令传令兵把全昌哲也带到外面去罚站。过了整整三个小时，他才把张相龙喊进帐篷里来，对他说，肚子饿吧，先吃饭。

张相龙坐在饭桌前，却吃不下去。因为他痛切地悔悟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金策看到这情景，才把张相龙喊到身边用温和的声音说，你可能认为你犯的错误不是什么大错误。这是不对的。我为什么把这个错误看得这么严重呢？这是因为，你一个人犯的错误会导致我们小分队暴露目标，到头来不消说我们大家的生命，就连革命任务都全给毁了。所以，我才让你们禁止使用那个猎棚。可是你明明知道上级有这个指示，却置若罔闻，仍冒险地在那里过了一夜。如果那里有特务的话，该多么危险。

张相龙后来说，当时他把金策的话句句都铭刻在心里了。

金策为人寡言少语，但他讲的每句话都像法律条文一样有分量。

在北满，敌人为了挫伤抗日游击队员的士气，一度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金策被逮捕啦，朴吉松投降啦，某某支队归顺啦，许亨植怎么啦，等等。

对此，游击队指战员都义愤填膺，因为他们知道这都是纯属捏造。

第二支队长忍无可忍，决定狠狠地惩治敌人。他制定了一个计策，把一个在驻地附近行动诡秘的特务诱过来，对他说，我们游击队准备投降，你下山去跟宪兵队通报一下。

宪兵队通过这个特务通知接头地点和时间，甚至许诺要给支

队长以很高的奖赏。之后，他们让特务带路，在约好的接头时间出现在指定地点，要接收投降。他们看到在树林中排队等候的二支队，还笑嘻嘻地朝队伍挥了挥手。

这时二支队队员们突然把枪口对准敌人齐声喊道："别动！"。支队长厉声呵斥敌人说，你们这些笨蛋，我们不是来投降，而是来抓你们的，还不快交枪！

敌人的头目抗议说，我知道你们共军素来不会撒谎，可你们怎能如此违背诺言，军队应该恪守信义。

支队长回击说，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睁着眼睛说瞎话，到处散布谣言，还讲什么信义！你们专事弥天大谎，我们也就这样回击你们。

二支队活捉了全部敌人。人们都赞扬支队长立了大功。有的还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作战。其实，这是同朴得范为解决粮食而贴出"投降"广告挨批评的事很相似的。

金策召来二支队的指挥员严厉呵斥道，敌人撒谎，游击队也可以说谎，这究竟是什么思想方法？即使演出假归顺的戏，也绝不能把游击队和投降这个词连在一起！他当场给支队长以撤职处分，其余指挥员也都给了降职处分。

我讲这些，或许有些人认为金策是喜欢处分人的，其实他不是那种随便处分人的鲁莽的指挥员。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队员在一次战斗中因为有些慌张，竟把装有掷弹筒弹药的背囊丢在战场上，只带着掷弹筒撤退了。

部队开会批评了那个队员。批评或处分丢了武器的队员，在革命军部队里也是间或发生的事。那个犯错误的队员，受了战友们的批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决心不再犯这类错误。

然而，一个基层政治干部却建议从严处分这个队员，使得会议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金策了解到这个犯了错误的队员是个新队员，下结论说，责任在没有教育好他的指挥员身上，因此不应当处分，而要予以帮助。他驳回了那个基层政治干部的建议。

这个问题如果这样结束了，就不会发生别的事，可是那个基层政治干部一味固执己见，事情就闹大了。

那个犯了错误的新队员不知自己会落到什么样的地步，整天价愁眉苦脸，坐立不安，当天夜晚就开小差跑了。一个本来可以妥善解决的问题，竟闹出了出乎意料的大祸。主张处决的那个政治干部成了大家憎恨的对象。指战员们都指责他没有人情。有的谴责他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怒不可遏地说，应当给他处分。

金策听了这个情况后说，责任不在别人身上，而在我身上，我们队伍里有不爱惜队员政治生命的政治干部，说明我这个政治主任没有做好工作。从那天起，他就把那个政治干部调到自己的警卫班，留在身边进行个别教育。

金策一有机会就向指战员们强调说，要搞好军民关系和上下关系。

金策高度赞扬我们在别国疆土上仍高举朝鲜革命的旗帜进行斗争是坚持自主性的壮举。其实，他自己也常常对朝鲜人队员们

说，我们虽然在中国人部队里战斗，但时刻不要忘记朝鲜革命。朝鲜革命不是由别人替我们搞的，是应由我们朝鲜人自己搞的。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对革命的看法、对人民的观点、对自主性的立场，在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军队建设，甚至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许多方面，我和金策都有共同点。

金策说，他为我对他了如指掌而感到惊讶，我对他说，我也早就开始注视你了。

金策笑着说："素不相识，从没见过面，竟互相关注，互相思念，这就是缘分。"

我表示同感。

1930年夏，金策为了见我专程前往吉林，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友情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当时，金策在北满部队担任要职，无论从年龄上看，还是从革命斗争资历上看，他在满洲游击队朝鲜人军政干部中都应受到长者的礼遇。

那时我还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党的总书记。可是金策却在苏联人和中国人面前推崇我为朝鲜革命的代表和领导者。

我比他小九岁，可他为什么对我那么信任、那么推崇呢。这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金策坚持这样的思想：要干革命，就必须有领导中心，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这个领导中心的周围。可以说，他对领导中心的渴望和追求，就转化成了对我的关注和信赖。

金策从认识我之后，就把我作为最亲密的同志始终不渝地跟着我，拥护我。无论局势怎样变化，他都矢志不渝地把一切都寄托给我，忠心耿耿地工作。

解放后，回到祖国了，他为了搞好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国家建设和产业建设而东奔西跑，没能过一天安稳的日子。

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哪里艰苦，他就到哪里去。任前线司令官的时候，他还驻扎在忠清道。他自己驻在最前线，而我去前线视察时，就对我的随行人员大声指责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竟敢让最高司令官同志到这里来。难道你们疯了吗？陪我到水安堡的人，也受到了金策的严厉训斥。

吉林时期，是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把我推举为领导的中心，在30年代和40年代前半期是金策等抗日革命战士把我推举为统一团结的中心，为贯彻执行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而进行斗争。

把我推举为统一团结的中心，我国革命就有了领导中心。在建设这一领导中心方面，金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他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史册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当时在远东基地上有来自北满的人，也有来自南满的人，还有在当地土生土长的朝鲜人。如果当时各自推崇各自部队的人，那就不能实现革命队伍的团结，也不能形成领导中心。

然而，在远东基地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中，从未出现过搞地方主义和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因为他们都是很纯洁的人，所以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加上金策、崔庸健等老将都始终推崇我，所以领导中心是稳如泰山的。

我再举个例子，谈谈金策是怎样拥护和信赖我的。

金策参加哈巴罗夫斯克会议之后，于1942——1943两年中大部分都在满洲进行活动。他之所以去满洲，是为了指导在北满活动的小分队。对小分队的指导结束后，他没有回到基地，因为当时北满部队的指挥员许亨植和朴吉松都已经牺牲了。金策不忍心离开凝结着战友鲜血的地方。在组建国际联军时，指挥部多次打电报要求他撤回，可他每次都回电说，等处理好这里的工作之后再回去。当时，金策率领的小分队有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国际联军的指挥员们，每当接到他的回电，就对他的办事态度表示极大的不满。

当时，我认为金策对我们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争取抗日革命早日胜利而组建国际联军这件事还不够了解，因此我以我的名义给他打了电报。金策这才回到了基地。

国际联军指挥部多次要求他回来，他一直不回来，可是一接到我的电报就马上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完全相信我、拥护我。他认为，我叫他怎么做，他就应无条件地照办，才是对的。他就是这样绝对地服从我。

金策从远东基地时起，就一直真心拥护我，保护我。

1941年春我率一支小分队出发时，他特别注意挑选陪我一同去的警卫人员。

我们在准备对日军进行最后进攻作战时，金策瞒着我召集了国际联军朝鲜人指挥员会议，讨论保证我的安全问题。他在会上强调说，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做好保证金日成同志安全的工

作。金日成同志是代表朝鲜人民和朝鲜革命者的领导者，要誓死保卫他。

朝鲜人民革命军凯旋祖国后，金策又召开了会议，讨论保卫我的问题。他在会上号召说，祖国的形势，比我们在国外听说的还要复杂。恐怖分子的活动十分猖獗。如果不提高警惕，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平安南道党委第一书记玄俊赫已被恐怖分子杀害了。绝不要泄露金日成将军凯旋祖国的秘密。这是总有一天要公开的，这以前不要随便泄漏，都要以警卫员的心情格外做好保卫金日成将军的工作。

此后，他还亲自组建了警卫队。

金策忠于我的故事，一天也讲不完。

和现在一样，我在解放初期也致力于做人的工作，做人民群众的工作，做南朝鲜革命者的工作，也做外国人的工作，真叫我忙得不可分身。解放初期，野坂参三也是经由我国回日本去的。

解放初期，我们还没有建立招待外宾的服务系统，连供外宾食宿的招待所都没有。大部分外宾都带到我家里招待。所招待的，顶多是一碗饭，一碗汤而已。

大家都认为，在国家刚解放的情况下，这是不得已的事，没有其他办法。唯独金策为此费了不少心。他为我家饭桌上摆不出好酒暗自操心。

金策说，国家情况困难，我们的手中没有钱，这都是事实，但是金将军在家里招待来宾的时候，总不能老拿着大玻璃瓶到市场上去买酒吧。等共和国成立了，会有很多贵宾纷至沓来，拜访

我们的将军，因此应办一座酿酒厂，自己酿酒来招待外宾。为了确保金将军的安全，也必须由我们自己酿酒。他瞒着我去查访全国最出名的酒和酿造这类酒的专家。

解放初期，我国最出名的酒，算是龙岗酒。这种名牌酒，是一个酿酒业者和他的女儿共同酿造的。解放前，日本人高官和富豪都喝这个酒。

金策为了找到他们，去了龙岗。那个酿酒业者听了金策的话，很受感动。他说："如果国家需要酿酒技术人员，就把我的女儿带去。"他女儿的名字叫姜正淑。从那时起，姜正淑就一面给金策做饭，一面酿酒。

她开始修建酿酒的作坊，金策就带着一个干部到市场去买来了米。

这样，金策的住处就变成了酿酒作坊。

几天后，金策带着首次酿造的酒来找我。

"金将军，这是姜正淑酿造的第一批龙岗酒。"

说着，金策给我斟满了一杯。龙岗酒确实名不虚传，的确好。

我说这酒很香，金策喜出望外，说："这就好了。"

从那时起，姜正淑酿造的龙岗酒，就成了国宴专用酒了。在这过程中，他们也就结成了伉俪。

金策如何绝对地保障领袖的权威，通过下列事实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每当接我的电话时，总是站起身来，整好衣襟、扣好了纽扣，才开始通话。在他卧病不起的时候，如果我给他打电

话，他也都站起来接。不管人前人后，他始终是这样。不是真诚地尊崇领袖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金策认为，没有我，也就没有他。

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最严酷的是撤退的时候。尽管我们宣布，这是暂时的撤退，是战略性撤退，但缺乏信念的人却以为共和国就要垮台了。

敌人打进了沙里院，前线司令官金策就在中和、祥原和江东一带，构筑平壤防线。他报告前线情况时，力劝我率领最高司令部成员离开平壤，他表示用撤退的部队加强防卫力量，坚守到最后。

几天后，金策又来电话建议司令部转移地方。

我说，你们把敌人的进攻牵制到现在很不错，可以撤退了。但是，金策没有撤退，只送来了自己的党员证。他决心决一死战。

我通过电话找金策说，如果你不回来，我也不离开平壤。金策这才率防御部队回到平壤。人民军转入第二次进攻时，他找回了自己的党员证。

有些干部说，金策是非常严肃而厉害的人，其实不然，他对游手好闲的人、善于阿谀奉承的人、爱闹情绪的人、利已主义分子、贪图地位的人和宗派分子，是厉害的，而对下级干部和人民群众是无比慈祥而谦逊的。因为金策极其憎恨那些同床异梦的人，所以连朴宪永都在他面前表现得谨小慎微。金枓奉虽然身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但一看到金策就悄悄地溜走了。

金策一贯实事求是，从不作假。

解放初期，他的曾在满洲颠沛流离的儿子来找他。儿子身上穿着只剩两个纽扣的麻布衬衫，脚上穿着草鞋。金策叫儿子去拜见我。儿子说：穿着草鞋怎能去见金将军呀？这要是别人，就会先给儿子买一身衣服和鞋子穿，然后再带他来看我。可是金策没有这样做。他对儿子说，不要以为穿草鞋就丢人。你不了解金日成将军，不要紧，快进去吧。你一直无依无靠，光着脚走路，怎么能扮作富家子弟啊。金将军喜欢看到你穿着草鞋和这样的衣服。如果你身着西服，脚穿皮鞋，他就不高兴了。他这样说服儿子带到了我的房间。

我看到金策带着离别了十六年、穿着草鞋的儿子出现在我的房间，不禁热泪盈眶。那天，我哭得比金策更厉害。金策也哭了，他是把泪往肚里咽的。

金策同离别多年的儿子邂逅相逢，实在可歌可泣。但他同儿子只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多一点。

金策不幸早逝，是因为过度的劳累。他承受的负担太重了。

我最后见到他，是1951年1月30日。当时我们的最高司令部驻在干芝里。那天晚上，金策突然来找我，向我表示歉意说：上个月24日，是金正淑同志的生日，我明明知道首相同志是会怀念她的，但是因为工作忙没能来。这个月也快过去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总感到很不对，不能这样过去，所以就来了。

我对他说，去年12月，我们为击退侵犯北半部的美国佬，是两眼喷着怒火的时候，哪有工夫考虑这些事啊。不要放在心上。

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那天金策的情绪不符合他的性格，显得有些伤感。

他要求和我一起散步，于是我们就出去了。他对我说，战前，没有散过步，还不知道有这样优美的地方，等战争结束了，在这里修一座休养所吧。我同意了。其实，解放后我们建设新社会十分繁忙，顾不上哪里有适于休息的幽谷，哪里有名胜古迹。那时我们休息，顶多到长水院桥下或麦田渡口去洗洗脚就回来。

那天，他为了不让我看见自己穿的破袜子，竭力遮掩的样子，我至今还难忘。

我对他说，不要光埋头工作，要保重身体。在这么寒冷的冬天，穿着露脚的破袜子，怎能受得了，如果为我着想，你就应该保重身体。说罢，我拿出了一双袜子给他穿。

那天晚上，金策很想跟我一起进餐。可是，许嘉谊突然出现在我跟前说，要向我汇报党务工作。他跟我耍手腕儿，含糊其辞地说了很长的话，所以占了很长时间，金策只好没吃上饭就离开干芝里了。

他离开司令部时劝我说："金将军，跟美国鬼子打仗的事，全由我们包下来，您可千万不能劳累过度，要保重身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不知怎么回事，那天我听了这句话，感到有一股热流直冲心头。

那天晚上，金策又在办公室里工作了一通宵，结果因心脏麻痹而逝世。

兼任军医局局长的保健相李炳南报告他逝世的情况时，我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几小时以前还跟我交谈的人，怎么会突然去世呢，令人不可思议。我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大白天驱车前往内阁办公厅，这才证实了李炳南的报告。

我后悔那天晚上没留他在我这里住一宿。他如果住在我这里，就不会打夜班，也就不会诱发心脏麻痹症。

我后悔的第二件事，是那天晚上我没有同他共进晚餐，就让他回去了。当然，即使让他吃了一顿饭，也不会减轻我的悲痛。但是，我总是为这件事感到难过。

我记不清是怎样向他的遗体告别的。但有一件事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就是出丧以前，我最后握金策的手，这是十年前在哈巴罗夫斯克第一次握住后久久不肯放下的手。十年前我握他的这双手，一生都没有忘记它是那样的温暖，可是向他遗体告别的那天，他的手却是冰凉冰凉的。我每次去地方进行现场指导后回来时，最先跑出来握住我手的是金策的手。

金策的一生是忠于我的一生，因此我总是怀念他。他去世后，我以亲生父母的心情照顾他的孩子，把他们送到国外留学，还为他们办了婚礼。生孩子的时候，我表示祝贺，还常常叫他们到我家里来一同用餐。尽管如此，我仍觉得为金策做得太少，因而常有一种愧疚感。

每当我国革命经受考验，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对金策的怀念就愈加强烈。

我过去也说过，我不能驱车走近金策的墓地。因为驱车去墓

地，总觉得过意不去，必须在大城山脚下下车，徒步前往。

金策虽然逝世了，但是我对他的感情和敬意是永远不会变的。

我在革命过程中，有很多感受，感受最深的是同志友爱。

对于为争取人民的自由与解放不惜献出生命而踏上革命道路的人来说，最宝贵的是同志和同志友爱。真正的同志，可以说是第二个我。我是不会背叛“我”的。如果忠实又重情义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就能无敌于天下。因此我常说，获得了同志，就能获得天下；失去了同志，就会失去天下。

同志这个词，是志同道合的意思，意志就是思想。基于暂时的利益或打算而建立的关系，是不能稳固的，是容易破裂的。只有在思想意志上结合起来的同志关系，才是始终不渝的，才是连子弹和断头台都毁不掉的。

在朝鲜革命中涌现了许许多多树立了忠于领袖的榜样的同志。这样的同志在我们的周围形成了银河系。

金策逝世后，为了永远追念他，我们把他的家乡所在的城津市和凝结着他的心血的清津钢铁厂以及平壤工业大学，分别改名为金策市、金策钢铁厂和金策工业大学，还把一所人民军军官学校也以他的名字命名。金策市还立了他的铜像。

我希望以金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工厂和大学，要一如既往，继续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头。

金策最讨厌那种做人家的尾巴，磨磨蹭蹭的人。他是一向站在前头前进的。在我国的产业建设中，金策做了很多事。我每当看到一些工矿企业搞不好经济管理时，心里就反复地想，如果金

策知道这个情况，他会……。他做产业相时，我国的经济就像齿合的齿轮一样紧紧地衔接，运转得很好。

现在我们的干部中，有不少是和金策一道工作过的，你们不要让他为我国的产业建设所奉献的心血白费。

三　外邦他乡迎新春

朝鲜革命博物馆里，有一张图片吸引观众久久伫立不动。这是一张上有金日成同志豁达遒劲的亲笔字迹“外邦他乡迎新春”的图片。

有一天，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莅临革命博物馆指导，站在这张图片面前说，这是我最珍惜的一张图片。

他在回忆抗日革命时期的时候，常常谈到金正淑同志。金正淑同志作为金日成同志最宝贵、最亲密的同志和难忘的革命战友，一直活在金日成同志的心灵深处。

这张图片，是我在南野营时照的。南野营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和属于抗联第一路军的部队最初使用的临时基地，位于伏罗希洛夫附近，也叫B野营。

我们在这里过了一冬之后再回到满洲和国内开展了小分队活动。

从1942年夏，根据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急剧变化的形势，我们同东北抗日联军和苏军部队组成国际联军，驻扎在北野营。抗日老战士们讲的A野营，就是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基地——北野营。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后，我去了南野营。先期到达的崔贤老远就来接我。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崔

贤圆睁着眼睛把我端详了半天，才说：“我以为是哪来的绅士呢，原来是金将军呀！”说罢就哈哈大笑，同我拥抱，抱得那么有力，我连气都喘不过来。“听说你们在哈巴罗夫斯克开会，可那是什么会，开那么久？”他的口气既像打趣，又像有点怄气。

南野营东边不远有个小火车站和一条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

集结在南野营的人民革命军指战员自己盖了营房、住宅、仓库、食堂和盥洗场。营房是半地下室，里面像现在人民军营房那样搭了两层床。营房前面是很大的操场。他们修这所营房，吃了很多苦。

在这个南野营，我们一面做在国内和满洲进行小分队活动的准备，一面进行政治学习。

我们的大部分队员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电影。

到了这里，我们不再为口粮操心了。每顿每人发二百克左右切成片的面包，可都觉得不合口味。因为是没有吃惯的“洋饭”，加上菜也不怎么好，大家都不大爱吃。

这里还有后勤卡车，常到附近的副业农场给我们运送后勤物资。司机是苏联人。李五松为了学会开汽车，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有时还跟他跑副业农场。久而久之，他既学会了开汽车，也学会了喝酒。那个苏联司机是个能喝酒的人。

李五松靠这时候学会的开车技术，解放后也开过一段时间汽车。他一见汽车，心里就痒得忍不住。有一次，他给我开车，竟撞坏了人家的篱笆。从此以后，我的同志们再也不许他开车了。

那些曾在南野营一起生活的苏联战友，解放后来过我们朝鲜，那个后勤卡车司机也来跟李五松见了面。

在苏联远东过了一冬又迎来了新春的那一年，是令人难忘的。

1941年，不仅我国革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世界上也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6月，希特勒军队进攻苏联，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这一年的确是给人类带来了说不尽的痛苦和灾难的不幸的一年，是几千年来人类所创造的文明被坦克、大炮残酷摧残的灾难之年、战乱之年。

不过，我们迎接这一年到来的时候，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我们乐观地展望着未来，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一年——1941年。朝鲜革命者完成自己在历史和时代、祖国和人民面前所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那时候，我用大部分时间考虑今后小分队活动和联合作战的计划。

考虑成熟了就和同志们一起讨论，交换意见。当时，金策和周保中跟我们一起住了些时候，也常常跟他们进行讨论。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后，我们决定把小分队派到国内和满洲去。我也做好了带小分队出发的准备。

临出发的时候，金正淑帮助我和小分队准备行装。那时候，我和金正淑已经结了婚。

我们是在革命道路上认识，在白头山休戚与共的斗争中成了朋友和同志，成了终身的伴侣。

我是在举行大荒崴会议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金正淑的。不记得

是在会议期间还是会后，我去了延吉县的三道湾。当时，党的秘书处设在三道湾的能芝营，金正淑就在秘书处工作。我在这个举行秘书处干部会议的地方见到了金正淑。

后来，在马鞍山又见到了编入我们队伍的金正淑。那时她在漫江同金明花一起接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天，我同她谈了很多话，了解到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单身，她所能依托的只有革命战友的集体。

从此以后，她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她来后，在抚松县城战斗中充分显示了作为一名女战士的胆略和机智。我在抚松县城战斗中没有丧生，可以说是托了金正淑的福。这次战斗十分激烈。金正淑带着七八个女队员在离战场有段距离的山口为战友们做早饭。这里有个可以做饭的小房子，很隐蔽，烧火冒烟也不会被别处发现。可是，敌人突然扑向了这个山口。如果敌人占了这个山口，我们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金正淑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抽出匣枪同战友们一道向敌人开枪射击。敌人遭到她们坚决的反击，丢下许多尸体逃跑了。

从这以后，大家都更加喜欢她，成了战友们所爱戴的人物。

这年我们在长白活动，第二年3月远征抚松。我多次讲过，抚松远征是一次艰苦的行军，我也累得筋疲力尽，一到夜里，大都倒下就睡着了。唯独金正淑坐在篝火旁通宵达旦地缝补战友们挂破的衣裳。因为一路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大家的衣服很快就破了。新入伍的马东熙，被篝火烧破了帽子，金正淑把它修得像新的一样。不管什么事情，金正淑一抓到手，就全神贯注，做得

圆圆满满，利利索索。那天夜里我看着她如此勤恳，心里很佩服。我佩服她以助人为乐，帮人不帮到底就不能入睡的非凡的优良品质和浓厚的人情味。

通过这些生活细节，我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正因为有这样的了解，当别的指挥员们建议让她去桃泉里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同意。

她在桃泉里和新坡一带做了很多工作。我就在这个时候看出了她具有革命战士的难能可贵的气质和能力。

她有善于感化群众，唤醒群众，发动群众的非凡的才能。她被靖安军逮捕的时候，桃泉里和附近的群众为了救她，向警察当局提出了好几百人联名作保的“良民保证书”。可以说这是群众对她的鉴定书了。

她是怎样赢得了群众如此深厚的信任呢？这是她奋不顾身地为群众服务所得的回报。她有骨气，不管做什么事，只要是为革命为人民，不怕苦，不怕死，坚持干到底。正因为有这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骨气，她在危急的关头也能活了下来。

她有一颗热爱人民的火热之心。为别人，为同志，从不顾惜个人，甘愿牺牲自己，赴汤蹈火，这就是她的气质。

1938年4月，打了六道沟的敌人之后撤退的时候，在双山子又与敌人接火，战斗异常激烈，连我也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我们无路可走，更无暇喘口气吃口饭。突然，我感到腰部有点烫，一摸，摸到了口袋里的热馒头。急忙转眼一看，只见金正淑在飞快地跑来跑去把馒头一个个地塞在战友

们的手里。大家边吃馒头边打敌人。

她是在山下一口泉水边蒸了馒头的。她是怎样提着这些馒头爬上了陡坡，简直不可想象。

她唯恐战友们挨饿，甚至把吃的带到火线上去分给大家，而她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

有一段时间，部队断了粮食，只吃土豆充饥。一连多日顿顿吃土豆，就会倒胃口，失去食欲。金正淑为战友们天天吃土豆充饥都没了食欲，心里很难过，一直想着怎样才能让战友们增进食欲。她把土豆磨成粉，烙土豆饼，采野菜炒熟后剁成馅，做成土豆馅饼，从此，大家食欲大增，都爱吃土豆做的食物了。

金正淑的一生，是为革命同志奉献的一生。她的革命生涯，由同志友爱起始，为同志友爱所丰富，在这过程中，她成长为最重共产主义道德情义的优秀革命者。她一辈子所做的事情，都是为同志、为人民、为革命而做的，没有一点是为自己做的。她的心中，根本没有个人的观念。

自己饿死、冻死、病死都无所谓，只要能使同志们不挨饿、不受冻、不闹病就心满意足；只要能拯救同志的生命，她愿意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含着微笑去迎接死亡。这就是金正淑的人生观。

只举一个有关一条毛毯的故事，也能充分地了解金正淑的同志友爱是多么真挚而炽热。

前不久，金正淑的一位老战友，住在中国延吉的徐顺玉到平壤来看我。她带来了一条毛毯和一只望远镜。她过去在朝鲜人民

革命军主力部队当过司令部的炊事员，她的丈夫金明柱过去也是我们主力部队的军事指挥员，他有“延吉监狱”这样的绰号，因此很出名。我们在抚松地方活动时他在第七团工作。

徐顺玉是崔希淑在腰房子做地下工作时带来吸收入伍的。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崔希淑那时连她的侄子也带来了。严光浩在青峰密营诬为日寇密探的那个小战士，就是徐顺玉的侄子。

金正淑十分疼爱徐顺玉，在宿营地总是抱着这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小顺玉一块睡，一起盖一条毛毯子。当时跟司令部在一起的女战士只有她们两个。

徐顺玉带来的就是那条毛毯。这是金正淑经常捆在背囊上带着的。

她一背上它，毛毯就高过她的头顶，简直认不出她是谁，可是我一看到那条毛毯，就知道是金正淑。

当徐顺玉被调到小分队基地时，金正淑把这条毛毯作为纪念品送给了她。当时金明柱和玄哲等人驻在那个基地，徐顺玉大概就在这里同金明柱结婚的。

徐顺玉走的时候，抱着金正淑不停地哭。长期盖一条毯子同甘共苦的女同志之间生离死别，自然是难舍难分，泪流不止了。金正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她作纪念，心里很着急，索性把那条毛毯塞在徐顺玉的背囊里，对她说：“给，作为纪念收下吧。虽然不是新的，但你别忘了这条毯子里有着我这个姐姐的温暖气息呀。”

我没想到这条毛毯居然过了半个世纪又回到我身边来。虽然

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它是金正淑所爱惜的毛毯。徐顺玉带来的望远镜也是我送给金明柱的。

如果当时金正淑手里有比这毛毯更贵重的东西，肯定会毫不踌躇地送了徐顺玉。她常说，授之与人，比受之于人高兴得多。这就是金正淑的人生哲学。

金正淑的同志友爱，最突出地表现在为我作出的努力、为我献出自己全部身心的实际行动上。对自己的司令官的忠诚，实质上也是同志友爱精神的表现。

有一年，我们在断了粮一连几天饿着肚子的情况下作战。我正在紧张地指挥战斗，突然觉得有人往我衣袋里塞了什么东西，掉头一看，是金正淑。战斗结束后，我把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纸包的一把剥了皮的松子。我问金正淑这是哪来的，她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后来听别的女战士们说，是她亲自爬上海松摘来的。

金正淑还多次从险境中救了我。她时刻准备着做我的盾牌。我们在大沙河尽头作战的时候，我的身边出现了十分危险的情况，一群敌人正在隐秘地向我逼近，而我却只顾指挥作战，毫无察觉。如果没有金正淑，一定出了大事。她一见情势危急，立即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我，迅雷不及掩耳地开枪消灭了向我逼近的敌人。这样，我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种情况，不止经历了一两次。

抗日时我穿了多年的棉大衣，也是金正淑给我做的。不知她是听谁说的，子弹打不透丝绵。从此以后，她一有机会就搜集丝

绵，接着一连多日，不眠不休，一针又一针，细针密缕地缝制棉大衣。当她看到她精心缝制的棉大衣正合我的身材，高兴得不知所措。

从此以后，我在宿营地熬夜或睡眠时，地上铺一张狍子皮，身上披这套棉大衣，就感到全身暖呼呼的。听说现在的妇女不爱织毛衣。这也难怪，是机器生产针织品的时代嘛，谁还愿意辛辛苦苦地织毛衣。我每当看到手织的毛衣，就想起金正淑来。她为我织了不少东西。她做炊事员工作，一直很忙，没有空闲的时候。可是她总是想方设法挤出时间，不是看书就是织东西，不知她是从哪里弄到毛线的。

在深山密林里弄到毛线，可不是件易事。那个时候，要想搞到一包针，也需要打一仗。尽管这样困难，金正淑还是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她心里想着我一年四季不停地同敌人作战，成年累月地风餐露宿，就手不停歇地给我做棉大衣，给我做腰围子，给我织毛袜子。她年年给我织毛袜子，直到祖国解放，我没有一年不穿她织的毛袜子。

她为我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心里深感不安。有一次不禁问她，毛线是从哪儿弄来的。她依旧嫣然一笑，不做回答。我再问她你自己有没有毛袜子，她还是不开口。我毫不退让，继续追问，她才无可奈何地说：“将军，您是做大事的，这种小事，您可以不管。”

解放后她还是继续织。只要见到我的袜子破了，她就拿去，并不缝补，全都拆成线，卷成团，再织出新袜子来。她通宵达旦

地织，一早就放在我的床边。到商店或市场去，完全可以买到更好的袜子，可她就是不买新的，总是把旧袜子拆开再织，直到不能再织了。她就是这样一直自己亲手织好袜子给我穿。这是她的心愿。女人的至诚就是这样感人。

对着她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至诚，有一次我忍不住发了火。是哪一年的冬天，她给我拿来了洗干净的衣服，是她洗好了缠在自己的身上用自己的体温弄干了的。当然这是她背着人做的，我原先也不知道。可是别的女队员是瞒不住的，她们为之深受感动，在背后都称赞她。这话传到了我的耳里。

我生平第一次听说把洗好的湿衣服缠在身上用体温弄干的话，不禁愕然了。我叫来了金正淑，见到她冻得脸色发青，我几乎要淌出眼泪来。她做了连我亲生母亲都未做到的事，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金正淑主动地为我做甚至我的亲生母亲都未能做的事，为我不惜牺牲自己。她这种同志友爱，仔细一想，既是对自己司令官的革命同志友爱，也是对我金日成的炽热似火的一片痴情。

我对她说："正淑同志，你对我的赤诚，我很佩服，心中一直感谢你。可是，你怎么做这种事啊，冻出病来怎么办？你以你自己的牺牲换来我的舒服，我心里能好受吗？往后再不要这样！"

她浅浅一笑，说道：

"我吃点苦算什么，只要将军安然无恙……"

我在正淑面前发了"火"，但叫她回去以后，我情不自

禁地流下了眼泪。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忽然想起了我的母亲，觉得金正淑为我倾注的赤诚，饱含着母亲生前为我未能倾尽的爱心。

金正淑把自己的体温完全交给缠在自己身上的冰凉的湿衣裳，冻得瑟瑟发抖，却咬紧牙关努力不露声色的样子，我是一辈子不能忘记的。

那以后，她还是多次用自己的体温弄干了我的军服和内衣。可以说，她是用自己的身体为我挡住了向我飞来的子弹、雨雪和严寒。

今天，我们的历史学家说，我们走过来的抗日革命道路是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说得对。抗日革命战士们不仅在革命方面，而且在爱情方面，也开辟了前人未曾开辟的境界。我们在白头山上过的是无比艰苦的生活，但我们在白头山的浮石上也培育出了爱情之花。

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恋人之间的爱，师生之间的爱，同志之间的爱，以及人间生活中的所有的爱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献身精神。宁可自己挨饿，也不让自己所爱的人挨饿；宁可自己受冻，自己病倒，也不让自己所爱的人受冻、闹病；为自己所爱的人，需要的话，跳入火海，跳入冰窟，上绞首架也在所不辞，只有这种不惜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才能创造出最美丽、最崇高、最真挚的爱情。

我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后不久，回了一趟万景台。我一回去，家属和亲戚都问我，听说你在山上娶了个好媳妇，可你们的婚礼

是在什么地方怎样举行的，伴郎伴娘都是什么人，喜筵是什么人办的，等等，一再地问我。

而我，什么也回答不了。想要回答，可是忽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要说实话吧，怕爷爷、奶奶听了会难过，也怕亲戚们伤心。

实际上，我们在山上打仗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过什么结婚筵席。

生活艰难困苦固然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国家还没有光复，亡国人的耻辱还没有洗雪，怎么能想到办什么喜筵、做什么生日呢。我们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想过享什么福。

游击队式的婚礼是很简单的，向队员们宣布谁跟谁结婚就完事。像现在的青年结婚那样，置新衣裳、办大喜筵，那时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给喜桌放上一碗饭，就算最不错的了。没有饭就放一碗粥，连粥都没有，就放一些土豆或玉米。尽管这样，也没有一个埋怨的，反而都认为这是应当的和很自然的。

那时候，我们的人即使是已宣布结婚的夫妻，也都和往常一样生活在自己所属的连或排里。指挥员都毫无例外。既有刚结婚就上战场双双牺牲的夫妻，也有婚后各自接受不同的任务分开过日子的夫妻。

我和金正淑结婚的时候，战友们都想为我们办点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办成。当时我们全队断了口粮，连饭都吃不上，还能上哪去办什么呢。

我们的婚礼，虽然没有置新衣裳，没有办酒席，也没有主婚人和伴郎伴娘，却是永生不忘的，金正淑生前也常常回忆过。

新一代的人听了这话，也许摇头晃脑，不大相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只能如此。结婚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且都认为这样做才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为了幸福的明天，甘愿忍受今天的艰难，从中感到生活的意义，这是抗日游击队员们引以为乐的。他们是为了后代、为了祖国的明天，心甘情愿这样做的。

在白头山密营和苏联远东训练基地的时候，我曾打定主意，祖国解放后，一定要为战友们好好操办婚礼。可是真的解放了祖国，主意归主意，现实仍不允许我如愿以偿。人民的生活仍没有多大改善，粮食情况十分困难，无法实现我的愿望。

解放后不久，张时雨来找我说，一个当过游击队员的人，想用平安南道党委会的公款给人办婚礼，这是可以容忍的吗？我问那是谁干的？他说是金成国。

我把金成国叫到我的办公室来，命李乙雪解除了他的武装，然后厉声责问，你有什么权力胆敢随便动用道党委的公款？

他有点饮泣吞声地说：“孙宗俊要结婚，我想给他买一套结婚穿的新衣裳和一床被褥，再办些酒席。他没有亲人，孤孤单单的，我们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呀。”

虽然这样，我还是严厉地批评了他。要给孙宗俊买新的衣服和被褥，给他操办婚筵，谁不知道是好事？可是现在可以这样做吗？你要是想到了在游击队里结婚时连一碗饭都摆不上的往事，哪怕想到了一点点，就不会向党伸手要钱的。在国家还困难的时

候，你应该像个游击队出身的干部，要想到全局，谨慎处事。我把他打发走了，可心里却隐隐作痛。金成国要给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操办个像样的婚礼，是多么感人的好心肠啊！

我们的战友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后，结婚的人很多，但婚礼都是很简朴的，我心里一直为之而感到酸痛。多亏金正日同志了解我的心情，当我的老战友们过六十花甲、七十大寿的时候，他都给他们送去寿筵和寿礼。

唯独金正淑没有享受到这种乐趣，刚过三十就离开了我们，只留下了这么一张照片。我和金正淑照这张相，也是一个偶然。如果没有革命战友的关怀，这张照片也不会拍的。

当我们带着小分队准备动身的时候，同志们找我来，要跟我一起照相。他们说，这次去开展小分队活动，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大家一起照张相，好作个纪念。照相机都带来了，金将军只把脸借给我们一会儿就行了。

我穿上军装到外面一看，只见崔贤在等着我。天气虽然还有些凉丝丝的，眼前却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

我倚着一棵开始泛绿的树，跟战友们一起照了一张相。这是久别之后在南野营重逢时拍的纪念照，也是再度分手去搞小分队活动的纪念照。别的战友们也都两人一对，三人一伙地照了相。这时，几个女队员不知是怎样探听到的，也赶过来要照相。我又跟她们照了一张。她们接着让我跟金正淑两个人再照一张。金正淑听罢就羞涩地躲到女队员们的身后藏起来了。女队员都把她推到前头，她羞红了脸，无可奈何地微笑着被推到了我的身边。拿相

机的战友没有放过这一瞬间，按下了快门。

我单独跟一个女战友照相，这还是生平第一次。对我和金正淑来说，这一张相就等于是结婚照了。

那时候，我们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是爱幻想爱说笑的时节。虽然是在异邦外乡迎来了春天，但大家还是充满了信心，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这是我和金正淑婚后第一次迎来的难忘的春天。为了永远纪念这个春天，我在照片的背面写上了“外邦他乡迎新春，1941．3．1．于B野营区”。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张照片居然成为历史资料被展在这么大的博物馆里。我们进行抗日革命有20年之久，却没有留下多少照片，实在有些惋惜。这样看来，当时建议拍照留念的战友，确实是令人感激的。

那时候，金正淑跟别的女队员一样，留着半长头发。可是从照片上看不出她的头发样式，因为她把头发都塞到帽子里了。这也是有缘由的。

那年初春，我带着一支小分队重返满洲和国内，越过苏满边境经过珲春地方的时候，觉得一双脚暖呼呼的，起初以为是走了远路的缘故，并没在意，但越走越觉得脚底暖呼呼，有一种松软舒适的感觉。脱鞋一看，鞋底垫着一层用头发做的鞋垫。这才明白，金正淑平时老戴着军帽，在屋里也不脱，就是因为把头发剪下来给我做了鞋垫，头发稀疏难看了。

那天跟我一起照相的战友，现在都不在了。安吉、崔贤谢世

了，金正淑也早已故去，那么多的战友都已去世，只剩我一个人了。当年我和安吉、崔贤一起照相时所倚托的那棵树，现在恐怕已是一棵大树了。

南野营也不知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很想抽出时间再去看看。

解放后，金正淑一如既往，为我竭尽了至诚。

她照料我十分细心。连没隔几天就给我换一次的衬领，也都洗好上浆之后捶得很柔软。上了浆的衬领，如果只用熨斗熨一下，它就发硬，把皮肤磨得生疼，颈部活动很不自如。只有捶平了，才很柔软，不硌皮肤。

她捶衣服，都趁我不在的时候做。我在家时，怕妨碍我的思考，从不做捶衣服的活。

我再举一个例子。祖国解放的前夕，我到莫斯科去参加对日作战会议。有一天我在招待所作了个梦。梦见金正淑在一间很宽敞的房间里摆满了书，让我随意阅读，还说有了这么多书，恐怕您读一辈子也读不完。

我把这梦讲给大家听，他们都逗笑地争着给我圆梦，说这是将来当总统的梦，是预示大吉大利，万事亨通的梦，还向我表示祝贺。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又给金正淑讲了这场梦。她听了，笑着说我作了很吉利的梦。

随着岁月的推移，对这场梦的记忆早就淡漠了。但是，唯独金正淑还记着。国家解放后，我们住在解放山脚下的时候，她在我的书斋里装满了各种书籍，对我说，国家已经解放了，您就尽情地看书吧。然后要我一起照个相，作个纪念。这天照的相，现在还

在。

可以说，金正淑的一生，是为我奉献的一生。她跟我结婚后，仍一如既往，一直把我当作司令官和领导者，当作领袖，推崇我，拥护我。我和金正淑的关系，是领袖与战士的关系，是同志与同志的关系。

她常说自己是领袖的战士。直到与世长辞的最后一刻，她对我从没有用过夫妻之间通常使用的称呼，她叫我的时候，始终一贯地称呼我“将军”或“首相”。

解放后有一天，几个女记者来采访金正淑，想介绍她的业绩。她对这些女记者说：“战士的一生，是包含在领袖的历史之中的，请你们还是多多介绍金日成将军吧。”

我认为她这话表现了她与众不同的品格。

金正淑的一辈子，是只有受苦没有享受的一辈子。在告别她的遗体的时候，想到叫她一辈子受尽了苦，我心里疼痛难忍，把一只手表带在了她的手腕上。送一只手表，岂能报答她对我的赤诚，岂能减轻我失去了她的痛苦！但我还是给她带上了。如果那是一只平平常常的手表，我还不至于这样，而那是一只有特殊情由的手表。

不记得是哪一年哪一天，我的祖母对我说，能不能给她买一只好的女式手表，贵一些也不妨，说她有用场。一辈子连个挂钟都没挂过的祖母，突然要买—只手表，而且要买好的，我不免感到有些诧异。

不久，我买了一只女式手表送给祖母，问她要拿这只表做什么用。

她老人家说：“听说你们在山上两手空空地结了婚，我心里老记挂着这事儿。你们从山上下来也已经好些日子了，可我这个做奶奶的至今还没有给你们办一桌酒席，也没有给你们置一套新衣裳，所以想到买一只手表给正淑带上。要能看到她带着这只手表，该多好啊。”

金正淑谢世后带走的就是有这种情由的手表。

我祖母对孙媳妇的爱护和关怀是无以复加的，它抵补了过早去世的我父母的爱。

然而我，为金正淑做的事却什么都没有。她每年都给我做生日，尽管很简朴。但是我，跟她成家后共同度过了近十年的岁月，却没有给她做过一次生日。对自己的生日，她连提都不让提，这也是她的一个脾性。

因为我没有为金正淑做过什么事，心里总觉着对不住她，所以，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那天，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给她斟了一杯酒，说：“你一直辅佐我的工作，很辛苦，可是我为你，什么也没做，光让你受尽了苦。今天我敬你一杯，喝吧。”

她说：“怎能说什么也没做呀。您建立了党，建立了军队，建立了共和国，这是多么宝贵的礼物啊！您实现了我平生的夙愿，再没有什么可求的了。”

金正淑去世的第二年，参加过抗日的女战士们凑了一笔款交到党中央来，托付党中央为金正淑好好修一座墓。于是，修墓工程就开始了。不久，我上牡丹峰去看金正淑的墓，只见已经围上了铁栅栏，打上了石垣，正在用花岗石铺阶梯。

我对那些在工地上做工的女战士们说："我不是不知道你们的心意。你们看看那些房子，老百姓还住着那些低矮简陋的房子。我们的人民过去都流着血泪，经受了莫大的苦难，可是现在的生活仍不够富裕，而且我们还没有统一祖国。在这样的时候用花岗石修墓，要叫金正淑知道了，她该觉得多么对不起人民啊！你们要是实在愿意表示心意的话，就在墓的四周种些花草树木吧。想念她的时候，就带着孩子们来这里看看墓，休息休息。这才是对她真诚的纪念。所以，要把工程立即停下来，把这些花岗石都送到建筑工地上去。"

一生一世为人民、为同志献出了一切的金正淑，为自己的子女却没有留下一点财产、一分钱。她生前所花的钱，是我按月领到的薪水，她生前使用的住房和家具，都是国家的。

要说她有给我们留下的，那就是她把金正日培养成为未来的领导者，交给了党和祖国。同志们都说，是我把金正日培养成了继承人，其实，这个基础是金正淑打好的。这是她为革命建树的最大功绩。

金正淑同志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把金正日叫到跟前，嘱咐他要好好辅佐父亲，要继承和完成父亲的事业。这是她对金正日的遗嘱。她留下这个遗嘱三个小时后，才合上了眼睛。

我至今常常怀念金正淑。她多年来一直穿的是朝鲜的民族服装，可是不知为什么，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穿着民族服装的金正淑，而是穿着军装的金正淑。浮现的次数最多的，是她端着用自己的体温弄干的衣服冻得瑟瑟发抖的面容。一想起当时的

面容，我的心就像刀绞一样疼痛。

四　小分队活动的日日夜夜

日本御用刊物一旦获悉抗日联军某部指挥员牺牲，就大作文章，胡说什么他的部队全军覆没。进入40年代，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满军警明知抗日联军的大部分力量正在坚持抗战，却胡说什么，游击队完全被消灭了。

如果说抗日武装部队全军覆没，我们的抗战告终是事实的话，那么，野副把司令部从吉林移到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地区延吉是什么原因？就连为攻打杨靖宇而出动的兵力也都调到白头山东北部又是什么缘故？还有，出动关东军、伪满军、警察武装，甚至把铁路警护队和协和会的败类都动员出来，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在小分队活动时期，也不断地发出枪声。虽然尽量避免了无谓的大规模的战斗，但必要时，还是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为了保存力量，为了进行群众政治工作和侦察活动，付出了很大力量。还将许多小分队、小组和政工人员派往国内，进行全民抗战准备。

小分队和小组的规模，因情况而异，小分队一般为十至几十名，小组为几名。武器装备，则根据不同任务做到简单轻便。编成小分队和小组之后，就分别部署任务和指定活动地区。各小分队和小组，根据需要进行了分工，有的以做政治工作为主，有的

以作战为主，也有的以做侦察工作为主。但这种分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根据情况，侦察小组兼做政治工作，以作战为主的小组同时进行侦察工作和政治工作。

部队编好之后，就集中力量建设小分队和小组赖以活动的临时秘密根据地。小哈尔巴岭会议后建立的主要秘密根据地有：延吉县倒木沟附近基地、和龙县孟山村附近基地、安图县黄沟岭基地、汪清县夹皮沟基地，等等。国内也从恩德、先锋、茂山、罗津到腹地，建立了许多临时秘密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设有小分队驻扎的密营、通信联络场所、秘密聚会场所、后勤物资保管场所，等等。

小哈尔巴岭会议之后，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亲自率领警卫连部分队员胜利进行了安图县黄花甸子附近泥沼地战斗，创造了小分队活动的典范。他对这场战斗作了如下的回忆：

黄花甸子附近的战斗，是我们在小哈尔巴岭会议后转入小分队活动时的第一场战斗。小哈尔巴岭会议后，我带领约有一个班的警卫队员到了寒葱沟，返回时，在黄花甸子同敌人打了遭遇战，当时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

同马塘沟和南牌子一样，黄花甸子这个地名，也有它的由来。如果问这个地方的人，黄花甸子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回答都不一样。有的说，是野菊花盛开的泥沼地的意思；有的说，是黄花菜盛开的泥沼地的意思；有的还说，是青年男女相恋的意思。到底哪个正确，这不大清楚。

我们曾多次路过这个叫做黄花甸子的地方，野菊花不多，黄花菜也没有多少，但有泥沼地，战斗就是在这个泥沼地打起来的。

在我们的一行中有黄顺姬。我叫她来，是为了让她向崔贤传达小哈尔巴岭会议讨论并决定的方针。她身材矮小，但眼明手快，责任心也很强，而且还熟悉崔贤部队的方位。

天擦黑的时候，我们在黄花甸子后山稍事休息。

队员们休息时，我暗自琢磨如何通过那片泥沼地。泥沼地中心有条大水沟，上面架有独木桥，桥下流着不知有几丈深的臭水。过了这个桥，再翻越一两座山，就能径直去我们预定做临时秘密根据地的延吉县倒木沟。

可是，我考虑到对岸可能有敌人埋伏，就目不转睛地注视对岸桥头。果然不出所料，对岸闪了一下火光。我想可能是萤光，但又一想分明是敌人打的手电筒。我们只有过独木桥才能开赴倒木沟，可是敌人偏偏借黑打埋伏。真是冤家路窄。

在搞武装斗争的岁月里，我们曾多少次被敌人包围过，也曾多少次出生入死，但像今天这样情况紧急而又束手无策，还是第一次。

如果过不了桥，就得绕几十里弯路，而绕的这条路也有危险。宁可牺牲，也要沿着原定的路线径直前进。队员们看到我默默地注视着敌情想主意，都屏住呼吸，显得很紧张。

过了半天，我决定在敌人发觉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独木桥。

于是向队员们发出了出发的口令。队员们平安无事地过了独木桥。

我跟在后头，在最后过桥进入草丛的时候，敌人的机枪突然开火了。

我命令机枪手狠狠地打击敌人，并命令队员们朝大路方向转移。当时全文燮和黄顺姬都拼命地保卫着我。如果一失足掉进烂泥塘，就难以拔出脚来，再加上敌人的子弹雨注般地飞来，真是岌岌可危。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牺牲的，都安全地脱离了险境，真可谓万幸。

如果我当时惊慌失措，不能及时决策，势必逃不脱敌人的陷阱，遭受重大损失。

然而，正当我们向大路走的时候，尖兵报告说，前面出现敌人。显然是敌军主力听到桥头上的机枪声，扑上来了。

我命令队伍赶快掉头朝独木桥方向跑去，并分别向桥头的敌人和尾随的敌人射击，然后悄悄地溜出来登到山上去。到了山腰，我命令队员们就地休息。

当队员们坐在山腰上喘息的时候，桥头上的敌人和从大路方向拥来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后来，我们听安图的人说，敌人自相厮杀，死伤了很多人。对此，敌人追查，是谁先开的枪。还发出悲鸣说，通过独木桥的是鬼，还是游击队？敌人内部乱作了一团。

其后，我们在延吉县发财屯、安图县五道扬岔附近又消灭了大批敌人。跟黄花甸子战斗不同，延吉县发财屯一仗，是三个袭

击组将袭击战法和望远战术配合起来打的。在这次战斗中，敌人又自相残杀，伤亡惨重。

我们几乎每天都进行这样的战斗。有时还把几支小分队合并起来痛击大批敌人。由于我们以小分队作战为主，有时也配合大规模作战，所以敌人未能觉察人民革命军改换了战术：从大部队作战转入小分队作战。

崔贤通过黄顺姬接到小哈尔巴岭会议方针之后，也出色地开展了小分队活动。他们在汪清县先是用大部队攻打盘据在广盛屯、小城子两地的敌人，而后分成小分队分散运动，转战各地，消灭敌人。

延吉、和龙和安图县有吴白龙的小分队，珲春、东宁县一带有金一和孙长祥的小分队，东宁县、宁安县、穆棱县和五常县一带有韩仁和、朴成哲和尹泰洪的小分队分别活动。

由于开展小分队和小组活动，整个东北和朝鲜北部边境像滚开的粥一样沸腾起来了。

金日成同志就哈巴罗夫斯克会议之后亲自指挥的小分队活动，作了如下回忆：

以前，小分队和小组主要是在朝鲜北部边境和中国东北地区开展活动。从这时起，挺进到国内腹地，甚至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南端军事要冲和遥远的日本本土。

小分队和小组的活动内容也多种多样：恢复和新建国内和东

北一带被破坏的党组织和地下革命组织，重编现有武装部队；确保对全民抗战组织有系统的统一领导；充实国内各地秘密根据地，根据形势要求建立新的临时秘密根据地；在国内和东北一带吸收爱国青壮年参加游击队，以壮大朝鲜人民革命军队伍，培养军事骨干。

同时，还广泛开展了这样的活动：以积极的袭击战、伏击战和破击战，扰乱敌人后方，削弱敌人的作战能力；对敌人的军事设施、基地和要冲进行军事侦察；扰乱敌人的指挥系统和敌军内部，等等。

这个时期，东北抗日联军也参加了小分队活动。鉴于这种情况，各部队划分了各小分队的活动地区：朝鲜人民革命军第一路军所属部队和第二路军部分部队在朝鲜国内与东南满地区活动；第二路军主力部队在兴凯湖以北到东岗的地区活动；第三路军部队在庆城、铁骊、海伦等各县活动。

我来往于白头山和远东临时基地，领导国内与东南满的小分队活动，并同时推进军政学习。

不管是谁，搞完小分队活动回基地后，都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和现代战训练。

我们在南野营决定，由我率领人数较多的小分队，最先向白头山东北部和国内挺进。紧接着，崔贤小分队和安吉小分队也根据情况分别到国内和满洲去，还给他们指定了活动地区和任务。

我率小分队离开基地，是1941年4月。我们小分队的基本任务是：同留在东南满一带进行活动的小分队和小组取得联系，对

他们实行统一指挥。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恢复与整顿被破坏的革命组织，建立新组织；通过地下组织选拔青年，扩大武装力量，同时把他们培养成为争取祖国解放的最后作战与新社会建设所需的干部。

我们还打算寻找魏拯民的去处。

当时国内和满洲的局势十分严酷。

从1941年初春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进入新的“讨伐”作战。“野副讨伐司令部”解散，其职权移交给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主力部队、各地区伪满军军管区司令部和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所属各“讨伐队”，更加猖狂地进行对人民革命军的“讨伐”。

因此，有些指挥员对我直接率小分队挺进敌区表示担心，建议搞清形势后再行动。起初，金策也对我的安全表示担心。

临出发前，我任命柳京守为连长，金一为政治指导员，全文燮为传令兵。全文燮被任命为传令兵时，金策很严肃地对他说，你要步步跟随，一步也不要离开。

我们小分队的报务员是安英。

他曾在东满和北满搞过活动。多年来，在教育部门对青少年孜孜不倦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东满活动时，他还组织过流动剧团，到处开展群众启蒙工作。

安英见多识广，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在北满做群众工作时，当过厨房杂工，还在罂粟园打过短工。

我们离开满洲时选拔安英做报务员，是因为他在北满部队时曾到苏联学习过六个月的报务员业务。

安英留着小胡子，给人印象很深。因此不少人都管他叫小胡子。

我们的小分队成员共有三十名左右。小分队全体成员都穿着一身日本军服，伪装得挺像。

4月上旬的一天深夜，我们小分队跨过边境经过旧根据地开赴白头山东北部。

我们到白头山东北部后，需要做的工作很多。

我们撤离东满游击区转移到西间岛后，敌人在东满和白头山东北部一带进行了全面的破坏作战。为了收拾这一残局，继茂山地区战斗之后，我们又挺进到白头山东北部，积极推进这一地区的革命化工作。

敌人趁我们去苏联的时候，出动正规武装，在这里掀起了破坏活动。之后，夸海口说，“东满的安全已有了保障”。

要在白头山东北部重新掀起革命高潮，小分队和小组就必须积极进行活动，以显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威力。只要这样，就完全能够唤醒群众重新站起来。

我们计划在安图、汪清、延吉、珲春和敦化一带搅乱敌人之后，在白头山西间岛一带和国内组建更多的革命组织，同时加强全民抗战力量，选拔数百名爱国青年送到白头山根据地和远东基地，把他们培养成为军政干部。

小分队越过边境之后，进行几天急行军到达了离大黑瞎子沟密营不远的一个山谷。

我记得有一次，从延边来的一些朝鲜人说，他们在汪清、东

宁和珲春三县交界处找到了一处游击队宿营地旧址，并带来了他们参观时拍摄的录像带。我通过录像看出那个地方很像当年我们小分队作为临时秘密根据地的地方。

到了这个山谷一看，背囊里的口粮全都吃光了。

我派金一等去攻打汪清县金仓附近的一个金矿，以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进行群众政治工作。

全文燮在大黑瞎子沟基地附近，猎获了一只黑熊，非常大，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把它抬回基地。从那只黑熊身上竟榨出了一桶油。

几天后，金一等人搞来了粮食。可是他却沉痛地报告说，张兴龙在工作中牺牲了。张兴龙的牺牲，是池甲龙的过错。打了金矿之后回部队时，池甲龙偏要求做饭吃，因此耽误了一小时左右，致使追击之敌扑了过来。

金一后悔他没有拒绝池甲龙提出的要求，并说他没有脸见我。

张兴龙的牺牲，使我十分悲痛。想起他因牵牛一事受处分后，为改正错误而积极工作的情景，我心里很难过。

张兴龙牺牲时，还有一名汉族队员被敌人抓去，敌人才知道我们的部队出现在这里，为此惊恐万状，说金日成又出现了，于是疯狂地发动“讨伐”。

我想，我们的活动暴露了，反倒更好。敌人惊呼金日成部队出现了。这个消息传到人民群众中去，等于告诉人民群众朝鲜人民革命军还健在，正在继续坚持斗争。小分队的活动虽然更困难，这倒是事实，但敌人反而替我们作宣传，这岂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为了隐蔽踪迹，攀过高山峻岭，朝着太平沟方向前进，5月上旬，到了汪清县夹皮沟。

在夹皮沟，我和金一分手了。我让他带一支小分队，把夹皮沟作为临时秘密根据地开展活动。这个小分队活动区还包括罗子沟和图佳线一带。这里有不少人是我在游击区时期一手培养出来的。我对金一说，崔春国的家属可能在这里，不知住在什么地方，要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还叫报务员安英带两名助手也留在夹皮沟。这个地方还起到了联络站的作用。

我带了二十名左右队员离开夹皮沟，前往白头山东北部豆满江沿岸广阔地带。我们打算在敦化、安图、抚松、和龙、延吉等东满各县，迂回着开展活动。

我们的小分队经过敦化，在安图县寒葱沟建立了基地，设置了联络点。寒葱沟是我最后见到魏拯民的地方。

我们到达寒葱沟时，已春去夏来，草木繁茂，一到中午，天气很热。

在寒葱沟，我把政治工作小组派到长白、敦化、车厂子、白头山和国内其他地方去。

派到长白一带的有韩昌凤和韩泰龙，他们的任务是：领导长白地区的地下工作，找到我们队员的家属和亲戚，使他们通过组织回到国内去。我们的部队有很多来自长白的人。只要把他们的亲属都吸收到组织里来并派到国内去，他们就能为建立全民抗战组织做出很大的贡献。韩昌凤和韩泰龙的另一个任务

是，选拔优秀青年，送到远东基地。

我具体地告诉韩昌凤和韩泰龙，长白桃泉里有谁，某某地方又有谁。并指示他们在那里建立地下组织之后，就回到国内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

全文燮和金洪洙在车厂子尽头挖来了我们曾在那里埋藏的武器和地图。

这时，到敦化地区工作的同志带来了一位姓朴的老人，他在大荒沟密林里以狩猎为生，原来是地下组织员，曾经在桦甸县参加过反日会。我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据他说，山山谷谷到处都有日寇“讨伐队”，特务走狗无处不在。小分队曾经作为据点的烧炭棚、罂粟栽培棚、丧具房和洞窟也都成了密探巢穴。他还说，人民群众全部被关在集团部落里，禁止互相往来，甚至还逼他们相互监视，因此开展地下工作很困难。但是，工作再困难，只要是为游击队的事，一定尽力而为。

这位老人从敦化县城和集团部落，弄来了有组织关系的人员名单，还为我们搞来了粮食和其他所需物资。我们根据他送来的材料，很快恢复了这一地区的组织。

后来，老人被敌人逮捕，牺牲了。

在小分队活动时期，我们就这样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敌后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人民的支持确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人民对我们的斗争给予的这种支持，清楚地证明他们实际上早已投入了全民抗战。

我们决定一面扩大地下组织网点，一面寻找第一路军的余部和魏拯民的去向。组织了三个组，分别派往敦化县和桦甸县、安图与和龙县北部以及抚松县一带。

在这些工作中，柳京守的表现很出色。他吃过很多苦。

去桦甸县夹皮沟必须渡过富尔河，但因河水暴涨，无法过去。他从上游到下游查了几遍，仍找不到能渡河的地方。这样一天两天地过去，口粮也断了，回归日期也到了。柳京守饿了好几天，加上完不成任务急得病倒了。

夹皮沟，不管谁去，一定要去一趟。

我决定率小分队去完成本来派柳京守去完成的任务。

可是，在帐篷的一角卧病不起的柳京守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跟前说，将军，您可不能去，还是我去吧。

我说你有病不能去，可他说什么也不听。他脾气倔，一说不，谁也说不动。我只好忍着心痛，同意他去了。

在人的一生中，有检验其为人的特殊契机。我们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游击斗争，每分每秒都在对人进行着这种检验。每天都有数十次这种要么牺牲，要么生存的瞬间。

每当遇到生死关头，柳京守总是视死如归冲锋陷阵。因此，我常常把他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把轻担让给战友，把重担留给自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甘愿接受处分和指责，这就是柳京守的做人标准，又是他之所以受到大家一致尊敬的原因。

柳京守动身开赴桦甸县夹皮沟时，我指示把粮食全部拿出来

让他带去。柳京守悄悄地问全文燮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口粮。他看到全文燮支支吾吾地答不出来，就斥责说，你身为传令兵，怎么这样草率。说罢，他把背囊里的米倒出来了。几天后，柳京守完成任务回到了部队。

他一见到我就昏倒了，他受了很多磨难。脱下穿破了的鞋一看，脚都磨破了，鲜血淋漓。我给他喂了米汤，他勉强地睁开眼，作起了工作报告。

他们在夹皮沟一带遇见了一个跟游击队有联系的农民，但那农民不肯说，所以未见到郭池山等人，只听到了魏拯民去世的传闻，就回来了。

柳京守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却为未能圆满完成任务而感到十分内疚。

然而，当时带着另一个小组到王八脖子去活动的池甲龙却叛变了。

1941年的考验，是鉴别真正的革命者和冒牌革命者的试金石。

这种考验和鉴别，一直持续到祖国解放那一天。回到解放了的祖国的抗日战士都在这种千锤百炼中成了可敬的人。

池甲龙叛变后，敌人得悉我们的驻地，就像豺狼一样向我们扑来。

我率领部队巧妙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经大沙河、小沙河，开往安图。

我们在安图和抚松这一广阔地带开展活动，扩大过去我们建立的组织。

这时，我们通过组织了解到：魏拯民因病逝世，载有他的照片的通告贴满了明月沟的大街小巷。我们还收到了三十多名游击队员在南蛤蟆塘、北蛤蟆塘、明月沟和延吉附近进行活动的情报。

因此，我们决定在这里再停留一段时间，并派一个小组到沙河掌、南湖头、大荒崴、北蛤蟆塘等地。之后，我带着剩下的队员开赴白头山。

那时我在间白山密营召集小分队、政治工作小组和革命组织负责人向他们下达了任务：根据当前形势的要求，积极开展坚持主体立场，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完成朝鲜革命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好在国内和西间岛选拔优秀青年并把他们输送到远东基地加以培训的准备工作，和针对全民抗战，在白头山密营和间白山密营培养大批力量的工作。

后来，我们在稳城也根据这一方针领导了国内组织的工作。

我们结束了在白头山一带的活动，踏上了归途，但回来的路也很艰难。因为敌人听到了小分队发出的枪声，惊恐万状，丧心病狂地寻找我们的行踪。

那时候，到处都有“讨伐队”，大路上有，山顶和山沟里也有。

延吉县老头沟是敌人的军事要冲之一，关东军的宪兵队、特种部队和伪满军警盘据在这里，因此部队很难通过。

如果不经过这里，就无法靠近通向四方台树林的山地，也无法去我们小分队集结的地点。

我们决定伪装成日军，乘夜间通过老头沟。然而，还没有通过老头沟铁路时，天已亮了。白天只好停止行军，隐蔽在安全的地方。从山上极目遥望，公路旁有几座房屋，不远处有火车站。我决定到那些农家去等待天黑。

把队员们分派到一些农家，我就住进路旁的一家。一个队员化装成中国农民，拿着锄头边除草边放哨，其余的人都休息。

中午，几个身着黄色西服的人突然拥进我住的农家。他们看到满屋子的军队，大为吃惊。前头的那个人因害怕转身要走，我们的队员把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背。

我叫他们进屋来。看来，他们以为我们是日军。我问他是谁？他回答说他是协和会会长。因为听到金日成部队来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来到这里看看。

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们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那个会长一听这话，就害怕得打起哆嗦来。

我们通过他搜集了很多材料。

那天，我看了他带来的报纸，得知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

他说，日寇突然手忙脚乱地将兵力集中到苏满边境，传说苏日战争即将爆发。

我对协和会会长说，等我们离开村子之后，你就去警察署如实通报金日成部队大白天通过了老头沟。

后来，敌人听到这个报告，大吃一惊，说，金日成部队在我们的鼻子跟前做饭吃，甚至还从容不迫地睡了午觉，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我们没有一个牺牲，成功地抵达了集结地点即汪清县夹

皮沟。金一也完成了任务回到那里，我们汇合了。

继6月会议之后，7月底在夹皮沟再次召开了小分队负责人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鉴于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和苏德战争的爆发这急剧变化的形势，对朝鲜人民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和小分队成员进行思想动员。

对苏德战争的爆发，小分队指战员议论纷纷。有的说，苏德战争会给我国革命展现有利的前景；有人说，如果苏联受到东西两大强国的夹击，会对我国革命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的说，至于国际形势将对我国产生什么影响，只有日本侵苏成为现实时才能看清楚。

我在夹皮沟召开会议，就是为了把各种思想统一起来，使所有指战员树立起革命必胜的信念，为迎接祖国解放这个大变革做好准备。

在夹皮沟会议上，我们总结了派往各地的小分队和小组的活动情况，还讨论了以后的斗争方向。

会上，我始终强调：无论大局怎样变化，都不要动摇决心。德国侵略苏联，是自掘坟墓；如果日本发动侵苏战争，也将是自取灭亡，目前，日本还没有力量侵略苏联。看一下世界力量对比，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法西斯必亡，民主必胜，我国革命必将展现出辉煌前景。因此，不要在暂时的困难面前动摇起来，踌躇不前，要将革命的旗帜坚守到底。要有用自己力量争取祖国解放，完成朝鲜革命的信心和胆略。

在会上，我还提出了小分队今后的活动方向：为了保存力量，固然应避免冒险的正面冲突或寡不敌众的交战，但要展开猛烈的敌后骚扰战；奇袭扫荡敌人军需物资运输线和供应基地；进一步加强祖国解放作战所需的侦察活动和群众政治工作。

8月初，我们进行了袭击汪清——罗子沟修路工地的战斗。

当时，日寇正把大批兵力集结到这个与苏满边境毗连的地方。如果在这里鸣枪，定会产生很大的反响。我们既然要发出枪声，就到敌后去发。这是我们的决心。

我先往两个方向各派了一个阻击队，然后，我们扮成日军，威风凛凛地开进工地，转眼间解除了护路兵的武装，消灭了营房里的敌人。

因为我们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的这场战斗，所以工地上的工人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等到柳京守介绍说，我们是金日成游击队时，他们才从四面八方过来和我们拥抱起来。

我们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工作之后，绕过汪清县北部地区，到了能够望得见太平沟的一个山顶。

这场战斗之后，在汪清地区传开了许多关于我们的故事。

在山顶上用望远镜观察太平沟，望见了李光、吴仲洽和朴吉松的家，还望见了吴仲洽的父亲在院子里踱步。

我向金一交待了一项任务，让他在这里同他们取得联系，组建地下革命组织。

后来，金一同吴仲洽的父亲吴昌熙、朴吉松的父亲朴德深取得了联系，建立了地下组织。他还把地下组织扩大到汪清县南北

大洞一带农民和小汪清车站工人群众中去了。当时，吴仲洽的父亲说，现在广泛传开金日成部队重新挺进到白头山地区的消息，人民群众都欢喜若狂，对革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朝鲜人民革命军小分队还在敌人集中运输和移动频繁的苏满边境，积极开展了破坏敌人作战部署的军事政治活动。这个时期，在图们站制造了军用列车相撞事件，在和龙县头道沟和汪清县袭击了移动的敌人。

我们小分队胜利地结束了在国内和东北地区的活动，8月回到了远东临时基地。

1941年9月中旬，为了巩固前段小分队活动的成果，我率部挺进到满洲和国内去，同安吉、金一和崔贤小分队取得联系，综合他们搜集的侦察资料，现场指导在豆满江沿岸和国内各地活动的小分队和小组的工作，使他们树立必胜信念。这对于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要求，将小分队和小组活动范围扩大到国内腹地，以有准备地迎接光复祖国的大变革，和确认日本在苏满边境一带侵苏意图，都有重大意义。

临出发前，我让安英跟他妻子相见。安英的妻子李英淑驻在北野营。李英淑根据父母的意愿，跟一个在村里任夜校教师的安英结婚后，一起在崔庸健部队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安英去苏联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一直杳无音信。可现在他知道妻子在北野营，很想见面。于是我给他们安排了相见的时间，以使担负着艰巨的战斗任务的人减少心事。安英见到妻子之后笑咪咪的，显得更精神了。

我们住的汪清一带的宿营地附近有一条河。李斗益和全文燮常在那里钓鱼。他们对钓鱼很擅长。那时，正值雨季，河水暴涨。他们在钓鱼时，还猎获了一只到烂木桩子上吃红蚁的黑熊。

我们宰杀了黑熊，将一部分肉放在河水里。因为河水很凉，便于保管。面粉也一样，如贮藏在池水里，不易变质。把面袋放在水里，看来像湿了的样子，其实不然，只是浸湿了一点表皮，里面并不湿。在山上过日子，当然不方便，但也有些巧门和办法。

有一天召集小分队指挥员，综合其间搜集的侦察资料，进行时事讨论。这天，指挥员们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他们一致认为，日本能否侵略苏联，还有待观察，但从目前形势看，不可能马上进犯。

安吉提供了关于铁路货运量的侦察资料。他说，日本警官频繁召集居民大叫大嚷，不久就要跟苏联打仗，要赶快挖好防空壕，公路也要尽快修完。但从对铁路货车的调查资料看，敞篷车皮装些坦克、大炮等武器，而有篷车皮都是空空的。

崔光小组在牡丹江地区搜集的侦察资料，也是令人感兴趣的。崔光他们每天登上离车站较近的山岗，用望远镜观察敌兵调往边境一带的情况。

每当列车进站后，崔光就用望远镜观察每个车厢下多少鬼子。一天，他发现一个军官嘴里叼着烟下车。不知是由于他的举止特别傲慢，还是因为他叼着烟大摇大摆的样子很显眼，崔光把他的嘴脸看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他又发现那个军官站在那个台阶上。起初他怀疑自己的眼睛，心想这个鬼子昨天刚下了车，今天怎么又下车？可是他定睛一看，没错，还是那个军官，跟昨天一样，仍是嘴里叼着烟。崔光这才明白了敌人的骗人把戏。敌人每天用有篷车皮将一个部队运来运去，目的是为了造成一种大量运输兵力的假象。这是很重要的情报。

崔光回到基地后，同志们开玩笑说，正因为他是个烟鬼，所以才弄到了那个情报，否则根本弄不到。大家议论说，他垂涎那个鬼子军官嘴里叼着的烟，自然留心注意那个军官，一眼就看出那个家伙就是昨天那个军官了。

崔光因为跟烟有缘分，所以弄到了如此重要的情报。但有一次却因烟而受了罚。

崔光十六岁时就做了青年义勇军的排长。因他年轻，队员们都把他当做毛孩子对待。他为了显示自己已经长成大人，就开始吸起烟来。吸了几年就上瘾了，没有烟抽就难受。

有一次，他参加战斗从战利品中拿来了一袋面粉和一纸箱香烟。部队开党的会议批评他，说，现在粮食这么困难，你既然带战利品回来，为什么不多带面粉，而带不能吃的香烟呢？都建议应当给他处分。

我们根据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实际上还没有做好侵苏准备，它们造成把武力集结在苏满边境的假象，是为了掩盖其南进的企图。这使我们了解到日本不是为北攻而是为南攻做准备。这分析对苏联制定对日军事战略提供了很大帮助。

快到11月中旬时，我们才回到基地，还经过了赛别尔郡烟峰。

我率领小分队出征返回来以后，各小分队都向国内和满洲进军了。

1941年底，姜健小分队在牡佳线新家店附近，打了一场破击敌人军用列车的大仗，毁掉了载有日本军官的客车和满载装甲车和汽油的列车。

1942年初春，朴成哲一行到东宁、宁安、蛟河等县开展活动。他们找到在宁安县老松岭、蛟河县青沟子和五常县一带活动的战友，壮大队伍，不断同敌人展开遭遇战，同年9月，结束了小分队活动，回到了基地。

东北抗日联军的柴世荣小分队，在宁安县、穆棱县和牡丹江一带进行活动，取得很大成绩后胜利归来。

总结第一阶段小分队的活动成果，我认为，从远东临时基地挺进国内和东满一带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首先，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决定将大部队活动改为小分队活动，是极为适时的；小分队活动的威力不亚于大部队，它能给敌人以政治军事上的沉重打击，还能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人民群众投入反日抗战。

实行小分队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使我们的所有指战员都树立起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

我们的小分队活动向国内外人民清楚地表明：革命军仍然健在，而且正在不断击溃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只要全民团结在

革命军周围，展开全民抗战，就完全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

日满军警利令智昏，认为通过“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和大规模“讨伐”作战，会全部消灭游击队，然而，他们却在我们的小分队作战面前陷入窘境。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小分队活动，在组建国际联军前后开展得更加活跃。

当时我们估计到，对日最后作战即将到来，就把重点放在了做好军事侦察活动和全民抗战准备上，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小分队的活动。

这个时期，我们的小分队作战，以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小分队活动为主，配合属于国际联军别动队的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事侦察工作。从当时的活动条件和军事政治形势出发，既各自进行独立作战，又根据需要相互补充和合作。这种活动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小分队活动的政治军事成果。

国际联军建成后，小分队活动的特点是，坚持以小组活动为主，配合以较大的小分队活动的原则。在军事作战中也以小组活动为主，小分队的袭击战和伏击战与之配合。

下面介绍一份资料，说明朝鲜人民革命军在国内和满洲日益加强活动的情况。

“……重新回到满洲的金日成、崔贤和柴世荣等人……觉察到武装抗战已经失利，便想出了破坏军事、产业和重要经济设施，赤化民众，煽动暴动，做士

兵工作的谋略。”[牡丹江领事代理古屋的报告，昭和16年(1941年)6月23日]

“1942年初，在朝鲜北部，朝鲜游击队进行多次战斗，击毁日本飞机二十二架、破坏机库两座，击沉油船两艘和渔船九十二艘。”[维·雅罗沃伊《朝鲜》44页，1945年9月，苏联海军出版社]

派到国内和满洲的小分队，还开展了瓦解敌军的工作。在小分队的积极活动下，日军内部普遍产生了厌战情绪，被强征去的朝鲜青年带着枪逃出来找我们小组成员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敌航空队飞行员们也起义投到人民革命军来了。

小分队活动取得的最大成果是，粉碎了敌人扬言歼灭我们的企图，保存并壮大了我们的力量，做好了迎接祖国解放这一大变革的准备。

朝鲜人民革命军通过小分队活动所取得的政治军事上的成果，为早日实现祖国解放打下了牢固基础。

五　信念与背叛

最近，各家报纸重新刊登抗日游击队员的回忆录，这是件很好的事情。

每篇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它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必胜的信念》这篇回忆录多好啊。60年代，我国人民就爱读这篇回忆录。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在战后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形势越复杂，革命斗争越艰苦，就越要多读些像《必胜的信念》这样的回忆录。这是因为形势复杂，革命斗争艰苦，就会容易产生动摇分子。

当革命面临着像艰难的行军那样的考验时，在革命信念薄弱的人当中就开始出现了掉队的人、逃兵甚至投降分子。

在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时，我们队伍中便出现了动摇分子和逃兵。回忆录《必胜的信念》谈到的池甲龙就是其中之一。

苏日中立条约是在1941年4月签订的，也就是我率领一支小分队进行活动的时候。日本外务相松冈结束了对德国的访问，于回国途中到莫斯科签订了这个条约。其影响波及到了人民革命军。

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维持和平关系；尊重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在一方和第三国之间发生纠纷时，另一方严守中立。

这个条约并没有涉及朝鲜问题，朝鲜人根本无须为此大惊小怪。然而，有不少朝鲜革命者听到苏日两国签订中立条约的消息，就感到大失所望。他们一直把苏联看做最可靠的盟国，现在苏联同敌国日本携起手来了，就认为大厦将倾了。他们绝望地说，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维持和平关系，这岂不是意味着苏联不和日本打仗了吗？

这种看法致使队伍中产生了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思想。

苏日中立条约缔结以后，日本人对它大加宣扬。他们把斯大林和松冈会晤的照片醒目地刊登在报纸上。这幅照片大大震动了动摇分子。

因为邻国签订了某种条约，朝鲜共产主义者就应改变对待革命的根本立场吗？难道我们是仰仗某一大国的力量踏上革命征途的吗？我们不是仰仗别人的支援，而是按照自己的信念开始革命的。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以后，我们从没有向邻国伸手要过一枚手榴弹。我们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自己解决一切问题，进行了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开展了统一战线运动。

在这过程中，我们和中国人民一起进行了共同斗争，还同苏联人民建立了联合战线。有同盟者更好，没有同盟者也照样坚持革命，这就是我们一贯的立场。所以，从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之日

起，就对军队和人民进行了自主精神的教育，使他们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武装自己。我经常对他们强调，只有坚持自主精神才能生存下去，依赖外来势力就会沦为奴隶；只有坚持自力更生，才能昌盛富强，否则，就既不能光复祖国，也不能建设新国家。

可是，有些指挥员不是努力用自求解放、自力更生的精神教育战士，而是片面地强调苏日矛盾和苏联的强大，致使池甲龙这种人的头脑沾染了事大主义思想，认为只有苏联对日本宣战，才能出现解放朝鲜的决定性局面；只有得到大国苏联的援助，才能打败日本。

日本外务相到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一出骗人把戏。

当时，日本人一直窥视北进的机会。北进就是侵略苏联。日本和德国秘密承诺，在侵略苏联时，互相合作，还拟定了瓜分方案：把广阔的苏联领土以乌拉尔为界，西部归德国所有，东部归日本所有。然而，对日本来说，因为国力薄弱，侵略苏联的条件尚不具备。这样，南进论就占了上风。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先占领东南亚，储备大量战略物资，等到希特勒德国重创了苏联，再开始进攻远东，一口气吞并乌拉尔以东。换句俗语说，要等到柿子熟了，再摘下来吃。日本同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只不过是按这个计划表演的一出骗人把戏。

中立条约签订两个月后，德国发动了侵苏战争，日本就随即下令举行“关东军特别演习”。这无异于对苏宣战的预令。举行这个演习时，部署在苏满边境的关东军兵力增加到两倍，可见日

本人居心何在了。当时，日苏中立条约把戏的主角松冈本身比谁都积极主张立即发动侵苏战争。只从这一事实就足以看出日本统治集团是多么狡猾和厚颜无耻了。

那么，苏联对日本的这种骗局是蒙在鼓里的吗？苏联对日本的策略也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日本主动要求维持和平关系，尊重领土完整，这使一直警惕日本和德国会从东西两侧夹击的苏联感到庆幸。当时，德军正集结在苏联西部边境一带，苏联面临着希特勒德国随时发动侵略战争的严重局势。在这种局势下，一直虎视眈眈窥视西伯利亚的日本突然标榜中立，这使苏联有可能暂时免受东西两头夹击的危难。

日本外务相松冈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到车站送行，只从这一事实，也能看出苏联领导人面临苏德战争的心理状态。

可见，认为苏联签订中立条约之后就成了日本友邦的看法，是多么的愚蠢。

形势越紧张，就越要对它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如果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就会犯不可挽回的错误。池甲龙的事例就说明这一点。

池甲龙逃跑事件亦称王八脖子事件。

这个事件发生在1941年春，也就是我率领一支小分队在安图一带进行活动的时候。当时，我们以寒葱沟为基地，领导各地小分队和小组的活动。我们进行小分队活动最感到困难的是，人民群众都被迫居住在集团部落里，要和他们取得联系是十分困难的。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猎人、烧炭人和采药人的帮助下，同群众取得联系。

当时，猎人们从早春到晚秋，利用陷阱捕鹿。陷阱的造法是，挖深坑，在坑底立数支扎枪，坑上横放细长容易踩折的树枝，再用狗尾草覆盖，上面撒盐。鹿为了吃盐踏上狗尾草，就落入陷阱被枪刺死。

做好猎人的工作，就能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也能侦察敌情。

我们将小分队再分为好几个小组，派往各地执行任务。池甲龙和金凤禄被派到安图县王八脖子去了。他们的任务是一面搞地方工作，一面搞粮食工作。

被派到各地去活动的小组负责人，按照司令部的命令每隔五天作一次工作汇报。然而，不知为什么，池甲龙他们小组却杳无音信。这是一件非常事故。需要派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去了解情况。正当司令部愁着无人前去的时候，柳京守小组回到了司令部。金益显和名叫徐宝仁的中国人属于这个小组。他们三个本来都是体魄健壮的人，可现在却瘦得皮包骨头。

他们断了粮，一直挨着饿，加上富尔河发洪水，又绕了加倍远的路；胃痉挛还不时发作，吃尽了种种苦头。经过大蒲柴河时又遇到装成农民的琉球移民武装集团的追击，好不容易甩掉他们才回来。

我听了有关琉球移民武装集团的报告，更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险狡猾。

柳京守和金益显说，那个武装集团有一百来人。起先，柳京守看到一伙农民在播种，就打算跟他们要一点粮食。于是，他们三人隐蔽在路边等待机会，这时有一个人来到了地头。他们就对他说，我们是抗日游击队员，托你办一件事，替我们买些粮食。可是，这个农民听不懂他们的话。说朝鲜话不通，说中国话也不通。他们以为他是哑巴，便用手势表达意思，他这才明白了。他点头答应了，就往地里走去，没走几步，突然哇啦哇啦大声喊了什么。这一下，在地里的一大帮人一哄而散，跑到石堆和草丛拿起枪，就向柳京守他们三个人射击，还嗷嗷喊着扑过来。他们还有两挺机枪。原来他们都是假扮农民的日寇武袭集团。

这的确是好危险的陷阱。

我们的同志跑了五里多路，才好不容易甩掉了那帮敌人。他们三人都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幸亏发现刚播种的土豆地，挖出一小盆土豆芽煮着吃。然后，将五十元作为买土豆钱包在油纸里面，系在一条木棍上，立在地头，好让主人来取。

当时，五十元能买一头牛，他们吃了一脸盆土豆芽竟付了五十元钱。

同用机枪武装起来的琉球移民集团遭遇的事，真实地说明了这个时期小分队活动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

敌人为了瓦解革命队伍，使用了种种手段和办法。

金益显尽管精疲力竭，但他一听说需要去了解池甲龙小组的情况，就自告奋勇地要求去执行这个任务。

第二天，我把金益显派到王八脖子去了。

金益显在了解池甲龙小组活动情况的过程中，发现小组负责人有失败主义情绪，根本不执行司令部交给的任务。池甲龙无所事事，每天从早到晚登上山顶，望着村子发呆。

金凤禄倒在草棚里起不来，他说，断了粮，饿了四天，没有完成任务，又没有力气，无法把情况报告司令部。

池甲龙回到草棚来了，金益显就对他说，到这里执行任务快有十天了，还不向司令部报告情况，就这么待着怎么行。今天晚上就去找猎人，着手工作吧。

池甲龙却说，现在敌人警戒森严，不好行动，要等待时机。金益显无论怎样说，池甲龙就是不听。

第二天大清早，池甲龙趁金益显和金凤禄洗脸去的机会，把他们的枪都收了起来，等他们回来后，说：

我跟随武装队伍快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我忍受了种种苦难，心里想，终有一天会苦尽甘来，朝鲜会独立，可是今天，这个宿愿成了泡影。你们也知道，苏日两国签订了中立条约。我一直相信苏联和日本之间有长期形成的敌对矛盾，不久定会发生苏日战争。这场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同苏联军队联合起来击溃日军，解放祖国。然而现在，连这个也没有指望了。我再不能干这种毫无希望的事了。再则，疾病缠身，没办法了。我要回家。

金益显就问他这是真心话吗？

池甲龙回答说，当然是真的。这是我苦苦地想了好几天才决定的。

你们愿意走就一同走吧。

金凤禄气得掉着泪斥责道，要走就你一个人走吧。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司令官同志的身边。革命的前途暗淡就背叛司令官同志，你有良心吗？池甲龙说，信不信由你们，我离开部队，决不会像林水山那样做可耻的事情。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活得像个人样。

金益显呵斥道：尽管革命前途暗淡，但我们绝不能背叛司令官同志，跟上你走。革命顺利时你跟着司令官走，革命艰难时你就背叛，这哪是做人的道理呢！你说无论到哪里去都活得像个人样，你下山去看看吧，不管你多么愿意活得像个人样，但办不到！你放下枪，就变成不如一块碎石的可怜虫。难道你不知道林水山、崔容斌和金白山的下场吗？千万不要投到敌人那边去。最后，金益显要求他还给他们的枪。

池甲龙说：决心已定了，我要安全下山，不能把枪还给你们。我把枪挂在离草棚不远的桥底下，你们来取吧。

他离开草棚以后，金凤禄到桥下取来了他们的两支枪。

池甲龙逃走以后，金益显和金凤禄前往联络地点。他们因为一连几天粒米不进，路上又遭遇敌人，未能在预定时间到达联络地点，所以，没有见到我们派去的联络员。我们游击队有规定：派出小分队做地方工作时，指挥部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另派联络员在原地与小分队取联系。

两个队员没有碰上联络员，但他们不离开联络地点，靠煮野草充饥，等待与司令部恢复联系。将野草放进脸盆，再放少许食盐煮熬，就泡出草汁。他们靠喝这种草汁度日。有一次，他们捡回几个

月前扔掉的牛骨头来煮汤，汤里漂浮着白米粒般的东西，一看不是白米，而是骨头里生的蛆。他们喝了这种汤，就晕倒了。

几天后，他们快要饿死了，从升过篝火的地方捡来一块炭，在剥皮的树干上写“池甲龙逃跑，金益显和金凤禄在此饿死”字样，肩挨肩躺在草丛里。如果我们没有派全文燮去联络地点，他们两个就肯定死在那里了。

全文燮看到他们写的字样，就跑遍整座山，焦急地喊他们的名字。

可是，他们没有力气，无法回答。全文燮好不容易才听到微弱的呻吟，这才找到了他们。

全文燮千辛万苦带他们回到了司令部，最后，连他自己也精疲力竭，迈不开步子，可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终于把他们带到了司令部。

他们吃了一点米汤，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这就是王八脖子事件。

这个事件，给了我们以深刻的教训。

这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必须加强思想教育，以使指战员克服事大主义，相信自己的力量。

池甲龙的逃跑，一方面是因为他丧失了革命胜利的信心，一方面是由于事大主义作祟。这是什么样的事大主义呢？是对苏联的事大主义。有些指挥员给队员们灌输对苏联的幻想，说，苏联和日本有矛盾，因此早晚会打起来，而且日本将会被打败。这样的教育导致了逃跑事件的发生。

在我们部分队员当中存在着对苏联的事大主义，这是事实。在强国周边必然会有妄图追随它或把它偶像化的人。他们看到斯大林和松冈会晤的照片，就以为革命没有前途了，甚至想到了逃跑。

我们为了防止再度发生这类逃跑事件，提出了“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完成朝鲜革命”的口号，积极地开展了克服事大主义的斗争。

我们从王八脖子事件得到的又一个严重教训是，革命者的生命在于信念，信念破灭，革命者的生命就会完结。

池甲龙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丧失了革命必胜的信念；金益显和金凤禄之所以坚持回到司令部，是因为他们对革命抱着必胜的信念，就是用草汁充饥，甚至躺在草丛中等着饿死的时刻，也没有放弃革命必胜的信念。

信念是革命者的生命。

革命必胜的信念是怎样产生的呢？这种信念来自相信自己的力量。

革命者只有信赖自己的领袖，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集体的力量，相信本国人民的力量，相信自己党的力量，才能有坚定的信念。

凡是参加革命的人都有一定的信念。问题是能不能坚持这个信念，这就要看磨练程度了。没有经过艰苦磨练的信念，就经不住考验，容易变质。磨练信念的手段就是过好组织思想生活，在革命实践中加强政治思想锻炼。

有些人认为参加革命时间长，信念就自然坚定。其实，信念坚定与否并不取决于参加革命的时间长短。即使参加革命早，如果不认真加强自我修养，在信念上也会成为弱者；即使参加革命晚，只要认真加强自我修养，也能成为信念的强者。

就革命资历来说，池甲龙可以说是金益显和金凤禄的长辈。他参加游击队有十来年。而金益显参加人民革命军才有四年，金凤禄则只有两年，无异于新队员。

可是，变节的是谁呢？是游击队经历长的池甲龙，坚守革命节操的却是金益显和金凤禄。这说明即使是革命资历深或斗争功劳多的人，如果信念薄弱，也会蜕化变质。

池甲龙在建军初期参加游击队，立过功，还提升为连长。可是，遇到严酷考验，就动摇起来了。起初，他说肚子不舒服，工作不出力。考虑到他身体不大好，我们给了他特殊的照顾，女队员们还给他做了腹带。可是，他却经不住考验，终于逃跑了。

具有信念的时候，他仗也打得好；失去了信念，他就变成了逃兵，连情义都抛弃了。

林水山也并不是因为革命资历浅而叛变的。就革命资历而言，他可以说是老资格。1933年在八道沟当工人的朴成哲，去藏财村参加游击队的时候，林水山已经是延吉游击队第二连的政治指导员了。他大声呵斥朴成哲，说，没有组织的介绍不收，快回去。

林水山参加游击队以前念过中学，还当过教师。他七尺之躯，比金一还要高。他仪表堂堂，见多识广，善于辞令，所以，战友们对他有好感。

然而，日久天长，他原形毕露，引起了队员的议论，都说，林水山话倒说得很漂亮，但作战却胆小如鼠。

1938年春，我们一个月打了两次六道沟战斗。为什么呢？

头一次战斗是由林水山指挥的，他把能打赢的仗打输了。

六道沟是拥有一千多户的大镇。林水山听说镇里没有多少敌人，立即率领团队进攻。可是，打进镇里，却遇到了大股敌人。原来，我军侦察组撤离以后，镇里又来了新的部队。

当我军部队打进镇里时，敌人正在摆宴大吃大喝，警戒松懈。所以，完全能够消灭他们。可是，林水山知道敌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就吓破了胆，命令部队撤退。这就使我军从主动转入了被动。

队员们惶惑不解地停止了战斗，敌人趁机收拾混乱，转入反攻，用机枪射击我军。这样，我军部队毫无收获地撤出了六道沟。

这次战斗以后，敌人气焰嚣张，大吹大擂，说他们击退了游击队的进攻。人民群众听到敌人的宣传，灰心丧气。由于林水山的错误，头一次六道沟战斗使人民革命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影响。

正因为这样，我再次组织了六道沟战斗。我率领部队打进六道沟，一举拿下了这座城镇。从此，敌人再也不敢嚣张了。

我们召开指挥员会议，对林水山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从思想上看，是胆怯使他犯了这种错误。

林水山受到了批评，仍不想悔改。在艰难的行军时，他不执

行司令部交给的任务，蹲在后方密营过安逸的生活。在北大顶子会议上，因他仍不改正错误，我们再次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有的同志还建议撤消他的参谋长职务。

但是，我再一次给了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谁料林水山居然以叛变革命回报了我们对他的信任。武装斗争的长期性使他感到厌倦，加上“野副讨伐队”大规模的出现，使他惶惶不可终日，趁在东牌子密营执行单独任务的机会，他叛变投敌了。他不是一个人投敌，而是勾通敌人，事先让“讨伐队”在密营周围打埋伏，逮走了我们许多战友。这一时期有许多同志被捕，都是因为他做了叛徒。

后来，这个姓林的居然妄想抓我，带着“讨伐队”来攻击司令部。

仔细回想起来，我似乎不记得他在战场上放过几枪。他每次总是借口搞政治工作，跑到敌人的子弹打不到的地方去隐蔽。

林水山投敌以后，敌人像活捉了老虎似的十分嚣张，说什么金日成游击队的第几把手带领大批部下向大日本帝国投降了。

坦率地说，林水山的投敌，使我们的队伍受到了一定的震动。我们的指战员心情沉重，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实际上，由于林水山的叛变，我军受到了不少损失。

但是，我没有吃惊，也没有灰心。

林水山是一个堕落分子。所谓堕落分子，是思想上蜕化变质的人。

这种人留在队伍里，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危害。

在革命斗争中出现叛徒，这是不管在哪个年代都能看到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不仅有斯大林、周恩来、台尔曼、切·格瓦拉那样忠实的革命家，而且也有背叛自己领袖和领袖事业的叛徒。

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崇拜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他们成了遗臭万年的叛徒。他们不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也背叛了自己的导师和前辈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曾经居于苏联共产党要职的托洛茨基，后来也成了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张国焘背叛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向蒋介石投降。叛徒的下场都是可耻的。难道因为这种人背叛了革命，革命就受挫后退了吗？每当叛徒被清除，革命就获得新的活力，掀起了新的高潮。清除托洛茨基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展得快。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他，斯大林会把一切事情办糟，苏联就会垮台。但是苏联人民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张国焘背叛了中国共产党，做了国民党的食客以后，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倒退，反而不断高涨，最终取得了全国性胜利。

尽管林水山投降，出卖司令部的机密，带着“讨伐队”猖獗地攻击我们人民革命军，使我们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我们人民革命军没有削弱，更没有崩溃。他叛变以后，我们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我国革命保持自己的纯洁性，朝着最后胜利不断地阔步前进。

战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也出现过叛徒。崔昌益、尹公钦和李弼圭等宗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妄图在我国人民前进道

路上设置障碍。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宗派阴谋不能得逞时，就选择了背叛党和祖国的道路。他们被清除以后，我国革命就掀起了新的高潮，迎来了千里马时代。从此，世界人民称颂我国为千里马朝鲜。

在民族运动队伍中也出现过叛徒。

崔南善就是其中之一。举世皆知，三一人民起义时，崔南善参与了，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我曾阅读过他写的白头山纪行，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精神。

可是,以爱国志士著称的他却摈弃良心和信念，做了叛徒。抗日武装斗争经受着最严重考验的40年代初，他居然写出针对我的劝降书，用飞机到处散发。

崔南善和其他亲日分子共同起草的劝降书有这么一段话：“你们风餐露宿，漂泊在荒山野谷，实在令人怜悯。诸君为无谓的盲目信念而在密林原始邦中受苦，享受不到现代文明，将宝贵的生命弃之如草芥，岂不可怜！与可憎的命运诀别的时刻到了！要么生存，要么死亡……

“呜呼，诸君！

“要决然走更生之路！自觉有愧，理当忏悔。要尽快悔过自新，弃暗投明，摆脱极不安定的生活，回到同胞温暖的怀抱里来，为建设新东亚的神圣事业，奉献诸君的武勇和锐气！为时尚不晚……

东南地区特别工作后援会本部

顾问崔南善……

总务朴锡胤……”

［杂志《三千里》，昭和16年(1941)第一期第206～209页］

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里曾有过一个五十开外的医生，绰号“忠清道大夫”，本名柳汉钟。他在我们部队一连几个月随同我们到各地去治疗伤员。他是忠诚老实的人。

柳汉钟的医疗器械只有几根金针和一把手术刀，可他什么外伤都能治好。他是妙手回春的神医，治疗伤病员他又那样的诚心诚意，所以，队员们都喜欢他，尊敬他。我也尊敬他，爱护他。他常常露宿，我特意给他弄来了一张熊皮。每当打一场城市攻坚战时，我就指示队员们多缴获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给柳汉钟。

1940年1月初，我们考虑到柳汉钟身体不好，让他下山回家。他这么大的年纪跟随游击队，很不容易，没有高度觉悟是做不到的。

然而，过了三个月他又找我们来了。

他含着眼泪对我说：

“这几个月，我吃着老伴做的饭，过着安闲的日子。可是，吃得不舒服，老觉得咽不下去。蹲在家里苟且偷安，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啊！不具有纯洁无瑕的良心，是绝不能达到这样崇高的思想境界的。

可是，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不可能继续跟随游击队。我忘不了当时苦口婆心地相劝，说服他回家的往事。

柳汉钟依依难舍地下山回家了。

解放初期，他领着自己的女儿来找我。和他共享重逢喜悦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流着泪激动地说，见到

了健康的将军，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我对他说，打败了日寇，现在建国大业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一起为建国事业做出贡献吧。

后来，柳汉钟在平壤做革命者后援会工作，还任平壤学院的军医。

他的女儿当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秘书室打字员。他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人民军，战时都壮烈地牺牲了。

同崔南善、林水山和池甲龙相比，柳汉钟的为人是多么高尚啊。两者截然相反，林水山失去信念，准备开小差时，柳汉钟却参加游击队；当崔南善在满洲山野和白头山一带到处散布劝降书时，柳汉钟却怀念“密林的原始邦”和游击队“不安定的生活”，主动要求归队。

柳汉钟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医生，但他的人格是崔南善、林水山和池甲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他是一个心地纯洁诚实的人。他的人格之所以高尚，是因为他具有高洁的良心。

据我的经验，容易背叛革命的人都是那些没有信念，随波逐流的人，爱闹情绪的人，贪图名利地位的人，意志薄弱的人以及一些投机分子和冒牌革命者。

消极怠工的人，工作不认真负责的人，交给艰巨的任务就愁眉苦脸地提出种种条件的人，在人前满口是漂亮的革命辞藻，在人后只顾中饱私囊的人，毫无顾忌地把别人的功劳窃为已有的人，爱吹牛说谎的人，一有机会也会摈弃红旗投降敌人。

这种人，不管十个还是百个，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丧尽天良。

一个革命者丧失良心，还能有什么呢？一无所有。信念、思想和道德情义也都随之化为乌有。丢掉良心，人格也随之丧失。

要做革命者，首先就要做人。这意味着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恪守道德情义的人。人只有具有良心，才能遵守道德，恪守情义。丢弃良心的人不可能具有道德、情义、忘我精神、正义感和诚实性。金正日同志说，对领袖的忠诚必须信念化、良心化、道德化、生活化。这是名言。

只有永葆良心的人才能成为革命者；良心被玷污，信念也随之被抛弃；良心出现裂痕，信念也随之出现裂痕，丧失斗志。

正因为这样，革命者一旦昧了良心，就不再是革命者，变成毫无作为的人。

我们与昧着良心的人是不能走同一条道路，不能同吃一锅饭的。这种人从摈弃良心的瞬间起就同床异梦，阳奉阴违。与这种人只能一刀两断，否则，必将大祸临头。

池甲龙也是从良心出毛病开始丧失革命者面貌的。

在进行六棵松战斗时，我在池甲龙的行动中发现了他昧良心的行径。

六棵松战斗的主攻目标是敌人的兵营，由七团和黄正海分队承担攻击它的任务。战斗一开始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枪声，过了几分钟，枪声突然停了。这意味着我军占领了敌人兵营。可是，过一会儿，重又响起了机枪声。我觉得诧异，马上派池甲龙去了解情况。可他在中途跑回来说他受了伤，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察看了一下，他的匣枪木盒被子弹击中破裂，而身体没有受伤。可能

是因匣枪木盒击中时的冲击而倒下去，受了一点碰伤。

我知道他是吓坏了，便另派池凤孙和金鹤松去了解情况。

池凤孙和金鹤松冒着枪林弹雨跑到战场了解情况后回来说，敌残兵在秘密地下隧道负隅顽抗。我马上下达命令：我军部队撤出敌兵营，用火攻战术压制地下隧道。

可是，我的命令传达到战场以前，吴仲洽已牺牲了。原来，吴仲洽自己下决心，施用火攻，但他没有撤出部队，急于进行搜索，招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如果池甲龙不折回来，而及时去了解情况，那么，我的命令就会及时传达到吴仲洽那里去，也不会发生那种不幸事情。在战斗中，情况瞬息万变，处理问题是刻不容缓的。由于池甲龙没有执行任务，而由金鹤松和池凤孙替他执行，延误了时间，致使吴仲洽中了隐蔽在地下隧道的残敌乱射的枪弹牺牲了。

池甲龙早在那时就已经丧失了作为战斗员的良心。如果是别的队员，就是受了重伤，也绝不会折回来的。

昧了良心的人既不负责任又胆怯，给革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啊。

昧良心背叛革命的人的下场，任何时候都是可悲的。历史对这种叛徒是严惩不贷的。那些罪行较轻从宽处理的人，也都不敢抬起头来望青天，直到死亡。

对那些奋斗到革命胜利的一天，永葆革命良心和信念的坚贞不屈的战士，人民向他们献花，给他们戴上了桂冠。

当年在八道沟当矿工的朴成哲，前来游击区要求参加游击队

时，林水山以没有组织的介绍为由，让他吃了闭门羹。可朴成哲最终参加了游击队，他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坚持革命斗争，凯旋祖国，如今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矢志不渝地坚持革命工作。

有一年，在行军途中，指挥员批准朴成哲回家探亲。那时，部队正路过他的家乡，使他更加想念离别多年的父母妻子。

可是，他一回到家就碰到了为难的事。他的妻子一见到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背起孩子要跟他去参加游击队。他怒斥说，你疯啦？带着孩子怎么去参加游击队？这不行！可是他的妻子却紧紧抓住他的腰带，说什么也不放。

他知道好言相劝是不能奏效的，可是如果甩开她跑掉，她就会哭闹。她一哭闹，全村人都会知道，也会让敌人知道这一家是游击队员的家庭，那么全家上下就会遇难。正当朴成哲不知所措，左右为难的时候，他母亲劝导儿媳妇说，你这样，就会让孩子他爸遭殃。如果他不按时回到部队，就会成为逃兵。这意味着做逆贼。难道你愿意这样？妻子无话可答，只是流泪，可是仍然紧紧抓住他的腰带不肯放。

母亲瞅了一阵，厉声呵斥儿子说，一个男子汉胸怀壮志出了门，就不该惦记家事，干吗半夜里回来闹出这个乱子？往后别再回来！要是祖国独立以前你再回来，我要打断你的腿！

妻子这才放开了他的腰带。

朴成哲听了母亲的话，很受感动，马上离开家回到了部队。

从文化程度来看，朴成哲的母亲和妻子是比不上林水山的。但是，从对革命的观点和立场来看，她们是林水山无可比拟的老

师。朴成哲的妻子要带着孩子参加游击队，这个愿望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的母亲严斥他祖国独立以前再回家来就要打断他的腿，这个心意又是多么的圣洁、崇高啊！

金益显被授予朝鲜人民军次帅军衔的那天，我不由得回想起了他年幼时到地阳溪台地来央求参加游击队的往事，想起了他断然驳斥池甲龙的诱降，在返回司令部途中快要饿死时，用木炭在剥了皮的树干上写下几个字，躺在草丛中等死的往事。

金益显由于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才得以生存下来，成了为后世所知晓的人物。

金益显是优秀的队员，千辛万苦背着金益显和金凤禄回到司令部来的全文爕又是多么刚毅、多么重情义的革命战士啊。背着两个奄奄一息的战友回到司令部时，他变成了泪人。他是不忍心看两个战友的惨状才掉泪的。

如果他是信念薄弱、不重情义、没有良心的人，是会为了不再挨饿，撇开战友逃跑的。只要下了山，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走。既没有铁丝网，也没有围墙和监视所，没有什么阻拦他的。只要扔掉枪下山，在转向书上画个押，就能吃得饱，也能在暖烘烘的炕头舒舒服服地睡大觉。

但是，全文爕没有走这条路，他轮流背着两个战友回到了司令部。

他后来也矢志不渝地跟随我们，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

你们要培养大量像抗日老战士那样对革命忠贞不渝的信念的强者。只凭主观愿望是不能推动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只有具

有坚定革命信念的人，才能保护自己，也才能捍卫社会主义。

具有饿一百天也能坚持下去这种信念的人；为一日之光荣甘心忍受千日之苦的人，即使身处大海孤岛有可能变做一抔泥土也深信革命组织一定会记住自己的人，为了恪守对培养自己的领导者和同志们的情义，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也不怕上绞首架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胜利者。

国家越困难，越要加强革命必定胜利、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取得成功的信念教育。我尊敬和喜欢信念坚强的人。

六　组建国际联军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他伟大一生的最后时刻，对我国革命历史中很少提到过的40年代前期在苏联境内的活动，作了意义深远的回忆。

金日成同志在回忆中阐明了国际联军的组建及其活动历史，因此，这段回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20世纪40年代，抗日革命斗争进入了开创光复祖国决定性局面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从1942年夏在苏联境内跟中国、苏联共同组建国际联军，为最终消灭日寇而进行政治军事上的准备。

朝鲜人民革命军同苏联、中国一起组建国际联军，开展共同斗争，意味着朝鲜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我国革命的任务，是击溃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由于国际联军的组建，我们不仅要完成祖国的解放事业，同时还要完成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任务。

国际联军的组建，使我国的武装斗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从同中国人民的共同斗争的阶段发展到朝、中、苏三国武装力量联合斗争的阶段，也就是说汇聚到世界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巨流之中。

在20世纪40年代的前期，朝鲜人民革命军为了进行决定性的

最后作战，在有利的地方整顿队伍，保存并培育骨干力量，为主动迎接祖国解放做准备。

1942年7月，我们同苏联、中国一道组建国际联军，千方百计地加强朝鲜革命的主体力量，同时与国际反帝力量共同斗争，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正因为如此，苏联的有关外交、军事文献称：我们从1942年夏起在苏联进行了共同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准备。

金日成同志就朝鲜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共同组成国际联军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发展过程，作了如下的回忆：

我们把远东作为临时基地，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国内积极开展小分队活动的时期，是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

苏联和日本之间存在着从俄日战争以来的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引发苏日新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双方都极力推行避免冲突的政治军事外交。

德国和日本，是苏联高度警惕的穷凶极恶的好战国家。苏联为了防止作为反共突击队出现的希特勒德国的入侵，从各方面做出了努力。并且为避免同德国发生战争，至少要拖延战争爆发时间，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谋求同日本的和平，以防止它的入侵。苏日中立条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

苏日签订这一条约的目的在于互相牵制对方。这个条约的签

订并不能保证苏日之间不发生战争。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了。

我召集小分队成员强调说，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的德国开始了对苏联的进攻，这是不足为奇的。希特勒不能不这样做。当面握手言欢，掉过头就攻其不备，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但是希特勒打错了算盘，它侵略苏联，等于自掘坟墓。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不要东张西望，要按照已制定的方针认真进行最后决战准备。

由于法西斯德国的突然袭击，苏联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在不利的形势下不得不暂时撤退。德军接连攻克基辅、哈尔科夫、明斯克后，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发。

我审查了我们针对苏德战争爆发的新局势制定的活动方案后，到哈巴罗夫斯克同苏联、中国的军事干部就今后进一步加强三国合作问题进行了磋商。

1941年12月，日军突然偷袭美国的夏威夷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我对美日开战非常高兴，因为日本是霸占我国的敌人。

日本在尚未结束侵华战争的情况下又挑起了新的战争，是穷兵黩武。不搜刮别国的石油、橡胶、钢铁等战略物资就活不下去的岛国日本，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真是不可思议。

日美战争必将使日本的国力丧失殆尽，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讳言，日本自动落入太平洋战争这个大陷阱，无异给我们朝鲜革命者提供了一个提前进行最后决战的良好机会。

我们估计，苏日迟早会打起来。一旦苏日战争爆发，日本就将以中国、美国和苏联为对象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以驻满洲关东军和驻朝日军为打击对象，进行解放祖国的最后作战。

怎样才能尽快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早日解放祖国呢？这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要夺取最后胜利，就必须加强我们的主体力量。不能等待人家恩赐独立。友邦的支援固然重要，但也只有自己的力量强大，才能在战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是不行的。

为了加强同国际反帝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我们也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当时，苏联的远东成了朝、苏、中三国抗日力量的汇合点。采用何种形式建立朝鲜人民革命军同苏中两国武装力量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同东北抗日联军战友需要频繁地出入远东临时基地。因此协调好同苏中两国武装力量的关系，创造有利于巩固和壮大我国革命主体的国际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

然而，我们用何种形式实现与苏中两国武装力量的联合，这是应由我们自己根据每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三国革命的共同利益决定的问题。

我们已有既保持朝鲜人民革命军的独立性，又同中国的武装力量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开展共同斗争的经验。朝中武装力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进行共同斗争，不仅符合两国的革命利益，而且符合抗日革命的客观要求。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斗争，是建立双边军事关系的典范。

朝中两国武装力量在苏联远东还有一个基地，并且我们的侧翼是苏联远东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共同抗日的广度和深度，并把它发展到更高阶段。这不仅是朝鲜革命本身的需要，也是中国和苏联对日战略的需要。

我认为，朝、中、苏三国武装力量最理想的合作形式，是组建国际联军。我的组建国际联军的这一构想，金策、崔庸健、安吉、姜健等同志都表示支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构想实现得越快越好，并委托我去同苏联、中国进行协商。

共产国际和苏联曾建议：由满洲的抗日武装部队和苏联远东军的部分力量组建一个新的军事集团，开展共同斗争。不少中国同志对此持不同意见，说为时过早。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同苏方的一些人提出单方面的要求有关。

当组建国际联军的构想酝酿成熟，并提交会议讨论时，他们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一致认为三国武装力量的联合是适时的。

苏联也支持这个构想。

我就组建国际联军问题同苏联方面进行更具体的协商，是1942年春在南野营会晤苏联高级军事将领的时候。

那天，代表共产国际与苏联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是索罗金将领，他对莫斯科防御战的英雄和在莫斯科反击战中立下了战功的西伯利亚师，作了生动的介绍，对苏联远东军的经历也进行了炫耀。他为有远东军和参加莫斯科防御战的西伯利亚师感到极大的自豪。

我一提出组建国际联军的构想，索罗金将领就表示同感说：

这个想法很好，组建国际联军，是适应目前形势的最佳方案。他还坦率地说，他也曾想到过这个方案，认为这是迟早必须实现的，但是他顾虑能否得到朝鲜同志和中国同志的理解与支持，会不会被误解为大国主义表现，因此犹豫着未提。

我听了他的话，觉得其中有潜台词，于是对他说，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独立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但这并不排除国际合作，为什么反对既有利于本国革命又有利于世界革命的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国际革命力量的联合呢。要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强敌，就必须把力量联合起来。即使像苏联这样的大国，如果必要也应当接受别国的支援。

得到国际援助，或者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不是事大主义。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光想依靠别人，或者放弃本国革命，只去帮助别国，以为这样才是国际主义的，这种思想才是错误的，才是事大主义。

索罗金将领把同我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向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作了转达，继之，组建国际联军问题就作为紧急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如果在苏德战争结束之前美日战争还不能结束，形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对此一致认为，苏联会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尽管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但是它意识到，必须切实做好参加对日作战的准备以免猝不及防。实现国际抗日力量的联合，是苏联对日作战准备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治军事的需要同我们的战略构想一

致，所以组建国际联军的问题比较顺利地取得了进展。

1942年7月中旬，我们同苏联和中国最后一次讨论了武装力量联合问题，决定在保留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独立性的前提下建立国际联军。

1942年7月22日，我同周保中、张寿篯一起会见了苏联远东军司令、大将阿巴那森科。他圆脸，目光炯炯，体魄健壮，五十多岁，是位老练的将领。他握着我的手说，见到朝鲜年轻的游击队长，感到很高兴。

我们在司令员办公室与参谋长尼切夫中将相逢，互相问好。

阿巴那森科说，由苏联、中国和朝鲜的革命武装力量组建国际联军，不仅对朝鲜和中国的革命斗争有利，而且对苏联的安全与对日作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还表示确信，国际联军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他说，组建国际联军，对培养大量朝鲜和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所需的军事干部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国际联军中的朝中部队将成为解放朝鲜和满洲的主要力量。

那天，阿巴那森科一再强调说，要提高训练强度与质量，做好一切准备，以便随时参战。

他带我们到了一个挂着大作战地图的房间。

他对我们说，他很想了解过去朝鲜人民革命军与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情况和将来的作战思路，同时还要求说明满洲与朝鲜的军事政治形势。

周保中走近地图，概括地说明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活

动情况，还发表了对将来东北解放作战的看法。

当时，我着重讲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活动情况及其现状，还讲了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朝鲜方面必须注意的军事政治问题。

阿巴那森科要求我们对日军在朝鲜的武力部署、朝鲜反日力量现状及前景展望、同苏联联合作战的可行性等问题作详细的说明。

我对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具体回答。

对第三路军的现状，由张寿篯作了说明。

阿巴那森科对北满的军事形势比较熟悉。

同阿巴那森科商定，国际联军的军事装备和被服、粮食等后勤供应，由苏方予以保障。同时决定，将国际联军编为苏联远东军独立88旅，对外番号为8461步兵特种旅。

为了确保国际联军存在与活动的秘密，决定尽量缩简编制，建成旅的规模，并搞好伪装。

我负责指挥以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组成的第一支队。从人员构成上看，第一支队实际上是国际联军的朝鲜支队。

当时，为了保护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免受敌特暗害，我们将军阶定得很低，仅具象征性。

在组建国际联军时，我们都聚集在北野营。

由于国际联军的组建，使远东的军事政治局势变得有利于国际革命。

首先，苏联沾了不少光。它拥有了足以对付日本侵略的军事政治力量，拥有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作战的新的特殊部队。

国际联军的组建，还为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与环境。

由于同苏联远东军一起进行活动，朝鲜人民革命军获得了祖国解放作战所需的现代化军事技术与装备，并且在大变革到来之前做好了用自己的力量完成祖国解放任务的军事政治准备，培养了实力。

国际联军建成之后，我在国际联军总部再次会见了阿巴那森科。当时他带领军事委员和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干部来到了北野营。

那天，国际联军举行了列队行进。站在列队行进队伍最前头的是朝鲜支队。朝鲜支队的列队行进搞得不错。那天的活动，可以说是宣告国际联军诞生的庆祝仪式。

我们还同阿巴那森科一起共进午餐。

就在这一天，阿巴那森科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他是一位老战士。十月革命后，他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跟白党打过仗，也跟德国侵略军打过仗。早在国内战争时期，他就指挥骑兵师，任中亚军管区司令，后来又调任远东军司令。

苏联政府一直十分重视远东军。历届远东军司令都是有名的实干家，历届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将领中，出自远东军的人居多。

1943年初，阿巴那森科调任苏德战争最重要的战线之一沃罗

涅什战线副司令，当年夏天阵亡。国际联军的全体指战员获悉后，聚集在一起，以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支持并帮助朝中共产主义运动的将领。

共产主义者的战友之爱，是不分国籍的。

那时，我们把苏联人民所遭受的国难看作是自己的国难。苏军在前线作战遇到困难时，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许多指战员报名要求去参战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每当遇到这类事情，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总是阻止，不让参战，说你们肩负着解放自己祖国的重大历史任务。

我们就是这样热情拥护和珍视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因为，如果苏联一旦沦亡，社会主义也就要沦亡，世界和平也就无法维护，这就是当时共产主义者的共同观点。

有许多国家的人名词典中说我率领以朝鲜人组建的大部队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在这一战役中立功，荣获了赤旗勋章。还有的文章说，我作为第一线部队指挥员参加了攻克柏林的战斗。

我是得了苏联政府授予的赤旗勋章，但没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攻克柏林的战斗。不知这些词典是从哪里搞到这些资料的。但不管怎样，它却反映了当时参战情绪沸腾的训练基地的氛围。

国际联军的组建，使慑于朝、中、苏三国武装力量联合的日本帝国主义皇皇不可终日，这反而给了我国人民以极大的信心。

金日成同志在苏联训练基地进行了对日最后作战的准备。

反映这一情况的敌方资料数不胜数。下面只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关于金日成东征之案

“驻苏的金日成……于去年夏，由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前往延安，同中共要人毛泽东、贺龙、康生等会晤，就日苏开战前后同中国共军与抗日联军的合作以及抗日联军今后的活动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同延安附近的朝鲜共产党人交换了意见。

“金日成……于去年年底，从那里乘飞机回苏联。目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致力于对满鲜的谍报及思想工作。金日成还在哈巴罗夫斯克野营学校，招收朝鲜、中国共匪及其他旅苏鲜满人不法分子、被绑架者等约三百名在哈巴罗夫斯克红军指导下进行培训，以便日苏开战前后开进满洲，执行扰乱日军后方的任务。”[南阳警察署长呈报咸镜北道警察部长的警察材料，昭和19年(1944年)2月21日]“现在金日成驻在延安，向热河省调集军队。尼古拉耶夫斯克(滨海省)有以朝鲜人组建的四个师，准备在日苏开战时，作为决死队在北朝鲜登陆，或者空投朝鲜境内。”[“以城大学生为中心的大东亚战争后方扰乱及武装起义不法活动案件（4）”高原警察署，昭和20年(1945年)]

“某人取道西伯利亚返回，他发表讲话说，他看到西伯利亚某地方圆十多里内，挂着朝鲜旗，有朝鲜军队站岗守卫。”[《特高月报》内务省警保局，昭和19年(1944年)2月号，第79页]

组建国际联军的消息传到中国东北地区，对那里的反日爱国力量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东北抗日联军三五成群地渡江来同国际联军汇合的情形，是屡见不鲜的。有的伪满军士兵起义投奔联军。

记得组建国际联军前后，驻在饶河县东安镇的伪满军某团的一个连队，处决了他们的指挥员和日本军官，携带着许多步枪、机枪、掷弹筒等，乘木船渡过了乌苏里江。我们热烈欢迎他们，把他们编进了部队。

国际联军组建后，我们加强了战斗政治训练，同时加速了对日作战准备。

当时，我们的最重要任务，是从政治军事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朝鲜人民革命军。

无论是古代战争，中世纪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军事作战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不断发展的作战手段，如何组织不同军兵种之间的协作和配合。

我们为了掌握现代战法做了不懈的努力，尤其组建国际联军之后，更是加倍的努力。通过训练与学习，朝鲜人民革命军运用现代战法的能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朝鲜人民革命军一面进一步完善在白头山苦练出的游击战法，一面熟悉现代战法，从而很好地具备了作为朝鲜革命主力军的政治军事素质。

为了尽快增强国际联军的作战能力，苏联远东军也做了积极的努力。

1942年11月中旬，阿巴那森科组织苏联远东军南部驻军一个旅的综合军事演习，邀请国际联军的主要指挥员前往观看。

那天，我们乘装甲列车从哈巴罗夫斯克到了那个旅的驻地，第二天观看综合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四个步兵营和坦克、大炮、

迫击炮、通讯、反坦克炮营等。因为是第一次看这样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所以都抱着好奇心，全神贯注地观看。

演习的战斗任务是，消灭一座高地上的敌人，占领这座高地。中午12点开始，下午4点才结束。

其后，我们还观看了驻哈巴罗夫斯克郊区阿穆尔河岸的一个旅的军事演习。那天演习的任务是，把部队集结到别列佐夫卡村庄，进行战斗准备。这一演习，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观看了远东军的阅兵式。参加军事演习和阅兵式的各种现代化装备与战斗器材，我们看了很羡慕。何时我们也能有这样现代化的军队啊！这是我在观看军事演习和阅兵式时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解放祖国以后，要马上建设正规军的决心，在那时变得更加坚定了。

由于朝、苏、中三国军事指挥员的真诚合作，国际联军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适应现代战争的武装力量。

苏联在前线形势十分紧张，连一个团、一个营的兵力都很宝贵的情况下，也从未调动国际联军，而是让国际联军一心为跟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最后决战做好准备。

苏联的军事干部常常告诉我们，斯大林非常爱惜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斯大林说，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每个战士，都是将在解放自己祖国、建设新国家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独当一面的人，因此要爱惜他们，使他们免受任何损失。

国际联军的组建与发展，为在欧洲组建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的抗战力量，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943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同时在苏联组建了一支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它的目的是，同苏联红军一道参加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在解放基辅、别拉雅泽尔科夫等许多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波兰也在苏联组建了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军队。波兰集团军参加了解放卢布林等从德国法西斯魔爪中解放波兰领土的多次战斗。

1943年5月，我们在苏联境内组建国际联军开展活动时，听到了共产国际被解散的消息。训练基地的指战员对此议论纷纷。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为了消灭法西斯，国际的团结与合作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存在了二十多年的共产国际为什么在这时解散呢？

列宁组建共产国际是1919年。

我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世界革命期间，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与革命力量已发展壮大，没有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与干预也能依靠自己的路线与力量，独立地推进本国革命。二是它的存在，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更广泛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可能会成为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法西斯联合，是超越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新形势下的联合。实行这种联合的国家在同法西斯的较量中所表现出的超然立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美、英、法等国实现联合，对共产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右翼政客实行合作提供了可能性。鉴于这种情况，不能不考虑以反帝为理念，以实现

世界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共产国际的存在是否还有必要。

我们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当时形势发展要求的举措。

我们从来就不依靠别人的力量，也不实行别国的路线，而是在革命的每个阶段都由自己制定战略与策略，依靠自己建设革命力量，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为我们的这种斗争历史，感到极大的自豪。

但是，并不因为共产国际解散了，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国际团结与合作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

我们在国际联军内继续坚持独立性，同时继续加强同国际朋友的团结与合作。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把苏联境内作为舞台开展军事政治活动，引起了国际上的极大关注。日本军部、警察与特务机关为了侦探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动向、组织机构及活动内容进行了疯狂的阴谋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国际的解散特别敏感，因而对朝鲜共产主义者今后的运动方针，尤其是对金日成同志的活动，作了种种推断和猜测。

下面摘录日本帝国主义发表的《共产国际的解散与今后前景》中的一段：

“……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在这次战争中迫使日本溃败，从而获得民族解放与独立，是它当前的战略目标……在满洲的……金日成一派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朝鲜义勇军的活动，就是这一战略目标的体现……现在在朝鲜的运动，取决于日苏关系。随着日苏之间或者维持现状，或者发生冲突，局势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如果是后者，运动就会迅速恐怖化或战斗化。这一点，从德国所占

领的国家来看，也是很明显的。”［《思想汇报》续刊号，第131页，昭和18年(1943年)10月，高等法院刑事局思想部］

日本帝国主义无法否认，不管共产国际存在还是解散，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朝鲜人民的斗争具有独立性；金日成同志领导的武装斗争，一旦同国际反帝力量联合起来，就会变成巨大的力量。

朝鲜共产主义者为组建和发展国际联军而做出的努力，是在革命斗争中把每个国家的自主性、独立性同国际团结与合作这两项原则正确地予以结合的典范。

组建和发展国际联军所取得的成果与经验，不仅在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决战中，就是在战后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从主体的立场出发，维持和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等国际革命力量的联合方面，也是宝贵的财富。

七　和东北抗联战友们在一起

在国际联军时期，我同周保中、张寿钱、柴世荣、冯仲云等东北抗日联军的许多战友生活在一个队伍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的日日夜夜，虽已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但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中，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周保中。我同他的关系，是从30年代前半期在间岛地区同救国军做统战工作的时候开始建立的。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反日士兵委员会，也一起打过罗子沟战斗。在汪清的时候，我们两次远征北满，每次都会见周保中，同他的部队进行联合作战。到30年代后半期，我们的活动舞台迁到白头山地区和西间岛一带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周保中。

“路有千条，门只一扇”这是周保中每当和我分手时都要说的一句格言。意思是，活动舞台和斗争道路虽各不相同，但只要共同抗日，终能再度相会。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前夕，他见到我就大声笑着说：“瞧，金司令，我说什么来着？‘路有千条，门只一扇’对吧？”我们分别多年，这次不期邂逅，禁不住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自从杨司令牺牲以后，我一直担心南满同志们的安全。听说日本鬼子为了捉拿金司令，出了一笔惊人的赏金嘛。能闯过这

个险关，真不容易。东南满有多险恶，我很清楚。在哈巴罗夫斯克能见到你这样健康，真说不出有多高兴。我在这儿等你来，是望眼欲穿啊。”他真诚地说道。

他比过去衰老多了。在林海雪原，艰苦奋战，饱经风霜的痕迹，从他的脸上清晰可见。

我跟他打招呼说，你辛苦了。他回答说，我们受苦，那不算什么，不能跟你们南满同志受的苦相比。你们受那么大的苦，毫不屈服，还连连打胜仗，我们十分佩服。共产国际的干部和苏军指挥员也都赞叹不已。

我和周保中再度见面，是在共产国际正加紧准备召开东北抗联干部和苏联远东军代表会议的时候，所以，我和周保中交谈的话题，自然侧重于有关这次会议的问题。

周保中苦思冥想的问题，是应当如何把革命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革命斗争中的独立自主与国际团结结合起来。他渴望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但始终无法实现。他为之十分着急。他是中共党员，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推动东北革命向前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他始终想方设法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也努力同苏联取得联系。这是当时奋战在东北地区的中国同志普遍的想法。

共产国际和苏军统帅部曾经试图把东北抗日联军置于苏联的指挥之下。因此，周保中担心再度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那天，我和周保中经过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鉴于当前的

形势，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同苏联进行合作是迫切需要的，但是，合作的具体形式和方法问题，必须本着把各国革命的利益和国际革命的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解决，换句话说，必须本着保持东北抗日联军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独立自主的原则加以解决。

谈话结束时，周保中热情地对我说："我看，在这次协商中，南满代表的发言很重要。我完全相信金日成同志。在反日士兵委员会时代，也是金司令的发言每次都对我们的发言起了主导的作用。我希望我们同过去一样，今后也根据新形势的需要，继续携手共同前进。"

他对我的信任，是真诚的。

他拥护苏联，拥护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苏联人的言行和处事态度中只要有一点点大国主义的表现，他就怒不可遏，大发脾气。

我对他说，既要顽强地坚持原则立场，也要宽宏大度地待人，高度发扬同志式的合作精神，只要这样，就既可以使对方改变错误态度，也可以解决问题。

周保中点着头说："还是金司令老练有办法。"我对他说："不是我老练，是周司令缺乏一条经验。你没有像我们那样过过寄人篱下的经验嘛。"他又点着头说："对呀，在东满，为着那个'民生团'问题，朝鲜同志是经受了一场大苦难的。"

他在吉东活动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批评，说反'民生团'斗争进行得过左，东满特委的错误招致了这种恶果。从在间岛工作的时候起，他对朝鲜革命者进行的斗争所持的态度，就是比较公正

的。我们建立了祖国光复会以后，他就积极支持和帮助在他的东北抗联部队中建立祖国光复会支部的工作。那是1936年12月的事情，过去我已经讲过。

这都是周保中对朝鲜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支持和声援。

他对朝鲜革命持这样友好的态度，是和我们从游击斗争初期起就诚心诚意地支援他，同他进行多次联合作战，给了他积极的影响有关的。第一次远征北满的时候，从我们的远征队中调出半数以上的兵员支援了他，还同他们北满部队进行了联合作战。第二次远征北满的时候，第二军和第五军联合组成总指挥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当时，周保中任指挥，我任政治委员，平南洋(李荆璞)任副指挥。总指挥部下有六个部队，划分了活动区域。西部的安图部队，由周保中指挥，苇河部队归我指挥。各地区分别设了地区指挥部，如西线指挥部，中线指挥部等，下有几支部队。这些部队驰骋在自抚松至穆棱的广大地区，开展了联合作战。

如上所述，我和周保中的关系，是根深蒂固的。

也许是因为有这样的缘分，在国际联军时期，周保中也经常同我讨论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有事需要同苏联人讨论的时候，也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有一回我问他何必这样，他说从间岛在一起工作时起，就养成了征求我意见的习惯。

在国际联军时期，周保中不拘任何形式和军阶地位，始终把我尊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官、朝鲜革命的领导人、国际联军的朝方代表。

我们就像常见的某些机构的联合主席那样，一向互相支持、互相合作、共同工作。我和周保中的关系，足以真诚的互相尊重、互相信赖为基础的同志关系、兄弟关系。

我对他所以抱有好感，主要理由之一，是他比任何人都高度赞扬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人民为开拓和发展东北革命起了先驱作用的丰功伟绩。

他曾说过，他牢记着两件难忘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朝鲜人在抗日游击斗争中所起的先锋作用。

他对待朝鲜革命的立场观点是很明确的。他认为，朝鲜人为朝鲜革命奋斗是应当的；他一直强调说，东北的革命，离开朝鲜人的贡献是不能设想的。他说第二军既是东北抗日联军，同时又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极口赞扬共同斗争的历程中实现的朝中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

他在谈到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东北革命中起到的先锋作用时说，1932年建立的精悍有力的东满游击队、1933年建立的磐石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都是朝鲜同志、朝鲜的革命群众建立的，这些队伍壮大成了抗日联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军。第五军也有很多优秀的朝鲜同志。抗日联军各军的军长、政委以至排长、干事等各级军政干部都是朝鲜同志。

周保中在致王新林的信中，表达了他对金日成同志的尊敬和高度的赞扬。他在信中写道：

“金日成是最优秀的军事干部……是朝鲜同志中最优秀的干部。他在满洲南部、鸭绿江东部、朝鲜北部地区能够开展极为重要的工作。”(摘自周保中于1941年7月1日致王新林的信)

“现在，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唯一的重要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二同志牺牲后，唯有金日成仍负责南满游击队的领导和有关整个南满问题的事宜。”(摘自周保中于1941年9月15日致王新林的信)

周保中的另一个优点是，他坚持革命斗争的原则立场，他有崇高的精神，一贯积极维护本国的革命。对试图使中国革命服从于苏联革命或变为苏联革命的附庸的倾向，他是绝不容忍的。他主张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拥护苏联，加强同苏联革命的联系，同时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和独立发展。

周保中对待革命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有共同点。我主张，革命者的价值，是同他对革命所持的自主立场的坚定性成正比例的。自主立场越坚定，革命者的价值就越高；自主精神越彻底，革命就越能百战百胜。

周保中在国际联军时期也一如既往地称我为金司令。但是解放后来平壤同我会见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用过金司令这个称呼，一直用首相同志这个称呼，而他自己却让我仍像过去一样称呼他叫周司令。

他对我的称呼，我总觉得耳生，而且似乎在我们两人之间设置了不必要的距离，所以我要求他像以前一样叫我金司令。可是他说：“那可使不得。”

我们两个人，有时候也发生争论。他是个脾气倔强的人，他一说不，你再也说不动他。我也不示弱，不轻易作出让步。可是到了最后，我们俩的意见总能相辅相成，取得一致。日久天长，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就进一步加深了，友谊也更加深厚了。

我们有时候也随便聊天。他讲的多半是有关他的家属和同志的事情。他有个小女儿叫周伟，是他到了不惑之年才生的，自然爱如明珠，特别喜欢她。只要孩子多了一样逗人爱的本事，他就大加夸奖。每当这时候，他的脸上就浮现出一个父亲的幸福的微笑。他和他的夫人王一知长期在一个部队里共事，是在北满密林里结为夫妻的。周保中一谈起自己的夫人和孩子，眼睛就亮晶晶的，特别有神。

他喜欢聊天。有时讲驻地附近一个少数民族那乃人的生活风俗和自己对它的看法，讲他在哈巴罗夫斯克寄居的一家俄罗斯夫妇的故事。

他观察细腻，描述维妙维肖，饶有风趣。

有一回他还讲了他的家乡云南省一些地方的斗鸡节。每年一到农历二月初八，人们就身着节日的盛装，给自家的大公鸡脖颈上系一条红绸带，抱到斗鸡场上与别人家的公鸡斗。鸡是那个地方的人崇拜的对象。据传，他们的祖先是养鸡发家致富的，所以至今还流传着靠养鸡成家立业之说。周保中说，革命救国当然不能靠养鸡，但他愿意像公鸡一样勇敢地击败敌人。

周保中，外表上似乎寡言少语，冷酷呆板，实际上是个感情丰富，恪守情义的人。他待人开诚相见，有恩必报。这一点，在

他的后半生中有充分的表现。

周保中在国际联军的几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既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也为尽到国际主义的义务忠心耿耿地工作。

假如他是只顾自己而不顾国际革命的任务，或者只喊世界革命万岁而忽视了本国革命的人，那么他是不会成为值得我花费时间深情回忆的人物的。

我看着他不断地派小分队到中国东北去保证游击斗争前赴后继，衍续不断地蓬勃开展，由衷地赞佩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看着他为国际联军各民族部队之间的友谊团结和维护苏联而不辞劳苦，辛勤努力，赞许他是忠实的国际主义战士。

在国际联军，他的部队管理和生活安排也搞得很好。国际联军是多民族的集体，生活中常常发生种种难以预料的问题，从训练计划的制定、训练指导、干部任选直到俱乐部的建设，种种事情层出不穷。这一切，几乎没有周保中不插手处理的。队伍里出了逃兵，他为之伤心苦恼，汽车出了事故，他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处理善后问题。

国际联军组建初期，因为同一些苏联军官合不来，不谐调，周保中费了不少心。后来苏军统帅部严加控制，才改变了苏联军官的作风。

周保中带领队伍一向是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

在北野营进行跳伞训练的时候，他从头一天起就和其他指战员一起参加训练。在这个训练中，他险些丧生。他跳出了飞机，

降落伞却展不开，一直朝下坠落，幸亏辅助伞被打开了，他才避免了死亡，但他的肩膀受了伤。

这以后，中国同志托我去劝周保中，叫他不要参加跳伞训练。可是我没有劝他，因为我知道他是劝不住的。

1951年春天，云南省妇联会主任王一知参加赴朝慰问团来平壤时到最高司令部来看过我。她一见到我，就激动地噙着眼泪说，您身肩指挥战争的重任，过得很艰苦，可身体还这么好，真高兴。那天，她对我说："保中嘱托您，他请您千万不要到危险的前线去，请您千万注意保重。"

我非常感谢周保中的嘱咐，对王一知说："你回去，给周司令转达我的问候。"

王一知说："这是保中的嘱托，也是我的嘱托。我们中国人现在都为首相同志的安全，不知操多少心呀。"

据她说，在国际联军时期，周保中也一直是这样的，我带小分队出去活动，如果不按预定的时间回来，他就通宵不能人睡，焦灼不安地跑到门外去等我回来。

这是超越了国界和国籍的友情。

在抗日革命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取得了胜利的历史转折时期，金日成同志离别了周保中同志。但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周保中同志之间的战斗友谊是源远流长的，他们之间的交往在解放后也一直没有间断过。

对他们的亲密关系在解放后是怎样继续下来的，金日成同志作过如下的回忆：

解放后，我和周保中见过几次，两次是在朝鲜，最后一次是在北京。

周保中第一次到我们朝鲜来，是1946年的早春。我们在南阳见了面。那时候，周保中是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辽军区司令，正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

蒋介石实行反共，调动全部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中国大陆又被卷入了内战的旋涡。

周保中向我介绍了当时中国东北的危险局势，说明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军事政治形势。

日本鬼子败逃之后，中国东北一度是一个政治空白地区。为了争夺这个地区，蒋介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东北看做是决定由谁掌握全中国的最关键的战场。

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援下从海陆空输送几十万大军打入了东北。刚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面对着优势的敌人，不得不开展了极艰苦的战斗。

周保中来见我，就是为了要求我们给予紧急支援，以对付这种形势。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受毛泽东的委派，前来要求过我们的支援。

我欣然答应周保中，凡是与中国战友将在东北进行的战争有关的问题，我们都将给予解决，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坦率地

说，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力量帮助别人。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有没有可能。从我国革命的角度上看，也是绝对不能容许东北变成蒋介石的天下的。

当时，东北有抗日游击队出身的姜健、朴洛权、崔光等优秀的军政干部和大约二十五万名朝鲜青年，直接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

王一知也带着周保中的有关东北解放战争的托付，多次来过朝鲜。

第一次，是1946年，不是夏天就是秋天。当时，萧华指挥的辽东军区部队攻打了鞍山和海城，同一个时候，驻在鞍山、海城地方的国民党军队的一部举行了哗变。蒋介石为之大惊失色，疯狂地发动强大的攻势，威胁这支部队取消哗变，否则就要完全消灭掉。这支投诚的部队被迫退到了朝中边界，为鸭绿江所阻，无路可走了。为了设法救出这支部队，周保中接二连三地派代表来要求我们想办法。王一知也作为一个代表来过罗南。我们帮助这支投诚的部队经过我国领土撤到东满去了。

1947年初，我在平壤再次见到了王一知。

她首先代表周保中向我表示感谢，感谢我们从多方面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然后说，现在有两万多名伤病员、家属、后勤人员和两万多吨战略物资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这就需要再次借朝鲜的通路，希望金将军再次给予帮助。

我当场就答应了她，并且立即采取了措施。王一知一再表示感谢说，东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金将军的恩情。

那天，我还问过她，在苏联远东分手时，林春秋送给她作纪念的手表还带着没有。她微笑着回答说，送给了苏联人。

当年林春秋送她手表时她说过，这是朝中友谊的象征，一定永远带在身上，直到变成弯腰驼背的老太婆。可是她竟送给了苏联人，为什么呢？不可理解。那只表，原是林春秋非常珍惜的。当我们动身离开基地的时候，周保中和王一知依依不舍，不肯放我们走。林春秋就在这时候解下自己的手表送给了王一知。王一知说什么也不肯收。在那个年代，手表还是很难得的珍品。我对王一知说，你还是收下吧，往后会有很大用场的。她这才收下了那只手表。

长春解放后，她到了广播电台，做广播工作，也不时地做输送武器的工作，自然也沾了手表的光。据她说，输送武器的时候，苏军的一支汽车运输队帮了她很大的忙，她就把那只手表作为纪念送给了那个苏军运输队的队长。她说，那只手表，最后变成了中、朝、苏三国人民战斗友谊的象征。

那时候我们没有让王一知回东北去，让她在朝鲜休息了一些日子，因为她的健康情况很不好。她在朝鲜逗留期间游览了牡丹峰，参观了平壤的不少地方。

那以后，也为解决战略物资的运输问题来过平壤。王效明和彭施鲁也在那时候来了，住在平壤。他们三个人都见到了国际联军时期的老战友。他们的会晤，很激动人心。

记得好像是1947年夏天，周保中又叫王一知来看过我。东北民主联军在五十天的战斗中消灭了八万多名敌人，解放了四十二个城

镇，战果是辉煌的，但前方的形势仍然很紧张。民主联军没有鞋穿，光脚奔驰在烂泥滩和砂石地上，异常艰苦。王一知来找我，是要解决鞋子问题的。我下达了紧急命令，命所有的制鞋厂立即停止其他一切鞋类的生产，马上专门生产供给中国战友的军鞋。

据中国的有关东北解放战争的文献资料，1947年头七个月期间，我国支援东北民主联军的物资有21万吨，第二年又支援了30．09万吨物资。通过朝鲜领土的人数，1946年下半年为十八支部队，1947年九个月里有一万多人，1948年有九千来人经南阳桥头越过豆满江。还有去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经朝鲜赴哈尔滨。为工作需要经过朝鲜的中共领导干部就更不计其数了。

1948年秋，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周保中以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偕同夫人王一知和女儿周伟再度来朝访问。

他是专程来表示感谢的，感谢我们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作为酬谢，他还用火车运来了大量的白面。

我把他们都送到金刚山去了，还让金策陪同他们，好给他们做向导，做说话的伴儿。他们在金刚山的温泉休养所过了一段休养生活。回来后都兴奋地说金刚山的红叶很美，风景秀丽，引人入胜。他们还跟金策一道访问了万景台，参谒了我父母的陵墓。

之后，我和金正淑一起，亲自陪同周保中夫妻和女儿，去参谒了安吉同志的陵墓，还一起照了相。

每当回忆周保中的时候，我就不禁想起我们祖国解放战争第二阶段中的一件事。有一天，有两个面生的年轻人来找我，给我拿出了周保中的信。原来，他们都是朝鲜人，是周保中指挥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给他当副官和司机的，一个叫玄周荣，一个叫金吉龙。周保中调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时候，也把他们带到了云南。后来听到朝鲜人民军撤退的消息，周保中就紧催慢赶，把他们都送到朝鲜来了。

周保中在信中说，他虽然身在远方，心却一直在朝鲜的战壕里。还说，现派两个青年去您处，他们机智聪明，工作认真负责，我把他们都委托给您了。

当祖国经受着严峻考验的时候，周保中的来信，真不知给了我多么大的力量。

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我们在间岛和北满，在远东训练基地，以纯洁的感情凝成的战斗友谊，是终古不息的。战友爱的生命力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是在枪林弹雨中磨砺出来的爱，是因为它是能够为自己的战友不惜赴汤蹈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爱。

忠实地恪守情义，这是多么高尚的美德啊！重情义的人，才能成为高尚的人，重情义，人间生活才能像百花盛开的花园一样美丽而高尚。

1954年12月，我应邀访问中国，也见到了周保中，这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面。

当时，他心脏病很严重，久治不愈，住在颐和园介寿堂疗

养。是周恩来总理把他带到北京来治病疗养的。

他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拥抱我，泪水打湿了他的两颊。这个像铁打的一样刚强的硬汉子，这天老在淌着眼泪。也许是因为久卧病榻的缘故吧，他的意志力似乎也大大减弱了。尽管病得这样，可他还是先问我的健康情况，说我在三年战争中该受了多少苦。

他躺在病榻上仍不休息，继续坚持工作，撰写了题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与抗日联军》的厚厚一本书。

在颐和园会面后的第十年，1964年2月，周保中久治不愈，告别了人世。

我为他发唁电的那天，心情沉重，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直缅怀周保中。

在国际联军时期，我还与柴世荣不期相遇。

那天他抱着我连声不迭地喊“老金”，“老金”，用那胡子拉碴的脸颊蹭我的脸颊，那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他比我大二十来岁，可是他叫我的时候，像对待一个长辈似的，总是在我姓上加个“老”字，叫我老金。我笑着对他说，你总叫我老金，想叫我变成半大老头吗？他却很正经地说，金司令是让他变成了共产党人的老前辈，年龄有什么关系。

他的本名是柴兆升。日军侵占满洲以前，他是和龙县一个地方的警察署署长。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把一些警察集结起来组织一支小武装队，投入了反满抗日斗争。

我们是在1933年相识的。当时他在汪清地方指挥救国军的一

支队伍。我同吴义成部达成合作协议之后，去找柴世荣谈判，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他走上了联共道路，最后成了一个共产党人，也和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和他共同进行了东宁县城战斗和罗子沟战斗。

他后来转移到北满，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我们第二次远征到北满的时候，多次同柴世荣的部队进行了联合作战。当时他在中线指挥部任指挥，我们和他在额穆、宁安一带进行了联合作战。

柴世荣一直把我尊为革命前辈，待我很谦逊。他越这样，我越觉着他有一种崇高的人格美。

国际联军组成后，我和柴世荣分别担任了第一支队和第四支队的指挥。

如今，柴世荣也已成了故人。他是哪一年去世的，我不知道。每当看到我和他的合影，就禁不住浮想联翩，感慨万端，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地说明共产主义思想如何改造一个人的画卷。

柴世荣的未亡人胡振一曾带着儿子来过平壤。她原先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也去过苏联远东训练基地。

当白发苍苍的胡振一带着儿子走进锦绣山议事堂前厅的时候，我望着她雪白的头发，心中浮现了柴世荣的面容。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冯仲云，也是国际联军时期的中国战友之一。他从前是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到哈尔滨以后还当过教员。后来在北满省委和几个县做党的工作。两次入狱，因工作上的错误受过处分。两次受伤。

从1939年秋到1940年2月，他为解决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同苏联的军事政治联系问题，在苏联工作。40年代初，为召开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的联席会议和此后同苏联当局的会议，做出了很大贡献。

国际联军时期，他任政治部情报科科长，兼任教育军官的政治课教师。

在苏联远东训练基地时，他常常思念着失散的妻子，为久无音讯而痛苦不安。同志们见他为妻子心神不宁，夜不成眠，都劝他说，妻子久无音讯，说明十之八九已不在世了，不如重建一个家庭，安心工作。冯仲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宁可一辈子打光棍，也绝不再娶别的女子。他一心等待似乎没有希望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的妻子，表现了他作为革命者对待爱情矢志不移的崇高内心世界。

晚上他常出外散步，低吟着思念爱人的中国歌。那凄婉的低吟，至今犹在耳边回旋。

解放后，听说他找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过得很幸福。

冯仲云也和周保中一样，对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英勇斗争，一向表示敬佩，以感激的心情高度赞扬。

冯仲云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时写了一本书，题为《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其中几段是这样说的：

“抗联第二军的前身是东满游击队。……东满游击队原有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个反日游击队。间岛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朝鲜人，因此，东满游击队主要以朝鲜人为骨干。

“著名的朝鲜民族英雄金日成将军率部挺进安图、临江、长白、鸭绿江一带……与兄弟部队抗联第一军杨靖宇司令会师。

“……在金日成将军的领导下，组织了朝鲜祖国光复军，多次越过鸭绿江深入朝鲜本土北部地区开展活动，并多次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激战，还秘密建立了朝鲜人民的祖国光复会地下组织。

“……解放后，朝鲜国内男女老少举国上下热烈欢迎金日成将军，热烈高呼民族英雄金日成将军万岁！”

解放后，冯仲云历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他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时，为朝中两国共同利用水电站的问题曾多次来朝鲜访问。

1958年9月，冯仲云率中国水利电力部代表团来朝鲜的时候，我在水丰发电站见了他。我们先看了电站的设备，然后一同走到大坝上，俯瞰着水丰湖的美丽风光，讨论了在鸭绿江共同建设新的发电站，在水力发电领域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的问题。当年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此后，听说冯仲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受到残酷折磨，1968年春在狱中逝世。

在我过八十岁生日时，冯仲云的夫人薛文带着儿女来看我。她就是冯仲云在远东的训练基地时牵肠挂肚日夜思念的薛文。抗日战争时期她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干部。她矮矮的个子，脸上闪烁着智慧的光。

据她说，冯冲云在狱中去世后过了近十年，于1977年年底，

恢复了名誉，被安葬在八宝山烈士陵园中。

当冯仲云的遗属泪流满面地拥抱我的时候，我也禁不住淌下了热泪，不由自主地忆起了流逝已久的往事。

冯仲云的遗属，那以后也来过几次。冯仲云的大女儿冯忆罗在平壤时恰好赶上了花甲，金正日同志为她筹办了花甲筵。

我和冯仲云的战斗友谊和亲同骨肉的关系，被我们的后一代牢固地继承下来了。

国际联军时期的政工干部张寿钱，也是我亲密的中国战友之一。在北满的时候，他是第三路军的军长。他还有个名字叫李兆麟。他和冯仲云是莫逆之交，和金策也是肝胆相照的挚友。

他品质优秀，谦虚和忘我精神是他特异的品质。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见面就成了挚友。有好事，他都让给同志，有困难，他一身独揽。他的这种品质，使我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共产国际保存的游击队指挥员鉴定文件，称赞他是优秀的组织者，是英勇无畏、精力充沛、富有创造性的游击队指挥员。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露营之歌》，在北满游击队员中广为流行。

抗战胜利后，张寿钱身负中共松江地区委员会的书记，松江省副省长等重任，积极工作，不幸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周保中、张寿篯、马仲云，都离开了我们身边。

1992年4月，国际联军时期的老战友，前来祝贺我的八十岁生日。陈雷和他的夫人李敏，还有李在德……他们都是贵宾。

陈雷在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当过军部宣传科长和第三团政治主任，国际联军时期是排长，解放后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和黑龙江省省长等职。他当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时曾率领黑龙江省友好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过。

在我八十岁生日时，陈雷作为寿礼送了我一幅写有“千秋岁祝金日成同志八秋大寿”字样的字画。他解释这幅字画的涵义说，我领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取得了胜利，在三千里江山上建立了人民的乐园，祝愿我同高丽国一道长寿千万年。他对书法，造诣很深。

李敏送了我一本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百首歌曲的革命歌曲集。在国际联军时期，她是广播员。

隔着豆满江和鸭绿江，一直作为亲密邻邦和睦相处的朝中两国人民和革命者，从抗日大战以来，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共同洒鲜血，抛头颅，并肩战斗在一起。这一宝贵的斗争传统和兄弟友谊，必将一代接一代地继续开出美丽的花朵，形成绚烂夺目的大花园。

主体83年(1994年)7月，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溘然逝世的噩耗乘着电波传遍了全球。人们惊闻这一晴天霹雳般的讣告，受到了如同天塌地陷一般的巨大震动，全世界都挥洒着悲痛的眼泪沉浸在哀悼之中。

陈雷和李敏当即坐上轿车从哈尔滨朝平壤奔驰。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收到我驻沈阳总领事馆报告陈雷夫妇乘汽车赶往朝鲜的急电，立即亲自安排了在鸭绿江桥头迎接他们来平壤的措施。当平安北道党委会派轿车迎接了开过鸭绿江来

的陈雷夫妇，并送他们来到新安州的时候，敬爱的金正日同志派去的轿车已经在那里等候。

陈雷夫妇从哈尔滨起程，坐汽车跑了两千五百里路程，在这整整两天的路上他们一直没有合过眼，就是因为他们的脑海里深深地刻印着

金日成同志伟大慈祥的形象。当他们赶到主席灵前时，时针早已移到子时前去了。他们顾不得扯平远路上摺皱的衣服，急急奔到主席的遗体旁，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敬爱的主席同志，您的战友陈雷和李敏来看您了。"

敬爱的金正日同志，在追悼大会主席台上会见了陈雷夫妇。

周保中的女儿周伟，为再也不能见到金日成同志而万分悲痛，认为这是她的终生憾事。主体84年(1995年)10月，她把一封信和自己编纂的画册赠送给金正日同志。画册收录了许多反映周保中一生的图片资料，也收录了好多金日成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的图片。

主体85年(1996年)夏天，周伟实现了访问朝鲜的愿望。她满怀着自小时候在远东训练基地时就深藏在心间的对金日成同志的深切怀念，一放下行李就奔到了锦绣山纪念宫。

"金日成主席，周伟来了，请您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吧，主席呀……"

她低声喃喃自语着，睑上不住地淌着泪水。她心中一股烈火在燃烧，要继承父母的遗志，誓做一朵让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鲜艳美丽的红花。

八　来自北满的战友

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后，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安吉对我说："崔庸健已经来到，住在不远的地方，正急切地等您来。他现在还不知道您来了，要是知道了，会一口气跑来看您的。"我也非常想见到他。他和金策、姜健、许亨植、朴吉松一样，也是我很早就渴望会见的战友。

我们在间岛的时候，进行了第二次北满远征。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会见金策和崔庸健等战斗在北满的朝鲜战友，支援他们的斗争。但是很遗憾，由于难以预料的情况，未能见到他们。

崔庸健也曾四次派人同我们联系，但都未能成功。其中一人来到敦化后返回去了。

在东南满和北满的许多地方分别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们要互相建立联系，互相团结合作，互相交流和支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和要求。

崔庸健是在北满为抗日联军的建设起了主导作用的功臣之一。他是建立抗日联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主要人物。来远东以前，他是军的参谋长。

第一个给我介绍崔庸健的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朴勋。我们在安图建立反日游击队后加紧练兵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军事教官。虽然建立了游击队，但能够训练部队的军事专家却只有一个人。

我和车光秀、朴勋凑到一起，就谈论找军事专家的问题，也就很自然地讲到了崔庸健。

朴勋说，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合作破裂，黄埔军校的朝鲜青年也都随之走散了。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崔秋海，是黄埔军校的训练教官。这样的人才只要再有一两个人，我们就能解决很大问题，可惜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后来才知道，这个崔秋海就是崔庸健的另一个名字。崔庸健除了这个名字以外还有金志刚、崔石泉这样的名字。

我一听到崔庸健已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就说，何必等他来呢，干脆我们先去找他。

我跟着安吉刚走进崔庸健的宿舍，他腾地站起来呆呆地望了我半天。只见他膀阔腰粗，身材魁伟，是个武官型的大汉。

“在满洲未见到的金司令，到俄罗斯来才相会。”他握着我的手说道，这就算是同我打招呼了。我看见他的两眼闪着泪光。

他说，听说金司令很快就到，没想到你已经来了。他一再道歉，说他没有先来拜访。

“跟金司令一起战斗，是我平生的夙愿。今天这样见了面，不知有多高兴。但愿咱们不要再分手了。”

他参加革命以来，经历了很多波折。

他和我一样，也是从参加学生运动，开始了革命斗争的。他念中学的时候，领头发动了反对美国人校长的同盟罢课，把那个美国人校长吓跑了。但由于日本官厅的干涉，崔庸健等领导发动了罢课的学生都被学校开除了。此后，崔庸健参加了三一人民起

义，参与了反日书刊的发行工作，因而也尝到了蹲监狱的苦味。后来，到汉城过了一段，偶然结识了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工作员，同他相处得很亲密，约好了跟他一起行动。这样，他就跟着那个工作员，离开了祖国，投奔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去了。

他艰难地来到了上海，但是看了临时政府的所作所为，他大失所望，毅然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他在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军事经验，但也意识到，与离开祖国时所抱的誓死恢复国权的初衷不同，自己越来越深深地卷入了中国革命。当时，住在中国关内的朝鲜青年，都对中国革命抱着很大的期望。

崔庸健在回忆过去的时候说，为别国闹革命，虽然也感到自豪而有意义，但总是摆脱不掉一种被挤到边缘去的惆怅情绪。有时候还画上一个中国革命也是朝鲜革命、朝鲜革命也是中国革命这样的等式来自圆其说，但无论如何也甩不掉一种总觉得自己背离祖国越来越远的歉疚之感。

当孙中山提出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依靠国共合作打倒北洋政府，建立国民革命政府的时候，崔庸健积极参加了这场革命。当时他认为，只要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势力掌握了中国东北地方，就会出现有利于朝鲜独立的大好形势。但是，局势并没有照他的希望发展。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对共产党人开始了大屠杀。他屠杀共产党人，是不问国籍的。当时在中国关内被蒋介石屠杀的朝鲜青年就不少。

崔庸健也几经死里逃生，辗转逃出了大屠杀的旋风席卷的腥风血雨的关内，径直到了北满。他十分后悔地说，当时没有去间

岛，径直去了北满，是如同迷失了航路的失策。

“如果那个时候去了间岛，一定会更早见到金司令，也会为朝鲜革命多做点贡献。想起来太可惜了，真是一生一世的憾事。”

我对他说，我没有早遇到你这样的军事专家，十分惋惜。如果东满早有了金策、崔庸健这样的人才，我们肯定能为朝鲜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已经过去的，让它过去吧。北满幸亏有你这样的骨干燃起了抗日的烈火，使那里的朝鲜人有了革命的觉悟，也壮大了那里的抗联队伍。群众有了革命的觉悟，朝鲜革命就有了基础，这对中国革命也有好处。我们不要把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分开来看。在中国疆土上进行革命的情况下，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斗争，同中国其他抗日力量的联合战线，是不能不重视的。你们在北满做的事情，既是为解放中国的，也是为解放朝鲜的。

崔庸健说，迄今为止，他最难忍受的是孤独感。我问他为什么感到孤独。他说，敌人那么强大，革命的前程又那么遥远，加上自己的周围全是中国人，自然是感到孤独的。感到孤独难受的时候，就想起战斗在白头山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听了他的话，我更理解了他曾四次派人找我的心情。

他接着说，看到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受了很大的震动，更急不可耐地想奔到白头山去跟我们一起战斗，认为这样才能为朝鲜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去不成，就决定找到我的部队，加强同我的联系。

我对他说明了我也为见到北满的朝鲜战友，1935年进行第二次北满远征的情况。

那天，我们的话题转到了30年代初在东满和北满东奔西走地筹备建立武装队伍的往事。

崔庸健说，他在北满的农民群众中办了训练所，也组织了武装队伍，但因为很难扩充力量，费了不少心思。老早就听说金司令提出了全民抗战的主张，不知要靠什么办法发动全体民众投入抗战，希望听听我的打算。

我对他说，现在，朝鲜民族的大多数已到了痛苦的极限，都渴望着民族的复兴。这就是今天朝鲜的现实。只要把这些民众武装起来，就能组成几十万大军。怎样武装他们呢？要到处建立边做工边搞武装活动的半军事组织，工业区建立工人部队，农村建立农民部队，城市建立学生部队。从30年代后半期开始，朝鲜北部地区已经建立了生产游击队和工人突击队，并且已经开始了活动。将来要在全国各地都建立这样的组织。谁去建立？要把在抗日武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骨干分子派到各个地方去。

我接着说，这并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现在的世界形势正朝着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方向发展。目前，日本还在同中国一个国家打仗，但它迟早会发动更大的战争。它的侵华战争的前途还很渺茫，如果它再发动更大的战争，那么必然导致日本灭亡的后果。可见，最后决战的时刻在近几年之内必定会到来，那时候，就要配合朝鲜革命的主力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总攻势，把全国的抗战组织都发动起来，开展全民抗战，用这种方法去打最后的

决战。这就是我的祖国解放作战的计划，是我的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的路线。

听完我的话，崔庸健说他的民众观点似乎有问题。他说，迄今为止，他把祖国人民只看作是拯救的对象，没有看作是解放作战的承担者。认为革命是只有先觉分子才能干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工人、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但他们真的都能参加革命吗？必须由先觉分子浴血奋斗，光复祖国，把光复的祖国献给人民。这就是自己对待民众的观点。他坦率地说，正因为自己有这样的观点，才忽视了提高群众革命觉悟的政治工作，而侧重于军事工作一面。

乍看起来严肃不苟言笑的崔庸健，在之谈中不时地露出了笑容。

他说，来哈巴罗夫斯克的时候，他只考虑过同苏联搞军事合作的问题，对朝鲜国内的全民抗战和祖国解放作战问题却很少考虑过。现在见到了金司令，听了金司令的话，心里感到豁然开朗了。

他接着说："金司令，坦率地说，我真想到白头山去作战，觉得只有到白头山去打仗，才能尽到一点朝鲜人的本分。去当普通兵也好，做什么事情都行，让我去白头山，做你的部下吧。我愿战斗在白头山，战死在白头山，埋葬在白头山。这是我的夙愿。"他说着，眼里汪满了泪水。

我走出他的宿舍时对他说：

"分散在南满、东满、北满的朝鲜革命者，现在都汇到一起来

了，再不要分散了，大家都紧密地携起手来，为朝鲜而战吧。”

同崔庸健的会晤，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噙着眼泪说的话，饱含着他多年来的夙愿，那是他在寄人篱下的处境中仍想为本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强烈愿望，是要推举出一个中心，团结在这个中心的周围，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的坚定不移的意志。

这并不是崔庸健一个人的愿望和意志。凡是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不论是在南满的还是东满或北满的，都有着这个共同的愿望和意志。

崔庸健那么真诚而殷切地希望到白头山去战斗，表达了他对我的信赖和期望，表现了一心一意为朝鲜闹革命、为朝鲜而献身的爱国热情。

崔庸健的夙愿，随着国际联军的组建，大部分兑现了。自从在哈巴罗夫斯克同我会师以来，他就一直和我在一起。他那要到白头山去战斗的夙愿，就这样变成了现实。

姜健也是我在远东不期而遇的北满战友之一。

在国际联军成立前，我有事到北野营去，碰见了姜健。他一看见我，高兴得简直不知道怎样才好，二路军和三路军的军政干部看了都惊呆了。在北满的军政干部中，知道我与姜健关系的人，只有周保中和五军的几个指挥员。我和姜健是老相识，在满洲的时候就见过几次，两次远征北满时都见过他。

1938年，姜健已经是第五军第三师第九团的政委。他入伍不久，就当了团级政治干部，可见领导上对他是多么信任了。

我们在小哈尔巴岭会议上提出了小分队活动方针以后，第五

军也进行了整编，姜健被任命为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警卫队的政治委员，警卫队队长是朴洛权。

我每当见到来往于北满的通信员，就问姜健的情况，每次都得到的回答是健康、作战都很好。姜健是五军里无人不晓的人，都知道他是进步快，有军事才能，前途无量的指挥员。他入伍仅两三年就能成为一个响噹噹的人物，一方面是因为他作战英勇机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无限热爱人民群众。

群众都非常喜欢他，称赞他正直坦率，淳朴厚道。只要他带着队伍走进居民点，老百姓就喊着“姜政委来了”，热情地欢迎他，而且都争先恐后地送子女加入他的队伍。足见他的队伍是深受群众爱戴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姜健在部队里建立了严格的纪律。他的部下，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

他作战英勇，指挥有方，充分具备了军事指挥员的才能和素质。尤其是小分队活动时期，他的军事才能表现得最突出。他特别善于组织伏击战和截击敌军列车的战斗。在小分队活动时期，他多次熟练地指挥破击敌军列车、铁路、公路和仓库的战斗，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见到姜健的那天，我们在黑龙江边聊了很长时间。

国际联军成立以后，姜健就和我在一起。我和他以及国际联军主要指挥员住的房子叫圈儿房。这是西伯利亚地方常见的圆桶式房子，中间有走廊，四面围着一圈儿房间。我们常见面交谈，发现他不仅思考和行动都很严谨，而且说话也很有条理很有风趣。有人说他性格呆板生硬，其实这是对他不了解的人说的。他

性情沉稳冷静，正直淳朴，且又感情丰富，富有人情味。他提出自己的主张或看法，从不加任何修饰，不遮不盖，直言不讳。

他喜欢谈自己的家乡。他的家乡是庆尚北道尚州。他十岁离开家乡，但家乡的风土人情仍记得很清楚，常常深情地怀念家乡。我有好几次听他说，他的家乡尚州是以盛产美酒、丝绸和柿子而著称的地方。当他讲到家乡的美酒、丝绸和柿子，描述洛东江和俗离山风光，尤其提及他离乡时留下来给人家做童养媳的姐姐时，他禁不住两眼发潮，淌出眼泪来。这个外表上似乎有点呆板冷酷的人，一谈起家乡，就像诗人一般抑制不住感情迸发，有如清泉淙淙，娓娓而谈。

像姜健这样对家乡的感情似火一样热烈的人，干革命也是火一样热烈的。酷爱家乡的人，必然酷爱祖国；酷爱祖国的人，干革命也必然是满腔热忱的。

我和姜健的关系，在国际联军时期更加发展成了热烈的同志友爱关系。

对姜健，我特别佩服的是他的颖慧的军事眼光和高度的责任心。他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只要提到军事问题、作战问题，他就侃侃而谈，披露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表现出他是有真知灼见的。

他说中国话非常流利，俄语也说得很好。他是到北野营以后才开始学俄语的，可是没过多久，就能跟苏联军官用俄语对话，也能阅读苏联的军事操典等俄文书了。他写汉字，也写自己造的简化字。

他头脑清晰，聪慧过人，苏联人和中国人也都赞不绝口。

对姜健的进步，最高兴的是金策。他和姜健是师生关系，他在宁安做地下工作时在一所私立学校当过一段教师，教过姜健。

“信泰念私立学校时就是出类拔萃的高才生，把《三国演义》都背得滚瓜烂熟。”金策十分得意地夸耀说。信泰是姜健的本名。

金策和姜健，一个是恩师，一个是弟子，他们的品性也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非常相像。金策以刚直淳朴而有名，姜健也不亚于他，一样刚直淳朴。坚持原则，开展工作的胆略，他们两个也不相上下，就像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

解放后，姜健任人民军总参谋长时，他的属下有不少比他年纪大得多，革命资历很深的干部，但都很敬重他，待他都恭谨，因为他们都知道他是革命原则性很强的人。

在原则性问题上，他对任何人都毫不妥协。不管是什么人，即使是骨肉亲人，如果背离了革命原则，他也是绝不宽恕的。

金正日同志经常要求干部学习姜健对党和领袖的忠诚精神和革命的原则性，是很对的。姜健是值得后来人学习的有才能的干部、深得人心的军事指挥员。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他要是还活着，一定会为武装力量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的。

姜健为革命献出了最后一滴血。他一辈子从没有歇息过。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后，他为了支援中国革命，没有回国，作为吉东分区司令员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当时，他以朝鲜人组建了许多部队。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的朝鲜人有25万。姜健一直废寝忘食地工作，以致患了胃病。回国后做保安干部训练所二所所长工作的

时候，因为胃病受了大苦。为工作，他从来没有按时吃饭。因为他胃病严重，参加宴会时我从不让他喝酒和汽水。

为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姜健建树了巨大的业绩。

汉城解放战斗的胜利、大田解放战斗的胜利，以及在战争第一阶段我们的人民军取得的辉煌战果，都是与姜健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

人民军打到洛东江界线的时候，姜健向我报告前线情况后说，再过几天，可能回到故乡尚州与姐姐会面了。没想到他的这句话竟成了一句遗言。1950年9月，他不幸战死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他牺牲时才三十二岁。

姜健才华四溢，政治军事无所不能。我们有这样年轻有才华的总参谋长，苏联人都羡慕不已。他正当年华方富之时离开了我们，实在令人痛惜。

我们追授他以共和国英雄称号，并将第一中央军官学校命名为姜健军官学校，以永远传颂他的业绩。建国二十周年时，在沙里院市立了姜健的铜像。

失去了姜健，我无比沉痛，心如刀绞。至今我还常常怀念他。

抗日战士们向苏联远东训练基地集结的时候，东满的战友们一致渴望着能见到战斗在北满的朝鲜战友，北满的战友们也同样渴望同东满的朝鲜战友会师。

我第一次到北野营的时候，从北满来的朝鲜游击队员都跑到宿舍外边来欢迎我。他们的绝大多数是我不认识的。在我离开北

野营的时候，他们围着我不放我走的情景，仿佛是昨天的事，还记得很清楚。

北满的朝鲜战友，都把我们从东满来的人当祖国来的亲人看待。东满和北满，对我们朝鲜人来说，都是外国的疆土，但是，与北满相比，东满还是离朝鲜近，而且东满是朝鲜人开拓的，东满革命也是朝鲜人开始掀起的，所以，把东满当祖国的一部分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加上，东满的抗日战士还跟我一起多次去过祖国，所以，北满战友们把我们当祖国来的亲人看待，也是很自然的。

我首次去北野营的时候，觉得最突出的人是蓄着小胡子的金龙化。

他的小胡子，印象很深。再一个人是同样蓄着小胡子的滑稽大王崔勇进。他从队伍里走出一步，向我一个个地介绍他们的人，不拘形式，大大咧咧地逗人发笑，叫人一点也没有初次见面时的拘谨。

他介绍说，这个叫姜尚昊，记忆力数第一；这个叫金龙化和金大洪，是神枪手；这个叫张相龙、金智明、全奉瑞，他们屁股蛋子轻，像车轱辘转似地勤快；这个叫金曾东，是个有眼力的机灵鬼；他叫柳应三，是个种田的好把式。他就这样一语道破地点出了每个人的特点。后来事实证明，他的介绍都是很恰当的。

姜尚昊头脑清晰，聪明过人。金龙化和金大洪的确是有名的神枪手。张相龙、金智明、全奉瑞、朴宇燮、金阳春，都是勤奋能干的积极分子，不管什么任务，一拿到手就迅速敏捷地干完，

绝不拖延。在远东训练基地时，张相龙为我和金策跑了不少腿。柳应三确实是一个精于种地的行家。在北满时，他是主管游击队农业生产的，到了北野营，他仍参与副业地的大小事务。解放后，他还当过人民武装力量部的副业部长。

在训练基地，我还见到了崔敏哲和李宗山。李宗山是北满战友中年纪最小的战士。崔勇进说，李宗山有一次听到紧急集合的钟声，慌得从床上滚落到了地上。大家听了都捧腹大笑。

从北满来的女战士，大都是性格开朗的同志。北满有很多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人要是生活在这样辽阔的大地上，兴许性格也会变得非常开阔吧。她们还善于骑马。北满的女同志中，掌握无线电技术最棒的是朴京淑和朴景玉，骑马最棒的是王玉环，听说李淑贞也是骑马的好手。许昌淑、全顺姬、张熙淑都是响噹噹的缝纫队员，李桂香是神枪手。

崔勇进介绍人的时候，总是脸带着滑稽的表情，说些打趣的话，令人发出一阵阵的笑声。说崔勇进是个很有趣的人，我在西间岛时早有所闻，真的见到了他，觉得他比传闻还更有趣。

崔勇进是出名的战将和硬汉，在我们主力部队也很出名。在一次全歼乘轮船前去视察的日军“讨伐队”高级将官及其随从的战斗中，他表现得特别勇敢，从此就出了名。

他原则性很强。记不准他在北满是当团长还是当连长的时候，为了解决部队的口粮，他去找在自卫团混事的父亲要粮食。他父亲原是拿枪打日本鬼子的独立军。独立军解散后，他放下武器回到了家。日本鬼子为了利用他在朝鲜人中间制造分裂，硬逼

他入了自卫团。崔勇进回家对父亲说，现在部队断了粮，需要拿点粮食回去。他父亲一口拒绝说，哪有粮食给你们。其实，他们家有一块地，口粮也充足，虽说不是富人家，却是不愁吃穿的过得去的一家。他父亲不给他粮食，是不是为了在别的自卫团员面前装出一幅不私通游击队的样子，我不清楚。急性子的崔勇进听了父亲的话，怒不可遏地说："当过独立军的父亲，这样做对吗？你应该比谁都积极帮助我们。我们抗日游击队，为了打倒日本鬼子，光复被侵占的祖国，忍受着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睡不上觉的困难，风餐露宿，流着鲜血，跟日本鬼子打仗。对这样的游击队，谁不支援，谁就是逆贼。你要不给粮食，绝不饶你。"

他父亲可能受了很大震动，送了他十五辆牛车的粮食。此后又给游击队送了很多粮食和武器。他的父亲，虽然挂着自卫团的牌子，却没有丢掉手持武器跟着独立军走南闯北时的爱国精神，不断地支援了游击队。后来，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国际联军时期，崔勇进在我的支队里当连长。他带领的第一连在各方面都名列前茅，连苏联人也都赞叹不已。他要求严格，争强好胜，工作积极，这使他成了很有名气的指挥员。

解放后，他在保卫平壤的重要岗位上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消灭敌特破坏分子的斗争；在平壤学院和中央保安干部学校忠实地进行了培养正规军骨干的工作。他任水产相时大大增加了水产品的生产。有一度他还当过副首相。

在训练基地，我还见到了过去我们派到北满去的老战友，那次会见是激动人心的。崔光、金京锡、全昌哲、朴洛权、金玉

顺、安贞淑等，都是我们在东满时派到北满去的。

崔光见了我就哭着说："我们分别了多少年啊。将军，我身在北满，心却一直在白头山您的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想您。这回，您赶我，我也绝不走啦。"

国际联军成立后，他当了排长。我是在他做儿童局局长工作时认识他的。那时候，他曾带着儿童团演艺队到我部队来表演过。我们第一次远征北满的时候，他卸去了儿童局局长职务，加入了青年义勇军。

他入伍的时候还以为子弹是跟弹壳一块被射出枪口的。他入伍就当了排长。

我还记得，在吊庙台作战的时候，他为了保护我，带领自己的排奔到腰营沟西头熬了一夜。之后又参加了老黑山战斗。去远东以前，他是周保中第五军指挥部警卫队的排长，深得周保中的爱护。

因为有这样的关系，为了在东北进行对日作战选拔人员的时候，周保中抢先要求，把姜健、崔光、朴洛权分配给他。

到了东北，姜健任分区司令，崔光、朴洛权、南昌洙分别任团长。

崔光的团驻扎在汪清县一带，吃的是伪满时日本人储存的高粱米。他们一面进行部队建设，一面进行战斗。当时有些人刁难崔光，说他的部队人数太多，超过了一县二百名队伍的规定人数。崔光就索性跳出县城，到农村去继续招兵买马，不断地扩大了队伍。他们那时候组建的武装队伍，为东北解放战争做出了很

大贡献，也为我们国家的军队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崔光的部队在敦化一带取得了辉煌战果。他们一面打仗，一面还建立了党组织和群众团体。

1946年初秋，我叫崔光选拔一批有才华的干才回国。他很快移交了自己的部队，带着二百来名挑选的人员回来了。金策和武亭在平壤车站迎接了他们，金正淑特意尽其心意准备了一顿饭为崔光洗尘。

崔光回国后任保安干部训练所第一所参谋长，后任朝鲜人民军第一师师长，参加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祖国解放战争。他为我国的军队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崔光作为普通人，作为军事家，是信誓旦旦，尽忠竭力的。发生了“普韦布洛”号事件时，因为形势紧张，他整整一年不回家，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他是诚心诚意地献出一生拥护党和领袖的。在革命道路上他也经历了波折，也有过烦恼苦闷的时候，但始终没有变心。

崔光是我最珍惜和爱护的武官之一。金正日同志对他也是完全信赖，十分爱护和器重的。他已年逾古稀，金正日同志还任命他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可见对他是多么信任多么爱护和器重了。

我去远东训练基地时满以为能见到朴吉松和许亨植，但未能如愿，他们已在北满牺牲了，实在令人痛心。

许亨植是珠河游击队的创建人之一。北满的战友没有一个不知道他。对他，金策给我做了详细介绍。其中有一件事至今仍不

能忘记。在冬天向江南行军的路上，他曾罚自己执行了两次站岗放哨的任务。那次行军很艰苦，他为了减少战士们的疲劳，命所有指挥员都和战士一样站岗放哨，他自己也不例外。他们都没有表，不好掌握时间，便用烧香的办法量时间，烧一柱香就换一次班。有一天夜里，许亨植轮到自己站岗，不料他错过了时间，第二天一早他就在队伍面前做了检讨，并宣布罚自己重站一次岗。当他夜里重新站岗的时候，有个战士看了心疼，便悄悄地把点着的一柱香截掉了一半。许亨植知道了这事，对那个战士说，你为我着想，我感谢你，不过，革命队伍里只有一条纪律，人人都要遵守，不能有例外，这样，才能做到纪律严明。今天夜里，你和我都要再罚一次，认真反省反省。那天夜里，他们真的又罚自己站了一次岗。

他接到金策要他带队尽快赶到训练基地的通知后，为了执行最后一项作战计划，拖了些时间，不料，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未能来到训练基地。

许亨植这样一个重要指挥员的牺牲，是任何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无法补偿的。尤其是在准备解放祖国的作战的时候，他的牺牲，是我们莫大的损失。

朴吉松原在汪清一带活动，后来到北满去当了支队长。他小时候就在吴仲和的带动下参加了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他父亲朴德深是佃农，又是艄公。我跟他很熟，他曾多次用船给我们运过支援物资。

朴吉松当儿童局长时跟我接触较多，所以很快就跟他搞熟

了。他是个工作热情很高的青年，只做儿童局长的工作还不过瘾，总想找机会参加游击队。到我们第二次远征北满的时候，他就缠着我批准他入伍。我没有批准，却派他到罗子沟去做群众工作。当时罗子沟集结着许多从汪清、珲春一带的游击区疏散来的革命群众，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朴吉松，恰好是做这些群众工作的适当人选。

此后，通过通信员，听到了几次朴吉松的消息。

在罗子沟，他暴露后被关进了监狱。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在监狱里很好地坚持了斗争。后来，托病获得保释。接着秘密逃出罗子沟，去北满找我们的队伍。他翻越了老爷岭以后，因为找不到我们的行踪，吃了不少苦。后来在宁安县笑来地盘附近遇到活动在当地的一支游击队，就加入了这支队伍。

他组织观念强，是共青同盟组织生活的模范。他二十几岁就负起了支队长的重任，当时他的通信员是李宗山。

朴吉松支队是以英勇善战而远近闻名的劲旅，他的支队里还有一支骑兵队，是敌人闻风丧胆的雄兵。

朴吉松紧张地处理了计划中的各项事宜后，开赴远东训练基地的时候，不幸被俘牺牲。李宗山从无线电里收到这个噩耗跑来告诉了我。朴吉松在行军路上与敌人遭遇，在激战中受伤倒下。敌人拉走了昏迷不醒的朴吉松。如果他接到我们的通知立刻出发，是不会遇到这种不幸的，实在太可惜了。

解放后，我们把朴吉松的父亲，从罗子沟接到平壤来住。崔光和金玉顺要赡养他，开始办手续。金一知道了，提出要由他来

奉养，他说，看在小分队活动时期他与这位朴德深老人的关系上，应当由他来奉养。两家互不相让，争执不下，最后找到我这儿来了。金一要求我来裁决。我为这些革命的第一代人所具有的崇高情义深受感动。我对金一说，朴吉松的父亲，不仅是你或崔光、金玉顺的父亲，而且是我们大家的父亲，我们大家都是他的儿女，我们应当共同赡养他老人家。这样，我们就请朴吉松的父亲住在当时部长、副部长一级的干部住的普通江边高级住房里，让他安度晚年。

要讲北满战友们的事情，是讲不完的。在远东训练基地时，我还见到了参加国际联军别动队同苏军共同执行过侦察任务的北满战友。洪春洙也是那个时候见到的。他原是独立军的一员，曾在平壤、江西、安岳、沙里院等地做过募捐工作。后加入游击队，他射击本领高，也善于做侦察工作。在祖国解放作战时，他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参加国际联军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从前都分散在南满、东满和北满战斗，但在思想意志上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地推动朝鲜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老爷岭虽是划分东南满和北满的分水岭，但它在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心灵中却未能划出什么界线。分别战斗在各地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都一致表示要到白头山去作战，战死也要战死在白头山上。他们的这种意志，形成了保证我们队伍思想统一、团结一致的因素，对加强朝鲜革命的主体力量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九　培育革命的根苗

革命并不只意味着斗争。革命中既有斗争，也有生活。把斗争和生活融合为一，在斗争中创造美好的生活，以实现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这就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革命。

抗日革命战士们在人们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创造了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设想的崇高而美好的生活，在所到之处都建设起了道德情义的理想之乡。他们在斗争中相爱、成家。抗日战士的生活，既有诗，也有歌；既有眼泪，也有欢悦。

进入40年代，我国革命开辟了具有新的意义和内容的更加丰富多彩的发展道路。正在朝着抗日革命的最后胜利猛进的40年代，给了我们新的希望和喜悦的是，诞生了革命的第二代。

金正日于1942年2月16日清晨在白头山密营出生。

金正日的出生，对我们一家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金正日他是在枪炮呼啸的激烈战场上作为朝鲜的男儿出生的。我和金正淑以殷切的心情祝福了他的未来。

金正日出生的时候，我心里想，若是我的父母健在的话，他们该是多么高兴啊！肯定像我的祖父和祖母爱我一样疼爱他的。老人说孙子孙女比儿女更可爱，可是金正日的祖父和祖母已经谢世了。

虽然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还在世，但他们在遥远的故乡，连

曾孙子出生的消息都无法及时得到。

我小时候受了家里长辈们的深切爱护。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人人都对我关怀备至，说我是家门的支柱。乡里的人们也十分爱护我。可能是由于献身于独立运动的人家的子孙，才对我更加体贴的。

然而，金正日没能得到这种爱护。他在人迹罕至的白头山密营和远东训练基地度过了童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我们在没有地址、没有门牌号码的原木房和帐篷里，有时以冰天雪地为家度过了青春时期。

金正日在穿着军装的人们中间度过了童年。他从我的战友那里受到了没能从家庭长辈那里受到的爱护。他是在游击队员们比我更细心的爱护下成长的。

那时我的同志们都十分高兴地说，白头山又有一位将军诞生了。金策常把童年的金正日叫做小将军。

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看着我国革命的新一代在抗日的烈火中诞生，像白头山的赤柏青松一样茁壮成长，都对朝鲜革命的锦绣前程有了更坚定的信心，都鼓起千百倍的力量、勇气与斗志，为尽早迎来祖国的解放，更加顽强地进行斗争。

战友们把金正日的出生当作大家共同的喜事，无微不至地关怀他。

我从他们这种真诚的情意中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我们一家的爱护是代代相传的真挚的爱。

我过去也说过，我一生生活在同志们的爱护中。我所以能够

至今身体健康，继续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完全是因为有着同志们和人民的帮助。

我十四岁离开了母亲以后就一直生活在人民和同志们中间。无论是在抗日革命的日子里，在建设新国家的日子里，还是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日子里，同志们都始终如一地真诚地帮助了我，保护了我。他们把自己的身躯当作盾牌为我挡住敌弹，为我遮住雨雪，驱除病魔。当我有心事时，也是同志们和人民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精疲力竭，或有了痛苦的事，也先去找同志们和人民。只要在他们中间，就会涌出一股新的力量，暗淡的前程也豁然明朗，也就有了克服任何困难的信心。

现在我想对你们讲些我在远东训练基地时发生的事情。

组建国际联军后我们集结在北野营的那年冬天，满洲和远东地区雪下得很多，使得山里的野兽也闯到人家住地来觅食。积雪齐膝深，街上有一段时间连汽车也无法行驶。

正当这时，去搞小分队活动的金一，背着沉重的米袋子回基地来找金正淑。他对金正淑说，他考虑到这里以面包为主食的生活习惯，特意弄来了一些大米，绝不要作为他用，一定要给司令官做大米饭。

金一为我背来米袋子，并不止一两次。他自己顿顿吃整粒玉米饭，却想方设法让我吃上大米饭。

柳京守从后勤部领到一点大米就交给金正淑说，不要声张，要给司令官做米饭。

我和战友之间的革命同志友爱和共产主义道德情义，自从金正日出生以后，还表现在对金正淑和金正日的道德情义上。

金正日一出生，金正淑就把我和她的军服拆下来给他改做了衣服。

在训练基地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

当时，苏联人也因为打仗，吃不饱。要少吃、少睡，穿戴要朴素，这就是他们的口号。襁褓、被子、帽子都无法置备，所以，女队员们收集碎布片拼凑成小包被给他盖。

直到祖国解放，金正日一直用着这条小包被。

战友们眼看着司令官的儿子盖着用碎布片拼凑成的小包被，心里十分难过。这事一直挂在他们的心上，以至解放后林春秋到中国东北去工作，休假回国时买来五百条毛毯，作为礼物送给我和金正淑。我们把这些毛毯都送给了万景台革命学院。

尽管生活十分困难，但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还是尽心尽意地照顾金正淑和金正日。

女队员们特别辛苦。她们对金正淑照顾得无微不至。

金正日从小就很喜欢军队，憧憬军人世界。因此，我的战友们一见到金正日就给他戴上军帽。有些同志在做敌后工作的时候，亲手做了木制手枪，作为礼物送给金正日。

在远东地区，与在白头山密营时不同，我们家离部队驻地很近，在训练间隙和休息日就有很多指战员到我家来，抱着金正日转，教他学走步，叫他搭马马肩儿，还教他唱歌。有时也把他带到黑龙江边，让他看看在江面上驶行的机轮和飞过天空的候鸟群。

他生为游击队的儿子，穿着浸透了硝烟味的衣服，吃军队饭，听着冲锋的口令声成长，他的人生一开始就与众不同。

金正日所以能够从小就刚直不阿，有胆量有骨气，固然也可以说是先天的，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从世界上正义感最强，信念最坚定的抗日战士们那里学到了斗争和生活的真理，心地光明、生气勃勃地成长的缘故。

金正日与他小小年纪相比，在思想上早熟，我认为这也是由于他在游击队的熏陶下成长的缘故。游击队员高洁的情操，成为丰富的滋养注入了他的灵魂，他们像白头山的峰峦一样坚强的气质，更加陶冶了他那男子汉性格。

帮助金正淑和金正日，男队员也不比女队员差。很多男队员到我家来，里里外外从各方面努力帮助金正淑，减轻她的辛苦。

和白头山密营一样，远东的训练基地也没有什么可作滋养品的东西。那是人们都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的时候，想帮一把，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时，林春秋和其他很多同志把自己分到的面包每次都留下一点积攒起来送给金正淑。为了支援苏德前线，人人都饿肚子，可是他们每天都积攒面包送来。

金正淑把战友们送来的面包只留下一点，其余的就存起来再还给他们。

有一次林春秋带着无线电收发报机到满洲去搞小分队活动。他用无线电同司令部联系，搞了几个月的政治工作。他出色地完成任务后回基地时，从敌占区带来了几十个鸡蛋。他搞小分队活

动的地点离我们的训练基地很远，路又不是平坦的大路，而是敌人刀枪如林的危险地段。他背着无线电收发报机，还提着一包鸡蛋，要通过空着身子都很难走的险恶地段，该是多么吃力啊！

林春秋带着那鸡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为他对金正淑和金正日的一片至诚深受感动。

林春秋和金正淑有着师生情谊。金正淑在符岩洞上夜校的时候，林春秋和郭池山一起当她的老师。

林春秋给了那些因病受苦的人很多医疗帮助。金正淑的家属也受过他的治疗。有一次，金正淑生了病，也是林春秋治好的。

林春秋不仅在国际联军时期，而且一生都为我、为金正淑和金正日费尽了心思。

祖国解放后，林春秋为寻找金正淑的家属亲戚，做了很大努力。

他以向后代人宣传和介绍金正淑、金哲柱、金基松的生平和业绩为己任，多年来努力搜集史料，写了很多部关于他们的书。

林春秋是手持武器同敌人作战，又用知识辅佐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以渊博的知识，从抗日武装斗争初期起就进行了史实记录和著述活动。

可以说，林春秋是从他记录我在延吉县朝阳川对党及共青干部所作的谈话开始，迈出了作为历史学家的第一步的。从那以后，他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随军史学家，参加了南湖头会议、南牌子会议、小哈尔巴岭会议等各个主要会议，忠实地作了会议记录。

林春秋还向共产国际的出版物投了好多篇文章。

有一年，《太平洋》杂志刊登过这家杂志特派员和林春秋的会见记。我看了这篇会见记，得知林春秋向特派员谈了很多赞扬我们部队的话。

他说，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战斗前制定好作战计划，运用神妙的战，行动迅速准确、勇敢，所以从没有打过败仗。还说，我们的队伍自主性强，文明，又充满乐观精神。

杂志特派员在那篇会见记里还谈到，林春秋为这家杂志写过介绍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赫赫战果和儿童团员金今顺壮烈牺牲的文章。

林春秋常对战友们说，办好队内刊物、写送交共产国际的报告与文件、综合革命军的战果材料，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金司令从事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史系统地记录下来。我虽然笔锋钝拙，知识浅薄，但愿意把金日成同志的传记写出来使之永世相传。

我们游击队指战员中手持武器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很多，可是像林春秋那样以坚定的信念自动写下游击队的革命斗争史实留给后世的人却是很少的。

林春秋是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老练的政治干部。但是我们更推崇作为作家、历史学家的林春秋。这是因为他在纂修我们革命史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传世的业绩。林春秋以丰富的史料综合地系统地并且深入地考证和叙述了我们的革命历史。

他所以能够对抗日武装斗争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是因为他当时从不间断地写了日记。

如果没有林春秋那样的作家、历史学家把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史料整理好，那么，我们的革命史中有许多史实就会被埋没，见不到天日了。

林春秋不仅在纂修我们的革命史方面，而且在宣传介绍我们的革命史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初期，他在平安南道党委会从事党务工作，对赵基天[14]、郑宽澈[15]等文化界人士讲了普天堡战斗等许多我们游击队的斗争史实。

林春秋编写了以革命传统为主要内容的书和许多回忆录，为丰富我们党史文库做出了贡献。

只要是维护和发扬光大领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历史以及我们党革命传统的事，他排除一切障碍，坚决做到底。

国际联军时期，林春秋曾拿我的论文《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作过政治讲演。当时外国的一些指挥员表示疑虑说，要不要把我的论文当教材，还需要考虑。

林春秋断然地说，我们很早就拥戴金日成司令官为朝鲜民族的领导者和领袖，我们拿自己领袖的著作讲课，你们干吗要说三道四。他就这样坚持用我的论文进行讲课。

林春秋为我的健康，也操了很多心。

他当团党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通知我一项会议的决定说，大家决定不准我背背囊。

我对他说，你是老革命，怎么能开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他说，这是党员们的要求，人们看到司令官背着背囊行军，就责备我们，这是群众的意见，应该接受。

林春秋对金正日的领导也是竭诚拥护的，就像为我献身服务一样。

他是怎样才成为如此由衷地敬慕自己的领袖和领导者，忠实于领袖的领导的革命家呢？那是因为他同金赫、车光秀、金策一样认清了宗派的危害性，通过亲身体验比谁都透彻地明白了领袖的可贵。

金正日十分尊敬林春秋，推崇他是第一代革命人，对他的爱护和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林春秋在任驻外大使时为坚持原则，同那个国家的当权者大吵一场后回到了祖国。这时党内的宗派事大主义者说他违反了外交惯例，吵着要给他党纪处分。

但是，金正日说，林春秋同现代修正主义者斗得很好，显示了朝鲜人的气概，还把在我家院子里收的桃送给他作礼物。

林春秋不仅对自从革命斗争的初期就开始并肩战斗的许多革命烈士的斗争事迹进行考证，使之成为我们党的历史财富，而且在任驻外使节期间还完成了具有国宝价值的书《回忆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编写工作，从而把抗日武装斗争史规定为我的斗争史、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斗争史，并综合地加以体系化。对他的这一功绩和辛劳，金正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林春秋在著述活动中得到了金正日的很多指导和帮助。在这过程中，林春秋为金正日的人格美所倾倒，拜他为导师和领导者，跟随他，敬仰他。

从那时起，林春秋把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报告金正日，

遵照他的指导去行动，在所到之处都宣传介绍他的伟大，为此作讲演、著书立说。

60年代后半期，当林春秋专心从事著述活动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革命事业的继承问题，特别是接班人问题，成了时代的要求、议论的焦点。

选好接班人，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命运的根本问题。因为没有选好接班人，而葬送了革命，致使国家沦亡的事例，不是很多吗。

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在短时间内把国家建设成了世界强国，其根本因素是列宁选好了接班人。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斯大林终生忠于自己领袖的事业。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列宁的灵柩前立下了六条誓言。他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这些誓言都付诸于实践。

德国军队攻到莫斯科近郊的时候，斯大林把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干部都送到疏散地去，自己却仍坐镇克里姆林宫指挥作战。

斯大林在世时，苏联万事亨通。然而，自从赫鲁晓夫执政后，就开始变天了。从那时起，在苏联党内现代修正主义抬起了头，苏联人的思想就开始变质了。

赫鲁晓夫把领袖培养了自己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搬用个人迷信来诋毁斯大林，把忠于斯大林的老革命家全都赶出了政治局，甚至开除了他们的党籍。

有一次，林春秋在莫斯科的红场参谒列宁陵墓时偶然遇见了被革职的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对林春秋说，鉴于苏联党的前车之覆，你们绝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忠实地继承自己领袖的思想和业绩。

林春秋说，那时他清楚地认识到，解决不好接班人问题，就会毁掉党和革命。

历史的沉痛教训证明，接班人的主要标志，可以说是对领袖和领袖事业的忠诚和道德情义。对领袖的忠诚，离开了道德情义是不可设想的。

对领袖的忠诚和道德情义，这是接班人应具有的首要标志。

同时，要具备高度的才智和领导作风。只有这样的实干家才能按照领袖的思想和意图发展领袖开创的革命事业。

金正日在确立领袖的思想体系和领导体系方面所表现的非凡才能和革命原则性，他在拥护和实现领袖的路线和构想方面所表现的不屈的意志、精力以及高洁的忠诚和孝心，使我国人民惊叹不已，并深深地认识到只有金正日才是能够按照领袖的思想和意图接代领导并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领导者。

我国人民很早以来就一直尊敬和拥护金正日。

在拥戴金正日方面，过去和现在都由抗日革命战士们起着带头作用。

抗日革命战士之所以推戴金正日为领袖的唯一接班人，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只有他领导党、国家和军队，民族的未来才有保证，才能毫无偏差地接代继承和发展在白头山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抗日革命战士们推戴他为领袖的接班人，就意味着军队拥戴他为民族的领袖。

和金一、崔贤、吴振宇一样，林春秋在推戴金正日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方面起到了先驱作用。

抗日革命战士们之所以一定要推戴金正日为我的接班人，首先是因为他们为他的人格美心悦诚服。

金一常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像金正日那样对领袖尽忠尽孝的忠臣；林春秋说，没有人像金正日那样尊敬革命前辈，坚决拥护革命传统，没有一个像金正日那样伟大的思想的大师、领导的大师；吴振宇说，没有一个像金正日那样具备了无比的胆识和非凡的智略的统帅。崔贤和李宗山常常说，像金正日那样富于人情味的人是少有的。

在辅佐我，辅佐金正淑和金正日方面，李乙雪也是老资格。

解放后，他做副官的时候，每天大清早起来，巡视警卫状态，然后就在我家厨房和金正日一起吃饭，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李乙雪和年幼的金正日的关系是如此亲密。

每当我去进行现场指导时，李乙雪总是让金正日坐在他身旁。他十分理解金正日，照顾得十分精心周到。

我至今忘不了战争时期在新义州同金正日相见的事。他是在疏散地住了好久才回到我身边的。他去疏散地的时候，对跟着我的副官长李乙雪说，要代替我母亲好好照顾将军。他的话语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边。

金正日为什么至今信任和感激李乙雪呢，那是因为他母亲逝世后，李乙雪作为副官长体贴入微地照顾了他。

金正日在应受到父母爱抚的年纪失去了母亲。加上又发生了

战争，因此他和妹妹同我分离了一段时间。战争结束后，我又为恢复经济，东奔西走，无暇照料他们兄妹。金正日怀念着去世的母亲，寂寞地度过童年的时候，就是李乙雪这样的老战友代替他的父母和亲属以亲骨肉之情细心照料了他。

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李乙雪是怎样真心爱护和照料童年时期的金正日的。

1953年夏，我率领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当我们结束访问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苏联方面设宴欢送我们，宴席上的西瓜味道独特。

宴会结束后我回到了宾馆，正在包一个纸箱的李乙雪一见到我，显得十分惊慌。我问他纸箱里是什么东西，他支吾了一会儿说，想起了您的子女，弄了个西瓜。

纸箱里的西瓜有水罐那么大。

金正日拿到那颗西瓜非常高兴。他说，我国人民在战争中受尽了苦难，能让他们吃到这种西瓜该多好，把瓜子留下来，咱们也种这种西瓜吧！

李乙雪用那天和金正日一起留下的西瓜种子，从第二年开始在我家的庭院种西瓜。从此，这种西瓜就繁殖开了。

李乙雪幼年离开双亲，一直生活在我身边。他作为警卫员服务了几十年，同帝国主义者、大国主义者、反动派和宗派分子作斗争，尝尽了酸甜苦辣，饱经了风霜。在这过程中，他成长为一个刚烈的铁汉。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结束后，我马上把朴永纯和李乙雪送进在

伏罗希洛夫的无线电讲习所，指示他们学习一结束就要径直回到部队来。

我率领小分队在白头山东北部和国内进行活动的时候，李乙雪结束了无线电学习，准备回部队。总结无线电讲习时，李乙雪受到了表扬。当天，有个苏军高级干部叫他准备到朝鲜去，说这是共产国际的要求。李乙雪听了，一时目瞪口呆，愣住了。

那个苏军干部说，这是因为信得过你，我们在战略上重视的城津是你的故乡，你要到那里去潜伏下来，用无线电向我们报告敌人的动向。

李乙雪拒绝说，我也很想到家乡去做工作，但希望你谅解，我们的司令官命令我讲习结束后径直回部队做无线电教官，所以我要回我的部队去。

第二天，那个苏联人又来说服他说，他们将事后请示金日成同志批准，叫他先到朝鲜去。看来，他们是借共产国际的名义想制伏李乙雪。

李乙雪顶他说，我在执行司令官的命令之前哪儿也不能去。过去，我们由于没有一个掌握了无线电技术的报务员，流了多少鲜血，你们可能不知道。为了不再受到这种损失，我必须遵照司令官同志的命令尽快回到部队去。

当时，我们暂驻远东地区，还没有组建国际联军，没有统一的指挥体系。因此，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各自按独立的指挥体系和秩序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军事干部事先不和我们商量就要派李乙

雪去做别的工作，显然是无理的。

李乙雪表明在执行司令官的命令之前不能接受其他任何任务，这表现了他对我们的绝对忠诚。

李乙雪从少年连队时起直至现在，一生从事保卫我的工作，从未违背过我的意思，在执行任务中从未懈怠过。他一心一意时时刻刻为自己的领袖着想，为领袖的健康和安全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1939年，我在乌口江钓鱼的时候，在我身后架起机枪保护我的也是警卫队员李乙雪。

李乙雪在解放后也忠实地保卫我。

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最高司令部周边有不少反革命分子，直接关系到祖国命运的绝密资料通过朴宪永和李承烨不断传到美国人那里去。

1952年夏，李承烨指使走卒用无线电引来几十架美国飞机，轰炸了最高司令部所在的干芝里山沟。敌机把最高司令部驻地一带都给炸翻了。

最高司令部建筑旁边还投下了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那颗定时炸弹离我住的房子很近。

那时，李乙雪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副官和警卫队员开展决死战，把党员证交给组织，用木杠抬着定时炸弹扔到山谷去了。

以这次事件为契机，李乙雪捕获了潜伏在最高司令部周边的所有破坏分子和反动分子。

李乙雪对反党反革命宗派分子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56年我访问苏联等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回国后，有一天，副官长李乙雪说，现在崔昌益，朴昌玉等人在背后鬼鬼祟祟的，有些不正常，需要对他们特别注意，并一个个地揭露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南日也给我打电话说，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行迹可疑。

李乙雪同金昌凤的军阀官僚主义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李乙雪就像为我献出了一切一样，对金正日也是竭诚拥护的。

李乙雪和朴永纯来到南野营培养了很多报务员。

后来，李乙雪多次在将开展解放祖国的最后决战的重要作战地点和部署着日军主要力量的战略要冲，进行了小分队活动。

他还作为小分队成员带着无线电收发报机在汪清县老黑山一带进行过侦察活动。

当时，我们收到了这样的情报：敌人在老黑山一带修了个大飞机场，集结了数百架飞机、数百门大炮和数百辆汽车。然而，我们无法核实，作战准备遇到了很大困难。苏联人也为无从弄清这则情报是否准确而十分焦急。所以，向老黑山派去了小分队。小分队成员大胆地潜入敌人的机场，弄清了那里的新飞机、新汽车及其周边的新型大炮都是假的，是用木头做的。

李乙雪侦察一结束就用无线电向我汇报了侦察结果。

现在，很多人说，我们出色地解决了领导的继承问题。我愿意说，在解决领导的继承问题方面，抗日革命战士们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金正日小时候，是抗日革命战士们给他穿的、戴的、吃的，还教会了他走路。从那时起，在金正日的心田里就

萌生了对抗日革命战士的信任和尊敬；在抗日革命战士的心里就产生了对金正日的信任和亲密的感情。对金正日在思想精神上的成长和高尚情操的陶冶，起了最主动、最积极作用的，就是抗日革命战士。

金正日的必胜信念、坚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他在同抗日革命战士们亲密相处的过程中更加丰富、更加坚定了。

抗日革命战士们在同金正日的接触中，学到了他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和道德情义，对人民的热爱和忘我服务的精神，以及遵照领袖的思想和意图接代完成先烈开创的革命事业的不屈意志和信念；一致认为只有金正日才是唯一能够认真负责地、出色地开拓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命运的领导者。

说金正日是白头山的儿子，这意味着他是抗日革命的产儿，是民族的儿子。他是在抗日革命战士们的怀抱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在他们的怀抱里升起的我国革命的向导星，是朝鲜的儿子。

抗日革命战士们不仅在推戴金正日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方面，而且在建立他的领导体系方面也都起了先驱作用。

推戴了接班人，并不意味着万事如意，一帆风顺。因此，我一见到抗日革命战士们，就号召他们说，我们要多活几年，多多帮助金正日。

在继承并完成领袖的事业方面，再一个重要的是，要培养出竭诚拥护接班人的领导的骨干和后备队。如果不建设一支忠贞不

渝的骨干队伍，培养出忠实可靠的后备队，就既不能很好地建立接班人的领导体系，也不能贯彻接班人的路线和方针。

解放后，我们靠在白头山打过仗的骨干分子发展了革命。今天，我们拥有由党员、军人和青年组成的千百万人的骨干队伍。有了领导者，有了骨干分子，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金正日领导的朝鲜革命的未来，就像那万里晴空一样明亮、远大。

金正日出生的地方，叫小白水沟。小白水沟是只有在我国高山地区才能看到的无与伦比的胜境。80年代我们发掘这所密营之前，小白水沟还是人迹罕至的千古密林。

这地方是连不大懂军事的人也会说是天险要塞或金城汤池的处所。

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是宝地。

正日峰的原名是将帅峰，为了将金正日的业绩永世传颂，把将帅峰命名为正日峰了。现在我国人民还谱写歌曲来向全世界夸耀正日峰。

把金正日培育成民族的领导者的是白头山。白头山的战士们把他推举为向导星，白头山的正气育出了他的气概。

因为金正日是在抗日革命的烈火中生长起来的民族领袖，所以我国革命的基础才非常坚实。他是受到万众支持和爱戴的人民领导者。

金正日生为游击队的儿子，在军队和人民绝对的拥护和信任中成为领袖的接班人，成为民族的领导者，他的事业必将一如既往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第二十四章

发动全民抗战

时期：主体31年(1942年)8月～主体34年（1945年）8月)

一　为了解放的那一天

解放后，有不少抗日革命战士在填写履历表时，都在学历栏上写上“88军官学校”或“88野营学校”的字样。

当时，做人事工作的干部们，得知抗日战士们在那艰苦的游击斗争中还能从军官学校毕业，都感到非常惊讶。我国革命的第一代人在自己履历表的学历栏上引以自豪地填写的“88军官学校”的实体是什么呢？

后来，干部们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国际联军时期军政训练情况的回忆中，才了解了它的真实情况。

金日成同志是这样回忆当时的军政训练情况的：

组建国际联军之后，我们一面积极开展小分队作战和侦察活动，一面大力进行了军政学习与军事训练。

当时我们使用的教学大纲，其广度和深度都比现在的正规军事学校使用的教学大纲内容更为丰富广泛。训练强度也比他们大好几倍。

培训纲领本身就是以培养指挥员为目标的，抗日革命战士们在自己的学历栏上写上“88军官学校”或“88野营学校”的理由就在于此。

当然，学校既没有挂过这样的牌子，也没有发过文凭。但凡是完成了几年的训练课程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从现代军政大学毕业的。

那时候，我们的队员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学习了军事理论，也学习了现代正规战的战术与战法。

国际联军时期的教育，并不是单纯的军事教育，而是政治与军事齐头并进的综合性教育与训练，同时也是为解放祖国而进行的作战准备，又是为将来在解放了的祖国建设党、国家与武装力量而做的超前准备。

因此，我们同样重视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研究了党的建设理论，也学习了有关经营管理的内容。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地进行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力量的方向发展。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巨大胜利，极大地打击了法西斯德国的嚣张气焰，使苏德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梦寐以求的祖国解放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等我去做的工作堆积如山。那时，我最关注的是解放后如何建设新社会的问题。

要建立党与国家，还要进行武装力量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而要做好这一切，最困难的就是缺乏革命的骨干力量——干部。

当时，我们所考虑的是要把在艰苦的武装斗争中久经考验的抗日战士都培养成为多面手干部，以使他们能够承担军事、党务、国家管理、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各种部门的工作。我决心要通过国际联军的军政学习与训练，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初期训

练纲领的政治学习比重低于军事训练的比重。

我认为政治理论学习比重不应低于军事训练的比重。于是，我与阿巴那森科大将谈了这一点。阿巴那森科说，国际联军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民族革命所需的军事干部，所以要加紧军事训练，使他们精通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技术，以便在朝鲜满洲出现新形势时，能够同红军联合作战。

我强调说：不应该只偏重于军事训练和培养军事干部；朝鲜获得解放后，我们要建设新国家，就需要有成为自主独立国家支柱的各部门干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高训练纲领中政治教学的比重；但这并不是说要挤掉军事训练时间来搞政治教学，而是说在不改变军事训练时间的情况下，增加政治学习的时间。

阿巴那森科赞成我的主张，说我的意见很正确。

后来，在国际联军军政训练纲领中，政治学习的比重有了显著的增加。

进入军政训练时，我们对队员们积极开展了思想动员和思想教育工作。党的小组和共青组织分别召开了会议，队员们纷纷在报纸和壁报上表示了决心，还通过队内广播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各支队将得力的军政干部组成担当政治学习的教师队伍。

组建国际联军以后，远东军司令部为担当政治学习的教师举办了短期讲习班。但效果不怎么好。因为苏联教师中国话说得不流利，学员们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后来采取措施给苏联教师配备了一名汉语翻译。但对我们的同志来说，这种方法仍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因为翻译占了一半时间，所以讲课效率很低。

因此，我们又想办法把用俄文编写的教材译成朝文，然后根据我们的情况重新编写教案分发给担当政治教学的教师。

初期用作政治教学的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一般理论科目，也有苏联共产党历史和有关苏中两国历史与地理的教材。还有解释《共产党宣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教材。当然，这些教材都是有助于开阔我们队员的政治眼界的。

但是，对朝鲜人民革命军队员教苏联与中国的历史，却不教朝鲜历史，也不教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这是不合适的。

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把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与成立宣言，还有《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等过去我们指定为必读文献的几篇著作包括进了教材里，还增加了朝鲜历史与朝鲜地理的科目。

那时，负责政治教学的教师为编写教案费了很大心血。他们一面照常参加训练，一面编写教案，还要讲课，所以比其他队员更忙碌更辛苦。

我们的教师讲课水平很高。因为他们都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老战士，所以课讲得很吸引人。

我多次听过安吉的讲课，他讲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他是老政治干部，所以讲课也别有风格。他的讲课，以幽默与比喻贯穿始终，使听课的人在欢笑中就领会了革命的真理。

安吉讲课，必要的时候还朗诵诗，唱歌。当需要援引列宁论断时，他能把长达一页的论断背得滚瓜烂熟。

作战时，他指挥有方，当他发现队员们精疲力竭，步履维艰，难以坚持行军时，就马上下达休息口令，亲自打鼓吹口琴让队员们载歌载舞，重新鼓起勇气。他的这种特长在讲课中也充分地发挥出来了。

林春秋讲课讲得好，个别辅导做得更好。他组织学习讨论，了解学员的水平和消化情况后，利用课外时间对一些理解慢的队员进行个别辅导。有时还搬到队员的寝室同他们睡在一起进行辅导。

金京锡也是大受欢迎的教师。他口才一般，但备课备得认真扎实，所以深得学员们的好评。每当他编写教案的时候，总是通宵达旦。教案完成之后，他每次都要征求我的意见。他是真诚而又刚强的人。他的教案自始至终都是用文字书写的。

金京锡习惯于那时的生活了，解放后，无论发表什么讲话都亲自写出稿子。报告原稿他也都亲自起草。

严师出高徒，由于教师们如此刻苦认真，所以队员的水平也自然不低了。

安英、全昌哲和李凤洙的讲课，也博得了好评。

伏龙芝军事大学毕业生刘亚楼课也讲得很好。我还记得刘亚楼讲解苏联新型武器喀秋莎炮时的情景。

我也常常讲政治课。

军政学习总结时，朝鲜支队队员们的成绩总是被评为第一。

在部队政治部工作的冯仲云，也对朝鲜支队队员所获得的成绩表示钦佩。他甚至问我，朝鲜同志获得优异成绩的秘诀是

什么。我诙谐地说，没有什么秘诀，是头上缠着头巾，用冷水敷一敷的结果。冯仲云把手一挥说：“谁能赶得上朝鲜人的顽强劲啊。”

当时，我们的同志确实是顽强的。朝鲜支队队员们之所以在军政训练与学习中一向成为部队的模范，是因为他们对革命的责任心强。

支队的队员们当中也不是没有在马塘沟时期朴昌顺那样把学习看做头疼事的人。其代表人物，就是朴洛权。

朴洛权原属东满青年义勇军，后来我们根据北满同志们的要求输送一批优秀指战员给他们时，被调去五军做了周保中的警卫队长。

朴洛权是不惜赴汤蹈火、骁勇善战的干将。他具有军事指挥员的素质和硬骨头精神。

他在汪清游击队时，有一次突然同日寇“讨伐队”遭遇，打起枪击战，腹部受了重伤。他一面用手塞进往外流出的肠子，一面匍匐前进，终于回到了游击区。

他在北满部队做警卫队长时，因为警卫工作做得好，深得周保中的喜爱。周保中本人也多次在危急关头得到过他的救助。

朴洛权的特长是精通武器。无论什么武器，他操作一两次，就能闭着眼麻利地拆装，简直操作如神。

可是，他不爱学习军事理论。叫他学习理论，就像吃了苦药的人一样，皱巴着脸。一到理论学习时间，他就怕和讲师碰上视线，专找犄角旮旯处坐下。

我对他说：现在你指挥一个排，但将来打起大规模现代战争时，就会交给你指挥一个团或一个师；可是像你现在这样不努力学习现代军事知识，怎么能指挥大部队作战啊；如果你只凭经验指挥部队，就会致使许多队员失去生命，难道你愿意发生这种事情吗？

从那以后，他横了心埋头学习理论。有一次，我发现他在阿穆尔河岸边坐了一整天，学习步兵战术理论，就像患热病的人一样汗水淋漓。

解放后，我们派他到东北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长春的战斗。

他指挥一个团的兵力参加了长春解放战役。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在这样大规模的攻坚战役中，出色地指挥一个团打垮敌人，是因为在远东基地努力学习战术的缘故。他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被迫击炮弹片打中好几处，壮烈牺牲了。他将作为朝中两国人民永不忘记的英雄彪炳史册。

“学习也是战斗”，这句话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得出来的一条真理。革命者时时刻刻都要坚持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不学习，脑筋就会生锈，就不能展望未来。

正因为如此，金正日同志才把学习当作培养革命者的首要环节，一向强调要加强学习。

我们还通过部队的课外教育设施和宣传鼓动教育队员，使他们开阔政治眼界。

在训练基地设有拥有放映室、图书室和广播室的俱乐部。部队指战员们在这里举行集会，有时也看电影。

我们还利用广播，广泛介绍在学习、军政训练和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还及时进行有关国际和苏德战争的时事报道。

国际联军还办了报纸。各个支队和连队都有壁报，各排都有战斗快报。报纸、壁报和战斗快报大都登载有关军人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军政训练准备或总结的内容。

我们还通过红军建军纪念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和五一节等节日活动，向队员们进行革命教育、阶级教育。当时，部队广泛介绍了在苏德战争中涌现出的苏联战斗英雄。这对军人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还为牺牲了的战友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对军人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柳英灿去世的时候，我们在训练基地举行了追悼会。柳英灿是金正淑到桃泉里做地下工作时，经过革命组织的培养，后来带到游击队里来的，他作战很勇敢，在阿穆尔河往兵营运送建设用沙时，因翻船事故牺牲了。

当时，我们还举行过前线司令员阿巴那森科、瓦杜金和切日涅霍夫斯基的追悼会。

每当举行追悼仪式时，都由部队里的乐队奏哀乐。

国际联军经常举办报告会，有时也请参加过苏德战争的老战士和我们一起开座谈会。

我们在远东基地不仅积极进行军事理论学习，而且军事训练也搞得很热烈。针对现代战争的各种要求，如，战术、射击、游泳、滑雪、空降、无线电通讯等，我们都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现代战训练，是以战术训练为主，主要是进行进攻与防御的训练。

同时，学习兵器学、地形学、卫生学和工兵学，还传授了反化学战的知识。

游击战训练，是把重点放在袭击战与伏击战上。因为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所以进行这种训练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地争相参加。

举行军事演习时，我们是把帐篷搭在无边无垠的平原上度过的。那个平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指出训练方向，连长、排长就编写提纲加以执行。我们的原则是：结合抗日战争的经验和苏德战争的经验，按照适合于我国地形条件和朝鲜人体质条件的朝鲜方式进行训练。

战术训练的方法是：学完教育纲领中的一个题目，就进行实地训练，然后评定掌握的程度。

指挥员的战术训练，由我亲自执行。战术训练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军人都能担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也就是说，要使他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连长能指挥营或团，排长能指挥连或营，战士能熟练地指挥排或连。

战术训练是以排或连为单位进行的。训练时向被任命为指挥员的同志交待情况和任务，让他进行分析和判断，拿出作战方案，然后组织战斗，下达命令。

这是战术训练刚开始时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我下到连队检查战术训练情况。正好，孙宗俊担任执行排长的职务。

孙宗俊满有把握地指挥着。我给他提出了新情况：前方有各种路障，高地上有一个连的敌增援部队。孙宗俊一听就决定搞一线形正面冲锋。我告诉他应该采用迂回突破战术。然后，让他发起进攻。

孙宗俊打算采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线形进攻，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按照当时的战斗条令机械地进行训练的结果。当时的战斗条令规定，发动进攻时机械化部队冲在前面，以一线形散开的部队尾随在后面。这种进攻方法，是不符合我国山多、沟壑密布的实际情况的。

我们全面地检查了战术训练提纲，根据我们积累的游击斗争经验发展了它，编写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新提纲来指导训练。我让吴振宇编写步兵排进攻战术示范训练提纲。当时吴振宇是军士，但在我的帮助下编了一部毫不逊色的示范训练提纲。我们用这个提纲进行了整个部队范围的示范训练。此后吴振宇还制定了全支队机动训练计划。

射击训练，是以不同距离的固定靶子、活动靶子和实物靶为射击目标的。射击训练场设在离部队二三十里远的地方。

在整个国际联军中，朝鲜支队的射击成绩是名列前茅的。其中李斗益是有名的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我们还选拔一些神枪手，进行狙击训练，同时进行了地形学训练。

开始是进行射击固定目标的训练。因为枪打得多，狙击手们说回到营房后耳边还嗡嗡作响。这种训练结束后，我们又向每个

狙击手分发一份标有行军路程的地图和一个指南针，同时交给一项任务，即：到某指定地点打几只鸟，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返回。要按照图上的标识在何地拐几个弯，再回到指定的地点，就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加上还要猎获几只鸟。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训练的基本目的，是要磨练队员们的射击本领，同时让他们掌握使用地图的方法。

我们在远东训练基地的时候，还经常进行滑雪和游泳训练。待祖国解放的时机到来时，要依托狼林山脉和咸镜山脉开展游击战就必须学会滑雪；要渡过鸭绿江和豆满江开展祖国解放作战也必须学会游泳。

游泳训练是在夏季到阿穆尔河进行的。考虑到我国是三面环海的国家，我们对游泳训练予以了特别的关注。我们支队的指战员大都没有看到过大海，会游泳的人只有几个。所以，大多数人都怕江河。

当时队员们都说游泳训练很艰难，是仅次于跳伞的困难项目。

我们首先让队员们在地上练四肢动作，然后让他们到河里去，由几个会游泳的同志边作示范动作边教他们。

队员们在尝了水的滋味之后，我们又在水面上架起绳索，让他们抓住绳索游过去。

可是，冯仲云和其他几个人，练了好多次也学不会。一进河里，就像石头般地沉下去。冯仲云沉入河底，竟丢了眼镜。

金京锡单独练，差一点儿闹出事来。他一下水就沉到了河底，拼着命才摸着河床一下一下爬出来。

水性最好的队员是全顺姬。她所以水性好，是因为生长在河边上。

据说，她小时候不会游水，渡河让大人背着过去，后来长大懂事了，这样做就觉得害羞，于是就学起游泳来了。她在第七军做过护士，所以到了训练基地之后，也在部队军医所当护士。从全顺姬那里学到游泳技术的队员不止一两个。

游泳训练结束之后，紧接着进行了渡河训练。可以说渡河训练是一种综合训练。队员们全副武装，进行二十五公里左右的急行军，然后按排分别编一个木排，乘它渡河。

这种训练，哪怕出现一名落伍者，也要扣分的。崔光他们的排，因渡河训练搞得好而出名，但因为有孔正洙，常常被别的排夺去首位。

孔正洙当过雇农，后来参加游击队。他为人正直，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因天生的慢性子，不像个军人。仅一个冬天，他就烧掉几顶帽子。他是看到裤子被篝火烧着也不急的慢性子人。

孔正洙在第五军时也属于崔光他们的排。崔光因多次为他伤脑筋，有一次竟想把他撵出部队去。崔光对他说，你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可是，孔正洙却一瘸一拐地仍然跟着部队走。

崔光为此而深受感动，心想还是留下他为好，这样的人是最可靠的。

我对崔光说，你撵他他也不走，要继续跟随我们干革命，这是多么好的同志啊！就是费一点劲，也要耐心帮助他。崔光把我的话铭记在心，对他进行了特别的关照。在七米高的跳台上搞跳

水训练的时候，崔光曾单独辅导过他。

在稍远的地方，我也观看过他的训练情景。他不是挺直身板而是横着跳下来的，肚子碰着水面疼得要命，但他只哎哟了几声就又进行训练去了。反正他是个有特点的人。解放后，他做过我的副官，也做过崔庸健的护卫军官，还担任过营长。

我们在阿穆尔河还划过船。划的是一种单人乘用的，此地人称它为“阿穆尔齐卡”。那乃人善于划这种船。我们的指战员经常用它进行划船比赛，比赛距离是往返于哈巴罗夫斯克之间，只许用一个橹。阿穆尔河使我难忘。

我们在进行游泳、渡河训练的同时，还进行了登陆战训练。我国三面环海，江河密布，因此，渡河训练和登陆战训练都是为迫在眉睫的对日作战所迫切需要的。

我们还进行过以罗津港为假想目标的登陆战演习。

比游泳训练更难的是跳伞训练。在跳伞训练中，女队员们反而比男队员更大胆。在男队员当中或有惧怕这种训练的人，但在女队员当中却没有出现过一个这种胆小鬼。

跳伞训练首先是模拟训练，就是从跳台上往铺着一层锯末的地上跳下来的训练。其次，是在回转台上搞旋转训练。进行这种训练时，有不少女队员晕车，但她们仍然克服了困难，坚持了下来。

跳伞训练，是在伏罗希洛夫附近大平原上进行的，那里有军用机场。

首先我们要掌握降落伞的折叠法。

接着就进行登上约五十米高的跳伞塔，靠展开的降落伞跳下来的练习。从五十米高处往下跳时，要按照风向转一次身，熟练了这种动作，就获得了乘飞机跳伞的资格。一个伞兵组为十至二十名左右。跳伞训练，开头是在一千米高空进行，最后在六百米低空进行。一般都在八百米处下达跳伞命令。

机场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甜菜地。每当结束训练的时候，集体农庄的妇女们就跑过来，亲切地帮我们拉伞，还削甜萝卜塞给我们。

对跳伞次数多的人，发给一枚绿色纪念章，在我们支队，崔勇进创了最高记录，获得了纪念章。

我也多次参加了跳伞训练。搞跳伞训练时，时常会发生一些使人预料不到的事，如，有的人丢了帽子，有的人丢了长筒靴，有的人挫伤了脚脖子，有的人因伞挂在树枝上被悬在空中晃来荡去。

体重八十公斤以上和四十公斤以下的队员，不允许参加跳伞训练。因为身体太重，就会降速快，容易受伤；体重过轻，就会升到高空降不下来。全顺姬体重过轻，跳伞后反而升到比飞机还高的上空，好容易才落到地面上来。金曾东因身体瘦小也老是飞到老远的地方去。有一次，他飞到相反的地方，吊在了树枝上，我把他抱了下来，他的身体就像小孩一样轻。

祖国解放战争时期，金曾东在汉城和大田解放战斗中都建树了丰功伟绩，荣获了共和国英雄称号。

我们搞跳伞训练时，把降落训练与航空陆战队训练配合起来进行。

这种训练，是在1944年以后广泛进行的。

航空陆战队训练主要项目有：边降落边消灭抵抗的敌人、着陆之后迅速展开、从背后打击敌人，等等。

因为跳伞训练强度高，加上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为支援前线缩减了部队的粮食供应量，所以训练后，就觉得体重减轻，肚子也饿得慌。

为了吃饱肚子，我们就开垦荒地，搞副业生产。我们种了马铃薯、大豆和蔬菜，做到了自给自足，解决了我们粮食不足的困难。

我们的支队还采野菜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训练基地周围有蕨菜、关苍术和刺龙牙等各种野菜。

部队军医所的苏军医生看到我们用野菜熬汤吃，就要停止我们用餐，他们说不能吃没有把握的草。可是，他们尝过之后说没想到这么香。我们说这种野菜是药草，吃了能增进健康，后来他们就专要野菜吃。

有一次，种土豆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和部队的后勤部长犹太人苏军少校之间发生了争吵。那个少校看到我们的同志种的是剜出来的土豆芽，就说我们不懂种土豆，这样就会把庄稼弄糟的。我们的同志说，是好是坏，要等到秋天再看。

那年，土豆收成很好。种整个土豆的地，结了沙砾大小的土豆，而我们用土豆芽种的地，就结了拳头大的土豆。那个少校这才承认我们的方法好。那年春天，我们支队把剜出芽剩下的土豆全都煮着吃了，秋天又收获了一倍多的土豆。

我们的同志还组织了打猎队，到山里去捕猎野兽，假日还到阿穆尔河去捕鱼，那条河里盲鱼多，大的竟达数十公斤。

阿穆尔河一到鲑鱼产卵期，就有很多鲑鱼溯流而上，我们就撒网捕捞，然后用盐腌起来。鲑鱼子也做成腌制品用饭时拿出来佐餐吃。

我们还猎获大量的野兽，捕捞大量的鱼来支援西部前线。

在训练基地我们还进行了无线电通讯的训练。

北满的部队早在30年代后半期就派了不少同志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但我们支队只是到了临时基地后才派朴永纯和李乙雪到伏罗希洛夫无线电讲习班学习了三个月的无线电技术。他们回来后传授给了其他同志。参加无线电训练的男同志有李宗山、李五松等，女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她们是：金正淑、朴京淑、朴景玉、金玉顺、李英淑、王玉环、李在德、李敏等。

过去，在东南满一带活动的大部分部队，都没有使用过无线电。要培养报务员，就要请共产国际或苏联人的帮助，但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没有报务员，我们多次缴获了无线电收发报机，却派不上用场。

我们在司令部和各部队设了通信员，靠徒步保证了通信联络的畅通。我们的通信员走过的路程多的无法计算。他们走过来的每一步都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执行通信联络任务时牺牲的同志何止一两个。

李致浩入伍后，做了好几年司令部的通信员。他为保证司令部的联络畅通，忍受过饥饿之苦，疲劳之苦，也曾被敌人逮捕拷

打得体无完肤。他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用人力保证联络的畅通，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但仍不能保证通信的机动性。因此，我们对无线电通讯训练给以了很大的关注。

在解放了的祖国，不仅建设正规武装力量迫切需要精通通讯的骨干力量，就是建立国家的神经——通讯机关，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也需要培养通讯部门的骨干分子。

那时，金正淑不仅参加无线电通讯和跳伞等各种训练，还到国内各地积极开展了小分队活动。

在无线电通讯训练中，女队员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她们不仅积极参加无线电通讯训练，还同男同志一起参加了滑雪、游泳、跳伞、渡河等训练。那时的训练强度很大。苏联军官们也说比他们在军官学校时还吃力好几倍。但是，女队员们不怕吃苦，全都参加了训练。

跳伞训练开始时，我们决定不让带孩子的女队员和身体虚弱的女队员参加。可是，女队员们都表示不能接受。安正淑哭着向我提出了抗议，她说：

“不搞训练，我们女队员何必留下孩子到俄国来？”

安正淑为了来远东，把年幼的孩子留在了别人家的柴门旁，李贞仁也是把女儿留在了别人家的菜地草棚里才出来的。

她们说，早日解放祖国，就能早日同可爱的儿女们相逢，并坚决要求参加训练。

朴京淑怀孕时吃不下军人食堂的饭菜，但她时刻不离报务

台，分娩后不过几天就又参加了训练。通讯排的教官对她的那股韧劲赞不绝口，说朝鲜妇女真是又勤奋又顽强。可见她们参加学习和训练的热情有多高。

朴京淑还作为报务员，跟金策一起到敌占区搞过几个月小分队活动。她电报打得很好。

金正淑也勤奋顽强地参加了训练。有一次，她挫伤脚脖子，肿得很厉害，但仍坚持滑雪训练。我劝她休息养伤，可她却把一块纸包的方块糖递给我说，训练时嘴里含着它，呼吸容易些。

跳伞训练时，我最担心的是体重轻的女同志们能不能安全降落。但她们却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开伞，在指定的地点准确地着陆了。有的女同志为了增加体重，在背囊里装上几块砖头参加跳伞训练。

这就是我们的抗日战士的青春时代。我们为了祖国的明天，甘于吃大苦，耐大劳，从苦涩中寻找出幸福的甘甜、欢乐的滋味与生活的意义。

训练吃力，加上睡眠不足，有时使人感到精疲力竭，但是，我们为了祖国的明天，战胜了这一切艰难困苦，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的抗日老战士，将把那个时代永远铭记在心。

人人都有青春时代。但是，一个人能把自己的青春时代过得有意义，到了遥远的未来也能于心无愧地、引以自豪地回忆起它，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为祖国为民族奉献出一切，以沸腾的热情与不屈的斗志排除万难奋勇前进，这是多么可贵而自豪的生活呀！

我坚信，我们的青年也将继承抗日老战士的革命精神，为了祖国与革命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顽强地进行斗争。

日本和德国日薄西山，祖国解放的大变革近在眼前，我们为了进一步加强朝鲜革命的主体力量，下大力气展开了对祖国的方方面面加深了解的学习活动。如果我们缺乏关于朝鲜革命的正确理论和战略策略，缺乏有关祖国历史、地理、经济、文化、道德和风俗的知识，就不可能自力取得独立，也不可能建设好解放了的新祖国，更不能坚持革命的自主立场与独立性。

可是，我们的同志大都不太熟悉祖国。因为他们大都生于满洲，这也是必然的。朴成哲虽说是庆尚北道人，但他十岁离开家乡一直住在满洲；李乙雪虽然是城津人，但年幼时就渡过豆满江一直住在长白，后来才参加游击队的。

我下决心让队员们努力学习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和有关祖国的知识。

但令人焦急的是在训练基地上缺少有关朝鲜的书籍。

我指示，凡是在朝鲜出版的书籍，让到国内搞小分队活动的同志加以解决，同时也托苏联同志们给我们找一些书籍来。有一次，我们弄到了《朝鲜地理通鉴》，这本书对我们学习祖国地理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一天，我向林春秋交待一项任务，让他画一张朝鲜大地图。还指示，要把名山、大川、湖泊、平原、地下资源、各地方特产以及古迹等都要标识出来。

林春秋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把几张白纸连接在一

起，画出了一张毫不逊色于印刷的大地图。

在上政治课的时候，我把这张地图挂在墙上，对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政治干部和政治教师作了题为《朝鲜的革命者要熟悉朝鲜》的讲话。在讲话中，我强调了朝鲜革命者要熟悉朝鲜的历史和地理，还提出了主动迎接光复祖国革命大变革的几项任务。此后，国际联军所属全体朝鲜人队员，在《朝鲜的革命者要熟悉朝鲜》的口号下，深入学习了有关祖国的知识。

我记得那是中秋节前夕。那天夜晚，我们仰望着高高悬在树林上空的明月，互叙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谈啊谈，一直到深夜。

对祖国的怀念与热爱，是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勇气的源泉。我们发奋图强，促进了学习和训练。

当时，抗日战士们在连日进行战斗和紧张训练的环境中，也把相当于一个正规大学的教学计划的内容掌握得很好，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流下的汗水和付出的努力，在祖国解放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解放后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当中，也有不少从著名大学毕业的人。

还有从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毕业的人，我同他们进行过交谈，他们对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并不怎么熟悉。

但抗日战士们无论交给他们什么工作，都能拿得起放得下。

我把产业部门交给金策管，他就把搞得乱七八糟的国家产业

经济很快振兴起来了。我让安吉开办一所培养正规武装力量建设所需的军事干部的学校，他也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做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有人能比得过打过游击战的人。

在抗日革命斗争的整个时期，我们一向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心，展望着辉煌灿烂的明天，积极促进了肩负祖国未来工作的准备工作。

祖国解放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的时候，我们指示有关人员绘制平壤市的恢复建设蓝图，有的人就惊讶地说，战争还不知什么时候结束，绘制什么恢复建设蓝图。但是，由于有了这一蓝图，两年后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得以马上着手进行了平壤市的恢复建设。

革命者要高瞻远瞩，展望明天，善于规划并推动工作。

不在困难面前叫苦连天，而是勇敢地为明天绘制出宏伟的蓝图，并走在时间的前面去开创新生活，力争美好的未来早日到来，这就是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抗日革命的最后胜利近在眼前的时候，我们更加充满了乐观与信心，加倍地努力进行军政训练，争取祖国解放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只有那些以乐观精神闯过今天的难关，为祖国美好的未来而不分昼夜奋斗的人，只有那些苦心孤诣，为后代造福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热诚的革命者。

二　全民抗战的烈火燃遍全国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了进行抗日决战，提出了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总攻、全民起义和敌后联合作战结合起来统一进行的远大构思，并以此作为解放祖国的战略路线。这一依靠革命武装和全民族总动员来实现光复祖国大业的宏图，凝聚着金日成同志对在抗日革命烈火中千锤百炼的我国人民的绝对信任和无限期望。

只依靠少数先进分子和革命战士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这既是国际革命运动历史的经验，也是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教训。

我们从抗日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主张全民抗战。我们所说的全民抗战，就是使全民革命化，动员全民投入抗日革命。换句话说，就是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投入积极的反日抗战，以实现祖国的解放。

要实现全民革命化，就要使全国人民觉醒起来、组织起来；要以全民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要使全国人民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军事上做好准备。这就是我们全民抗战的主张。

全民抗战的准备，是在白头山把武装斗争扩大到鸭绿江沿岸和国内地区，在祖国光复会旗帜下积极进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运动和群众组织建设的时候，就开始全面进行的。以全民族总动

员实现祖国解放为宗旨的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实际上是全民抗战的宣言。

可以说，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我们就已经把全民抗战方针作为独立的路线提了出来，并开始采取了实际行动。为全民抗战问题，我们在白头山密营开过会，在初水滩和新兴也开过会。九月号召书可视为全民抗战号召书。

我们驻扎在白头山的时候，还提出了组建北鲜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设想。

我们一面把在地方组织得到锻炼的人送到间白山讲习所，大量培养全民抗战所需的领导骨干，一面致力于在北部地区及国内其他地区组建和壮大更多的半军事组织。

被派到国内的政工人员在所到之处组织了工人突击队和生产游击队。

最后决战的日子日益逼近，我们更加大力地进行了全民抗战的准备。

这时，我召开了朝鲜支队指挥员会议。

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做好最后决战的准备。我在会上强调指出，要周密细致地做好发动全民投入抗战的准备工作；祖国的光复大业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对此，与会的朝鲜支队指挥员都表示完全赞同。

此后，我们了解了国内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建设情况以及秘密武装活动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祖国解放的三大路线。所谓祖国解放三大路线，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总攻、全民起

义和敌后联合作战，以完成光复祖国的历史大业。

这是切实可行的路线。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呢？这是我根据民心所向得出的结论。当时，民心都向着我们。人民群众都仰望白头山，而且陆续投奔白头山，要求参加游击队做一名金日成的战士。有些人因躲避敌人征工、征兵，隐居深山老林，办起铁匠铺制造武器，准备跟日寇拼个你死我活。

再也不能在日寇的统治下忍受折磨了，在金日成游击队挺进国内时，我们也要随之奋起痛打日本鬼子；要么死，要么活，要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这就是当时的民心。

那时，在来往釜山和下关的关釜客轮“兴安丸”统舱天花板上发现“朝鲜独立大将金日成”的字样；在汉城南大门上发现“近日金日成大将凯旋祖国”的字样，吓得日寇惊恐万状。

到了20世纪40年代前期，各阶层广大人民把民族的命运完全寄托于我们身上，日夜盼望我们早日光复祖国。

民心就是人民的志向和宿愿。古人说，民心乃是天意。只要是民心所向，什么事情都能办成。这就是我们想到的可能性。祖国解放三大路线就是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的。

最后决战计划的要点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迅速挺进国内，开展军事行动，占领各道，同时向全国发出号召，把隐蔽在山里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集结起来组成武装队伍，发动全民武装起义，一举消灭敌人，解放祖国，这是有胜利把握的作战。

只要以经过抗日武装斗争千锤百炼的革命军为骨干，吸收国内的爱国青壮年扩大武装部队，在全国各地决一死战，我们自己

就完全能够实现祖国的解放。

问题是能否在关键时刻唤起人民群众投入全民抗战，我认为这是不会有问题的。三一人民起义时，有二百多万人奋起高呼独立万岁。想想看，如果发动最后决战，其声势该多么浩大。

当然，这个方针不会人人都毫无异议地接受。开始时，有的人就摇头，但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说完全有把握。

东北抗日联军指挥员们也对我们提出的全民抗战方针表示钦佩。他们说，你们的国家是日本的殖民地，武装斗争又主要在国外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出这样的抗战路线，真了不起。

我对他们说，全民武装、全民起义不是我们凭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我们不过是把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口号提出来罢了。

20世纪40年代前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体系逐渐趋于瘫痪。由于它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已成定局，因此他们的官吏普遍存在着消极怠工现象。

赵明善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他在国内进行小分队活动时，有一天在山里活捉了一个巡警。他问巡警说：在这紧急关头，你怎么像二流子一样在山里游逛。那个巡警说，日本快要灭亡了，事事不如意，心里闷得慌，才到山里来打猎消遣。

这就是当时日本官吏的精神状态。

这样的精神状态，其统治体系能不崩溃吗。

敌人阵营中的这种状态，为国内抗战组织大胆地进行全民抗战提供了客观条件。

我们的政工人员和抗战组织成员抓住敌人的这一弱点，向日本的官吏，下自面长和警察，上至道知事、总督、总理大臣以至天皇都发出了宣言书和警告信。他们吓得胆战心惊。

主体32年(1943年)2月，国内抗战组织就征兵制的实施问题，多次向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发出了警告信。

下面记述以碧城郡全体青年的名义写的警告信：

“东京市东条首相官邸东条总理大臣阁下：

“……

“朝鲜必将获得独立。

“……敌国日本要放明白些！你们不是要在半岛上实施征兵制，扩充军队吗，我们盼望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恨不得马上领到枪打击敌人。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鬼子。……

“我们要为祖国——朝鲜而战，不惜捐躯报国，反抗敌国日本，要坚决反抗到底，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死后也要反抗。我们……准备最先应征，为了实现这一宿愿，为了反抗敌国日本，不，为了叫它灭亡。”[《特高月报》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昭和18年(1943年)2月份第72页]

我们一面加紧进行全民抗战的准备工作，一面特别关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巩固在国内建立的秘密根据地，使之成为全民抗战的军事政治据点，同时建立新的临时秘密根据地；二是把更多的小分队、小组和政工人员派回国内，并责成他们根据新

的形势要求，组织全民抗战力量做好祖国解放作战的准备；三是对国内全民抗战力量实行统一领导。

全民抗战，离开武装起义是不可能的，没有根据地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在提出全民抗战路线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根据地的建设问题，准备在狼林山等大山脉建立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的活动基地、作战基地、后勤基地和全民抗战力量的军事据点的秘密根据地。

这样，在以白头山脉为中心的东北部地区，以鸭绿江沿岸，狼林山脉和赴战岭山脉为中心的北部内陆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等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秘密根据地。

20世纪40年代，根据新的形势要求，除了上述这些秘密根据地外，还在对祖国解放作战具有重要战略战术意义的国内主要要冲地建立了许多形式多样、规模不等的临时秘密根据地。

我们在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同时，还把许多小分队、小组和政工人员派回国内，我也多次率领小分队挺进到国内腹地。

我们派遣的小分队、小组和政工人员不仅在豆满江和鸭绿江沿岸边境地区，而且在包括汉城在内的中部一带和釜山、镇海等南部一带，甚至潜入到日本境内进行政治、军事活动，使广大反日群众做好全民抗战准备。

日本官方有关金日成同志派遣的政工人员活动资料写道：

“金日成部下的思想班长被逮捕。

旅满不法朝鲜人领袖金日成疯狂进行抗日阴谋活动。他的精锐部下思想班

长金某最近公开潜入间岛省图们进行地下工作，被当地警备机关逮捕。现在正接受审讯，潜入目的和活动情况如下：

一　潜入目的：一旦日苏战争爆发，在朝鲜进行后方扰乱活动，组织朝鲜第五纵队，搜集日本的银行券。

二　活动情况：作为金日成的思想班长，为达到上述目的，从哈巴罗夫斯克潜入满洲，在图们已纠集约二十名朝鲜的不法分子……

三　背后关系：已判明第五纵队本营在京城(汉城)，现在正严密进行调查。”[《特高月报》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昭和18年(1943年)2月份第82页]

促进全民抗战准备，重要的是建立一个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国内抗战运动。

国内党的工作委员会建立以后，在全国各地组建党小组，以对群众团体进行领导。30年代末，建立了地区党委会，负责对各地区分散的党小组和反日群众团体进行统一领导，起到了地区领导机构的作用。

金正淑组建的延社地区党委会就是一例。

20世纪40年代前期，在平安南道一带组建了由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参加的地区党委会并进行活动。平安南道地区党委会在平壤、介川、南浦等地分别建立了党小组，通过它，对道内各个祖国光复会和全民抗战组织进行领导。

咸镜北道的清津地区党委会，以日铁(清津炼铁厂——译注)为中心在清津地区的工厂设立了党支部。

40年代前期，为了以全民抗战打击日寇，我们开展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活动，因此国内全民抗战力量迅速壮大起来。1942年，日寇仅从国内查出的反日地下组织就达一百八十多个，其组织成员超过五十万。如果再加上没有暴露的组织和人员，其数目会更可观。

当时，国内外反日团体活动的重要特点是，大部分组织既有政治性质又有军事性质，提出了全民起义和武装抗战的斗争目的和任务。这一时期，许多团体公开声明，它们的斗争将配合全民抗战、全民起义、武装暴动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最后进攻战。连组织名称也都旗帜鲜明，都跟我们连在一起，如："金日成队"、"白头山会"，等等。

在汉城组建的"金日成队"势力扩大到济州岛摹瑟浦和国内其他各地以及日本，从其目的和活动方式来看，是抗日革命最后阶段值得注目的全民抗战组织。

我记得，这个组织被敌人发现，大概是1945年6月。那时，新潟县警察部在被征到日本做工的朝鲜人中发现了"金日成队"的组织活动情报。为了破坏它，他们进行了毒辣的阴谋活动。

"金日成队"的斗争目的是：把广大反日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抗战准备，等我们革命军发动国内进攻时，一起进行解放祖国的最后圣战。

这个组织扎根于重要兵工厂、企业、港口和军事工程工地。

据日本的秘密档案资料记载："金日成队"宣传大东亚战争

很快会以日本失败而告终，朝鲜会随之取得独立。战后，朝鲜将采用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人人都平等地过幸福生活的政治形式，“独立后朝鲜的最高领导者是金日成”，等等。

现在有不少史学家认为，1942年3月在济州岛的一个机场发生的朝鲜工人大规模暴动，是由“金日成队”领导的。这个看法不无道理。

所以说有道理，其根据是：1942年7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则消息：

“朝鲜人破坏了日本一大基地。

“朝鲜工人对位于朝鲜西海入海口的济州岛进行攻击，击毙日本空军一百四十二人。

“爱国者的暴动仍在继续。

“……

“据华盛顿7月17日电：今年3月，朝鲜的反日暴动使在济州岛或济州的日本空军基地遭到了严重破坏……

“济州岛位于朝鲜半岛南端，占据着朝鲜海峡与西海入海口的重要位置。

“据报道，3月29日，驻此岛的朝鲜工人袭击空军基地，破坏无线电收发报站，烧毁四所地下机库。在这场袭击中，一百四十二名日本飞机驾驶员和技术人员死亡，二百人受伤。

“两个汽油储槽和六十九架飞机也被破坏。后来，日本人把幸存的四百名朝鲜人都杀害了。

“据报道，3月1日，朝鲜人在朝鲜北部用炸药炸毁了三座电站。”

白头山会是1942年夏在咸镜北道城津(金策)成立的。据日本警察机关的资料称：白头山会是由一个在早稻田大学注册的人指导下组建的。因为我们以白头山为根据地，所以以此命名。这个资料还说，他们为实现朝鲜的独立而参加人民革命军并开展提高民族意识的活动。

在平壤一带还有名曰祖国解放团的抗战组织。我的堂弟金元柱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

祖国解放团是一个积极的抗战组织，它的主要目的是配合朝鲜人民革命军的祖国解放作战，举行武装起义。

他们深入到平壤及我国中西部的工业地区和农村，在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以及其他阶层群众中扩大组织，其组织网渗透到了敌警察机关和衙门。

这个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大刀阔斧，锐意进取。他们准备破坏敌人以征兵、征工的名义强制征募朝鲜青年的机关，还准备跟我们取得联系，解决武器问题，在组织成员中选拔优秀分子开展武装斗争。

他们还计划袭击警察署和面事务所，夺取粮食和征兵、征工文件；破坏交通设施；在九月山办铁匠铺，制造刀枪……可见他们要做很多事情。祖国解放团指挥部还打算把组织成员安插到日本军队和兵工厂里去。

据元柱说，祖国解放团是在斗团里成立的。后来，由于他在日寇统治末期夺取了一只手枪，被捕了。

元柱被捕以后，警察几乎每天都来翻箱倒柜，寻找他藏起来的那支手枪。

警察逮捕元柱以后，气焰十分嚣张，说捉到了金日成的堂弟。

在国内的抗日团体中，规模较大的是日铁秘密团体和京城帝国大学毕业生组建的武装起义筹备社。

日铁秘密团体，是在我们的一支小分队派去的政工人员的指导下，以日铁工人为中心组建起来的。

20世纪40年代，在日铁出现了为重建共产党而进行活动的组织，这并不是偶然的。从主导这个组织的不少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历来看，都是老一代人，他们都曾参加过工会和农会，有的还坐过几次牢。

日铁秘密团体提出了配合挺进国内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方针，并做了准备工作。这个团体在富润地区建立了秘密根据地，储备武器、粮食和药品，还印发了传单和小册子。他们在重要工厂组织行动队，还拟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如：武装起义的信号和日期，夺取武器的对象、顺序和方法，等等。

日铁秘密团体暴露以前，还出色地进行了破坏日本战时生产的工作。

这个组织还拟定了夺取驻扎在工厂附近的日本军队的高射机枪的计划。

日铁反日会不仅进行了破坏钢铁生产的斗争，还进行了拒绝装船的斗争，使日本鬼子无法把生铁运到日本去。因此经常出现许多货轮因装不了货，好几天停泊在清津港的现象。

汉城的武装起义筹备社也是规模较大、组织严密的团体。

京城(汉城)地区的武装起义筹备社，有许多老一代共产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参加，在国内的秘密组织中再没有像它那样吸收那么多知识分子参加的组织。这个组织又称城大秘密社。解放前，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城大事件”，就是指这个社发生的事件。

京城帝国大学简称城大。秘密指导这个社的人是我们派去的工作员。

京城地区武装起义筹备社的组织者金一洙和徐重锡，是我早在吉林时就认识的老共产主义者。

金一洙曾到过苏联远东地区，跟李俊的儿子李镛一起在苏联赤卫军朝鲜营当过连长。他曾多次参加扫荡白军的战斗，屡立战功。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参加过高丽共产党李东辉派。

有一段时间，金一洙也参与过朝鲜共产党的重建活动，但他后来说，党是需要重建的，但绝不能再干拿着土豆印章去找共产国际的那种蠢事了。

他虚心接受了我们党的建设不能自上而下，而应自下而上的主张，即先深入到群众中去，组建基层党组织然后成立中央，不能先成立中央而后组建基层组织。

金一洙后来流亡到满洲，在东满特委工作，被日寇警察逮捕，坐过几年牢。

获释后，他为了寻找我们的部队走遍了东北各地，但没能找到我们，就回到国内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了。

他重视工人阶级，看来他有了进步。

徐重锡、徐完锡兄弟俩，也是我所熟悉的人。

徐重锡本是汉城派，后来转为ML派。他在吉林的时候，跟黄贵轩的父亲黄白河关系很密切。

徐重锡在吉林搞青年工作时，我就认识他。因为他住在我寄居的张哲镐家的邻居，所以认识。他多次和我进行争论。

后来，徐重锡说他要与派别斗争诀别。按照一国一党制原则，当别人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却坚持党的重建运动。在这过程中，他被捕坐了几年牢。可见他是一个有主见，坚贞不屈的人。

解放后，他们兄弟二人为祖国的统一和南朝鲜的革命做了很多事情。

国内抗日战士们在汉城组织武装起义筹备社后，又把组织扩大到兴南氮肥厂等许多工厂、矿山和学校。

京城地区武装起义筹备社建立了秘密活动据点后，还积极购买武器、印发出版物和收集军事情报，并使组织成员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进行军事训练。

日寇统治时期，能上朝鲜唯一的大学——京城帝国大学的，都是了不起的人才，大都是有产阶级的子女。日本人并不是为了启蒙朝鲜人而办这种大学的。他们看到朝鲜人要创办自己的民立大学，为平息这种事态，设立了所谓帝国大学，以豢养殖民统治的走狗。

在这种大学里出现了武装起义筹备社，不能不说是使人震惊的事情。

安亨俊在汉城组建了全民抗战组织，并积极进行了活动。他很早就在我叔父亨权的指导下于北部边境一带开展反日青年运动。

安亨俊在汉城钟路大街挂起股份公司的牌子，下设企业，一面进行组织工作，一面为革命筹措资金。他在下属企业木材所工人和放木筏的工人中间建立了全民抗战组织网点。

安亨俊跟其他同志们一起廉价购买了因经营困难而停业的日本人皮革厂，把它变成了筹备武装起义的后勤基地、联络场所，并用这个厂赚的钱购买武器。

解放初期，安亨俊在汉城市人民委员会当过首任宣传部长。

1946年春，我和金策一道在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会见他。

朝鲜语学会的李克鲁等学者也建立了组织，并进行了斗争。

咸镜北道的同志们爱夸耀他们的地方武装，说会宁鹊峰人民武装队、熊山工农武装队和罗津人民武装队如何了不起。他们的确了不起，值得夸耀。他们的武装队发挥了不少作用。

茂山矿的青年工人组建的白衣社，系统地听取苏联的朝鲜语广播，并进行宣传活动，组织了群众的斗争。

铁山的爱国团、顺安铁工所反日武装队等各种名称的武装队在全国到处进行活动。

这些组织，有不少是由跟我们一起工作过的人组建的或由我们专门派去的人组建的。

在我们的指导下活动的兴南地区抗战组织，由于进行殊死的

斗争，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绝对秘密进行的毁灭性武器制造计划无法实施，陷于流产。

李贵显早年同朴寅镇、李昌善等人一起，参与丰山一带反日群众团体的建设，后来他被派到咸镜南道虚川一带进行活动，发动水电站建设工地的工人和爱国人士建立了抗战组织，开展了积极的斗争。

日本侵略军队内部也有抗战组织。

1944年，被征到镇海海兵团的一批朝鲜青年确信战争必将以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而告终，说：与其作为战败国的士兵白白送死，不如投到金日成部队为实现朝鲜独立做出贡献，便集体逃跑。这个有名的故事，同志们也都熟悉。

有一年，我访华时，周恩来和彭德怀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前线有许多全副武装的朝鲜青年要求我们把他们送到金日成部队去，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这样做，他们没能如愿以偿，被分配到华北义勇军去了。

日军驻平壤第三十师中的朝鲜青年也组织了反日学生兵武装队，打算与朝鲜人民革命军汇合。

这支武装组织严密，拥有两个支队，下设四五个分支队。

起初，他们不知道斗争方向，只是暗中摸索，后来有了我们的组织线才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积极开展抗战活动。

这支武装队的行动计划是够大胆的。他们准备趁中秋节一起逃出兵营，在阳德郡北大峰山脚集结，用袭击警察署和宪兵队的办法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沿着山脉开到普天堡附近的山林

去。然后，在为躲避征工、征兵而隐匿在这里的人中扩充队伍，建立活动据点，开展游击斗争，等待时机成熟配合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进行祖国解放作战。

他们在会议上提出了挺进白头山的口号，并周密细致地进行了与朝鲜人民革命军配合的准备工作，但由于一个成员不慎，使这计划流产了。

当时，日本军部获悉后惊恐万状，说：这是建军以来最大的阴谋叛乱事件。

过去在国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事各项工作的人也都遵照全民抗战路线，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同我们一道参加抗日斗争的最后决战。

李铉相因共产主义小组事件被捕囚禁在西大门监狱时，朴达、权永壁和李悌淳也在这个监狱里，是他们向李铉相传达了我们关于祖国解放作战的构想。

他得知我们的构想以后，为了争取尽早获释，组织抗战队伍，同日寇拼个你死我活，开始进行绝食斗争。

他坚持了二十多天的绝食斗争，病倒了，因此获得了保释。他在疗养了一段时间后，到了智异山，将躲避征兵、征工而隐居在山里的青壮年和学生组成了小型武装部队。

李铉相占据的智异山是解放区形式的根据地。他为了同我们进行联合作战，派联络员来到了白头山。

我们派赵东旭去汉城做全民抗战准备。他在那里建立了六六同盟，下设登山队和足球队等几个合法组织，跟汉城的其他反日

组织也保持着紧密联系。解放后，赵东旭在汉城为了按照我们的意图搞好南朝鲜的青年运动做出了很大努力。他一到平壤就来找我，向我汇报了十年来的活动情况。

金三龙也在狱中组建了秘密组织，为贯彻我们的全民抗战方针做出了努力。他被监禁在汉城西大门监狱时，在狱中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转向的运动。他之所以身陷囹圄，是因为共产主义小组事件。他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以后，作为组织的负责人积极开展活动。这个小组是以重建党的组织为目的而组建的。

参加这个组织的不少人支持我们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最后汇合到全民抗战洪流中来了。

过去我也说过，我们派去的工作员深入到汉城中心，向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分发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还通报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战果。

汉城共产主义小组在汉城一带的许多工矿企业组织工会，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

组织并领导这个组织的金三龙被捕入狱后仍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

朴达从汉城回来后，常说：金三龙是重情义、坚贞不屈的革命者。他是狱中始终不低头的几个人之一。

和李铉相一样，金三龙也在西大门监狱里见过朴达。在坐牢时，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亲密。朴达出狱后，金三龙把他送到汉城医院住院治疗，并细心关照他。朴达按照我们的指令回

平壤时，也是金三龙安排护送的。他让朴达转给了我一封信，表示问候。

金三龙是一位具有坚强信念、老练成熟和极有组织能力的党的活动家，是为祖国和民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生的爱国者。

在南朝鲜劳动党活动被视为非法的情况下，我们为他的安全着想，劝他：如果形势险恶，就毫不犹豫地转移到北半部来工作。但他不离开自己的岗位，在地下认真负责地领导南朝鲜的党务工作，后因叛徒告密被南朝鲜警察逮捕，不幸遇难。

40年代前期，我们领导全国人民周密地进行迎接祖国解放大变革的准备工作。1945年8月，敌人在我国的统治体系为什么垮得那么快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全民抗战组织在全国各地同时奋起一举粉碎了日本统治机构的缘故。

苏联出版物在谈到40年代前期我国各地组织的全民抗战力量积极开展反日斗争时写道：

“太平洋战争时期，由于朝鲜的反日运动异常高涨，使日本的形势日趋恶化。

“在朝鲜发生了多起怠工和破坏日本军事设施和军需物资的事件。例如，1942年2月在新义州，满载着军需物资的七辆车被破坏，造纸厂被烧毁；在雄基，六个燃料库爆炸，烧毁；在济州岛，在日本航空基地做工的朝鲜工人破坏了六十九架日本飞机……”（维·雅罗沃伊《朝鲜》43～44页，苏联海军出版社，1945年9月）

在为祖国解放最后决战做准备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力量全部发动起来了。

可以说，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调动了民族的爱国力量，形成了全民反日抗战的洪流，这就是40年代前期我国革命发展的新面貌，同时也是突出的新成果。

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相对峙的势力，在这个时期超越了理念的差别，再度实现了合作。

李镛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是。他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是和我父亲同一辈的老一代。然而，他同我们采取了统一步调。对于真正的爱国者来说，关键不在于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信仰民族主义。

金九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是。他是民族主义者，甚至是顽固的反共分子。但是，他号召侨居美国的同胞为我们筹措军费。最后，为了实现同我们的军事联合派来了联络员。

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所以发誓要做金日成的部下，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走白头山的路就是爱国的路，也是争取独立的路。

拘泥于原来奉行的主义主张和理念，就不能实现民族的大团结。要像40年代前期迎接祖国解放大变革那样，把各自的理念暂时搁置起来，求大同，存小异。所以，我说抗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珍贵的。

三　对日作战的突破口

在对日作战前夕，无数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高举解放祖国的旗帜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进行了分散的小分队侦察活动，许多战士壮烈牺牲了。

参加小分队侦察活动的朝鲜人民革命军队员们发扬自我牺牲精神，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打开了对日作战的突破口。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以下回忆，使我们更加缅怀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在敌后侦察活动中建树的丰功伟绩。

在为解放祖国的最后对日作战做准备时，朝鲜人民革命军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对日作战打开了突破口。

这一时期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是通过国际联军所属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这条线和国际联军别动队这条线进行的。

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为即将发生的对日作战积极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尤其是与国际联军的共同侦察活动。

要想及时探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意图，不仅要在日本国土，还要在与苏联接壤的满洲和朝鲜，大力进行军事侦察活动。

40年代前期，随着祖国解放的大变革逼近，我们面临着与以前无法相比的繁重的侦察任务。

当时，我们为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决战做准备，侦察工作就繁重起来。过去，主要是对一两个或三四个目标进行袭击战、

破击战和伏击战，只打有把握的仗，因此侦察任务也不很繁重。而这时，敌驻地、要塞区、机场、炮阵地等一切战争要素都成了侦察对象。甚至，反动团体的所在地及其构成特点、民心动向也都成了我们的侦察对象。

40年代前期，我们重视军事侦察活动的另一个理由，是日军移动频繁，指挥机构不断更替。

德国一侵犯苏联，日本军部就把在满洲的关东军兵力增加了几十万。他们打算希特勒军队一旦占领莫斯科，苏联陷入混乱，就立即开始北攻。在这种野心支配下，他们把大量的军队开进了满洲。

看到希特勒军队攻不下莫斯科，开始踏步不前，诡计多端的日本军部就断定北攻为时尚早，马上改变计划，转入了“北守南攻”的策略。

他们偷袭了珍珠港，占领了新加坡，把集中于满洲的兵力大部分调到了南方。为填补这里的空白，他们不得不把新的兵员和战斗器材运往满洲。

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在满洲和国内的广阔地区纵横驰骋，收集了为祖国解放作战所需的大量情报资料。

我认为，在他们收集的军事情报中最重要的是有关日军在朝苏、朝满、苏满边境一带构筑要塞和要塞地区的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我们是不能出色地进行对日作战的。由于我们事前全部掌握了敌人的计划，所以号称“老虎之子”的关东军精锐部队连抵抗都没能来得及组织就投降了。

日本人炫耀这些要塞为铜墙铁壁，这并非是吹牛。世人只知道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和德国的西格弗里德防线了不起，但没有几个人知道日本构筑的要塞和要塞地区有多么庞大坚固。

若把日本人修筑的要塞区连接起来，总长就达一千多公里。日本长期投入大量物资构筑了这个要塞防线，一个要塞区平均有五百个永久碉堡和土木结构火力点，再把指挥所、监视哨、火力阵地、各种掩体、堑壕、交通壕、反坦克、反步兵路障都合起来，就森严得连一只蚂蚁都不能通过。关东军主力防守着这些地区，从这一点，就能知道日本军部从战略上多么重视这些要塞区了。

因此，我们首先致力于侦察这些要塞地区。

我多次带领小分队到满洲和国内进行活动。有一次，经过东兴镇要塞区的北侧，到处都是敌人的碉堡和伪装好的掩体。晚上宿营，凌晨醒来一看，不是在敌人地下构筑物的上面，就是在碉堡旁边。

另一次，我们在夜里行军到一个山脚下宿营，大清早醒来才知道山坡上设有敌哨所，我急忙叫醒队员们，悄悄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吃早饭时，我对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昨天夜里我们是在敌人鼻子底下宿营的。他们听了都大吃一惊，个个目瞪口呆。

为侦察要塞地区，我们专门派了几个侦察组。对咸镜北道庆兴(恩德)要塞区的侦察，是由十几个侦察组承担的，对珲春、东兴镇、东宁要塞区，也投入了不小的力量。

当时，我军侦察组甚至潜入敌人要塞区取来了永久碉堡的混凝土碎片。

碉堡的大小和大炮的口径，可以用绳子或尺子量，但在敌哨兵旁边神不知鬼不觉地取来混凝土碎片，谈何容易。可是，我们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我军侦察组不仅对边境一带的要塞，而且对罗津、清津和元山一带以及国土南端的镇海要塞与丽水要塞也进行了侦察。

他们侦察分布在广阔地区的要塞和部署在那里的兵力、武器装备、机场和飞机数量，还侦察港口设施、敌舰型号、吨位、港口出入规律、通讯所和军用仓库的位置等各种情况。

在对要塞区和要塞的侦察中，以吴白龙为组长，以金铁万、韩千秋、金赫哲为成员的侦察组屡立殊功。这个小组出色地完成了几十次的国内侦察任务。

初期，因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把鸽子当做通信手段。一到达目的地，就把字条放进系在鸽腿的铝盒里放回基地。从1942年左右起，到国内和满洲进行活动的大部分小分队和侦察小组都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机。

挺进国内的时候，大体上都穿日本人称之为国民服的服装和劳动鞋，带一些干粮。到了国内，既不乘坐火车和汽车，也不利用牛马，而是徒步行军。

我们的侦察员都训练有素，他们对侦察对象地区的地理、风俗与语言习惯都非常熟悉。

敌人在豆满江沿岸和北部边境地区强化警戒，不让朝鲜人民革命军小分队和小组潜入。他们在小分队和小组可能通过的每座山上都布下细绳，严密监视，如果发现哪里的绳子断了，就立刻

动员军警和居民进行搜索，连地上的脚印也不放过。

吴白龙侦察小组好几次闯过了危险的虎口。

有一次，这个侦察组在从雄基(先锋)通往庆兴(恩德)的猪瑟岭遇到一个罪大恶极的警防团员就消灭了他。第二天早晨，敌军警发现那个警防团员的尸首，就在猪瑟岭一带实施大规模搜索。敌人还强迫几百名老百姓参加搜索。

我们的同志藏在柞树丛里，老百姓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

金铁万把写有“我们是为朝鲜独立而斗争的革命军”的字条挂在树枝上。

被迫参加搜索的人们看到了那个字条，叽咕了一阵，说这里没有革命军，就翻过那座山离去了。

吴白龙侦察小组在国内进行活动时，开辟了许多临时秘密根据地。

甫老知山、小炭窑院、青鹤山等临时秘密根据地，都是他们开辟的。

他们利用这些临时秘密根据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从中结识了许多可以信赖的好人。

他们引导一位烧炭老人，让他帮助收集情报，替他们买报纸和杂志。经过一段时间，老人熟悉了侦察工作，他们就派他到清津港和元山港去执行侦察任务。老人以在元山的亲戚家为据点长期对元山要塞进行了侦察，为吴白龙侦察组收集了许多重要情报。

在甫老知的深山老林子里有一个以种田烧炭为生的人，他还

会说几句日语。吴白龙吸收他参加侦察活动，几经锻炼后，把他派到了日本。当时，日军每年秋天都要把在此地军马补充部驯养的马运到日本去。每当这时，日军就在朝鲜人中征集马夫一同带到日本去。吴白龙就乘机把自己的人安插在他们中间。在吴白龙那里接受特殊任务的这些人，到日本后，为利用罗津——新潟、清津——敦贺航路，开辟朝鲜——日本通路做出了贡献。

吴白龙侦察组活动的特点是：活动范围广、情报资料可靠。

对朝鲜南端的要冲——镇海、马山、釜山一带的情报，也是由吴白龙小组派遣的人收集的。被派到釜山的一个情报员开杂货铺作掩护，进行侦察活动。丽水要塞也有我们派遣的工作员进行活动。

他们进行侦察活动，既大刀阔斧，又准确无误。对日战争前夕，苏军拟定的罗津、雄基、清津等东海岸地区主要港口的登陆作战计划，完全是以吴白龙侦察组收集的情报资料为基础的。这个小组对港口的侦察活动是大胆无比的。

这个侦察组的金赫哲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英雄战士。他在第十次到祖国进行侦察活动时不幸牺牲了。他们小组一共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患有关节炎。小组胜利完成了任务，但因那个队员步履艰难，金赫哲就背着他走。恰恰又下了大雪，他们寸步难移，三个人在雪路上蹒跚。

因此，耽搁了时间，在对岸接头地点等待他们的人撤走了。

小组负责人看到战友们一连几天粒米不沾牙，快要饿死了，就到村里弄粮食去了。金赫哲一个人尽力照料患关节炎的战友，可是他终于牺牲了。

其实，金赫哲也难以支撑下去了。他倒在雪原上吃力地往前爬，最后精疲力竭，再也站不起来了。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像金赫哲那样饿死的战友不止一两个。

第二年春天，村里农民发现了他的遗体，把他安葬在豆满江畔。患关节炎的那位战士也安葬在他的旁边。金赫哲在牺牲的最后时刻仍紧握着手枪。农民们看到那支手枪就知道他们是游击队员了。

金赫哲是金正淑到桃泉里搞地下工作时带到我们部队来的。他为人忠实，很勇敢。桃泉里人都英勇善战。

庆兴要塞区的侦察任务，是由孙泰春侦察小组承担的。他们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孙泰春侦察小组在雄基后山建立了临时秘密根据地，他们收集到了很多情报资料。1942年夏天，他被敌人包围了，就赤手空拳地同一伙敌人英勇搏斗，最后壮烈牺牲了。

他原属和龙游击队，后来被编入我们主力部队，当过班长、排长。

在和龙参加游击队的朴永纯和金周贤极口夸赞他，说他是有头脑、有骨气、信念坚强、刚正不阿的热血青年。

对孙泰春的这种赞扬，毫不过分。他是深受战友们爱戴的人。论游击队经历，是个老兵，入伍年龄跟金周贤一样。他是个卷发美男子。

孙泰春的为人有一段令人动心的故事。

孙泰春住在和龙的时候，与父母指定的姑娘订了婚。尽管是

父母包办，但他俩倒还相亲相爱。后来，姑娘的哥哥因参加革命被捕坐牢，加上地主的逼迫，姑娘家不得不把草房抵了债，全家被迫搬到丧具房住。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就开始有了波折。

当时，孙泰春在长仁江做共青工作。他看到未婚妻一家人经受的苦难，难受极了。他想方设法要帮助她。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下了决心去找邻村共青盟员金某的父亲。他对金某的父亲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儿媳妇吧，条件是要给我一头牛。金某的父亲听了心想，只要能娶一个好儿媳妇，暂送一头牛也值得，就说，只要以后还牛钱，就好说。孙泰春说的好儿媳妇，就是自己的未婚妻。

孙泰春把牛弄到手后，用它换了钱，替未婚妻家还清了地主的债，找回了草房，让她家重新返回了旧居。随后，他把事情的原委如实地告诉了未婚妻。

未婚妻听了他的话立时哭起来，说绝不嫁给别人。孙泰春只好努力劝说她，对她说，我怎么忍心让你嫁给别人呢？难道我们不能为备受地主逼迫的父母兄弟姊妹牺牲爱情吗？求你不要反对我这样做。听了孙泰春的话，姑娘不再说什么，只是悲伤地哭泣。

可是，祸不单行，姑娘跟姓金的青年结婚的那天，“讨伐队”突然打进了村子。村里顿时人仰马翻，新郎和新娘也吓得仓皇逃难。后来，全家离散，新郎参加了游击队，新娘则留在敌后做共青工作。孙泰春也参加了游击队。

姓金的青年在汪清游击队活动，后来牺牲了。不幸的女人忘不了孙泰春，守寡终生。

我一向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孙泰春。他参加了间三峰、茂山地区、红旗河等我们组织并指挥的所有重要战斗，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在红旗河战斗时，他作为前方尖兵，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孙泰春一家同汪清吴泰熙一家一样，是全家人都为抗日斗争捐躯的革命家庭。孙泰春的兄弟孙泰伊、孙泰云、孙泰龙也都参加了游击队和革命组织，在斗争中壮烈牺牲。

金学松是在侦察庆兴要塞区时牺牲的。他也像孙泰春一样被敌人包围了。他把侦察资料交给金凤锡后，为把敌人引向自己保护金凤锡而壮烈牺牲了。

参加侦察清津、罗南要塞的还有韩泰龙小组。他们有时装扮成日本宪兵，有时伪装成修鞋匠，有时装扮成黄包车夫。他们要侦察敌人设在一个山岗上的高射炮阵地，可是，因为敌人戒备森严，伪装得再好也难以打进去。只有靠近阵地，才能查出大炮的口径和数量，但是很难接近。

一天，他们在通往高射炮阵地的坡路上，碰到一位正在吃力地拉手推车的老人，他们就帮他推车。老人十分感激，再三道谢。韩泰龙边推车边给老人讲他们“流浪讨饭”的凄凉身世。老人听了很同情他们，哀叹说，只有日寇灭亡，朝鲜人才能活下去。韩泰龙乘机指着高射炮阵地说，日本人有那么多大炮，怎么会灭亡呢？老人不以为然地苦笑着说，那座山上的大炮大都是假的，没有几门是真的，他亲眼看见鬼子们砍树剥皮，涂上油漆运到阵地上去。他还对清津一带的日军兵力部署情况、清津港的船

只出入情况、物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

同别的通路收集的资料对照起来，这些情报都没有错。

在对稳城、庆源、庆兴等北部边境一带要塞区和要塞的侦察中，朴光鲜侦察小组和洪春洙侦察小组做出了很大成绩。

朴光鲜小组把军事侦察工作和群众工作结合得很好。他们既致力于军事侦察，也没有放松使群众革命化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群众工作做得好，所以在军事侦察活动中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帮助。

稳城、雄基、庆源、庆兴、罗津一带有很多我们早在30年代初期建立的组织。朴光鲜小组所以能够收集到许多情报资料，就是因为他们很好地发动了这些组织。

解放后，朴光鲜在回忆小分队的活动时说，他们的侦察组在咸镜北道北部一带进行活动时，得到了稳城居民的很多帮助，后来才得知他们都是从30年代前期起受到“吉林风”和“间岛风”的影响，坚持进行援军运动的组织成员和他们的后嗣。他还说，他们小组到稳城偶然接触到的区长，原来是地下组织成员。那个区长经常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情报，如：今晚不宜渡豆满江，上边有指令对渡口严格检查；在哪里窃听电话最安全，等等。

在帮助朴光鲜侦察小组的人当中，还有在南阳宪兵分队当宪兵伍长的人。朝鲜人当宪兵伍长，是罕见的。像洪钟宇那样当宪兵辅助员的朝鲜人还有一些，但当宪兵伍长的朝鲜人却是极少见的。

朴光鲜他们决定争取他，就积极地接近他。在这过程中了解

到他是从40年代初就跟孙长春有联系的祖国光复会特殊会员。在庆源郡进行小分队活动的孙长春牺牲以后，他潜伏地下，等待人民革命军派人来找他。

他把宪兵队的一切情报资料都提供给侦察组，还保护朝鲜人民革命军小分队和革命组织成员的安全。

有一次，小分队的一个小组在侦察豆满江流域要塞区时被敌人扣住了。在这紧急时刻，他对放哨的警防团员和密探说要由他直接调查处理，放走了我们的小组成员。而后，他训斥警防团员们说，这些人是宪兵队所属的“密探”，你们竟敢抓自己人，真是岂有此理！

南阳是保证边境一带要塞区和日本国土联系的中继地点。在我国北部边境地区，连接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公路、铁路、通信网点基本上都通过南阳，侵略中国大陆所需物资也通过南阳运到东北地区。

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侦察小组吸收南阳的宪兵伍长搞情报工作，是一个很大成果。

朝鲜人民革命军小分队和小组还大胆地吸收敌机关人员来搞军事侦察。有一个朝鲜人在西水罗警察署当听差，他对侦察庆兴要塞区和罗津要塞的我们小组成员给了很大帮助。他以殷勤侍候骗取署长的信任后，收集了各种情报。后来还窃取重要军事机密文件交给我们侦察小组。韩昌凤和赵明善在北部边境地区活动时常去的青鹤的日本警察中，也有积极为我们侦察小组服务的人。

我们通过小分队和小组的侦察活动严密观察日寇的作战意图

和兵力流动情况，大量收集了我们在进行最后总攻时所需要的有价值的情报资料。

日本人好诈，所以，我们的同志只好进行反复侦察。敌人耍了种种骗术，但是没能瞒过我们的侦察小组。

尹泰洪也收集了不少关东军第一方面军编制的情报资料，为国际联军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还把大量工作员长期安插在敌占区。当时，我们的工作员潜入到敌占区的主要部门，甚至潜入到伪满军、伪满警察和日军部队。

搞地下工作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无论处于什么环境，只要没有调动命令，就不得任意离开工作地点，也不得泄露工作秘密。这个原则，必须死守。

我们的同志是严格遵守这个原则的。

池京洙就是这样一位同志。在最后攻击作战前夕，我们司令部交给他一项任务：到敌占区长期潜伏下来搞地下工作。地点是苏满边境地带。

池京洙用工作资金买了土地和房子，还成了家。他做了地主，以熟练的方法拉拢日本军警，从他们那里探出绝密资料送给司令部。他提供的资料在解放祖国的最后攻击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解放祖国以后，也没有召回他。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他工作的地方将会成为同蒋介石军队的决战场。

那个地方一获得解放，他在佃农们拥来清算之前先主动缴出土地和房子，做好了用自己的双手种庄稼过日子的准备。因为他

这样做，没有被列为打倒对象。

没过多久，这个地方又被置于国民党军队统治之下。他收回分给佃农的土地，又做了地主，跟国民党军队上层拉关系，以收集重要情报资料。

可是，东北从国民党军队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后，一直默默地为革命立功的池京洙却被划为反动分子，差一点被农民打死。尽管如此，他在公审会上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

幸亏我们的同志当场出面证明他是抗日游击队员，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把他召回祖国了。

珲春县密江附近有个地方叫莎塞沟。这个地方住着一位姓廉的以狩猎为生的老人。当时，日寇不许一般居民狩猎。准许狩猎时，就提出附加条件：必须协助他们的情报活动。廉老人接受了这个附带条件，开始狩猎。

担任图们侦察的任哲小组接近这个老人，要求合作，他答应了。这样，他不得不脚踏两只船，同时执行日寇指令和游击队指示。他给敌人提供假情报，给游击队提供真情报。

任哲小组之所以能够胜利完成图们侦察任务，是因为得到了这个老人的帮助。以前，派到图们一带的侦察组因被敌人识破而失败，但他们的小组却成功了。图们是日寇秘密侦探机关和军警的集结地。

解放后，人们说廉老人是当过日寇密探的反动分子，把他的家产全都没收了。他也和池京洙一样，在公审会上受了罪。1946

年初，任哲出面替廉老人作保。从此，他受到人民的尊敬，被誉为爱国者。

随着对日作战的迫近，打开对日作战突破口的军事政治活动就更加迅猛了。

战败前夕，日本的政界和军部提出了要“死守朝鲜”的口号。他们说，在自活自战体制中朝鲜不仅是侵华战争的兵站基地、战争最后据点，而且是日本的最后输血路，朝鲜绝对不能放弃。“死守朝鲜论”就是要把朝鲜作为最后支撑点进行顽抗，企图苟延残喘。把所谓的“死守朝鲜论”付诸于实践，就意味着朝鲜将变成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决战场。

因此，我们就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国内侦察，以掌握敌人新的军事动态和秘密。

其中，对敌军用机场的侦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升级地扩大战争，在朝鲜和满洲新建和扩建了很多机场。在朝鲜，主要修在东海岸一带，清津和吉州等地的机场都是这个时期修建的。

可是，在吉州新建的机场，日军进行试飞时，一架接一架，都来了个倒栽葱。他们经过多次试飞才明白，吉州地区的气流具有吃掉飞机的魔力，便废弃了这个机场。由于建设这些机场，无数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到东海岸地区进行活动的小组连这些资料都收集到了。

侦察会宁机场的小组查实了这个机场上的飞机没有几架是真的，大都是假的。

金慈麟小组经东海岸潜入到平壤，在牡丹峰拍下了机场的照片。

机场有兼管飞机修理和汽车修理的修理厂，还有零部件仓库、运输车间、医院、食堂等几个附属建筑。金慈麟侦察小组乔装成日本宪兵进入机场，进行侦察，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了。

被派到北满的金大洪也出色地进行了机场侦察。他伪装成打零工的人，对苏满边境地区的机场进行了四个月的侦察。那个机场上的真飞机，不过二十架，其余都是模型。

我们的侦察兵受了很大的苦。有的侦察兵为了侦察敌人的移动情况，在铁路附近建造物旁边的污水里一连潜伏好几天，了解军用列车的通车时间和编车规律；有的侦察兵在炎热的夏天，一整天藏在令人窒息的獾子窟里，流着大汗，侦察敌人的战术训练状态。

我不能忘记，到远离训练基地几百公里的地方进行侦察活动，全体壮烈牺牲的一个侦察组。这个侦察组一到指定的日子就用无线电把侦察到的情况报告给司令部。他们的情报资料丰富、可靠，又及时，所以，不仅我们，连苏联同志也非常满意。

有一天，那个侦察小组用无线电发来了紧急信号，说侦察小组被敌人包围了，无线电位置在山顶上，现在发最后情报资料，望速收信。

接着又报告说现在敌人压缩包围网，向有无线电的山岗扑过来；年轻的队员已同敌人拼了命，年纪大的队员也壮烈牺牲了；她自己准备发完报就用一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那个报务员是个姑娘，在南满参加游击队，她发完这些电波后壮烈牺牲了。

金洪洙也英勇就义了。

他是1943年到珲春进行侦察活动时被捕的。敌人施加严刑拷打，逼他供出秘密，但他守口如瓶。最后，敌人用磨土豆的机器把他磨死了。

国际联军报纸用很大篇幅介绍了他的斗争事迹。

一有艰巨的任务，他就自告奋勇，所以，我非常爱惜他，可他死得太惨了。

池凤孙也同年春在珲春进行侦察时牺牲了。

朝鲜人民革命军小分队、小组的侦察活动和英雄事迹，是说不尽写不完的。

为了打开对日作战的突破口在敌后进行侦察活动的日子里，我们取得的成就，离开人民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我们得到了人民的很多帮助。

其实，我们部署艰巨的敌后侦察的时候，对人民的帮助寄托很大的希望，再三对小分队和小组强调，在敌后一定要依靠人民，取得人民的帮助。但又担心，敌后侦察这个新方式的斗争能否像我们在东北和国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大部队游击战那样同人民结成亲密无间的血缘纽带，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在杀出对日作战这条血路的艰苦斗争中，我们始终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声援，证实了我们一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是正确的。

在这个时期，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像我们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一样，人民也相信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把白头山看作希望的灯塔，仰望着它坚持斗争。

只要我们相信人民，人民相信我们，全民族支持我们，我们就必定胜利这一真理、这一确信，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和勇气，鼓舞我们进行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决战。

我们收集的几百几千件侦察资料，为对日作战准备和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朝鲜人民革命军没有进行大胆而广泛的侦察活动，就不可能用那么短暂的时间胜利结束击溃一百万关东军的对日作战。

在40年代前期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了积极的小分队、小组活动和坚持不懈的大无畏的军事侦察活动，用鲜血打开了对日作战的突破口，从而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先锋的、决定性的作用。对此，我们抱有极大的自豪感和骄傲感。

四　民族的灵魂

40年代前半期，朝鲜民族的命运处在十字路口：能不能作为一个民族继续存在、能不能复活被蹂躏的民族性。不改姓，不拜神社，不使用日本语言就别想活下去，这就是强加在朝鲜人民身上的命运。

我国的爱国人士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遥望着抗日统帅金日成将军所在的白头山，为坚守民族灵魂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下面记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有关这方面的回忆：

进入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推行“皇民化”政策。所谓“皇民化”，就是把朝鲜人同化为日本人。他们企图用几十年时间使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朝鲜民族日本化。他们的殖民化政策有多么凶残，这是不言而喻的。

向进入国民学校的新生教唱的第一支歌就是有关膏药旗的歌。这样从上学时起，日本帝国主义就强行灌输“忠君”思想。它们将以自尽表示竭尽“忠义”的狂妄的天皇主义者乃木的故事编入孩子们的教科书。

为了灌输“忠君”思想，把乃木这类军国主义头子当作忠君的典型。“皇国臣民誓词”和“皇国臣民体操”，也都充满着把朝鲜人同化为日本人的内容。

资源被掠夺，使人心痛欲裂。他们疯狂掠夺我们的自然资

源，甚至劫走铜碗、黄铜羹匙、黄铜筷子、祭桌上的铜烛台和铜酒盅，还从女人的头上拔走发簪。

过去，金刚山有许多几百年的老树。可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连这座名山寺院周围的老树也都砍走了。

他们抢走的财富是难以计数的。对此，朝鲜人怎能不义愤填膺。

更为令人痛恨的是日本人为了扼杀朝鲜人的民族性，干出了种种可恶的勾当。诸如：必须穿彩色服装啦，必须改名换姓啦，要"常用国语"啦，必须"参拜神社"啦，还必须搞"中午默祷"啦，等等。欺人最甚的，是强迫朝鲜人不说朝鲜话而说日本话。民族的特征，首先表现在血统和语言的共同性上。离开我国的民族语言，朝鲜民族就不复存在。

强迫朝鲜人不说朝鲜话而说日本话，这难道不是妄图在地球上消灭朝鲜民族吗？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这个民族就意味着被消灭。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内鲜一体始于常用国语"的谬论，人们不仅在官厅、会社、学校和工厂，就是在家庭和教堂，甚至在澡堂也必须使用日语。《皇民日报》是专门普及"国语"的报纸。

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提倡常用"国语"，还强迫朝鲜作家用日文写作，甚至专门办了用日文编写的杂志《国民文学》。

在日寇统治末期，创作话剧，也要求至少有一幕是用日语演出的。

解放后，我同黄澈、文艺峰、赵灵出谈话。据他们说，日寇还强迫朝鲜电影演员用日语说台词；录音朝鲜歌曲时，歌手也必须用日语唱一节以上。还开展“国民皆唱运动”，来强迫人们唱法西斯军歌。

在学校不使用日语的学生，更受到非国民待遇。如果谁使用朝鲜话，官厅就不答理他，甚至连粮食也不供应，坐火车时也不卖给火车票。

“神棚”是所谓日本开国神“天照大神”的日本式神龛。他们让每个家庭都挂这种神龛，大肆宣扬“同祖同根”。解放后我回到祖国，听说有人曾因在“神社”旁解过手而获罪坐了牢。

我在远东训练基地时，听到过这样一段故事：有个农民受到鬼子如不改用日本姓名就开除子女学籍的恐吓，被迫改名换姓。后来因感到愧疚而投井自杀了。

时局到了如此地步，活着还不如死了。

霸占别国的侵略者在殖民地施行民族同化政策，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土耳其在保加利亚、英国在爱尔兰、沙俄在波兰、法国在越南都施行了这种政策。但是，剥夺别国人民使用本国语言、文字的权利，并强迫别人改名换姓，这是只有日本帝国主义才干的事。

闯进别国的皇宫，明目张胆地乱砍王妃的鬼子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进入40年代，日寇在我国肆无忌惮地干了很多罪恶勾当。我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摆在我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抵抗，要么屈从

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扼杀政策。

当然，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抵抗的立场。

但是有些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背离了本民族；有些人卑躬屈膝，谋求自己的富贵荣华；还有些人积极支持并帮助日寇推行民族同化政策。

我在远东基地的时候，常常阅读国内发行的出版物。因此非常了解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谁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谁坐了牢狱；谁转了向，谁上了断头台，等等。

你们谁看过李光洙的有关改姓的文章？我在《每日申报》上看过一篇，大体内容是：我是天皇的臣民，我的子女也将成为天皇的臣民。我将我的姓改成香山，只有这样，才不愧为天皇的臣民。据李光洙在文章中说，香山是日本神武天皇即位的地方。

李光洙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得卑鄙无耻，根本不顾朝鲜人的廉耻和尊严。如果说在《民族改造论》一文中只表明他脱掉了长袍和大褂，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则连裤子和内衣都脱掉了，成了地地道道的走狗。

他在杂志上还发表了赞扬志愿兵制的文章。

解放后，李光洙把他的亲日行径美化成“保存民族”的爱国行动。意思是说为了保存民族不得不亲日。如果他真正希望保存民族，那么为什么赞扬志愿兵制呢？上战场的志愿兵，有几个回来的？

佛教徒中有一位叫韩龙云的诗人。他是三一人民起义时三十三名民族代表之一。他作为佛教僧侣，主张朝鲜的独立不能依靠

请愿，而能依靠民族自己的殊死斗争。他被敌人逮捕后，不进食也不要求辩护和保释。他发现大部分民族代表怕得要死，纷纷动摇，就举起牢里的马桶使劲扔向他们，大声呵斥说：你们这些臭东西，还算是为国家为民族的人吗？

后来，日本人为了收买他，要划给他土地。韩龙云断然拒绝了。同事和朋友们准备捐款给他在汉城城北洞盖住房，他说，讨厌那个总督府石料建筑，要求他们一定面背着它盖。

有一天，他在钟路十字路口遇到了李光洙。李光洙正忙于动员朝鲜青年学生当兵赴战场。他俩本是亲朋好友，可是韩龙云不理他，李光洙愕然地抓住韩龙云说，我是春园，不认识我吗？韩龙云摇着头回答说：我认识的那个春园李光洙已经死了。可以说，这是佛教僧侣向丧失了民族灵魂的李光洙下的死刑判决。

崔南善也是从爱国转向亲日的。他公然说，必须吸收日本的文化，这是朝鲜的命运。他和李光洙都算得上有知识的人，但是缺乏信念的知识和写作才华，是没有用场的。

崔麟也为日本的同化政策所屈服。

有些文人写了鼓吹亲日的诗，还得到了总督府的奖赏。

当有些知识分子悲叹自己生为朝鲜人，改换祖宗，穿上日本和服，向宫城遥拜，甚至胡说什么“甘为天皇而死”，背叛民族的时候，爱国的学者、教育界人士、文艺界人士、舆论界人士等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却对他们嗤之以鼻，顽强地坚守着朝鲜人的气节。

举一个李箕永的例子来说吧。

李箕永因“卡普”[16]事件蹲过两次监狱。他不像林和那样进了监狱马上叛变，而是出狱后始终不渝地坚守爱国文人的气节。

他出了监狱，作为失业者流浪于汉城街头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根据朝鲜思想犯保护观察令，把打成思想犯的爱国者和进步人士监禁在保护观察所里，强迫他们以亲日思想“报国”。所谓“报国”就是转向。

李箕永三天两头地被叫到警察机关遭受强迫转向的折磨。敌人要他用日文写作品，做亲日演讲。

但是，对他这样刚直不阿的人，任何强硬要求都是无用的。敌人强迫他写“国民文学”，他却用朝文写了本小说讽刺“皇民化”政策。据说，他上了“黑名单”以后，生活苦不堪言。因为穷，没钱为死了的二儿子送葬，就在遗体旁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钱》。

李箕永因常被警察骚扰，不得不带着家属躲到金刚山的一个山谷里。可是在这个山谷里，也常有人监视他。亲日分子冲他家扔石头，门都被砸坏了好几次。

他作为爱国知识分子毫不屈服。一到夜晚，就有为逃避征兵、征工而躲进山里的人来，请他给予指教。他就鼓励他们说，宁可像牛马一样吃草，也决不要下山，要反抗日寇。当时受到李箕永影响的青年人，解放后都当上了干部。

李光洙改了名换了姓，而李箕永一直没有改。他说，改名换姓就是狗崽子。不仅他本人，就连亲戚他也不让改。

解放后，我在平壤第一次见到李箕永时对他说，您身体虽然

不怎么健康，却在监狱里能忍受住种种折磨，抵制了改名换姓的凌辱，确实令人钦佩。

他说，连柳宽顺这样年仅十六岁的姑娘都将性命置之度外，坚守气节，而我身为知识分子岂能卑躬屈膝。在关东大地震时，我亲眼目睹日本鬼子在东京大街上用竹矛、日本刀和铁钩恣意屠杀朝鲜人的惨状，心想：就是死了变成鬼魂，也一定要跟鬼子算帐。

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扼杀民族灵魂的同化政策而英勇奋战的爱国者中，还有申采浩。

申采浩是有威望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作家和政治评论家。他文章写得很好。我在吉林时，曾在孙贞道牧师那里读过他写的声讨书。那是一篇谴责李承晚请求美国将朝鲜做为托管国的长文，写得十分有力而尖锐，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孙牧师说，正因为写得好，所以一直保存着。

申采浩在上海、北京等地办了很多报纸和杂志，发表过谴责妥协主义的文章。据说，人们一发现报纸上刊载申采浩的文章，就争先恐后地购买。他的文章不仅写得生动，而且字里行间都渗透着朝鲜人的灵魂。读了它，使人有一种看到活生生的生命体的感觉。

20年代末，申采浩被日本鬼子逮捕，关进旅顺监狱。他在狱中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岁月，从未屈服。还坚持不懈地写出了洋溢着民族灵魂的文章。

他在监狱中还编写了《朝鲜上古史》和《朝鲜上古文化

史》。由此可见，他为弘扬民族的灵魂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申采浩坚持民族的灵魂，献出自己的一切继续写作，直到在异国的监狱中溘然长逝。

我目击到爱国志士和知识分子宁愿在狱中壮烈牺牲，也要坚持民族灵魂，启发民族意识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更加强烈地感到必须保护他们的灵魂，并把他们团结成一个整体，使他们成为全民抗战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民族灵魂和全民抗战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坚持民族灵魂不仅是全民抗战的精神基础，而且是重要环节之一。如果不进行坚持民族灵魂的斗争，就不能把广大的爱国力量团结到全民抗战的队伍中来。

我们重视知识分子维护民族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使命，因此不断把工作员派到国内外知识分子阶层中去。

我经常对派往国内的政工人员强调说：有母亲，才有子女。同样，人都是民族的一员，不管生死，都离不开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在民族这个大家庭里，以同一个血脉连接在一起。因此，在保卫民族的斗争中没有主次之分。革命是为民族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为捍卫民族而进行的。我们不仅要收复祖国的疆土，还要恢复我们祖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本身。因此，我们要把武装全民和全民坚持民族灵魂的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以做好全民抗战的准备。在学者、教育界、舆论界、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中发展祖国光复会组织，以使他们成为捍卫民族灵魂的火星和枪弹。

1938年末，《东亚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汉城延禧专科

学校有赤色研究会这一秘密社团的嫌疑，受牵连者都被逮捕监禁，因此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共和国的首任教育相白南云也是赤色研究会的成员。

在那屈服能苟安，抵抗只能做牛马的暗无天日的年代里，白南云作为知识分子选择了抵抗之路。

白南云去日本工读商科大学，后来在延禧专科学校任教。

《朝鲜社会经济学》是他的代表性著作。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进行写作。在日本帝国主义拼命扼杀民族经济，妄图取消朝鲜民族的时候，白南云写出了我国的社会经济史，这是了不起的爱国行为。

汉城延禧专科学校有个合法团体，叫“经济研究会”。白南云和同事们一起把这一纯学术团体发展成了向往共产主义的富有革命色彩的政治性组织。

赤色研究会自从同我们派遣的政工人员取得联系之后，它的一切活动都服从于实现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据说，放假时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启蒙活动。

据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发表的《最近朝鲜治安状况》声称：赤色研究会以完成共产革命为目的，积极举办研讨会、讲习会、读书会等，向会员灌输共产主义思想。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之前，白南云无职业，过着隐居生活，他翻译了《李朝实录》。

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皇民化”的挑战。

白南云从得到普天堡战斗消息的那年冬天起，就不忍心烧炉

子，在冰冷的屋子里过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听到金日成麾下的游击队所有官兵一年四季都以树叶作铺盖，风餐露宿，心里惴惴不安。

我们在组织内阁的时候，任命白南云为首任教育相。他后来又先后任科学院院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工作做得很好。

我国人民培育出来的世界有名的遗传学和育种学专家桂应祥先生，也是民族自尊心很强、科学信念很坚定的人。

他从小学习就很用功。据说，他因生活困难，买不起纸张，就用干叶子写字。好不容易弄到一双袜子，却揣在兜里不穿，等到串门时才穿；鞋子也怕穿坏了，就拎在手里赤脚走。

由于他非常节俭，勤奋好学，因此在日本大学毕业后，又功读了研究院。

桂应祥学生时代就以秀才闻名，所以研究院毕业后，日本各地有很多人邀请他去。大学时期的辅导教师也很器重他。鼓动他去满洲在即将开办的一座农业试验场一起工作。

但是，桂应祥拒绝了这一些要求。他的愿望是到看不见日本鬼子的地方去搞蚕茧研究。他还盼望回到祖国搞科研工作，但这个念头也被打消了。

桂应祥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到中国关内去。当时，中国南方还没有日本人。从七七事变开始日本军队才入侵关内。

日军占领广东之后，他准备回祖国。他想，既然世界都变成日本鬼子的天下了，索性回到有祖先坟墓的地方去。他从中

国南方回来时，还带着在异国土地上千辛万苦地培育出来的蚕卵新品种。

解放后，他厌恶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把蚕种装在皮箱里来到了平壤。我首次接见桂应祥时，他说，具有朝鲜人灵魂的人是在美国人的统治下实在活不下去的。听了他的话，我深刻地认识到他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学者。

桂应祥在回到共和国北半部以后，大力培育了产量高，抗病能力强的优良蚕种。

只有具有坚强信念的人，才能坚持民族灵魂。

一个知识分子要想真正为祖国和人民做出贡献，就必须有火热的爱国精神和坚定的科学信念。

日寇统治末期，在国内为坚持民族灵魂而进行激烈斗争的组织中，还有朝鲜语学会。

据李克鲁说，朝鲜语学会成立于30年代初，其前身是朝鲜语研究会。

朝鲜语学会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工作。它成立后大力开展了朝鲜语词典编纂工作。在这以前，我国没有一本像样的朝鲜语词典。

在国家沦亡的情况下，编纂一本词典，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然而，朝鲜语学会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并且很多学者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没有规范统一的语言文字作为基础，文化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合理地整理和统一语言和文字，最重要的手段是编纂将民族语言集而大成的词典。

编纂民族语词典，是需要投入很大力量的工作。他们没有资金，而且由于需要躲避日本人的耳目，在背地里悄悄地工作，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援。再加上语言和文字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进行这项工作十分困难。

在编纂过程中，他们把稿子抄写两份，分别藏起来，以防万一。国家沦亡几十年了，不懂日语的人备受歧视，可是他们却将乱石一样被人遗弃的朝语单词一个一个地搜集起来收在词典里，他们是多么了不起而又多么有正义感的爱国者呀！

朝鲜语学会还秘密地开展了对外活动。他们参加了1935年在英国召开的国际语音学会和第二年在丹麦召开的世界语言学大会。在会上，他们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取消朝鲜语的勾当。

我国最早整理、研究朝鲜语的机关是世宗王建立的正音厅。世宗王不顾崔万理等事大主义者的拼命反对，主张训民正音，是一件很好的事。他让有关人员用朝文写《龙飞御天歌》，写公文，出版儒教、佛教的经典。

燕山君执政时期，正音厅被撤消，朝鲜文字被遗弃。几百年来，朝鲜文字像杂草一样备受凌辱，到了1894年甲午更张时，才枯木逢春。

朝鲜文字在上个世纪末刚刚绝路逢生，日本人又以“常用国语”为由将朝鲜文字肆意践踏了。为反对这一暴行而奋起展开斗争的，正是朝鲜语学会。

正当朝鲜语学会为争取祖国的独立、整理和普及朝鲜语而进

行斗争的时候，却于1942年秋遭到了敌人的镇压。几十名学者及有关人员被捕。

回国内搞小分队活动的同志带来这一消息，使我不禁义愤填膺。

当时，正接到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几十万德寇的捷报，都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之中，可是我听到几十名学者被捕受刑的消息，连饭都吃不下了。

他们在咸兴监狱吃了很多苦，敌人施行严刑拷打，几个人以身殉国。

日本警察把朝鲜语学会定性为反日独立团体，但是被监禁的学者们不惜牺牲地保守秘密，所以一直未能查出这个团体同我们有什么联系。

朝鲜语学会中有李克鲁等参加的秘密地下组织，这个组织同我们有直接联系。1936年秋和1937年夏，我们组织派崔一泉去汉城找李克鲁时，向他部署了在国内知识分子中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的任务。

崔一泉作为《东亚日报》长春支局局长经常出入汉城，出色地完成了我们交给的任务。

李克鲁也在监狱中受到了严刑拷打。这是因为他把别人的“罪”也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回到汉城后，不顾遍体鳞伤，就以朝鲜语学会为据点，为加强民主力量的团结，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做了很多工作。

解放后，李克鲁为了参加四月南北联席会议[17]，来到了平

壤。我对他说：当年我们很关注朝鲜语学会事件，日本警察几乎每天都进行拷打，有的人甚至失去了性命，这使我们很痛心。但是，朝鲜语学会成员在铁牢里毫不屈服，我们对那种坚贞不屈的反日意志和集体的爱国精神表示钦佩。

李克鲁听了我的话后说：这是因为我们有精神支柱才这样坚持下来。我们的胆量来自何处？除了白头山，还会有什么地方。接着他还讲起了往事，说：普天堡战斗以后，每个学会成员兜里的钱都抖搂出来，买了一瓶烧酒，边流着泪喝，边畅所欲言。

因为李克鲁在坚持民族灵魂方面有功，受到了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尊敬，所以在四月南北联席会议上，我们邀请他上了主席台，并让他以与会者的名义宣读致全体朝鲜人民的《告全体朝鲜同胞书》。

四月南北联席会议闭幕之后，李克鲁要求留在平壤和我一起工作。

所以他的家属也由汉城迁来平壤。多年来，他在内阁任相，无论上级还是下级都以礼相待。

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李克鲁填的履历表，大吃一惊。他周游世界各地，交际很广。中国、日本、苏联、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他都去过，还见过列宁。

在莫斯科举行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同李东辉、朴镇淳等人一起住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两次见到列宁。

李克鲁同民族运动中有威望的人几乎都见过面。对崔一泉、边大愚、黄白河等很多在东北地区活动的人，他也都认识。

据说，经当时在莫斯科的威廉·皮克的介绍，李克鲁考上了柏林综合大学，毕业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有一次我问李克鲁，你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为什么专攻朝鲜语研究；听说你回到祖国时，有的人劝你到实业界就职，还有人劝你从政，可你为什么成了语言学家？

李克鲁回答说，他在爱尔兰看到那个国家的人不使用本国语言，而使用英语，招牌、路标等都是英文。当时就想，如果朝鲜也落到这样的地步，该怎么办？于是下决心回到祖国将一生献给维护祖国语言的事业。

朝鲜语学会给了我们很大鼓舞。知识分子们不顾刀枪和断头台，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民族灵魂，我们从中看到了活着的祖国，活着的英勇奋战的国家。

京城帝国大学的学生们也建立组织，积极开展坚守民族灵魂的斗争。

参加这一组织的爱国知识分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扼杀朝鲜民族的行径，勇敢地进行了坚守民族灵魂的斗争。

京城帝国大学的爱国知识分子一面给亲日文人和御用学者的荒谬理论以沉重打击，一面通过合法的讲台广泛宣传朝鲜民族的优秀性。

他们说，朝鲜民族并不是懒惰、爱搞派系斗争的民族。之所以贫穷，完全是由于日本鬼子全部掠走了我们民族的财富。谁敢说我们民族是落后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是智慧的、文明的、值得夸耀于世的优秀民族。尽管日本鬼子疯狂镇压，朝鲜民族即使付

出高昂的代价，也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性。

然而，只靠舆论，抵挡不住挥动刀枪的敌人。这是知识分子所得出的经验。所以，他们选定一座大山建立根据地，吸收矿工和逃避征兵、征工的人组建武装队伍。

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学者、宗教徒和教育界、文艺界、舆论界人士参加了全民抗战组织，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扼杀政策而展开英勇的斗争。没参加组织的知识分子，也坚持信念抵抗敌人的同化政策。任何残暴的镇压和锁链，都阻挡不住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坚持民族灵魂的斗争。

历来彪炳史册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忠于祖国和民族、具有坚强信念和意志的人。因此，我经常对知识分子强调说，要热爱祖国和民族，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要坚持不屈的意志和革命的信念。

五　同其他一切反日爱国力量联合起来

全民族的爱国力量联合起来，团结抗日，实现祖国光复，这是抗日革命时期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一贯坚持的路线和战略方针。

从进行抗日的第一天起，金日成同志就为实现国内外反日爱国力量的联合而呕心沥血。

到了40年代前期他仍然坚持这一斗争。

我一生始终把同爱国的、进步的民族主义者实现联合作为重要路线，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曾有一个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是朝鲜民族解放斗争的两大力量。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始于民族主义运动。40年代前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存在，在抗日斗争中，它又是一支反日的爱国力量，尽管其力量很薄弱。除了改良主义势力以外，大多数民族运动者仍然在反日旗帜下，在国内和海外坚持抗日，并且对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梁世凤合作的努力失败以后，我们没有动摇，为同反日民族运动者结成统一战线，继续不懈地做出了努力。

反日民族运动者为了同我们进行合作，也作过一些尝试。他

们中的一些人过去对共产主义者一概排斥并敬而远之，现在逐渐倒向我们这边了。

30年代后期，反日独立运动者同我们联合，成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潮流。1936年5月，我们创立了祖国光复会，号召全民族总动员起来，有力地开展统一战线运动。民族主义者积极响应了我们的号召。

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有：在南满活动的独立军参谋长尹一坡向我们致函表示支持；上海朝鲜人居留民团的一位姓朴的独立运动者专程去南满会见祖国光复会南满代表李东光；金活石麾下的独立军残部由崔允龟带头自愿编入朝鲜人民革命军。

民族主义者为什么摆脱了过去的排外主义立场，如此积极地同我们进行合作呢。一句话，这是由于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威望大大提高，影响力大大增强。抗日武装斗争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轴。朝鲜人民革命军是反日民族解放战线的主力军，是民族独立意志和信念的最高代表，又是抗日革命的组织者、向导者。

在民族解放运动战线的队伍中，有各种反日力量，但是给敌人以最沉重打击的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日本帝国主义最怕的也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我国人民寄以最大希望的武装力量也是朝鲜人民革命军。

我国人民非常清楚，能够从祖国疆土上赶走日寇的军事力量只有朝鲜人民革命军。

据金九的辅佐者说，金九听到日寇在普天堡战斗中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高兴得欢呼起来。

当时，在南京发行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机关报，以《朝鲜革命武装运动的喜讯》为题详细报道了普天堡战斗的消息。还把这条新闻资料送到了在咸兴的《朝鲜日报》分社。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民族支持、鼓励和声援抗日斗争的表现。我们攻打普天堡的消息，还使在中国关内进行活动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大受鼓舞。

金九早就摸索武装抗战的道路。20年代初，他组织的劳兵会实际上是矢志于武装抗战的团体。他不喜欢那些不抵抗主义的培养实力或仅靠外交途径争取朝鲜独立的人。他为没有能力组建一支大部队痛快地进行武装斗争而感到遗憾。所以，他非常关注我们的武装斗争，并寄以很大希望。

解放初期，在洛杉矶发行的侨胞报纸《朝鲜独立》曾刊登过一篇骂金九的文章。这篇文章说，旅美侨胞响应金九的倡议，向金日成部队和朝鲜义勇军给予巨额捐款，但是，金九以战乱为借口没把那笔捐款送给金日成部队和朝鲜义勇军，而中饱私囊了，云云。

金九没能把那笔捐款送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转交捐款，必须找到组织线，可那时要找到我们的组织线是很困难的。

我通过金九倡议捐款这一事实，了解到他为支援我们的武装斗争做出了极大努力。

间三峰战斗也大大鼓舞了中国关内的朝鲜独立运动者。

海外的民族运动团体深切关注我们的斗争情况，联共活动十分活跃，这与我们建立祖国光复会，发表全民都能接受的民族共同斗争纲领——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是有关系的。

当时在中国关内活动的朝鲜反日爱国力量由于存在着一些分歧，没能联合起来，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主要有两大派，一个是金九派，称之为民族主义派，另一个是金元凤派，称之为人民战线派。金元凤派是接近共产主义系统的独立运动左派。这两个派分别同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有联系。

要同中国关内朝鲜独立运动者建立统一战线，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要使关内的各反日民族团体团结成一股力量。就是说，各个团体把主义主张和活动方式的差别放在一边，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结成一条战线。其次，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我们同这条战线的所有反日力量的合作。

祖国光复会成立以后，我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不懈的努力。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为了同中国关内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取得联系开展了积极、主动的活动。

在这期间，中国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引起了内外极大关注。国共合作的实现，给中国人民的救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金九派和金元凤派结束了过去的对峙状态，于1940年9月宣告结成一条战线，并发表了联合宣言。联合宣言的许多内容与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十大纲领相同。后来，金元凤派参加了临时政府，实现了左派与右派合作。

在民族运动内部发生这种变化，自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40年代前期，我们一面为团结国内和在日本的朝鲜反日爱国

力量而努力，一面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开展把满洲和关内的朝鲜反日爱国力量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工作。

随着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陷入了灭亡的深渊，到处连续发生的事变，敲响了灭亡的丧钟。急剧变化的形势要求国内和海外的所有反日力量拧成一股绳，为同日寇进行最后决战做好准备。几十年的反日斗争历史，使人民群众认识到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全民族超越主义和党派的界限，紧密地团结起来，才是早日实现祖国光复的正确道路。

把国内外广大爱国力量紧密团结起来，建成强大的全民抗战力量，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各阶层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

日本警察当局文件对40年代朝鲜独立运动者的活动方式和民众心态，作了如下记述：

“朝鲜民族在国内外进行的阴谋活动，目的在于实现朝鲜独立。现在公然宣称，不问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无论重庆手下的人、美国手下的人……苏联和中共手下的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朝鲜独立。”[昭和19年(1944年)5月，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下达各道警察部长的警察文件]

“思想案件的特点：

与从前不同，超越主义主张，把重点放在中心目标——朝鲜民族独立上，因而，过去处于对立状态的派别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趋于接近，民族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合作的事也不乏其例。”[《高等外事月报》，第51号第5页，朝鲜总督府警务局保安科，昭和19年(1944年)3、4月份]

在同中国关内的反日爱国力量联手方面，我们一贯重视的团体之一是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

日本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以后，临时政府频繁地改换所在地。由于跟随国民党政府频繁地改换所在地，因此处境十分困难，招牌也勉强维持。据当时曾在临时政府工作的人回忆，他们常常背着行李漂流各地。有时刚到旅馆下榻还没来得及解开行李，又害怕战火烧身，仓皇搬到别的地方去。

临时政府不仅为连绵不断的派系斗争、频繁的宪法修订和内阁改组而大伤脑筋，还为生活条件和人身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而忧心忡忡。

金九说，那时经济困难，政府朝不保夕；政府办公楼每月租金是三十元，勤务员的工资不过二十元，可是临时政府连这几个钱都支不起，因此多次吃了官司；睡觉睡在办公楼的地板上，在有工作做的同胞家吃饭，今天吃这家，明天吃那家，像个乞丐。

1940年临时政府结束流浪生活，在蒋介石政府所在地重庆定居。他们这才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

临时政府在重庆时，组建了光复军，这可以说是临时政府活动中的一个进展。

当时，临时政府光复军办的出版物介绍了金日成、杨靖宇和赵尚志等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情况。

但是，这支武装力量无论从建军时间、人员构成或者武器装备上看，都是年轻的。临时政府的有关人员也认为他们的武装力量是有限的。李青天在分析海外反日力量状况时坦率地指出，临

时政府的势力难以掌握主导权，还指出，它对迎接八一五解放毫无准备。我认为这个分析是客观的。

日本警察文件对光复军作了如下记述：

“尽管临时政府大吹大擂，但光复军阵容不足挂齿，每个支队不过十余人，唯独第五支队有五十人，其中二十名是罗月焕手下的无政府主义者，其他人都是朝鲜人俘虏，而且大都是文盲，有的还走私过鸦片。现在这个队伍几乎没有什么活动。”［黄海道警察部高等警察科，昭和18年(1943年)2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同他们合作。我们认为，只要同金九派合作，就能动员他们参加祖国解放的最后作战。

起初，金策对我们同临时政府的金九派合作不大情愿。理由是，他认为同反共分子金九合作是不可能的，即使合作成功，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但他听了我的说明后，表示同意，承认自己对金九的爱国精神没给予应有的重视，片面地看重了其反共的一面。他还建议：通过许贞淑推进同关内反日力量的联系。

那时，崔庸健也不甘心同金九进行合作。对临时政府的态度，他比金策更保守。他说，跟搞派系斗争成性的人联手干什么，跟他们联手没有好处。与其跟他们合作，还不如跟金元凤派合作。当然，崔庸健后来也跟金策一样对我的主张表示了理解。

金元凤组建义烈团，不仅在关内和东北地方，而且在国内，都进行过暗杀和破坏活动。

后来他还组织了朝鲜义勇队，第一区队长是解放初期曾任过中央保安干部学校校长的朴孝三。当时他手下有四十来名队员。

后来听金元凤说，朝鲜义勇队因规模小，装备也很差，不大进行独立活动，主要跟中国部队一起活动，拿着扩音器做反战宣传和瓦解敌军工作。虽然它的规模和武器装备不怎么样，但我们重视他们要用实力打败日寇的志向。

我们对在华北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也予以一定的关注。

那时候，武亭起了不少作用，他还为中国红军建设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做出了贡献。回国以后，他历任民族保卫省副相、炮兵司令官。

他一回到祖国，我就把他的家安排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武亭回到了祖国，参与了人民军建设，并立了功，但他的军阀官僚主义很严重，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受到了批评，还被革去了军职。

尽管武亭被免职了，但他染病的时候，我们还是尽力给予帮助，使他得到了治疗。当时，中国长春有个罗马尼亚人办的医院，我们把他送到了那里。后来他说，他很想死在我们身边，我们按照他的要求，把他带回祖国。他逝世时，我对他的功劳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我和武亭初次见面时，他说，金将军久仰久仰！每当听到将军的传奇故事，我就很兴奋；一想到朝鲜出了一位令日本鬼子不寒而栗的将军，不知心里有多高兴；我人在八路军，心在白头

山。不知朝鲜义勇军以什么方式同金将军部队汇合？朝鲜义勇军和朝鲜人民革命军能不能共同抗日？他为了同我们合作，从各方面做出了努力。

日本官方资料对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组建后，为了同金日成同志取得联系而进行的活动，作了如下记述：

“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动向：

……1941年5月或6月前后组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其后，以京汉线一带我们占领的地区为目标，疯狂地进行争取同志、不良宣传等活动，同时，为跟在满洲活动的不法朝鲜人金日成合作，并同鲜内同志取得联系进行活动。……它还发表了一项宣言，摘要如下：‘我们为了争取朝鲜民族的解放，进一步巩固内部团结，并把在华北的二十万朝鲜同胞、东北(满洲)、国内(朝鲜)的革命人士、革命团体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将抗日斗争进行到底。’……”[黄海道警察部高等警察科，昭和18年(1943年)2月]

解放后首任内阁文化宣传相的许贞淑，40年代在延安工作。据她说，在延安的朝鲜人运动者中有很多响噹噹的人，他们都向往我们部队。她也多次请求周恩来和朱德同意她到满洲去。可见，她是多么向往我们部队的。为此，她受了一些中国人的批评，说她是搞民族主义。

从她的话中我更具体地了解到，当我们寻求同中国关内的朝鲜人运动者和爱国人士合作时，他们也在积极地寻求同我们进行合作。

那时，他们也跟八路军一起积极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主要工作对象是在日本军队服役的朝鲜青年。

他们向那些朝鲜青年喊话：不要做日寇的挡箭牌，要勇敢地逃出来，在中国北部的，去找朝鲜义勇军或八路军；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去找朝鲜义勇队或新四军；在满洲的，去找金日成部队。

他们还宣传起义者可享受的待遇，诸如，带来重机关枪，给多少钱，还给三年的日用品；带来轻机关枪、掷弹筒、步枪，分别给予什么待遇，还可按照个人的希望参加学习，有病也能得到治疗。这些话对瓦解敌军作用很大。

在关内活动的朝鲜爱国人士中，既有共产主义者，也有民族主义者。不管主义、主张如何，他们都希望同我们联手、合作。这显然是好事情。

我们不以主义、主张为标准而区分他们，歧视他们；也根本不问谁是受了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谁是受了蒋介石保护的。凡是爱国人士都被看作是合作的对象。

同中国关内的联系，有各种渠道可供利用。既可利用苏联军事当局和共产国际，也可利用东北抗日联军派往关内的联络线，我们还可以直接往那里派联络员。

我们在中国东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跟关内联系使用的联络线，有饶河、东岗方面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的渠道，有经新疆省伊犁、甘肃省兰州和延安的国际渠道，还有一条是从满洲的东边道连接满洲和中国边境的游击渠道。

远东训练基地有当时在中国关内任红军师长，后来到苏联接

受军事教育后未返回延安而到国际联军讲课的刘亚楼和卢冬生，还有中共联络员王朋。我打算等他们回延安时，托他们给在延安和重庆活动的朝鲜人捎信。可是直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他们三个人都未能返回延安。

东北解放战争时，刘亚楼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后来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卢冬生留在东北任松江军区司令，他的另一个名字大概叫宋明，他于1945年底牺牲。

我们试图通过在东北开展小分队活动的同志同关内取得联系，还为通过国内地下组织同关内人士接头做出了努力。

我根据金策的建议，对许贞淑给予了重视。如果我们能与许贞淑取得联系，就能通过她与延安和重庆一带的反日力量携起手来。

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许贞淑，不仅因为她有爱国斗争的经历，而且还因为她是与金策有深交的许宪的女儿。

我们指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康炳善主管的新义州地下组织，负责同关内联系。

该地下组织按照这个指令，将一项任务交给了在天津活动的一个工作员，这项任务是：开拓重庆和延安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联络通道。

这位工作员为建立我们同重庆与延安合作的联络站做出了努力。

在国际联军建立后，金日成同志为同中国关内反日爱国力量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为与中共等抗日力量建立反帝共同战线，做出了各方面的努力。下面转引

日寇警察机关收集的有关情报资料：

“金日成的活动情况：

现在……金日成以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海洋野营学校为据点，策划拉拢旅满不法朝鲜人。据最近情报，目前正在准备将工作员秘密派往满洲和朝鲜主要地区，以待美军驻华空军根据美苏合作秘密协定，对满洲和朝鲜进行空袭时，破坏满洲和朝鲜的铁路，阻碍军货运输和扰乱民心。

金日成于今年6月中旬两次赴莫斯科，还赴重庆和延安，同苏美驻华使节与中共有关机关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之后，为了对付将来……秘密派遣工作组把过去在鸭绿江沿岸进行活动的朝满抗日匪徒重新组成铁路破坏团和思想工作班，现正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进行训练。”［《特高月报》，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昭和19年(1944年)11月份，第76页］

当我们努力同关内反日爱国力量进行合作时，重庆的反日爱国力量也在为同我们合作，进行多方面的活动。

据金九的秘书安重根的侄子安偶生回忆，当时金九向我们派遣了联络员，可是很遗憾，没等那个联络员进入满洲就解放了。

1942年12月，临时政府一名姓金的特派员来到牡丹江，但他没找到我们就返回重庆了。

日寇的一份情报资料说，我们同关内的中共所属朝鲜人共产党系统以中江镇、临江、惠山镇、通化一带为中心进行联络。

国际联军时期，我们在进行小分队活动时，对宗教徒也给予关注。

1942年底，在宁安县东京城的大倧教本部，三世教主尹世复等很多宗教徒被警察逮捕。

大倧教教徒们进行了反日活动，他们说，该宗教的使命是祈祷朝鲜民族从日本和满洲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重建倍达国。大倧教的一个要人说，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遭到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趁这个时机早日实现祖国光复。他还说，缅甸有巴莫，朝鲜有金日成，独立定将给朝鲜民族带来幸福。

我从进行小分队活动的同志那里，听到了牡丹江省警务厅大肆逮捕大倧教要人的消息，于是向第二方面军所属反日会宁安县总部下达了两项任务：一个是采取措施，反抗敌人的镇压，保护爱国的宗教徒；另一个是加紧进行工作，把桦甸、敦化和安图一带的反日力量团结在组织的周围。

在准备对日总攻的工作中，吕运亨领导的朝鲜建国同盟，是我们重视的国内反日民族团体。朝鲜建国同盟是1944年成立的反日地下团体。这个同盟属下有以吕运亨的故乡京畿道杨平一带农民为主组成的农民同盟。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民族主义团体的镇压达到了顶峰。濒于灭亡的日本帝国主义用国家总动员法等种种法西斯法律，对反日团体成员，哪怕是只有一点点反日倾向者，也都肆无忌惮地逮捕监禁，严加刑讯拷打。

吕运亨竟于此时在汉城一带建立朝鲜建国同盟这样的反日团体，真是一个胆大的人。

建国同盟严守机密，就连我们在汉城的工作员在一段时间也

不知道在他们鼻子底下竟有这种组织在活动。到了1945年，我们才得知有建国同盟这样的组织。

吕运亨建立朝鲜建国同盟后，马上向我和朝鲜独立同盟分别派遣了联络员。可惜，他派的联络员没找到我们，回去了。派往朝鲜独立同盟的联络员在延安会见了该同盟的人士，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吕运亨派遣的联络员没找到我的原因，是那时我们正在苏联训练基地进行活动。

正如普天堡战斗以后吕运亨为同我们会晤做了多方努力一样，我们也为同他合作做了许多努力。我委托在汉城的政治工作员去做吕运亨的工作。我指示他一定要做好吕运亨的工作，但他说，因对方始终没能敞开思想，所以谈得不深入。

吕运亨在建国同盟内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并拟定了以武装斗争从背后扰乱日寇的计划。这个计划也符合我们提出的全民抗战路线。

我们为同关内所有反日爱国力量合作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无明显的成效。这是因为日本灭亡得太快。同时也因为，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和国内抗战组织内应外合发动总攻解放祖国时，关内的武装力量没能直接参加这个战役。

金九为此感到很遗憾，他说：日寇投降的消息，没有使他特别高兴，反而有天塌地陷之感，因为他数年来煞费苦心做好的参战准备付诸东流。他为之叹息，又表示忧虑：他认为，没能为这次战争做出贡献，将来的发言权也会受到影响。

然而，双方为合作做出的努力，是不会付诸东流的。虽然它没有很快结出果实来，但迟早会发挥作用的。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北斗俯瞰。为民族解放做出的努力，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为实现反日爱国力量的团结所做出的努力，成为历史的基肥，在解放了的祖国土地上，开出了绚丽的花朵——结成了各阶层广大人民参加的统一战线。

我现在仍认为，我们从抗日革命一开始就把统一战线工作作为至关重要的目标和路线提了出来，并为其实现做出了努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曾有一个时期，青年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出现过一定的摩擦和对立。在高而虚和玄默观那样的国民府上层人物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酿成旺清门事件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同民族主义者断绝了交往，并对他们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我们的一些同志还主张永远同民族主义者断绝关系。

然而，旺清门事件再严重，我们被杀害的人再多，也不能把国民府反动上层人物犯的罪行归咎于全体民族主义者。我们应以大义为重，忍受由于同志们的牺牲而造成的悲痛，继续高举统一战线的旗帜。这样，我们不计前嫌，还是为同在南满活动的国民府残存势力梁世凤的部队联手，去找这个部队，也为同被视为反共代词的金九合作做出了努力。

如果我们不克服狭隘的心理偏颇，而是感情用事，采取极端主义态度，敌视民族主义者，那么，统一战线就会成为纸上谈兵，不能得以实现的。

我们为维护统一战线所做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金九这样顽固的反共人士都深受感动。

不要以为民族主义者金九是轻易转向我们这边的。这不是因为他对不承认他的临时政府的美国军事管制抱不满，也不是因为他跟李承晚合不来而抛弃反共立场，走上联共道路的，而是因为我们从抗日作战一开始就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同金九精诚团结。

历史已经证实，我们以前所信任的人，解放后全都团结在统一战线旗帜之下了。请看，参加1948年4月南北联席会议的，都是哪些政界人士。金九、金奎植、赵素昂、崔东旿、严恒燮、赵皖九、金月松……这些有名的民族主义者不是都参加了吗，金九临时政府的人士都到我们这边来了。

朝鲜建国同盟领导人吕运亨来平壤和我会晤，朝鲜独立同盟的领导人及其同事们也来到了平壤，金元凤还当了我国首任监察相。

我们共和国北半部早在1946年就建立了容纳各党派、各界爱国力量的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要实现民族大团结的理念，是在为对日总攻做准备的日子里得到进一步的磨练和巩固的。如果没有这一坚定的理念，解放后，在爱国和卖国、进步和保守、民主和反动之间进行的尖锐复杂斗争面前，我们不可能那样耐心地把具有不同政见、主张和斗争经历的海内外各阶层爱国力量引导到统一战线中来。

对经常受到外来势力威胁的我们民族来说，民族大团结是法宝。我认为，我们民族的兴亡盛衰完全取决于我们全体民族能否坚持这个法宝。

由于我们有视民族重于意识形态、理念、政见和制度之差别的始终一贯、光明正大的政策的深远历史根基和伟大业绩与宝贵经验，所以我们今天才得以提出实现祖国统一的全民族大团结十大纲领，以有力地唤起全民族投入统一事业。

六　在玄海滩对岸

40年代前半期，为了主动地迎接祖国解放的大变革，我们加紧了准备工作的进行。我们一面在国内组建强大的全民抗战力量，一面使在日本的革命组织能够承担起全民抗战运动的一部分任务。

我们在日本的活动，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整顿在日本成立的祖国光复会组织和各种形式的反日组织，使他们在朝鲜人民革命军打响最后攻击战的时候能够与之配合，同时还不断发展新的组织；另一方面，朝鲜人民革命军的特工人员深入到日本侵略者的大本营去侦察敌人的军事情报，为争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做好准备工作。

在30年代后半期，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挺进到白头山和西间岛地区开始建立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以后，我们开始向日本大量派入政工人员。在敌人的心脏构筑我们的炮台，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武装斗争初期就提出的口号。

政工人员要进入日本，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一旦被日寇发现了，坐牢还算是幸运的，否则就要上绞刑架。要到日本只有一条水路。这条水路密布着警察、便衣警察、特务和密探。工作员们通过这样危险的通路进入日本，是件非常艰难的事。但是我们不能取消这个计划。

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编的资料清楚地说明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对日本的侦察活动是多么活跃。

“关于金日成向鲜内(朝鲜和日本)两地派特殊密探一事

“旅满不法鲜人……金日成一派的活动似乎依然十分活跃。最近本省朝鲜特派员报来如下情报，须按情严密缉捕。

“府、县须特别注意海港警备、列车移动警备等。

1 派遣目的

使用由苏联特派的共党组成的特殊密探，在朝鲜和日本从事谍报勤务。

2 派遣地点

图佳线、奉吉线的各重要军事地区

朝鲜的主要海港(清津、罗津、釜山、木浦、元山、群山、新义州)

日本的下关和敦贺

3 派遣员的年龄、服装、携带品

年龄：二十至二十五岁，满系朝鲜男子

服装：黄绿色翻领西服、皮靴

携带品：皮箱里装着政治、经济、文艺等各种杂志及洗脸用具等

其他不详。这个密探精通日语，似乎有教员、警察官等的经历，言语，态度等无异于日本人。”[内务省警保局，昭和16年(1941年)11月8日]

我们所以重视日本国内，是因为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大本营和本源。搅动了本源，就能给敌人的中枢以强大打击，对摧垮殖民统治也有很大作用。

使旅日朝鲜人特别是被强行拉到日本的许多朝鲜青年觉醒起

来、组织起来，这在对日作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为了收集军事政治情报，为了把那些将被迫当战争炮灰的朝鲜青年从日本法西斯的魔掌中拯救出来，集体地转向革命一边，是十分必要的。

在日本的朝鲜反日力量，同在国内和海外的反日爱国力量一样，是在最后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日作战时期能够与朝鲜人民革命军配合起来开展积极活动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看日本历代天皇的年号，好像给人以对别国人关怀备至的印象。什么“明治”、“大正”、“昭和”等，意思倒不错。可是，昭和时代是日本把邻国变成杀人场，作为国际刽子手一直把不幸和灾难强加于亿万人类的时代；标榜清明政治的明治天皇，却大喊要吞并朝鲜、吞并东亚、吞掉世界，鼓动日本武士大肆侵略。日本同中国打过仗，也同俄国打过仗，强夺了别国许多利权的正是明治时代。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用刀枪在光天化日之下吞并了我们国家。日本在大正时代也干下了许多坏事。

日本帝国主义历来就残酷地剥削朝鲜人民，吸吮朝鲜人民的血汗，其罪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朝鲜人被强行拉到日本去做牛马。在把人当作猪狗牛马驱使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日本。

朝鲜人并不是自愿去日本的，而是日本军队和警察开着卡车强盗式地把行人像行李一样强行装上车拉走的。有些人甚至在深夜只穿一件内衣就被拉到了日本。

他们把人们强行编成队伍，不给人们任何一点自由。乘船和乘火车的时候，甚至上厕所也轮流派人监视。

日本人来到朝鲜，喜欢说“一视同仁”这句话。意思是说把朝鲜人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这是一句口蜜腹剑的话。如果真是“一视同仁”，为什么像对待牛马一样虐待被强行拉到日本的朝鲜人呢？

在描写旧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出现“打高贝牙”这个词，意为“章鱼房”、“章鱼屋”。章鱼栖息在石缝里。北海道的土木工人把他们像发豆芽的笼屉似的集体宿舍叫作“打高贝牙”。如果叫做“牢房”，就有危险，所以叫做“章鱼房”、“章鱼屋”。

朝鲜工人住的窝棚叫做“半岛房”。意思是来自半岛的人住的房子。据说，这比“打高贝牙”的情况更恶劣。夜里在外面要上锁，还放上几条狗把门，别说是逃跑，连外出都不行。

工人们只要说句朝鲜话，就用竹刀或镐把又捅又打。企图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就用绳子穿上鼻子，四处游街示众。日本的承包业者和雇主，甚至肆无忌惮地拷打朝鲜人。他们残忍地用刀把朝鲜工人的脊背割开，往里面嵌入烧红的铅块。他们一不顺心，就在作业现场把工人打死扔进水里或混凝土浆里。

民族自尊心强的朝鲜人怎么能忍受这种虐待和侮辱呢。朝鲜人虽然善良、淳朴，但骨头是硬的。

被征工、征兵到日本去的人据说有一百几十万，他们的心里都有一个主意，那就是希望日本早日灭亡。如果有一天抗日游击队打进朝鲜，他们也将一致奋起痛打日本鬼子。

并不是只有工人有这种打算，到日本去留学的青年学生也都

有这种打算。在日本的朝鲜留学生，据说有一万多人。一万多留学生，这个数字并不小。

我每当听到在日本的朝鲜人的生活惨状时，就心痛欲裂。旅居满洲的朝鲜人还能多少受到我们的保护。可是，在日本的朝鲜人却得不到这种保护。所以我们更同情他们。

不过，只是同情，怎么能拯救他们呢。人同情人，谁都能做到。共产主义者能给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群众赠送的最好礼物是组织。只有组织才能从苦难中拯救人民。

朝鲜人在日本建立的组织很多。有共产主义组织、民族运动组织、启蒙组织、学生组织等各式各样的组织。

在日本开展的反日运动中，也是青年学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建立了叫做旅东京朝鲜人留学生学友会的组织，在三一人民起义前夕还拟定了独立宣言书。这个宣言书的抄本传入国内，给了独立运动者很大的鼓舞。

日本用武力吞并了我国的时候，为了表示抗拒，在东京和京都的许多朝鲜留学生集体地回国了。可见，朝鲜青年学生的抵抗精神是多么强烈。

以民族运动的形式开展的青年学生运动，虽然以请愿、示威、培养实力等消极的斗争形式同敌人对抗,但对我们同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朴烈也是到日本去留过学的。他以阴谋杀害日本天皇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坐了二十多年的牢，祖国解放才获释。

1925年建立朝鲜共产党的人当中，有不少曾到日本留过学的人。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日本时，他们建立起许多思想团体和组织，开始了研究和传播新思想的工作。

30年代初，在日本的朝鲜人共产主义团体已达三十多个，参加这些组织的人有数千人。共产党组织以日本共产党一个支部的形式存在。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旅日朝鲜人的工人运动也得到了发展。在大阪成立了叫做东亚合同组合的民族企业团体。朝鲜人到日本去，还组织了很多宗教组织。在日本，还有过新干会支部。

如上所述，在旅日朝鲜人中间有众多的各种形式的组织。当然，这些组织的主义和主张各异，活动方式也互不相同，有的组织还没有超越启蒙、和睦相处、互助的范围。

但是，从全民抗战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些组织都是很大的力量。鼓动纯粹的启蒙组织，使其投入革命的实际斗争，是不成问题。所有的组织都要反日，因此，这种改造就取决于我们努力的如何。

被强行拉到日本的同胞中有这样或那样的组织，它们都是插在日本帝国主义心脏的定时炸弹，给这个炸弹点火的使命就落在我们的肩上。

因此，我们对由朝鲜人形成的几十万劳动大军和反日力量集中的日本本土，予以特别的注意。

为了把朝鲜人反日运动同抗日武装斗争在一个脉络上联系起来，保证对在日本各地自发地分散进行的朝鲜人群众运动的统一

领导，同时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从质量上发展这一运动，向日本派工作员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向日本派入工作员的通路，主要利用了釜山至下关和清津至敦贺的航路。需要长期潜伏的重要政工人员则绕远路利用第三国的港口。

最容易出入日本的阶层是留学生。有钱人提着皮箱或柳条箱到日本去留学，是当时的一种趋势。

我交给朴达和金正淑一项任务，要他们物色能做我们工作员的有前途的留学生。

后来，金正淑了解到，从丰山到日本去工读的青年在东京建立了留学生组织。

如果把在东京的留学生组织改组成革命的组织，就能从日本本土的中心开辟使朝鲜人革命化的道路。

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京滨地区是日本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工业区。

朝鲜留学生和朝鲜工人最多的地方也是京滨地区。我把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交给金正淑，叫她研究一下同丰山留学生携起手来把他们在东京的组织变成革命组织的途径。

金正淑向朱炳谱转达了我们的意向，并同他商量了如何把东京的留学生组织改变成革命组织的办法。

据说，朱炳谱选的最适合于派到日本去的人，就是李仁模。

丰山留学生在东京建立的组织，是丰友东京工读生亲睦会。丰友，意思是来自丰山的朋友。这个亲睦会有时聚在一起谈论时

局，悲叹背井离乡的苦衷，有时还给无职业的会员介绍职业，纯粹是个亲睦团体。

如果说它有点政治色彩，那也不过是骂日本鬼子“内鲜一体”是欺骗，“同祖同根”是谎言，“一视同仁”是胡诌。

李仁模一到东京，就给这个组织灌输了白头山精神。

丰友东京工读生亲睦会成员看到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成立宣言，受到了很大鼓舞。原来没有任何目标和方向，只是在郁愤中挣扎的亲睦会，就这样变成了反日爱国团体。

当时，在日本的朝鲜留学生支持我们在白头山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并为同我们联合，从各方面做出了努力。

在高等学校、中学和专科学校里也有不少反日地下组织。

1944年上半年，被日本警察发现的金泽朝鲜学生民族主义小组，也是我们主力部队的政工人员组建的抗战组织。

金泽中学朝鲜留学生的活动，由朝鲜人民革命军政工人员李哲洙向我们作了汇报。

李哲洙在清津执行特殊任务。他在以学生身分执行政治工作任务时，在去日本金泽中学留学的学生当中安插了工作员。

工作员到了金泽后，吸收来自朝鲜各地的学生在学校里建立了无名组织。组织没有命名，是为避免遭到敌人的破坏。这个组织的最终目的，也是决定性时机一到就发动武装起义，与朝鲜人民革命军向国内进军相呼应。

据日本警察的资料，这个无名组织的成员们说，北朝鲜人独立运动者金日成以白头山为根据地组织了游击队，为朝鲜独立而战，

还在训练优秀的朝鲜同胞；他们也将投奔金日成参加独立运动。

在日本虽然有许多反日组织，但公开地以投奔白头山加入我们队伍为斗争目标的组织还没有几个。大部分反日组织听到我们斗争的消息，从中得到了力量。他们以开展最后进攻战时与我们相呼应为目的进行了斗争，但考虑到日本警察的镇压，没有公开表露过这种斗争目的。

在大阪，曾有个叫做忠诚会的工读生组织。

本来那里有很多来自济州岛和庆尚道的工读生和工人。据说，济州岛人抵抗精神和团结力很强。据总联的人说，聚居在大阪贫民区念大学夜授部的济州岛青年，民族意识都很强。民族意识强的地方，必然成立组织，也必然会涌现出许多革命者。

济州岛的留学生在大阪吸收来自济州岛的青年办起了同人夜校，以在那里培养的人组织了反日亲睦团体，后来从我们的工作员那里得到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后，再以反日亲睦团体成员和日本大学附属夜授中学部的学生建立了叫忠诚会的新组织。

这个组织提出的纲领和斗争任务很不错。只看忠诚会的宗旨就足见它是什么样的组织了。这个会的宗旨是：苏联和日本一开战，就立即回朝鲜，领导青年抵抗日本，开展独立运动，金日成大举进攻时就与之相呼应，勇敢地进行斗争。

忠诚会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时，其有关人员就回到汉城，同我们派去的国内工作员携手继续进行了革命活动。解放后，他们在南朝鲜和日本投身于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他们和济州岛游击队也取得了联系。

甚至在日本的神学校里也有朝鲜留学生的反日地下组织。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是在神户的中央神学校的朝鲜学生民族主义小组。

在他们的斗争中值得注目的是：赞扬在白头山进行斗争的我们为大有前途的独立运动者，并努力培养了民族意识、独立精神和爱国心。

冈山六高等学校的朝鲜学生亲睦会也改组为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把冈山六高等学校的朝鲜学生亲睦会改组为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人，是当时在东京读大学的闵德元。

据说，闵德元对他们说，光复朝鲜是朝鲜同胞面临的至高无上的任务，祖国光复会号召朝鲜的一切爱国力量联合起来投入光复祖国的圣战；留学生们作为朝鲜的知识分子要启蒙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拉来的不幸的朝鲜同胞，使他们觉醒起来，团结到反日组织里，等日本内部发生混乱时，一齐动员起来实现独立。当时，工作员们作了很多这样的宣传。

闵德元还安排吕云昌、金在镐等组织成员在放假期间回家乡，在家属、亲友和同学中进行启蒙工作。

那个时期的启蒙工作，中心是宣传介绍抗日游击队的战果。在介绍完战果，解说完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后，就单刀直入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是真心希望朝鲜独立，就要投入光复祖国的圣战，你们有没有这个意向。用这种方法先从合得来的亲属亲友开始结成伙儿，然后悄悄地引进组织里。

六高还有不少有趣的事。六高组织成员当自己的弟弟及其朋

友受日本人宣传的骗，要参加少年航空队时，就劝他们不要参加，还劝他们去找金日成部队。据说，在这些组织成员的影响下，一些青少年到满洲去找我们，但没有找到而返回去了。

祖国光复会冈山分会的成员，有些人在解放后献身于祖国统一的事业，有些人入智异山同李铉相一起进行了游击斗争。

在工人群众中也有过很多反日斗争组织。日本的主要工业区——京滨地区和阪神地区，以及北海道、新潟等朝鲜人多的地方都有过不少由工人组成的斗争组织。

在京滨地区的组织中放异彩的是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同盟会是以工人为骨干吸收工读生组成的反日组织。这个组织否认日本天皇的正统性，反对派别，赞扬朝鲜爱国者的活动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斗争。

同盟会在工人和工读生中大力进行了关于我们的宣传。

日本官方资料就同盟会成员的宣传内容写道：

“在北满的……金日成是我们的同胞，其势力很强大，连日本军队也为之伤脑筋。他们有时袭击朝鲜内地，但从不侵犯朝鲜同胞的家，而以日本人房屋和日本人为目标。这实在是令人敬佩的行动……”[《特高月报》，内务省警保局，昭和17年(1942年)3月份，第202页]

同盟会的战略是：利用敌人的志愿兵制度，暂且接受军事训练，一旦事态有变化就把枪口掉过来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同盟会主张，朝鲜的独立，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实现。

京滨地区的朝鲜工人多么敬慕金日成同志，他们的反日情绪多么高，可以从东京一个工人组织成员的表述中看出来。他表示决心说："在满洲国金日成组成朝鲜独立团积极进行活动。将来，朝鲜的大总统是金日成。我们要跟着他前进。

应征入伍为日本而死，是无谓的送命。我们要投向金日成的怀抱，为朝鲜而战。"[《特高月报》，内务省警保局，昭和19年(1944年)3月份，第75页]

本来，京滨地区是20年代旅日朝鲜劳动总同盟成立和进行活动的地方。这个劳总很早就被解散，但其残余力量仍在继续进行活动，虽然力量很单薄。白头山武装斗争的春风引发了他们改组原组织为革命新组织的热潮。

我们往北海道派去了大批政治工作员。

打进北海道的工作员中有个化名金太玄的人。

他的任务是潜入北海道，可是他没有直接到那里去，而是先到了千岛群岛的军事基地建设工地。他一面宣传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一面秘密地建立了组织。后来被逮捕，在被押送监狱的途中逃脱，在隐藏了一段时间后，他去北海道开始工作。他把征工到矿山、飞机场、水电站等建设工地的朝鲜工人团结到反日组织里。据说，他的政治工作做得很好。

他向工人们宣传说，祖国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就是因为失去了祖国，才被强行拉到这个远在天涯的北海道来受苦受难；为了光复祖国，我们民族正在浴血奋战，在白头山密林里有手持武器誓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革命者；只有有了祖国，

才有我们，我们要同金日成部队一起斗争，尽早光复祖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建立组织，把人们团结起来。他又向工人们逐条解说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随后，吸收支持这个纲领的人建立了组织。

这些工人在北海道的许多苦役场带头举行了罢工。夕张煤矿工人的暴动就是这个工作员组织的。

看了在日本出版的《强行带走朝鲜人、强制朝鲜人劳动的记录》一书，就能比较详细地了解在北海道、南部萨哈林、千岛群岛等地组织的建设和反日、反战斗争的情况。这部书是强行带走朝鲜人真相调查团编写的。这个调查团的副团长藤岛宇内是著名的评论家，多次访问过我国。他是日本人中最先参观了我国革命战迹地的人。

这本书里还叙述了一个工作员打进北海道土木建设工地，向朝鲜工人宣传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唤起他们投入反日斗争的资料。那个工作员在工地经常组织工人怠工，策动许多工人逃离工地，给日军的军需生产造成了困难。

逃走的工人到了别的工地都成了斗争的火种。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灭亡的日子日益迫近，就打着“要造，要送，要赢”的口号，拼命地促进军需生产。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战主义者则提出“不能造，不能送，不能赢”的反战口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员发动工人破坏军需生产，这对加速日本的灭亡，早日解放祖国，都是有益的。

打进北海道札幌的工作员在被强行拉到军事基地建设工地的工人中建立了地下组织，逐步扩大了队伍，甚至还做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

我们的工作员在北海道的大学及其他各级学校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日本的工人和进步的青年学生也投入了反帝、反战斗争。

日本的主要工业区之一的阪神地区，我们工作员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这个地区的组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强征到兵库县某工厂的朝鲜工人建立的协和训练队特别青年会。打进这个地方的工作员，是由我们派的政工人员教育和训练的同志。

旧日本的秘密文件里把国内工作员的名字写成高英石，我不记得这个名字，看来这不是本名而是化名。

下面介绍的是有关协和训练队特别青年会案件的日本官方资料的一部分。

“对尼崎的朝鲜人民族主义小组协和训练队特别青年会案逮捕审讯的情况……主谋者……炳奎(二十七岁)……逐渐有了民族觉悟，加上偶然受到在满洲搞朝鲜独立运动的……金日成麾下的高英石的煽动：‘不久日苏将开战，与此相呼应，朝鲜也要起来斗争在满洲的金日成准备在昭和20年(1945年)8月进攻朝鲜；为此要做好准备工作，我肩负着实现朝鲜青年的团结，确保粮食供应……的使命，这次是金日成秘密派我来的。朝鲜青年即将迎来朝鲜独立的日子，希望你积极活动……’……他们认为当前与其在朝鲜国内争取同志，还不如作为移入工人潜入有众多朝鲜青年做工的日本，通过集体生活结成大组织，与金日成的进攻朝鲜，作内鲜呼应一齐举行起义；于昭和19年(1944年)3月下旬潜入大谷重工业

尼崎工厂，进行提高移入朝鲜劳工的民族意识和加强团结等活动。”［《内鲜关系月报》，昭和20年(1945年)6月］

我们在远东训练基地的时候，向国内、满洲和日本派了许多政工人员。他们成功地组织、建立了全民抗战力量，为配合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总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在日本，有像金昌国那样由我们亲自选派的政工人员，也有在我们领导下的国内组织按照我们的指令派遣的政工人员，还有与国际联军别动队相联系的特殊侦察员。不管怎样，所有这些政工人员都按照我们提出的全民抗战计划，为了使在日本的所有反日力量都切实做好光复祖国的准备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金日成队”在新潟铁工所建立起强大的反日力量，破坏了日本主要军需品的生产，从而削弱了日本的军事实力，他们还成功地帮助几十名被新强征来的工人集体逃离了工厂。

京都的朝鲜青年工人还提出了以白头山为根据地实现朝鲜独立的目标，并在许多工厂里建立了反日组织。

在日本，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从大学生到神学校学生，从煤矿工人到被强征的劳工，只要有朝鲜人的地方都有了我们的组织。

下面的资料清楚地说明，日本警察当局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政工人员和特殊侦察员被派到日本一事，多么胆战心惊。

资料说，在朝鲜北部航路进行航运的船舶招募补缺船员，平时几乎没有应募

者，而这次每个港口都有四十七至四十八名似乎受过相当教育、精通日语的应募者。因无法知晓他们的底细，只好停止录用。并说明了其理由：

“据情报，这些应募者都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知道渡海到内地不容易，便企图利用船员的身份，乘在内地港口停泊的机会逃出船舶；潜入东京、大阪及其他大城市，煽动那里朝鲜人的民族意识，以便内外呼应搞不法活动。因此，对由满洲方面渡海的朝鲜人船员的动向，有必要严加监视。”[《特高月报》，内务省警保局，昭和16年(1941年)8月份，第77页]

可以说，由于在日本各地分布着众多的朝鲜人斗争组织，使日本犹如坐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这是由于我们的政工人员和小组成员的积极斗争而形成的。

头脑清醒的朝鲜人未曾有过民族的前途会在列强的谈判桌上得到实现的幻想。我国人民确信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可以说就是这种一致的立场和观点才把朝鲜的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人民革命军的周围。

朝鲜人仰望白头山，是因为那里有我们的人民革命军。过去，白头山作为祖宗之山，受到民族的爱护，而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那里开展抗日大战之后，就作为革命的圣山进一步受到了民族的热爱。

我们迅速地发展了武装斗争，以此为中心建立了坚强的主体革命力量，这确实具有巨大的意义。正如抗日革命的整个历程证明，在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最主要的是武装斗争。只有在高水平上发展武装斗争，人民才能迅速觉醒，才能动员各阶层广大

群众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

由于亡国受到严重创伤的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从我们在白头山开展武装斗争以后，就千百倍地增强了，那是过去的民族自尊心无法比拟的革命自负心。可以说我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自负心和祖国爱的本源在于白头山。

在抗日武装斗争的影响下，在日本成立的全民抗战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的实际斗争，为提高民族自主意识，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做出了贡献。

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过程，总联运动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发展。总联所以兴旺，是因为它的基础雄厚。

七　在最后决战的日子里

战后，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当他步入克里姆林宫时，迎接他的一位苏联领导人向他一一介绍迎候在门口的苏联领导人，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也在其中。要介绍他的时候，他笑容满面地说："我们是老相识，不用介绍。"他接着补充说："金日成同志在远东的时候，我们是在哈巴罗夫斯克认识的。"

金日成同志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是的，我们是老相识。"在场的两国领导人都惊讶不已。

金日成同志和马利诺夫斯基的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在哈巴罗夫斯克又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希特勒德国灭亡以后，我们开始全面加紧准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的最后决战。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候，苏联军队已经解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正准备着攻克柏林的战斗。德国的灭亡已成定局。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讨论的重点议题是击溃德国以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他们达成协议，击溃德国两三个月以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雅尔塔会谈确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

的东方被压迫民族和革命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们为了主动迎接解放祖国的大变革，加紧进行了准备。

苏联军队攻克柏林的大战开始后不久，远东前线司令部给我们送来了德国战败的消息。这天晚上，国际联军的苏军官兵，大摆贺宴，通宵达旦地喝酒，把仓库里的酒甚至连军医站的酒精都喝了个精光。苏联人一般都很能喝酒。这天晚上，苏联人，朝鲜人，中国人，不分国籍，都欣喜若狂地唱歌跳舞，庆贺战争的胜利。我们把苏联的胜利看作是我们共同的胜利。继意大利灭亡之后而来的是德国的灭亡，继德国灭亡之后而来的必将是日本的灭亡，这是不言而喻的。德国的惨败，可以说是日本惨败的前奏曲。

曾给世界带来了那么多灾难的法西斯势力，以东方和西方为赛场，开始了奔向坟墓的接力赛，这个接力棒，就要轮到日本了。

我们也必须加紧准备，争取早日解放祖国。

贺宴之后，国际联军的朝鲜指挥员聚在一起，就解放祖国的作战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虽然不是正式会议，气氛却很严肃认真。个个都满怀激情，表现出消灭日寇，光复祖国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大家气势磅礴，像是就要跨过豆满江打入国内似的。

讨论的中心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全民抗战，争取祖国独立的问题。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解放祖国的主体立场；要自力解放祖国，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加强朝鲜人民革

命军的政治军事威力，并且领导国内抗战组织做好准备，以在人民革命军开始进行祖国解放作战时，立即动员起来开展全民抗战；并要加强同苏联、中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合作，密切配合苏联的全面对日作战，充分做好协同作战的准备。这就是那天我们所谈的要点。

此后，就军事、政治合作问题，我多次同苏联远东军指挥部进行了讨论。有时和周保中、张寿篯一起去，有时只带金策、崔庸健去。

为了随时击退日本的侵犯，苏联做了对日作战的细致周密的准备。

这个准备，是在打败德国以前就一直秘密进行的。

苏联的领导，在艰难地进行苏德战争的1943年采取了加强总参谋部负责远东事务部门的措施，对远东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符合战争需要的改编。斯大林选拔在苏德战争中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分别任命为远东前线司令官和各集团军司令官。远东前线司令官阿巴纳森科被调任为莫斯科以南沃罗涅什前线副司令官，加里宁前线司令官布鲁加耶夫被任命为远东前线司令官，就是一例。

到了1944年，苏联军队打到欧洲积极扩大战果的时候，斯大林同时还命令火速增派兵力最大限度地增强远东地区的武装力量。

击溃德国以后，苏联进入了最终确定对日作战计划的阶段。我们也根据我们自己的意志开始制定作战方针和具体的行动计划。当然这是以同苏军的联合行动为前提的。

苏联的高级指挥员都对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寄于很大的期望。国际联军的所有部队，为了即将开始的对日作战，把训练强度提高了好几倍。当时的军事训练，既考虑了组成国际联军的各国部队的特点，也特别注意到了各国部队在对日战争中保证步调一致的问题。

要保证联合作战成功，重要的是正确规定国际联军各国部队的作战任务，保证各军种、兵种之间的密切配合与步调一致。国际联军的军事训练，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很大力量。

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各部队，还为了完善在长期的抗日斗争中创造和磨练出来的游击战法，为了摸索出将此战法有效地运用于大规模的正规战争的方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在全面加强各种训练的同时，还着重地进行了祖国解放作战所迫切需要的侦察训练、工兵训练、有关无线电通讯和航空陆战队的训练。并充分地研究和尽快地掌握了苏军在对德战争中创造的最新作战经验，大家的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国际联军刚成立时被派到训练基地来的苏联教官，大部分是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的人，而到了最后准备对日战争的时候，新调来的教官，大部分都是参加了对德战争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几年来在现代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所以他们的讲课内容都很新鲜。

这个时期，为了领导国内抗战组织进行战备，我们向国内派了许多工作员。白头山密营和间白山一带也派去了工作员。他们同已在那里领导抗战组织的政治工作员一道，加紧进行最后决战的准备工作。

我也回到国内，给国内的队伍确定了与当前对日作战有关的活动方针，同时为了保证苏联的对日作战准备和我们的作战计划一致，还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5年夏，苏联组成了以华西列夫斯基为总司令的苏军远东总司令部，下设三个大的前线军。外贝加尔前线军由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第一远东前线军由梅列茨科夫指挥，第二远东前线军由前远东前线司令官布鲁加耶夫指挥。第一远东前线军的主要作战区域是中国东北哈尔滨以南和朝鲜，第二远东前线军的作战区域是哈巴罗夫斯克以西的中国东北地区。

国际联军原属于第二远东前线军，但朝鲜人民革命军主要同第一远东前线军联系。自从苏军远东总司令部成立以后，我经常同第一远东前线司令官梅列茨科夫、军事委员斯蒂可夫接触，也同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齐斯查可夫和集团军指挥员列别捷夫建立了亲密关系。他们都是一旦开始对日作战就要率部挺进朝鲜的。

远东总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我常去，同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到了1945年夏，远东军总司令部常常开会讨论联合作战问题。华西列夫斯基详细地说明了苏军统帅部的作战计划。他说，要包围关东军主力，再把它分割成几部分，分别孤立起来，然后一举歼灭。

在解放我们祖国的问题上，我们始终一贯地坚持既定的作战方针。

我们的计划是：集结在间白山一带的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沿

着预定的通道进入国内解放各个道；集结在远东训练基地的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迅速空投到平壤和其他几个地区，占据已准备好的秘密根据地，以闪电战消灭日军。与此同时，奋战在国内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各小分队和政治工作员，积极扩大抗战组织，发动广大人民投入全民抗战，在全国各地密切配合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进攻。

我现在仍认为，这个作战计划，在我国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是保证能够在短时间内解放祖国的最正确的计划。只要按照这个计划，空降在各个道的游击队同时出击，同全民抗战队伍联合起来四处打击敌人，再加上，根据同苏联的事前协议，苏联军队用大炮和舰炮轰击敌人的海防要塞，步兵部队以装甲部队为先导，像海啸一样直捣国境防线，那么，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那时，为了最后的决战，我们向国内派去了许多小分队和工作小组，并且给所有的游击队、人民武装队和抗战组织指定了具体任务：要在全歼敌人之后，摧毁敌人的殖民统治机构，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建立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机关。

在苏联远东军指挥员中同我交往最密切的是梅列茨科夫。他是快到五十岁的将领，额头稍秃。他的经历使我意识到，斯大林任命他为滨海省方面的前线司令官，不是偶然的。他原是远东一支部队的指挥员，后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官，苏芬战争时指挥过主力部队第七集团军。他曾任苏军总参谋长，来远东以前是莫斯科西北卡累利阿前线司令官。

我们首次见面，就一见如故，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见

到你，非常高兴。”他请我坐下，然后，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方面，朝鲜同志是先行者。这次对日作战，朝鲜同志的作用非常重要。对你们的斗争，我们寄于很大的期望。”

他在听取了我对国际联军朝鲜支队活动情况的简短介绍后，希望我更加详细地说明朝鲜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他和他的同事对日本在朝鲜的兵力部署、统治方式、朝鲜国内人民的反日斗争情况、革命组织的分布、秘密根据地及武装队伍的活动，表示了特别的关注。

在对日作战开始的前夕，我和国际联军的指挥员去莫斯科参加苏军总参谋部召集的会议。梅列茨科夫、斯蒂可夫等与对日作战有关的各前线司令部负责人也都到齐。在这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华西列夫斯基总司令。

对我们的用空降陆战队战法为基础的祖国解放作战计划，大家都表示支持。当时给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指定的任务是，先把部队空降在满洲各主要城市，为苏联地面部队开辟前进道路。

在莫斯科，我还见到了朱柯夫。他当时是驻德苏军总司令，又是德境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苏方代表。我不知道他来莫斯科的目的。同他的会晤，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著名的百战百胜老将朱柯夫，十分豁达大度，豪放洒脱。

苏联人尽心尽意地接待我们，这是打破了外交惯例的特殊款待。在莫斯科，我们瞻仰了列宁的遗容，参观了历史博物馆，还访问了与保卫莫斯科有关的著名战迹地，再次观看了故事影片《夏伯阳》。

对日作战会议结束后，不知为什么，苏联人仍不让我们回远东，继续安排我们在市内进行参观访问。过了几天，他们邀我们去会见日丹诺夫。他当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

日丹诺夫会见我们时，斯蒂可夫也在场。

日丹诺夫说他受斯大林的委托会见来自东方的使者，并对我们的抗日武装斗争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他说，通过斯大林和斯蒂可夫早就熟悉了朝鲜的抗日将领金日成，今天见了面，看到我比预想的还年轻得多，实在很高兴。据他说，斯大林也对我们的活动格外关心。

我们的谈话，是从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谈起的。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很想听取我对朝鲜解放后如何把朝鲜建成为一个民主独立国家这一问题所持的看法。

他突然问我，国家解放后，朝鲜人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估计需要几年的时间。

我回答说，最多需要两三年。

他听了，搓着两手显得很高兴，同时也露出惊讶的神色。

日丹诺夫为什么特别关心我们在解放后建立自主独立国家的问题，为什么对我的回答表露出既高兴又惊讶的样子。这是因为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战后朝鲜的处理问题提出了托管的方案。罗斯福一贯主张，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亚洲弱小国家，必须在强大国家的支援下“接受民主制度的教育”。

罗斯福在1943年春于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英国外长会谈的时候就说过，朝鲜和印度支那必须置于强大国家的托管之下。他

还说，朝鲜人“在完全实现独立之前大约需要四十年的收拾期”。他太小看我们的民族了。

我强调说，我国人民在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经受了锻炼；形成了富有斗争经验及熟练的组织能力和强大感召力的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并涌现出了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的广大爱国力量。

日丹诺夫注意地听了我的话，然后问我，解放后，朝鲜人民的建国事业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援。

我回答说，苏联同德国打了四年仗，不久还要向日本开战，哪还有力量来帮助我们啊。如果真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当然很感激。但我们想，要尽可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虽然这样会很吃力，但我认为，对于将来，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我们的国家历来就存在着事大主义，这是招致国家灭亡的祸根。在建设新社会的时候，绝不容许事大主义造成危害，这就是我的决心。我们对苏联的期望是，在国际舞台上能给予我们政治上的支持，并为使朝鲜问题能够根据朝鲜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得到解决而做出努力。

日丹诺夫听了我的话，很满意。他说：“前不久，东欧一个国家的同志，一见到我就说，他们的国家经济本来就很落后，再加上又遭到了严重的战争破坏，困难很多，希望苏联作为老大哥，多给些援助。这跟您的立场是多么的不同啊！也许这就是东方与西方，日出国与日落国之间的差别吧。”

他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是打趣的，哪能有什么日出国与日落国的差别呢。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东欧国家的领导人相信苏联胜于相信本国人民的力量。那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苏联军队解放的，所以，他们都仰仗苏联，照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苏联说“阿”，他们也跟着说“阿”，莫斯科下雨，他们就撑雨伞。他们的事大主义如此严重。

这就是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原因之一。

日丹诺夫说，他将把我们的会晤情况报给斯大林。

从此以后，我同日丹诺夫又会晤过多次，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梅列茨科夫好像也对斯大林讲过不少有关我的话。

我至今忘不了在旅顺同梅列茨科夫会晤的往事。解放初我去旅顺，在那里会见过梅列茨科夫。他同我谈了不少问题，最后说，他就要回莫斯科去见斯大林，问我有没有要托办的事。我提了几个问题，如废除苏军司令部发行的军币，改用我们自己发行的货币，实行产业国有化，将朝鲜人民革命军改编为正规武装力量等，并希望苏联给予必要的帮助。

此后，梅列茨科夫继续从各方面帮助了我们的工作。他任滨海边疆军区司令的时候，常常到平壤来，每次来，不去苏军司令部，却先奔我家。有一次，他和马利诺夫斯基一起到平壤。驻朝苏军司令请他们到专供外宾用的旅社下榻。可是他们谢绝了，说：“我们是到金日成同志家去做客的，我们要到他家去，请他的夫人给我们包饺子吃”。然后径直到了我家。我在不在家，他

们全不在意。他们都是很大方很随和的人。可这就苦了金正淑，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来了客人，她怎能不着急呢。

马利诺夫斯基却对她说：“我们来平壤时预先做了通知，可是他没到机场来接我们，也不在家里等我们，可见他忙得不得了，咱们就别等他，先吃吧。”他跟金正淑要了朝鲜冷面，还要了“朝鲜面包”。

话再说回来，我同日丹诺夫会晤后，和斯蒂可夫一道到了远东。

我和斯蒂可夫在远东结成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过。斯蒂可夫为朝鲜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作为根据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决议建立的苏美联合委员会的苏方代表团团长，为了朝鲜的统一和自主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召集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员，通报了我的工作情况。

1945年8月9日，苏联根据与盟国的协议，正式对日宣战，进入了同日本的战争状态。

同一天，我向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下达了为解放祖国开始总攻击的命令。

当时我命令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在开始最后总攻击之前，先出其不意地袭击雄基郡土里、珲春县南别里、东兴镇等敌人的国境要塞区的几个要冲，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打击敌人部署在要塞区的有生力量和火力器械。

同我们联合作战的远东第一前线军司令部最关注的是选择最

有效的打击点。也就是说，在敌人要塞化的国境地区，打击哪一个环节，才能打乱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这个问题我决定由我们来解决。

截止1945年，日军在满洲、苏联、蒙古边境地区构筑了许多永久性的火力点。朝鲜的四个要塞区，都是进攻苏联的基地。他们十多年来构筑在朝苏、朝满、苏满边境上的要塞区，集结着关东军和驻朝日军的庞大陆海空兵力。他们号称这些要塞区是“攻不破的防线”。这些要塞都是秘密的地下要塞。为了保密，敌人枪杀了参加构筑的全部民夫。这些要塞，是对日战争的最大障碍。苏军指挥员重视的是这些要塞后面的日军主力，而我认为难题是对这些要塞的突破，因此我决定先对要塞区的几处要隘进行试探。

我提出要在开战前先打一场局部的战斗，第一前线军的高级指挥员都很惊讶。我对他们说，要想打开对日战争的突破口，就必须打几处军事要冲，迫使敌人暴露出秘密增强的防御体系和隐蔽的有生力量与火力器械。

据此，我们的一支部队，在开战前夕冒着狂风暴雨袭击了豆满江要塞区的一个要冲土里。这个要冲位于庆兴要塞区和雄基——罗津要塞区之间，位置十分奇特险要。只要攻克了这个要冲，敌人就得被迫让出这一带的广阔地盘，他们的庆兴要塞也将陷入危险之中。

我们的部队攻进土里，烧毁了警察署，解放了这个村庄。这是在解放祖国的最后决战中我们的革命军解放的第一个地方。敌

人迅速派了增援部队，但这支增援部队早已吓破了胆，到雄尚岭朝熊熊燃烧的警察署眺望了一阵就逃回去了。

对朝鲜人民革命军袭击土里一事，日本的一本书有如下记载："8月8日晚上11时50分，朝鲜人的一个集团约八十人同苏军共乘快艇越过豆满江袭击了土里。此地与苏联近在咫尺，土里警察署先遭袭击……

"9日晨3时许……派一卡车兵力增援，却为时已晚……从雄尚岭折回。"（《朝鲜终战记录》，第29页）

与苏军形成了联合战线的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别动队、先遣队以坚决果敢的战斗打开突破口，在贯彻我们的作战意图，即闪电似地结束对日作战方面，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以间白山密营为最后攻击出发阵地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一面扩大队伍，一面按作战计划发动了攻击。集结在豆满江沿岸的我军部队一举突破敌人的国境要塞，解放了庆源、庆兴一带，继续向雄基方面发动攻击，迅速解放了祖国的广大地区。负有登陆部队先遣队使命的另一支部队，同地面部队紧密配合，在雄基登陆，不断扩大战果，并向清津一带发动进攻。

其他部队解放了金仓、东宁、穆陵、牡丹江之后，继续追歼敌人，直逼豆满江对岸，沉重地打击了关东军。

被派到国内活动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各小分队和政治工作员，积极发动人民武装队、武装起义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投入了武装暴动。他们在全国各地袭击和消灭了日本军队、宪兵、警察，扰

乱了敌后，积极支援了进击的朝鲜人民革命军。

在摧毁庆兴要塞的战斗中，来自桃泉里的韩昌凤打得很出色。他在国际联军先遣队中第一个渡过了豆满江。先遣队过了豆满江，在地方革命组织的帮助下，一举摧毁了敌人的炮楼和永久性火力点，解放了元汀一带。

在摧毁豆满江一带要塞的战斗中，训戎马乳山战斗很出名。马乳山和月明山一带是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防线。敌人炸毁了训戎桥，蜷缩在筑有永久性火力点的高地上准备与我方决一死战。朴光鲜带领朝鲜人民革命军一个侦察小组，扮做日军，深夜渡过豆满江出现在马乳山背后，查清了守卫马乳山的敌军有两个大队的兵力。侦察组用无线电向部队报告了敌情，然后带领渡过江来的部队，投入了战斗。

马乳山一带的人民武装队，预先炸毁了敌人的火药库和存放各种弹药的露天仓库，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参加了土里袭击战的吴白龙先遣队，在万香岭战斗中也立了大功。

万香岭，是敌人在陆地上守卫雄基——罗津要塞的重要关口。

我军一支队伍来到这里受到了阻击，吴白龙自告奋勇，带他的先遣队爬上高地，摧毁了阻止我军前进的所有火力点，炸毁了炮阵地，开辟了我军的前进道路。

苏军官兵举起大拇指，称赞朝鲜游击队打仗真棒。

我们的战士中，还有在祖国解放的前一天牺牲的金凤锡，他是我最喜欢的传令兵。他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传达我命令的任

务，而且还善于做政治工作。30年代末期，我曾派他跟尹丙道一起，潜入敌人的“讨伐”据点龙井城，进了中学。他头戴学生帽，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政治工作。他曾把朴寅镇一直护送到汉城，还参加过天道教教徒们举行的什么纪念活动，还对他们的上层人物发表了革命演说。

他是给在国内参加解放作战的吴白龙传达了我的关于同苏军联合作战的具体命令之后，在回来的路上牺牲的。他完成了任务，在回来的路上到一户人家吃了一顿饭。不料这家主人是个坏蛋，向警察告了密。他在同追捕他的敌人交战中壮烈地牺牲了。这天正是1945年8月14日。他是我非常喜爱的战士，可是连他的遗体都没有找到。参观革命烈士陵园的人们，站在他的半身雕像前，追念着这位解放前一天牺牲的烈士，无不感到极大的惋惜，久久不愿离去。

罗津是罗津人民武装队解放的。

罗津这个海港是敌人付出很大力量修筑的坚固要塞，港口里经常停泊着许多军舰，周边的高地上都有高射炮部队。因此，担任罗津登陆战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海军部队，原以为这场登陆战一定是很艰苦的。可是当他们开到罗津的时候，罗津已经解放了。

最初，苏军用大炮和舰炮轰击的时候，盘据罗津的日军以为发生了类似张鼓峰事件的冲突，准备负隅顽抗。

这时，人民武装队的一支小分队，乘黑夜摸进市里，向要塞司令部、宪兵队和警察署发动了攻击，还放火烧了陆军军需仓

库。以此为信号，人民武装队主力攻进市内，里外夹击，扫荡了敌人。

参加罗津解放战斗的一个苏联军官的手记有如下的叙述：“……我们接近罗津市的时候，传来了机枪的哒哒声和炮声。接着，城郊涌出许多朝鲜农民，挥着双手高呼万岁。听他们说，在市内，金日成游击队和日军之间的战斗持续了两天。罗津市的小广场和街道挤满了敌人的汽车和装载货物的各种车辆。我们这才明白，朝鲜游击队已经切断了日军逃出城市的退路。

“日本的武士们被我们和游击队夹在中间，开始放下武器，做了俘虏。这时，我们看见一百多名武装人员从城郊向我们跑来，他们的指挥员向我们的坦克兵大校说：‘我们是金日成游击队！’（摘自伊·乌勒鸠梅拉什维里《朝鲜手记》）

人民武装队在全国各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投入了消灭日军的战斗。各道的所有地方，都有人民武装队的活动。咸镜北道庆兴、雄基地方的人民武装队，从开战初期就同朝苏联军汇合，打得很出色。清津、吉州、城津地方的武装部队，八一五解放前就摧垮了敌人的残余力量和警察机构，掌握了工矿企业。

崔一组织的鹊峰武装队在解放祖国的最后决战中起了很大作用。

崔一是1941年夏派到会宁地方的工作员，吴白龙小组给他带路，并给他指定了工作地点。他就在这一带把烧炭工人、躲避征工、征兵而来的青壮年和进步青年集结起来组织了武装队，自己

任队长。这就是鹊峰武装队。武装队成立时，宣读了誓词，发表了临时条例和行动规则。

崔一同庆兴郡鹿野里熊山地方的朴昌范建立了联系。朴昌范是以熊山秘密根据地为据点进行活动的政治工作员。

这支武装队在最后决战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行动。在北部边境一带战斗开始打响的时候，他们在元汀、青鹤、马乳山一线消灭了敌军溃逃的残兵败将，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和油库，没等到苏军到来，就自己解放了会宁。他们在鹊峰一带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数目多得惊人。他们甚至缴获了敌人的飞机、高射炮和大量的被服以及武器弹药。

两江道和咸镜南道一带的抗战组织也在苏军到来以前袭击和摧毁了许多警察署和统治机构。江原道铁原、法洞地方和平安北道盐州、朔州地方的抗战组织也都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新义州地方的抗战组织，从发出了总攻击命令的第二天起，就攻打警察派出所和国境哨所，占领了道警察部和道行政厅，解除了躲在飞机场里的日军武装。8月下旬苏军进驻时，都移交给了苏军司令部。

在平安南道和平壤地区，以祖国解放团为中心，组成庞大的抗战队伍，袭击了兵工厂，占领了道和府的行政厅，压制了日军残余兵力的反抗。黄海道的抗战组织也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前袭击和压制了许多地方的敌人。

每当回顾最后决战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为解放祖国在苏联训练基地做了多年的准备，到头却未能按计划参加作战。

当我军在北部边境地区同日军交战的时候，我一面指挥前线部队作战，一面根据前线的战局对陆战队进行了部分的改编，发放了新的武器、弹药和器材，最终地做好了率领航空陆战队向朝鲜出击的准备。

然而，陆战队刚刚开到机场，又不得不返了回来。因为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日本投降，是意料之中的，但没想到会这么快，简直令人感到惊疑，不敢相信。那么不可一世，残暴凶恶的日本强盗，开战才一个星期就乖乖地举起双手投降了，真是让人不可想象。

但是，日本的投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摧毁日本侵略者，是我们的先辈至死念念不忘的愿望，是我国人民几十年来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牺牲，含辛茹苦，坚忍不拔地攀登跋涉的抗战大道的终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我们的祖国和民族的面前出现了复兴、繁荣的光明前途。

有些人说日本的过早投降是美日之间共谋的产物。但不管真情如何，如果日本再拖几个月，我们是完全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解放全国领土的。

有一篇资料就日本帝国主义的慌忙投降所导致的形势作了如下的叙述：

“在日本逐步走向战败，苏联拿起正义的武器准备向日本进击的时候，金日成将军制定了再度派手下精锐部队打进满洲消灭关东军的计划。他向满洲各要冲派出了部队，还准备了二十多架飞机。他计划同大多数是被日本强征入伍的学徒兵等日军官兵中的朝鲜人联合起来作战。这一历史性的计划就要付诸实施

的时候，日本宣布投降了，计划未能得以实行，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如果这个计划订得再早一些，或者日本的投降再迟一点，那么，金日成将军一定会大展经纶，施展卓越的战略战术，随同飞机、大炮的轰隆声和大军雄健有力的脚步声，步履矫健地凯旋祖国的。然而这都未能实现，可谓是金日成将军和我们全民族的千秋憾事。”[摘自日本东京发行的杂志《文化朝鲜》的文章《论金日成》，昭和22年(1947年)5月]

听说，日本战败的消息一传开，全国男女老少都兴奋得哭了起来。

平壤的练光亭和乙密台，整天是一片欢腾雀跃、唱歌跳舞的人海。国家主权被剥夺了四十年，国土被吞并了三十六年，在这漫长的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受尽了种种欺凌与压榨的民族，如今为摆脱了奴隶地位而发出的欢呼声，震撼了三千里江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但是，日军仍在继续抵抗。这是美、日帝国主义为防止战后朝鲜的共产主义化、阻碍朝鲜实现独立自主而蓄意策划的阴谋的产物。

1945年8月16日，朝鲜总督府和朝鲜军管区司令部发布“政治运动取缔要领”，命令各地日军部队镇压朝鲜人民的解放斗争。他们扬言驻朝日军依然健在，居然警告朝鲜人不要轻举妄动，如果乘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机，掀起独立运动，将断然行使武力予以镇压。

这就是说，日本虽然宣告了无条件投降，但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仍没有结束。在朝鲜总督府和驻朝日军无视无条件投降宣言的

情况下，国内的抗战力量坚决毫不留情地用武力消灭了继续顽抗的日军残余势力和统治机构。

在平壤市和平安南道，抗战组织和武装队伍在苏军进驻以前就消灭了日军残余部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建立了从道到基层的党组织和自治机关，夺取了道内的行政权，直接主管一切民政问题。

据史料记载，除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外，国内其他地方的抗战组织和武装队伍，仅在8月中旬一个星期之内，就袭击和摧毁了近一千个敌人的统治机构。

如上所述，朝鲜人民革命军坚持了近十五年的斗争，从军事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的殖民统治。我们国家的解放，就是由这支朝鲜人民革命军和吸收各阶层群众参加的全民抗战力量，总动员起来才实现的。因为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群众进行了长期的抗战，苏联的对日战争才得以在短期内胜利结束。

朝鲜的解放，是在苏联军队击溃日本关东军的有利形势下，我国人民和人民革命军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到的伟大胜利。在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前半期，我们在国内建立的抗战组织和武装队，根据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最后攻击作战计划，在国内各地压制和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和殖民统治机构，解放了祖国。

下面的资料充分证明了朝鲜人民是用自己的主体力量解放了自己的祖国的。

美国人在1945年8月15日以前的一个外交文件中说，“朝鲜共军(金日成部

队)在适当的时机很可能席卷整个朝鲜半岛。”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写道：“旧满洲(中国东北)是太平洋战争的核心部位，金日成将军的抗战成了挫败日本军事扩张的主要原因。”

对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苏联人指出：

“40年来(自1905年以来)……朝鲜独立地坚持进行了反抗压迫者的斗争。直到1945年8月，朝鲜的游击队一直积极奋战……积极支援苏联军队打败了日本。”(列·马利诺夫斯基《关东军的溃灭》朝文版，第311页)

日军平壤守备队队长竹下在战败后对苏军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齐斯查可夫大将供认，日本在朝鲜拥有两个军团和九个师团以及大批的宪兵、警察，其主要目的是准备对苏战争和制止朝鲜的游击斗争。

我国人民的反日斗争有几百年的历史。早在16世纪末，我国就同数达几十万的日本侵略军打了七年的仗，即壬辰卫国战争。

只算近代的，朝鲜民族的反日斗争历史就有七十多年。1875年发生云洋号事件时，我国人民就用武力反击了日本侵略军。当时的统治阶级被日本军的威势吓得战战兢兢，不知所措，但我国的军队和人民群众坚决地进行了反击。

此后几十年来，为击退外来势力，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卫正斥邪运动[18]、义兵运动、启蒙运动、独立军运动等暴力斗争和非暴力斗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

正如白头山作为祖宗山统帅着朝鲜的千万座山峰一样，在白头山密林中开始和发展的我们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我国人民争取

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中一贯地发挥了主导作用。

朝鲜的解放，可以说是坚持了二十年的抗日革命斗争的总结，是国内外广大反日爱国力量几十年来不惜流血牺牲坚持开展的英勇抗战的伟大成果。

八　凯旋

主体34年(1945年)8月，朝鲜全国翻腾着欢庆解放的热浪，万分激动的欢呼声震撼着三千里江山，全国人民望眼欲穿地期待着民族英雄金日成将军凯旋祖国。

民族领袖诞生的古都平壤彻夜不眠，通宵达旦地企盼金日成将军入城。主体14年(1925年)冒着狂风暴雪辞别了家乡的金日成将军，何时回来，是今天，还是明天？四十万平壤市民翘首企足，盼望着将军早日归来。

在汉城，吕运亨、许宪、洪命熹等德高望重的人士，成立了欢迎金日成将军筹备委员会。汉城车站广场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市民热切地盼望金日成将军的到来。

三千万人民的心都在朝着金日成将军凯旋祖国的那一时刻飞奔疾驰。

自从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训练基地，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个个兴奋不已，都忙着准备回国。二十年如一日地在异国他乡风餐露宿、戎马倥偬的我，也愿意早一天回到祖国去。但是，我们把对祖国和家乡的怀念深深地埋在心中，推迟了回国的时间。当然，我们不是不知道祖国人民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朝鲜人民革命军凯旋祖国的心情。

我们没有急于回国。我想，要回去，就要事先充分做好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建设新社会。在祖国解放的战略任务已经完

成的情况下，必须把新社会建设的时刻表安排得十分紧凑。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上举行了从法律上确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国际仪式，日本外长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重光葵是任日本驻华公使时被尹凤吉炸断了一条腿的瘸子。梅津美治郎是日本军部的头面人物。他于1939年秋至1944年夏任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存在期间司令官换了十来个，梅津是倒数第二个。敌人打出“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的牌子，对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疯狂大“讨伐”的，就是梅津当司令官的时候。

多年来把人类推入不幸和痛苦深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以日本的投降和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而结束。

当我们的夙敌梅津在投降书上签字，悲伤地饮下一杯苦酒的时候，我们则作为取得了抗日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民族解放革命新历史的主人，准备凯旋祖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发祥地欧洲和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方亚洲的许多国家，开拓了在民主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的前景。

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我国刚刚获得解放，各地就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以国内党组织的革命者和抗战组织的成员为骨干，在各地建立了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海内外的文艺界人士，也怀着建设民族文化的美好理想汇集到平壤、汉城等主要城市。工人群众自发组成武装自卫队，保卫工矿企业、铁路与海港。我国人民在全民抗战中高涨起来的

救国热情转换成了建国热情。无论从朝鲜革命当时的任务来看，还是从最终目标来看，我们面前的形势都是令人乐观的。

然而，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日本虽然灭亡了，而反革命势力并没有放弃对革命的进攻。在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后，日军的残余仍在继续进行抵抗。亲日派、民族叛徒和剥削阶级的头子们还在地下策划破坏新社会建设的阴谋活动。革命的叛徒、形形色色的异己分子和政治野心家，改头换面，混入了党内和人民政权机关。

我们在远东听到了美军进驻三八线以南的报道。如果美军进驻三八线以南，那么进驻我国的，就是两个大国的军队了。我们不是战败国，却有两个大国的军队驻扎，不管它以何种名义，也不管它以何种理由，这对我们肯定是很不利的。

甲午农民战争[19]时，日本和清帝国都曾同时出兵我国，不仅没有给我国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演变成了中日战争，致使我国河山陷于战乱之中，赤地千里，民不聊生。

苏美两军的进驻，会把我国变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战场，我们民族会有分裂为左翼和右翼、爱国与卖国两个营垒的危险。派系纷争，里通外国，其结果必然走向亡国。

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我们民族的主权，促进新社会的建设，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加强我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我国革命的主体，就是我国人民。

我们从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天起，就为教育抗日革命的直接承担者——人民群众，为组织和发动他们，做出了很大努力。为

祖国解放而参加最后决战的成千上万的抗战队伍，不是凭一时冲动的群众，而是我们长期培养的有组织的革命群众。

我们一向坚持这样的信条，只要能多争取到一个革命同志，就是走千万里路，也心甘情愿；只要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抗日革命的整个历史，是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主体，唤起并组织他们站到光复祖国第一线上的关爱与信任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献出自己的热血从而证明自己是历史的堂堂正正的主体的伟大斗争和创造的历史。这样的人民群众，这样的人民革命军指战员，就是将担负起建设新社会重任的革命主体。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的爱护和支持下进行斗争，就能经得起任何严峻考验，就能在艰苦斗争中赢得胜利。这是我们在抗日革命的烈火中领悟到的宝贵真理。

解放后，有人说，收复被侵占的国土，是件难事，但是国土收复后，建设新社会并不难。我却认为，建设一个新社会，才是最艰难最复杂的。

抗日革命是我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完成的，新社会的建设也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建党、建国、建军自不用说，民族经济、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的建设、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开拓，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这就是我们的决心。要想发动人民群众建设新社会，就要有能够教育、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革命参谋部和政权机关，就要有能够保障新社会建设的军队。

我抱着这种想法，于1945年8月20日在训练基地召集了一次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把建党、建国、建军三大任务作为加强我国革命主体力量的新的战略提了出来。会议上讨论了贯彻这三大任务的工作方向和方法，并做了相应的组织工作，组建了执行这三大任务的工作小组，指定了他们的工作地点。决定派姜健、朴洛权、崔光、任哲、金万益、孔正洙等人去中国东北。

在回国以前，我们为工作小组成员举办了几天的讲习，由我、金策和安吉讲解了各小组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甚至还介绍了各地方的风土人情。

讲习一结束，同志们就催我早日回祖国。那时候，人人都盼着尽早回国，像萌发了童心似地想念祖国。

我们回国的时候，决定有孩子的女战士暂时留下来，晚走几天。

朝鲜人民革命军是分批回国的。他们本来是根据与苏军联合作战的计划，分别沿着指定的线路投入战斗的，但因为日本突然投降，只好从不同路线分批回国了。原定在训练基地待命，准备空投到国内各地的部队，则改走陆路，经哈巴罗夫斯克、牡丹江、汪清、图们回国。后来，由于临时发生的情况，又放弃了这个计划，改乘军舰回来。那时，关东军的残余部队炸毁了牡丹江南边的隧道，甚至破坏了迂回路上的桥梁以及牡丹江机场的跑道。因此，汽车、火车、飞机都不能用。部队走到牡丹江，只好掉头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搭上军舰回国。

苏联远东第一前线军司令部的一位大校，负责我的警卫，

陪我同行。舰长对我说，以普通速度航行，一天一夜就能到达元山港。

我们驶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那天，海上起了大浪。船舷外面波浪翻滚，像山一样的浪峰不断地拍打着船舷，把海水掼在甲板上，实在壮观。

我们的人大多数是第一次坐船，一路上饱尝了晕船之苦。过了一夜，海面平静了。

在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上，极目远眺，禁不住心潮翻腾，眼前浮现出十三岁时渡过鸭绿江的情景，心想，曾因国亡而停止流淌成了冰河的鸭绿江以及祖国其他江河，如今为解放的热浪所溶化，汇成了眼前的茫茫大海。

想起我的许多至亲、挚友和革命同志长眠地下，他们的英灵留在异国他乡，而自己返回阔别二十年的祖国，禁不住心潮翻滚，悲喜交集之情，实在难以形容。

1945年9月19日，军舰驶入元山港。当时驻元山的苏军司令部成员前来迎接我们。迎接我们的朝鲜人中，记得有一个叫韩一武的人。他当时是苏联军队的军官，后来当过江原道党委的委员长。因为当时苏军把我们的回国当作秘密，没有公开，所以没有群众来欢迎。

日后，许宪、洪命熹、吕运亨等最热情地准备欢迎我们凯旋的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士，听说我们抵达元山港时没有群众欢迎，表示十分惋惜。他们说，应该通知群众夹道欢迎，那样悄无声息地回来，不是让我们百姓难堪吗。元山市党委李舟河也说过类似

的话。许宪说，如果事先公布了我们回国的日程，那么，天天聚在汉城车站等我们回来的人自不消说，就是汉城市的大部分市民也都会徒步或坐火车赶到元山港欢迎我们的。

我们丝毫也没有想过要接受什么热烈的欢迎。我们革命战士，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漫长岁月里，在战场上，在绞首架上，洒尽鲜血，献出生命，从未期望过要得到什么补偿和酬谢。

我们打定主意，回国后也不宣扬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凯旋，而是悄悄地深入人民群众，为完成建党、建国、建军三大任务打好基础，然后再同祖国人民见面。

到了元山后，通过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接触，更加意识到必须尽快地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到达元山的当天，我同元山市党委的干部见了面并谈了话，在东洋旅馆同劳动组合的代表等地方的头面人物也谈了话。其中同李舟河交谈的时间最长。

在同元山人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国内的所有党派和组织，都还没有给人民群众指出明确的建国路线。元山市党委的一些人打算建立苏维埃政权。当话题转到朝鲜的前进道路时，他们提出自己的主张说，应当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元山市党委大楼的墙上挂着一幅标语："无产阶级要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这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主张。

我看了这幅标语，问他们，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能把新社会建设起来吗？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为共产主义革命而奋斗的，除了工人阶级还能依靠谁呀。

他们的主张，同我们在20年代后期接触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大同小异。二十年后的今天，在解放了的祖国又一次听到了这种主张，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与郁闷。他们的主张和政治见解，没有多大进步，也看不出他们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什么努力。

我对他们说，“无产阶级要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这幅标语，不符合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当前任务的我国实际，应当改为在民主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要想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建设一个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民主社会，就不仅要团结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群众，而且还要团结与建设新社会有切身利益的各阶层爱国群众，把他们团结到统一战线中来，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自主独立的国家。

同元山市党委同志们的谈话，从晚饭前开始，到晚饭后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一直让我多讲讲，我也无法解脱。跟徐哲一起陪我来的金益显这时靠在我身边对我说，现在已经是午夜了，您在山上一直熬夜，现在回到祖国了，还熬夜吗？

我对他说，国家虽然解放了，但要记住，现在我们才走到了新的起点。

同元山市委干部的谈话，是我回国后本着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精神，第一次同国内人士描绘建国方略的谈话。这天，我公开提出了我国要建立的政权形式，必须是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张。

同李舟河等元山市委干部和元山市头面人物见面交谈之

后，我进一步确信，我们在八一五解放后立即制定出以建党、建国、建军三大任务为内容的建设新朝鲜的里程表，并根据这个里程表回国后立即把有关人员分派到指定的地点去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到元山后，我们立即要求已决定派往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的工作小组部分人员赶快到达指定地点，负责铁原方面的人也在同一天坐火车出发了。

他们都是为革命献出了宝贵青春，尝尽了人间苦难和不幸，又从未认真休息过的人，如今回到了解放的祖国，我却让他们马不停蹄地立即赶赴新的工作岗位，心里也不是滋味。尤其是那天还是中秋节，本想让他们在元山过节，好好休息一下，解除一下疲劳，可是考虑到国内形势紧迫，只好狠着心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在火车上过了中秋节。那天的火车上还挤满了去上坟祭祀的人。

那天派去的人，有金策、安吉、崔春国、柳京守、赵政哲等，他们跟我分手时很难过，依依不舍。

我也很难过，尤其是抗战时受了重伤的崔春国和赵政哲，互相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上火车朝我挥手的时候，我心如刀绞。他们受了伤，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条件下，硬作的手术。他们拖着伤残的腿，披荆斩棘，走过了多少血路啊！他们理应在解放了的祖国享受荣誉军人的待遇，养养伤，解除一下抗战多年的疲劳。可是他们连几个小时的休息都得不到，径直奔向了北方指定的地点。

在我们建设富强的自主独立国家的道路上，横亘着无人走过的重峦叠嶂。要翻越这些重峦叠嶂，还需要继续流血流汗。抗日大战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同样，新社会的建设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我们要走的这条路，如果不是无人走过的初辟之路，如果不是横亘着千山万水的艰险之路，我们也不会那么急着上路的。

我一再叮嘱金策，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回家乡看看。对崔春国、柳京守、赵政哲、李乙雪也作了同样的叮嘱。他们的家都在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但是，他们都没有回过家。这不是因为他们不热爱自己的家乡，而是因为他们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家说我解放后在去降仙炼钢厂的路上，没有去近在咫尺的万景台，因而有了《万景台岔路口》这支歌。其实，所有抗日革命战士解放后都没有回过家乡，都在为建党、建国、建军而紧张地工作。

“没有完成司令官交给的任务，就没有死的权利”，这就是抗日革命战士的信条。

如上所述，我们从踏上祖国大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深入人民群众。抗日革命战士还没来得及解开在白头山系紧的鞋带就奔到新的战斗岗位去了。他们知道，自己被派去的地方就是新的战场。我们凯旋祖国，与其说是凯旋，不如说是为革命谱写新篇章的战略性转移。

1945年9月20日，我同前往西海地区工作的同志们一道，搭上开往平壤的列车离开了元山。

驻北朝鲜苏军司令部代表从平壤专程赶到浮来山车站接我

们。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热烈地祝贺我们凯旋祖国。

9月22日上午，我们抵达平壤。留在训练基地的女战友，11月底经咸镜北道先锋回到了祖国。金正淑一到清津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她的行程。她们一行在安吉、崔春国、朴永纯等清津工作小组的帮助下，为执行建党、建国、建军三大任务，积极开展了群众政治工作。在清津，金正淑察访了清津炼铁厂、古茂山水泥厂、富宁冶金厂等一些工矿企业和文教单位，对各阶层群众做了政治工作。其间，她会见了工人、农民，职员、家庭主妇，会见了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还同中学生见了面。

清津市的人民群众隆重热烈地欢迎金正淑。《新路新闻》以《金正淑女士的半生》为题，在头版上热情地介绍了她的革命生涯。

金正淑在北方城市感受很深，到了平壤后还老是谈起在清津的体验和见闻，诸如她同中学生们一起照相的情景，罗津冷面馆招待她们一行丰盛午餐的情形，等等。

年幼的金正日也随着女战士们一道回来了。

我回到平壤后，从第二天开始就同战友们一起执行建党、建国、建军三大任务。这一段是解放后我过得最忙碌的时候。

凯旋后的主要工作，仍是做人的工作，做人民群众的工作。一方面，到工厂、农村和街道跟群众交谈，一方面同在白头山一样，在办公室和宿舍里跟战友们一起生活和工作，会见来自国内外的各阶层人士，共商国事。

战友们都劝我，应该先回万景台看望祖父祖母，尽尽孝心。

林春秋见我怎么劝也劝不动，就不声不响地擅自到了万景台，假装过路人，打听了我家亲人的情况，回来后都告诉了我。托他的福，我知道了家里的详细情况。

9月底，不知怎么泄了密，我已凯旋祖国的消息传遍了平壤城。我叔父金亨禄听到消息后，跑到平安南道党委要求同我见面。林春秋问他说，你的侄子有什么特征。

我叔父回答说：“我侄子本名叫金成柱，他小时候在万景台，都叫他曾孙。他一笑，脸上就现出酒窝。”

当天晚上，林春秋就把我叔叔领到我的住处来了。

叔叔见了我，激动地刚说了一声“你受了多少苦啊！”就说不下去了，两眼不住地流着眼泪。我心想，他所以悲痛，是因为他想起了在异国他乡成了无主孤魂的亲骨肉；想起了自己在这二十年间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悲惨遭遇。是的，我叔父这二十年的经历是令人肝肠寸断的。

“直到你光复了祖国凯旋，我只顾养家糊口，一次也没能给哥哥嫂子祭奠扫墓。他们的生命怎么那么短暂啊！”

他仔细地把我端详了一阵，心疼地说，你过去，脸那么细白，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粗糙，准是白头山的风霜残酷无情吧。

其实，他脸上的皮肤更粗糙，比二十年前衰老多了。满脸的皱纹，仿佛在述说着他一生的苦难，使我不禁流下了眼泪。

“要是白头山离得近，还能编些草鞋给你们送去，可是这二十年来，我一点也没能帮上你们。”

“叔叔，您可是守住了咱们的家啦。”

这天，我跟亨禄叔谈了一个通宵。第二天，送他回万景台，嘱咐他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见到了我。他答应了。可是他回到万景台，还是悄悄地告诉了祖父，说我已回到了平壤。

我祖父对他说：“果不出所料啊。白头山能变，我们的成柱不能变！现在流传着什么‘全罗道金日成’，‘咸镜道金日成’的说法，朝鲜大地上哪有那么多的金日成啊！”

10月9日，我去看了降仙炼钢厂，接着创建了我们的党。10月14日，才在平壤市群众欢迎大会上，第一次同祖国人民见了面，向祖国人民表示了问候。

我根本没有想过在热烈盛大的欢迎大会上同祖国人民见面。然而国内人士和我的战友们坚持要举行盛大的大会欢迎我们。

我曾在一次集会上没有用金永焕这个假名，而是第一次公开使用了我的真名。那天，有一个人走上讲台要求举行全国性群众大会欢迎我。

与会者热烈响应，一致赞同这一建议。

平安南道党委和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背着我筹备了欢迎我的大会，在牡丹峰下的公立体育场搭好了彩牌楼和临时舞台。

我曾告诉金容范不要搞大型活动。可是平安南道党委根本不听，他们在市内的大街小巷贴出告示，通告我已到平壤，于10月14日在公立体育场同祖国人民见面。

1945年10月14日中午，我坐车前往公立体育场，看见大街上、广场上人山人海，不禁大吃一惊。会场上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外的大树上、最胜台上、乙密台上，都站满了人。在会场内

外热烈欢呼的声浪中，我频频地向欢腾的群众挥手致意。

苏军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齐斯查可夫大将和列别捷夫少将也出席了欢迎大会。

大会上，有很多人发表讲话，曹晚植也讲了话。我还记得，他的讲话中有一段很逗趣儿的话。他以卖乖的腔调说：“听说国家解放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好像在做梦。为了证实我不是在做梦，我撸起衣袖狠掐自己的胳膊。”他真地作出掐皮肉的动作说道：“这么掐，是的，就这么掐，嗨，掐得生疼啊。”

当我走到讲台的时候，群众齐声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

听着这惊天动地的欢呼声，顿时觉得二十年的疲劳烟消云散了。群众的欢呼声犹如一股热浪，温暖着我的心。

站在讲台上所感受到的十多万群众的火热情意，使我心里涌起了用尽天下最美丽的词藻也形容不出的幸福感。如果有人问我，哪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就是此刻。此时，我感受到了作为人民的儿子，为人民而进行斗争的幸福，感受到了人民关爱我、信赖我的幸福，感受到了置身于人民怀抱之中的幸福。

1945年10月14日平壤公立体育场上的欢呼声，可以说是祖国人民对我们为祖国和人民千辛万苦奋斗了半生的嘉奖和酬答。我接受了这个酬答，并把它当作人民群众对我的爱护和信赖珍藏在心间。我常说，天下哪里还有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护更幸福的呢！

我一向认为，人民的热爱、人民的拥护，是衡量一个革命者的存在价值、决定他能享有多大幸福的绝对标准。如果一个革命者失去了人民的热爱和拥护，他还拥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

资产阶级政客是用金钱拉拢群众的，而我们则是以献出自己的血汗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的。我为人民信赖我而感到幸福，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所能享受到的最大的幸福。

我在欢迎大会上讲话的重点是民族大团结。我号召说，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钱出钱，都为神圣的爱国事业做出贡献。全民族要团结一致，在祖国疆土上建设一个富强的自主独立国家。

对我的号召，群众以震天动地的掌声和欢呼声表示热烈的响应。

当时的《平壤民报》以《震撼锦绣江山的四十万人的欢呼声》为题，对1945年10月14日平壤公立体育场上的盛况，作了如下的报道：

“平壤有四千年悠久历史，有四十万人口，然而，何曾有过如此众多的市民汇聚一堂的盛况，何曾有过意义如此重大的聚会？

“这次大会的深远历史意义在于，朝鲜的伟大爱国者、平壤出生的英雄金日成将军亲临大会，高兴地向人民表示了热情的问候和勉励，与会群众无比感动……当全体朝鲜同胞最崇敬、最渴望的英雄金日成将军英姿飒爽地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场立即爆发出了震撼大地的欢呼声，几乎所有的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从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中，仿佛看见了群众的钢铁般的决心：‘要跟他一起战斗，要跟他休戚与共，同生共死！’”

那天的群众大会，可以说是我国人民在建设新社会的长征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在会场上，我还见到了玄养信婶母和康用锡舅父。大会结束后，我从主席台走下来跟婶母见了面。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还催人泪下。

那天不知她是怎么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进入会场的，朱道逸见她不顾一切地朝主席台挤，就把她请到了我的车子上。她坐在车里一直簌簌地流泪。

她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不已地说："大侄啊，多少年没见了！"我简短地问候说："婶婶，您操持着一个大家庭，受苦啦。"

"要说受苦，你在山上打仗受的苦才是大苦。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家里，算什么苦啊。我上这儿来，一路上还提心吊胆的。听我老头子说大侄回来了，可我怕不是你，心想如果是'全罗道金日成'可怎么办呀。到这儿往台上一看，没错，是我们的大侄，你不知我有多高兴啊……"

婶母说着，又潸然泪下，抽泣起来。

我的战友们看见她哭，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婶婶，整个平壤都在欢笑，跳舞，都这么高兴，可您老哭什么呀？"

"看到了你，想起了你的妈妈和爸爸，就忍不住哭了。要是你爹妈都还活着，听了你的演说，该多高兴啊。"

"婶婶，今天您可代替了我的母亲呀。"

我这么一说，婶母就一头扑在我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我知道婶母是在为我的母亲恸哭。我母亲和婶母相处得比亲姐妹还亲。听说婶母是十五岁时嫁到我们家的。那时候我们家很穷，日子很苦，她总感到不舒心。自从受到我母亲的爱护体贴，才跟婆家有了感情。

我母亲在世时，对婶母格外关心，体贴入微。下地干活，总是一起去。在地里歇息时，我母亲总是让好发困的婶母枕着自己的腿眯一会儿，等婶母睡着了，就轻轻地替她梳理头发。婶母就是这样在我母亲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中生活的，所以她一直念念不忘我的母亲。我母亲去世时，婶母为未能去安图参加葬礼，未能在我母亲的灵前磕头，感到十分难过。

婶母接着我的话说：“我这个没出息的婆娘，就是一百个也抵不上你母亲一个人啊！大侄啊，今天好像你母亲的英魂飞到这体育场来啦。”她说着，便用短袄上的飘带擦眼泪。她哭一阵又笑一阵，还讲了跟我亨禄叔父大闹了一场的事。她说：“我那个鬼心眼儿的老头子，背着我一个人跑到城里来见了你，可一直把嘴封得很严，到了昨天才告诉了我。为这事儿，我跟他大吵了一场。我对他说：‘老头子，你说金日成是你的侄子，就不是我的侄子了？’可他没头没脑地说：‘胳膊肘往里拐，不往外拐’。”

那天下午，我同叔父、婶母一道回万景台，走的不是现在这条路，是坐车到顺和江渡口，改乘渡船过江。江岸上的烂泥滩跟从前一样，放着稀稀拉拉的垫脚石，供人踩着过去。我小

时候，卷起裤腿，在这里抓过河螃蟹。

走出烂泥滩，我徒步走进村里。最先迎接我的是很有节奏的捣衣声和从万景峰矮松林飘来的清香。那捣衣声是那么熟悉悦耳，那矮松林的清香是那么沁人心脾，至今不能忘怀。从葛梅地平原传来的拖着长长余音的牛的哞哞叫声，使我闻到了阔别多年的乡间气息，我顿时感到心潮激荡，喉咙梗塞。

想当年我小的时候，因思念囚禁在监狱中的父亲，躺在炕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就像是昨天的事，可是不知不觉，我已经三十三岁了。难怪古人把岁月的无情流逝形容为光阴似箭。

亡国四十年后收复了祖国，离家二十年后回到了故乡。我不禁心想，为了祖国和故乡，我们奉献的岁月太多了。

亡国在瞬间，复国需千年。这是我在抗日革命二十年中领悟到的重要教训。就是说，一个国家丧失容易，夺回很难。

为了夺回在一瞬间失去的祖国，需要苦斗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是这个星球上屡见不鲜的严酷现实。

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经过了二百多年才获得独立，这是尽人皆知的。其他一些国家也都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菲律滨和印度尼西亚各花了三百多年，阿尔及利亚花了一百三十多年，斯里兰卡花了一百五十多年，越南花了近一百年。

正因为这样，我常常告诫年轻人说：失去了祖国，活着也如同死亡；要想不做亡国奴，就要好好保卫祖国；不要失去了祖国后再悲伤恸哭，而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哪怕是一块石头，也要拿来把祖国的围墙筑得更高。

回到乡里，看到一个只有两三岁穿着开裆裤的小男孩，站在路边朝我们一行人挥动小手的情景，至今难忘。这个似乎不足挂齿的情景，我看到后不知为什么，感到心中激荡着一股暖流。在这和平的世界、恬静的乡村，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地挥手的儿童，分明是新朝鲜的象征。

当我随婶母跨进老家院子的时候，顿时心潮汹涌，百感横生。二十年前觉得挺宽敞的院子，如今却觉得像巴掌那么窄小。但一想到这是我二十年漫长的艰苦行军所到达的终点，油然产生了从无边无际的万顷浪涛中登上了陆地之感。

在瞧见那熟悉的老家屋檐的刹那间，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因为眼前浮现了一种幻觉：仿佛看见了我小时候给我唱催眠曲、哈气暖我冻红的小手的父亲和母亲，看见了像春天的落花一样长眠在地下的父亲和母亲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大声喊着“成柱”，跑出来张开两臂拥抱我。

我祖父连鞋子都没顾上穿，从屋里奔到院子里，双手抱着我，泣不成声地说：“我们的长孙回来了，让我看看！”祖母见了我，说：“你把爹妈丢在哪儿，一个人回来了？……一起回来就不成吗？……”说着，放声哭了。

那天，我拿出从平壤带来的酒，给祖父和祖母敬酒：

“爷爷、奶奶，请恕罪，我三十多了，从未尽过孝。”

“别说了，你实现了你爸爸争取朝鲜独立的遗愿，这就是孝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孝道吗。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就是孝道。”

祖父说罢，轻轻地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绽出笑容，

说："今天的酒，味道真好。"而他的手却微微发颤。这天，祖母也高兴地喝了一杯。

可是，我怎么也摆脱不掉不仅没能为祖父、祖母尽孝，反而一直让他们为我操心，为我担惊受怕的万分愧疚心情。"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就是孝道"，祖父的这句话，多么使我感动啊！

南里的乡亲都聚到我家来了。斗团里和楸子岛的人听到我回来的消息，都成群结队地来到了我家。小时候的伙伴们也都带着吃的东西络绎不绝地来看我。

简朴的团圆饭自然成了几十人参加的群众宴会。好多人高兴地唱歌跳舞，表示对我的欢迎。在我曾祖父金应禹那一代时就受到我家不少周济的崔老人，也和着《宫尼里谣》跳起舞来。婶母还唱了我父亲作的歌《催眠曲》。

那天晚上，我睡在旧居里，这是我离家二十年后的第一次。那天，我们家刚扒了炕，门也没有安。炕还没有干，上面铺着麦秸、稻草和一张草席，还不能睡人。

祖父对我说，今天只好委屈你到别人家去过夜了。还说他已经跟那家说好了。

我对他说："我们在山上可不是享清福的，餐风宿露，蓝天当屋顶，枯草落叶当被褥。今天回到了温暖的家，干吗要到别人家借宿呢。我要在家里睡。"

祖父听了，顿时满面春风，高兴地说："要这样，那我就跟那家说不去了。说也是，回到了离别二十年的家，竟到别人家去借宿，确是不够味儿的。"

祖母在草席上给我铺上了已用了几代的粗棉布被褥。那被面和被里都是祖母亲手纺线织成的。夜深人静时，祖母伸出一支胳膊让我当枕头枕着，轻声问我：

“是在山上娶了媳妇吗？媳妇也是在山上的？”

“是的，是跟我一起打游击的。”

“你儿子的长相像你吗？”

“都说像我。”

“那就好啦。”

她还问了许多别的事情。我怕祖母的胳膊疼，问她：“奶奶，我的头够沉吧。”“沉什么呀。”她说着把胳膊伸得更长，让我枕得更舒服。她对我这个已经三十多岁的孙子，还像小时候那样伸出胳膊让我当枕头枕，我心里热乎乎的，激动之情难以自己。

“国家解放啦，该把躺在满洲的爸爸妈妈的遗体移到故乡来了。”这是那天夜里祖母谈的最后一个话题。她关心这事，是很自然的，惦记着子女的遗骸，希望把子女的遗骸迁到故乡来。祖母的这一心愿，我能不知道吗？

“奶奶，迁父母的墓当然很重要，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是要先找那些我的恩人，如：在烟浦里酒店帮我父亲逃脱的姓黄的人，柞树岭的全州金氏老人，从伤寒病的死神手中救出了我的赵氏老人。我应先找到他们，然后再去迁墓。”

“好，你想的对。这样，你那躺在阳地村的父亲也会高兴的。”那天，我通宵给祖母讲了在吉林、间岛和白头山时给予我

帮助的战友和亲朋好友的事迹，满含着眼泪回忆了永远安睡在异国他乡无名山岗的父母、亨权叔叔和哲柱弟。祖母听着，不时地低声抽泣。

她强忍着呜咽，抚摸着我的手臂，安慰说：

“你的爸爸妈妈虽然都走了，可是正淑进了我们的家门，还有了正日，已经可以传宗接代了嘛。”

我静静地回顾在白头山和满洲的冰天雪地上驰骋的情形，回忆未能和我一起回到祖国的许多战友的音容笑貌，回忆许多救我脱离了险境的恩人，回忆我小时候的种种往事，也预想我们将要重建的新国家的未来。

在时隔二十年后，在解放了的祖国度过的家乡万景台的一夜，是和平宁静的一夜。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两个月了，祖国光复也已两个月了，三千万朝鲜人民仍怀着解放的喜悦沉于梦乡。

然而，三千万同胞没有一个能想到，继祖国的解放而来的竟是国土的分割、民族的分裂，更没有料到这一巨大的国难会持续半个世纪之久。

注　　释

[1]　《催眠曲》：系朝鲜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金日成同志的父亲金亨稷先生为把金日成同志培养成为爱国者而亲自创作的歌曲。他同金日成同志的母亲康盘石女士一起经常唱给年幼的金日成同志听。歌词如下：

一　小宝宝睡吧睡吧快快入梦乡，
　　小宝宝睡吧睡吧睡得真甜香。
　　要做家庭和睦童，要做父母好孝子，
　　掌上明珠我们宝宝定将成英雄。

二　小宝宝睡吧睡吧快做小学生，
　　小宝宝睡吧睡吧快做大学生。
　　将来要做大博士，要做英雄好汉，
　　愿你把我国光复大业胜利完成。

[2]　《鸭绿江之歌》：亦称《渡江歌》。系三一人民起义(1919)之后创作的革命歌曲，它反映了朝鲜人民被日寇夺取国家的悲壮爱国感情。金日成同志在十三岁那年，怀着光复祖国的雄心壮志渡过鸭绿江时唱了这首歌，歌词如下：

一　1919年3月1日，
　　是我渡过鸭绿江的日子。
　　年年都有这一天，
　　达不到目的誓不回还。

二　碧绿的鸭绿江水啊，美丽的祖国河山啊！

　　我回家乡的[illegible]竟是哪一天？

　　只因有毕生难忘的志愿，

　　不光复祖国誓不回还。

[3]　《朝鲜之歌》：系金日成同志在抗日斗争初期创作的革命歌曲，歌词如下：

一　我们祖国朝日鲜明灿烂，

　　国家名称因此叫做朝鲜。

　　锦绣江山如此娇娆美好，

　　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媲艳。

二　三千里江山宝藏取不尽，

　　历史悠久光耀长五千年。

　　一致奋起赶走万恶日寇，

　　把祖国解放的钟声敲响。

三　打倒日寇地主建新朝鲜，

　　自由国土上立我们政权。

　　勤劳智慧的人民和睦相处，

　　靠我们双手让祖国昌盛。

[4]　跳神：朝鲜民俗剧之一，一个人连讲带唱，还配合舞蹈表演，引人发笑。

[5]　腰营沟会议：系主体24年(1935年)3月21日至27日，在中国汪清县腰营沟举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会上，金日成同志指出，必须克服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并提出了撤销游击区，挺进到广阔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方针与任务。

[6]　反“民生团”斗争：1932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内部瓦解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间岛地区网罗反革命间谍走狗组成“民生团”。后来，“民生团”[illegible]，日寇只好于1932年7月解散了这个组织，但他们却耍阴谋诡计说这个组织在革命队伍里仍然存在。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们中了日寇的奸计，对反“民生团”斗争采取了极左的行动，肆意把朝鲜人打成“民生团”加以陷害。这样，许多坚贞的革命者遭到牺牲，在革命队伍里造成了不安与恐怖气氛，使革命队伍的统一与团结以至朝鲜革命受到了莫大损失。金日成同志对此坚持原则进行了斗争，使反“民生团”斗争的左倾偏向得到了克服。

[7]　张鼓峰事件：亦称“哈桑湖事件”。1938年7月29日至8月10日，日寇为了侦探苏联的边防能力，并占领哈桑湖以西张鼓峰，以建立进攻远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对哈桑湖地区的武装进攻。

[8]　哈勒欣河事件：亦称“诺蒙坎事件”。1939年5月28日，日寇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勒欣河地区，其目的是：强占蒙古的东部突出地带，控制苏联并卡断西伯利亚铁路，进而占领远东地区。

[9]　大荒崴会议：1935年2月24日至3月3日，在中国汪清县大荒崴举行的党及共青干部会议。参看本书中文版第4卷，第28～65页。

[10]　热河远征：参看本书中文版第7卷，第61～75页。

[11]　青山里战斗：指1920年10月在间岛一带活动的朝鲜独立军于中国吉林省和龙县青山里消灭了大批日寇的战斗。

[12]　火曜派：朝鲜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于1923年5月组织了新思想研究会，

1924年11月，把这个组织用马克思出生的星期二(火曜日)命名为火曜会。因1925年建立的朝鲜共产党内有好几个派系，它就被称为火曜派。火曜派专事派别斗争，分裂当时的朝鲜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最后导致了朝鲜共产党于1928年解散。解放(1945年8月15日)后，火曜派又对南朝鲜的党组织进行破坏，葬送了人民的革命斗争。它潜入共和国北半部后进行种种阴谋活动，企图破坏朝鲜劳动党；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居然筹划颠覆党和政府的阴谋。1952年12月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被肃清。

［13］ ML派：20年代中期出现的称之为列宁主义者同盟的宗派，故名ML派。由于ML派以及其他宗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朝鲜共产党建党(1925年)后3年就被解散了。党解散后，派系斗争仍持续。解放(1945年8月15日)后，ML派破坏南朝鲜的党组织，葬送了群众运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同敌人狼狈为奸，筹划了颠覆党和政府的阴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956年8月全会上被肃清。

［14］ 赵基天：参看本书中文版第5卷注释。

［15］ 郑宽澈(1916．11～1983．12)：画家，平壤人，从1949年起至逝世，任朝鲜美术家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他创作了描写金日成同志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组织并指挥普天堡战斗的《普天堡的火炬》和刻画金日成同志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骑着白马的形象等大量的美术作品。

［16］ “卡普”：1925年以进步的作家与艺术工作者组建的“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的别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于1935年被解散。

［17］ 四月南北联席会议：参看本书中文版第4卷注释。

［18］ 卫正斥邪运动：是为了保卫国家免受外来侵略，以爱国儒生为中心开展的攘外运动。这一运动始于18世纪末儒生进行的反对欧美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19世纪末，日寇对朝鲜的侵略活动变本加厉，参加这一运动的儒生又转入了反日义兵运动。

［19］ 甲午农民战争：1894年至1895年，全罗道农民为反对封建统治集团与日寇而发动的战争。因战争爆发的1894年是甲午年，故名甲午农民战争。